



资本主义： 概念、理念、图像

论当代马克思《资本论》的若干面向

编者：

彼得·奥斯本

埃里克·阿利耶

埃里克·约翰·拉塞尔

封西编译组

资本主义： 概念、理念、图像

论当代马克思《资本论》的若干面向

[英]彼得·奥斯本 [法]埃里克·阿利耶 [美]埃里克-约翰·拉塞尔编

本书由封酒编译组翻译整理，仅供学习交流使用，不具有出版属性，仅以完全免费形式进行分享，如您看到任何付费信息，请不要相信！

本书可能有不妥或水平欠佳之处，敬请读者谅解，如有纰漏，请通过电子邮箱：sealed_alcohol@163.com及时反馈给我们，感谢长期以来对封酒编译组的支持。

目 录

导论	1
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	3
价值形式、本体论和政治	19
1. 形式分析与批判：马克思的社会劳动价值理论	21
2. 迈向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普遍剩余价值到总体吸纳	35
3. 从商品到景观：德波的马克思	57
4. 今日马克思式本体论	87
资本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再生产	101
5. 从价值的生产到再生产的价值化	103
6. 社会再生产与种族化的剩余人口	117

自由、民主和战争	127
7. 自由之日，渐趋黯淡：《资本论》、翻译与资本主义 再封建化	129
8. 《资本论》的“命运偏移”：作为事件与任务	157
9. 主体化与战争：马克思与福柯	179
《资本论》/资本的诗学	195
10. 《资本论》的诗学	197
11. 货币的回流：《绝命毒师》中的非法积累与辖域化	213
作者简介	243
索引	249
后记	253

导 论



资本主义：概念、理念、图像

彼得·奥斯本（Peter Osborne）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为其“拱廊街计划”（Arcades project）撰写的笔记中留下名言：“我们这代人的切身体验是，资本主义不会自然死亡。”¹而阅读本书的世代所体验到的则是：除非一切都遭到毁灭，否则资本主义在有生之年根本不可能灭亡。事实上，若以生产方式变革的历史尺度来衡量，那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非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实验——在俄罗斯与东欧地区的实践，不过在三十年前才黯然落幕；与此同时，第二个实验体已开始明确拥抱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中国于 1986 年启动加入世贸组织谈判，十五年后才于 2001 年正式加入）。当“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消亡之后，以数字化为根基的资本市场的全球扩张，催生了新型金融资本积累体制，我们可称之为“超级资本主义”（*Überkapitalismus*），这种特定意义上的“全球化”进程，迄今仅走过三十载。2008 年该体制首次遭遇重大危机，复苏之路至今仍缓慢而曲折。尽管危机效应催生了“资本主义必将在可见的历史时期内终结”的思潮，²甚至衍生出“其终结已经开始”的观点，但那些基于技术乐观

¹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trans. Howard Eiland and Kevin McLaughlin,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Belknap,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X11a,3], p. 667.

² Wolfgang Streeck,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6.

主义、忽视社会关系本质的“后资本主义”预言，终究只是镜花水月的空想。³

随着全球金融化的超级资本主义新体制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被左翼阵营逐渐消理解，学术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兴趣得到了显著的复苏，逆转了前十年逃离马克思主义的潮流。⁴当列宁与斯大林作为政治纪念品被移入后苏联时代的文化花园时，《资本论》却日益显现出把握当下历史时期根本社会结构与动态的独特价值。事实上，资本生产与流通的基本过程，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社会关系，作为对其的理论阐述，并随着资本关系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广泛地普遍化，并过度决定着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这种趋势源于民族国家形式对跨国资本再辖域化逻辑的臣服），《资本论》的当代相关性正与日俱增。（资本的跨国形式正是常被称为“全球”的非对称结构整体的内在表达。）2008 年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复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知。⁵《资本论》重新成为了广泛研读的经典，尤其是在英语世界。⁶如果说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左翼力量在危机后的十年间取得了何种意

³ 例如参见：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 *#accelerate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2013), <https://syntheticeidifice.wordpress.com/2014/03/13/accelerate-manifesto-for-an-accelerationist-politics>; Paul Mason, *Postcapitalism: A Guide to Our Future*, London: Penguin, 2016. 施特雷克更为谨慎地写道，在所谓“新秩序”出现之前，存在一个危机重重的“后资本主义过渡期”（*How Will Capitalism End?*, p. 46）。然而，这种危机四伏的局面究竟有何“后资本主义”特征，目前仍不明确。

⁴ 总部位于英国的期刊《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研究》（*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search in Critical Marxist Theory*）创刊于 1997 年。美国《反思马克思主义：经济、文化与社会期刊》（*Rethinking Marxism: A Journal of Economics, Culture and Society*）（创刊于 1988 年）于 2003 年转由一家大型学术出版社出版。

⁵ 参见 Peter Osborne, ‘A Sudden Topicality: Marx, Nietzsche and the Politics of Crisis’, *Radical Philosophy* 160 (March/April 2010), pp. 19–26, www.radicalphilosophyarchive.com/article/a-sudden-topicality.

⁶ 促使我重读《资本论》的契机之一，是 2010 年网上发布的 2007 年秋季大

意识形态胜利的话，那当属令公众重新意识到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充满冲突的社会形式，这种形式与“市场”话语中自然化的个人主义相对立，而这种对立已被新自由主义国家形式推向了自我毁灭的境地（尽管这种觉醒或许更多源自危机暴露所加剧的不平等现实，而非特定政治斗争的结果）。⁷在英国，工党作为左翼政党的复兴，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不再“理所当然地”接受各种基本不平等现象，这些不平等被经济自由主义者辩护为“有益”市场带来的“自然”结果——尽管这种转变产生的民众情绪被错误导向了排外的民族主义浪潮。

2017年9月正值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这一时间节点颇具象征意义。在诸多纪念活动中，本书所辑录论文来源的那场学术研讨会显得尤为特殊，它竟由哲学研究中心主办，⁸该中心侧重后康德欧洲哲学，不同于曾于80年代短暂流行的对马克思进行阉割式解

6

卫·哈维在纽约城市大学讲授《资本论》的课程视频：<http://davidharvey.org/reading-capital>。关于此次《资本论》研读热潮中过度依赖英语媒介所产生的问题，可参阅下文第七章鲍里斯·布登与第十章凯斯顿·萨瑟兰分别撰写的讨论。

⁷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2013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Le Capital au XXI Siècle*, trans.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Belknap,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在全球范围内的成功，既是这场思想复兴的征兆，又进一步推动了其发展。这部方法论传统的经济史著作，通过锲而不舍地用统计数据聚焦不平等现象加剧的趋势，并重新启用“资本”这一术语，不经意间为马克思主义视角重新进入公共讨论领域提供了正当性。

⁸ “资本主义：概念与理念——马克思《资本论》问世150年：当代资本的哲学与政治”，该会议由伦敦金斯顿大学现代欧洲哲学研究中心(CRMEP)主办，2017年10月13日至14日于伦敦康威堂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召开，巴黎第八大学(圣但尼校区)哲学系提供特别经费支持。

⁹ 这是路易·阿尔都塞等人所著《读〈资本论〉》(1965)开篇部分的标题，由

仍成问题地保留了哲学概念自足性的虚幻构想，只不过将其置换为某种非历史化的“理论”形式。究其根本，在于我们相信：延续后康德欧洲哲学的深层思想脉络，在当今最恰当的方式是将其发展为一种**跨学科批判实践与概念构建方法**。这种实践要求，在最高普遍性与抽象性层面展开批判，包括对现存学术分工体系的批判，该体系将概念通过唯心主义式的方式物化为自足的“哲学”概念；同时建构出能自觉观照自身社会历史条件的概念范式，——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上述两方面皆堪称典范。

概念（资本与资本主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坚持将“经济”（需求体系的历史社会形式）研究的焦点置于财富作为资本的积累条件，而非仅关注劳动或市场交换，这使经济分析从研究个体行为的理论转变为剖析社会关系的理论：特别是“社会劳动价值论”（参见下文第一章），该理论通过剩余价值理论，将贯穿所有“具体”劳动形态的资本主义积累概念化为剥削。的确，
7 正是论证剩余价值时，“撇开了它的特殊形态——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因而我们可以说，价值作为**社会抽象**的特殊地位，被马克思本人视为其著作中两大“最佳创见”之一。¹⁰另一个发现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具有“二重性”，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分别表现为使用

阿尔都塞本人撰写。 *Reading Capital: The Complete Edition*, trans. Ben Brewster and David Fernbach,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6, pp. 9–72.

¹⁰ Marx, letter to Engels, 24 August 1867,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ume 42: *Letters 1864–1868*,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7, p. 407.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上，中文第一版，1972，第331页。

价值和交换价值。艾蒂安·巴利巴尔指出，这两个发现导致了两种不同的资本主义概念：一种关注普遍商品化，另一种则聚焦剥削劳动力的不同方式。¹¹然而在分析上很难将它们区分开来，因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区分正是马克思价值概念的基础所在。然而在历史上，对不同维度的侧重衍生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流派：卢卡奇（Lukács）与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传承了商品化的分析脉络，而特隆蒂（Tronti）及其开创的意大利工人主义（Italian Workerism）和后工人主义（post-Workerism）则延续了剥削分析谱系。借用阿多诺的隐喻，这恰似马克思主义整体“断裂的两半”（torn halves），它们“终究无法拼合成完整的整体”。¹²

在强调雇佣劳动作为“抽象”劳动在历史上的特定社会属性时，《资本论》将经济分析从道德与行为心理学的领域（可追溯至亚当·斯密 1759 年《道德情操论》），这一领域如今再度活跃于新古典经济学中，转向了二战后学科分类意义上的社会学领域。即便在那些明确承认《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三卷所共用的副标题）哲学维度的语境中，这种转变依然显著。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历史，从 1931 年成立到 60 年代末，历经了流亡与回归，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一场围绕学科性问题的斗争史。这场斗争在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之后展开，而学科性本身具有双重意涵：既是思维形式，又是制度形式。¹³值得注意的是，

8

¹¹ 参见 Étienne Balibar, ‘Marx’s “Two Discoveries”’, trans. Cadenza Academic Translations, www.cairn-int.info/article-E_AMX_050_0044--marx-s-two-discoveries.htm, *Actuel Marx* 50 (2011/12), pp. 44–60.

¹² 参见 Adorno to Benjamin, 18 March 1936, in Theodor W. Adorno and Walter Benjamin, *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1928–1949*, trans. Nicholas Walk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p. 130.

¹³ 参见 Peter Osborne, ‘Problematizing Disciplinarity, Transdisciplinary Problematic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32, nos 5–6 (September–November 2015), pp. 3–

在这方面对《资本论》最富哲学意味的解读之一——德国“新马克思阅读”学派（*Neu Marx-Lektüre*），源自阿多诺 1962 年夏季题为“马克思与社会学理论基本概念”的讲座。¹⁴而且，尽管这种解读充满黑格尔主义色彩，它仍在某种程度上顽固地围绕着“社会”这一概念。¹⁵《资本论》具有多重哲学维度这一事实，且这些维度无法被机械地割裂为“马克思的哲学”而独立于全书其他内容，这一事实如今已获得广泛认同。确实，欧洲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以来对《资本论》的主要批判性解读流派，在哲学取向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法国学派”（阿尔都塞式/结构主义）、“意大利学派”（特隆蒂式/行动主义）与“德国学派”（阿多诺式/批判黑格尔主义）形成三足鼎立之势。¹⁶各派围绕马克思巨著发展出独具洞见的阐释体系，如今它们常以不稳定甚至矛盾的组合形态，共

35, 18–21, <http://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0263276415592245>.

¹⁴ ‘Theodor W. Adorno on “Marx and the Basic Concepts of Sociological Theory” from a Seminar Transcript in the Summer Semester of 1962’,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26, no. 1 (2018), pp. 154–164.

¹⁵ 关于“新马克思阅读”，参见 Hans-Georg Backhaus, ‘On the Dialectics of the Value-Form’ (1969), trans. Michael Eldred and Mike Roth, *Thesis Eleven* 1 (1980); 以及更一般地，Riccardo Bellofiore and Thommaso Redolfi Riva, ‘The Neue Marx-Lektüre: Putting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back into the Critique of Society’, *Radical Philosophy* 189 (January/February 2014), pp. 24–36, www.radicalphilosophyarchive.com/article/the-neue-marx-lekture. 连同 Peter Sloterdijk’s *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 (1983; trans. Michael Eldred,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8), “新马克思阅读”构成了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在阿多诺之后、非（且反）哈贝马斯的两条主要发展路径之一。

¹⁶ 关于“法国式”与“意大利式”解读之间的差异，参见 Étienne Balibar, ‘A Point of Heresy in Western Marxism: Althusser’s and Tronti’s Antithetic Readings of *Capital* in the Early 1960s’, in Nick Nesbitt (ed.), *The Concept in Crisis: ‘Reading Capital’ Today*, Durham NC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93–112. 当然，各国的情境在内部更为复杂，例如 米歇尔·亨利（Michel Henri）的法国现象学式解读所显示的那样。Michel Henri, *Marx: I, Une Philosophie de la réalité; II, Une Philosophie de l’économie*,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76; 英文节选版为 *Marx: A Philosophy of Human Reality*, trans. Kathleen McLaughlin,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生于国际英语学界“批判理论”的翻译文化场域中。

将经济价值，尤其是资本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一方面是商品化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是对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不是新古典意义上仅仅作为用于生产商品或服务的耐用物品，包括货币），会改变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性理解。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的发展，这一历史性转变（包括把劳动力作为“可变”资本）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实践中最基本且本质上**充满冲突**、对抗的结构的历史性变迁。因此，基于马克思资本概念的资本主义观，与任何以“市场”概念为基础的概念有着根本不同；尽管市场（以及更广义的交换关系）当然是资本基本社会关系的表现和显现方式的核心，作为受法律规制的交换形式。如今，这一概念往往包含了那些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末尾将其置于历史形成的“所谓原始（*ursprünglich*）积累”的持续性形式，即那些“剥夺式征用”（*expropriation through dispossession*），¹⁷以及对资本社会关系本身所固有的暴力关系（*Gewalt*）的重新强调（见下文第九章），并且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资本本身的“再封建化”倾向（见下文第七章）。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是：在这种社会类型中，资本关系在社会经济上占主导地位。但是，**资本社会关系体系的结构总体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历史现实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或许是马克思资本主义概念的核心问题，自 20 世纪 60 年代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争论复兴以来，这一问题再次成为争论焦点——被描绘为“理论”与“历史”

10

¹⁷ 参见 Claudia von Werlhof, ‘Why Peasants and Housewives Do Not Disappear in the Capitalist World-System’, *Working Paper* No. 68,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Bielefeld, 1985; and ‘Globalization and the Permanent Process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The Example of the MAI, the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Journal of World Systems Research*, vol. 6, no. 3 (Fall-Winter 2000), pp. 728-747.

之间，或“理论”与“政治”之间的矛盾场所。汤普森（E.P. Thompson）在其论战性文章《理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Theory*, 1978）中，将其极端表述为：

整个社会包括许多活动和关系……这些都不是政治经济学所关心的范畴，政治经济学也没有相应的术语。……《资本论》是对资本逻辑的研究，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历史的社会与政治维度、阶级斗争的愤怒与理解，来自于一个独立于封闭的经济逻辑系统之外的区域。¹⁸

在某种层面上，汤普森与阿尔都塞（汤普森所怨恨的对象）之间的争论是自 17 世纪以来贯穿欧洲哲学的经验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哲学二律背反的最新表现。在另一个层面上，这场争论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两个方面对立起来——它们事实上是内在地、辩证地相互联系的：历史与社会经济体系。然而，问题在于如何把握这一关系，跨越资本与资本主义的概念差异，这一点仍然存在。这既是关于如何思考中介的（理论）问题，也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问题。¹⁹自汤普森的论战以来，马克思主义文献在看似矛盾的两个方向上探讨了这一资本-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不过，将每一方向看作只有在与另一方向的关系中才成为真理，这样的辩证观点并不过分，但由这一根本矛盾结构出的真理在政治上的含意仍然难以把握。

¹⁸ E.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or An Orrery of Errors', i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erlin Press, 1978, pp. 62, 65.

¹⁹ 汤普森聚焦于工业资本主义形成期，关注英国工人阶级的“产生”(making)而非其线性发展。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很难断言阶级斗争“源自独立于经济逻辑体系的自主领域”。汤普森的理论花招在于，他将“封闭性”强加于一个动态开放、历史演进的社会经济系统。

其一方向，受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949 年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精神的影响，强调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资本主义因素与条件——无论这些被理解为“社会的”（如波兰尼所述）、人类学的或本体论的（见下文第四章奈格里的文章）。社会性解释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对马克思所称的“形式吸纳”有了新的强调：作为把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生产实践整合进价值生产过程的一种整合方式；这与劳动力在生产过程内部通过变形而被“实质吸纳”于资本相区分。²⁰这一点发挥两个作用：一是解释那些近来或仍处在萌芽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人口上仍占世界大多数）“结合与不均衡的发展”的动力学，这些社会在各种社会层面上保留着大量非资本主义实践，这些实践在资本主导的再生产回路之外或之内相并存；二是把资本主义特征的界限设想为即便在最资本化的社会中也存在的想象性界限——类似于作为残余自主社会存在形式的“人性”的界限。

另一方向，在关注点上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向：从专注于价值生产（《资本论》第一卷所采取的立场）转向对再生产，尤其是**社会再生产**的关注，这与关于“永久原始积累”（见下文第五、六、八章）的论点趋同。《资本论》第二卷讨论资本为实现扩大再生产而流通的循环，但它并未注意到可变资本的“非经济”再生产，即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包括新人的生产，也未关注马克思所称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更广泛社

12

²⁰ 例如参见 Harry Harootunian, *Marx After Marx: History and Time in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以及我的评论 ‘Marx after Marx after Marx after Marx’, *Radical Philosophy* 200 (November/December 2016), pp. 47–51, www.radicalphilosophyarchive.com/reviews/individual-reviews/marx-after-marx-after-marx-after-marx.

会条件，即“上层建筑”。这种转向由两大动力促成：一是阿尔都塞对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社会条件的理论兴趣，他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SAs）的理念来概括，并零散地呈现在生前遗稿 1969–1972 年间的《论再生产》（*Sur la reproduction*）中；²¹二是女性主义对马克思狭隘的以价值为中心的生产主义的批判，强调工人阶级家庭的亲属关系是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场域。²²这些文献的成果在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对近期全球金融危机的全面新波兰尼式的方法中被结合起来，从而使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历史形式的概念更为复杂。²³

而另一个方向，则强调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内在倾向的逐步历史

²¹ 英文版见 Louis Althusser, *On the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trans. G.M. Goshgaria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4. 其 1970 年名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即节选自该书手稿。该理论视角可追溯至葛兰西对霸权与国家概念的拓展性阐释。

²² 参见 Lisa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s a Unitary Theor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3; 更广义的人类学视角见 Gayle Rubin,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Rayna R. Reiter (ed.),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5, pp. 157–210; 近期研究则见 Silvia Federici, *Revolution at Point Zero: Housework, Reproduction, and Feminist Struggle*, New York: PM Press, 2012.

²³ 参见 Nancy Fraser, ‘Marketization, Social Protection Emancipation: Toward a Neo-Polanyian Conception of Capitalist Crisis’, in Craig Calhoun and Georgi Derlugian (eds), *Business as Usual: The Roots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Meltdown*, New York: NYU Press, 2011, pp. 137–158; Nancy Fraser, ‘A Triple Movement? Parsing the Politics of Crisis after Polanyi’, *New Left Review* 81 (May–June 2013), pp. 119–132; Nancy Fraser and Rahel Jaeggi, *Capitalism: A Conversation in Critic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8, chs 1 and 2.

此处还需提及关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社会学文献，常以地理命名：如所谓“亚洲式”资本主义、“东欧式”资本主义、“南美式”资本主义等。Peter A. Hall and David Soskice (eds),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然而该研究主要关注文化遗产、法律及政治形式的经济价值差异，具有零散性特征，未能整合进资本主义的整体历史叙事。

实现：即其社会关系的普遍化，以及对**所有**其他社会形式的替代（和/或重新功能化）。²⁴这种自我完成的资本主义概念有多种称谓与理论形式：从特隆蒂/奈格里所提出的“总体吸纳”（即社会本身被“实质”吸纳于资本），到朗西埃所言的“绝对”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类国家的官僚形式），再到巴利巴尔的“纯粹”或“绝对”资本主义，²⁵这些观点如今被重新构想为更马克思式的“总体吸纳”（见下文第二章）。在奈格里的著作中，历史与本体论的这一分裂使其同时指向这两个方向：既假定资本已实现了普遍化，又假定存在本体上具有抗拒性和创造性的非资本残余。从哲学上讲，把资本关系的总体或绝对实现作为总体或绝对的资本主义来看待，标志着从作为解释性概念的马克思资本主义向作为一种**理念**的资本主义的转变。

13

理念（黑格尔还是柏拉图？）

将资本主义（而非资本）作为一种**理念**来理解，在从柏拉图到康德、黑格尔及其后的经典哲学意义上，可以呈现出两种在政治上截然对立的形式。一方面，对于左翼而言，我们得到的是一种反乌托邦式的资本主义概念，其作为资本理念的自我实现——按黑格尔将“理念”理解为“概念与现实的统一”之意：正如黑格尔所写，“全部现实的东西都只有在自身内具有理念，并表达出理念时，才**存在着**”。²⁶在哲学上，这将

14

²⁴ 关于前/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与意识形态形式在资本主义下的再功能化问题，请参见 Étienne Balibar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Race, Nation, Class: Ambiguous Identitie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1.

²⁵ Étienne Balibar, ‘Critique in the 21st Century: Political Economy Still, and Religion Again’, *Radical Philosophy* 200 (November/December 2016), pp. 11–21, 12–13, www.radicalphilosophyarchive.com/article/critique-in-the-21st-century.

²⁶ Hegel’s *Science of Logic*, trans. A.V. Miller,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是一种极端的黑格尔马克思式政治经济学，价值形式主体性的异化对象性已在社会上被绝对化为理念的现实。历史唯物主义沦为绝对唯心主义。在那种情况下，很难想象“历史”还能如何复原。另一方面，则是更为柏拉图式的右翼投射，将此类反乌托邦当作乌托邦：无论是安·兰德(Ayn Rand)所说的“作为未知理念的资本主义”，还是尼克·兰德(Nick Land)所提出的那种虚无主义-加速主义版本(nihilist-accelerationist version)的资本主义原教旨主义，其中资本充当主体的角色，进行一种原尼采式(proto-Nietzschean)自我毁灭的解放。²⁷在同一哲学场域上，安·兰德的资本主义柏拉图主义在此处显得是阿兰·巴迪欧“共产主义理念”的直接意识形态对应物与对手。²⁸（“今日柏拉图！”曾是巴迪欧在巴黎直到最近所讲授“当代哲学”课程的标题。）

因此，在《资本论》第一卷问世 150 周年之际提出“资本主义作为理念”的幽灵，等同于提出另一个在 2017 年秋庆祝其象征性（100 年）周年事件的当下政治意义：1917 年“十月”俄国革命的幽灵。这里并非指马克思自 1845 年及以后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幽灵，那种自 1848 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1974-1975 年的葡萄牙革命）始终“在欧洲游荡”的共产主义幽灵，即“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²⁹恰恰相反，

Press, 1989, pp. 757, 756. 中文版译文见[德]黑格尔,《逻辑学 II》,先刚译,人民出版社,2021,第 373 页。

²⁷ Ayn Rand, *Capitalism: The Unknown Ideal*,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7; 'Ideology, Intelligence and Capital: An Interview with Nick Land', <https://vsnbrupt.com/2018/08/15/ideology-intelligence-and-capital-nick-land>. 必须牢记,尼克·兰德式的加速主义自始便是反左翼的项目,它与某些其他“原教旨主义”所崇尚的纯粹死亡文化如出一辙。

²⁸ Alain Badiou, 'The Idea of Communism', in *The Communist Hypothesis* (2008),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0, ch. 4.

²⁹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1845), in *Collected Works*, Volume 5: 1845-1847,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6, p. 49. 中文版译文

这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念的幽灵，那种从柏拉图可知的**超验**意义出发、并经康德“现代化”（变为主观上普遍）的理念：一种恒常重返且自我同一的存在。在巴迪欧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幽灵，是理念性的；因为按照马克思（作为历史现实）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幽灵已不再笼罩欧洲。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存在，它当前并不构成现实威胁。共产主义已**退**回到理念领域，与 21 世纪资本主义的历史现实脱节。这正是齐泽克（Žižek）提出的这种共产主义理念，像巡演品牌一样被推广开来。³⁰

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本次研讨会（这些论文的来源）的任务书才提出了“在激进左翼政治从历史退回为理念的**情形**下，探询当代‘资本’与‘资本主义’概念含义的问题”的呼吁。要追寻与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现实相连的解放性政治的可能性，就必须追寻马克思关于资本与资本主义概念的理论含义，尤其是其政治含义。

如果共产主义已经以一种贬义的方式，即在深刻的世界历史进程意义上与历史现实脱节，退回到理念领域，那么这种退回仍会产生对该现实的批判性距离；而当现实本身越来越朝向更纯粹或“绝对”资本主义的方向自我转化时，这种距离显得愈发具有吸引力。在此情境下，巴迪欧-齐泽克逃向一个与之竞争的纯粹理念之外的形而上学极端，逻辑上或许说得通；然而在社会或人性层面上却毫无意义。按照康德关于“概念-理念”对立的图式，尽管逃往一个原则上“超出可能经验”的境地可能能安抚某些知识分子的感受，但那并非构建作为必然的社会

16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 539 页。

³⁰ Costas Douzinas and Slavoj Žižek (eds), *The Idea of Commu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0; Slavoj Žižek (ed.), *The Idea of Communism 2: The New York Confer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3; Alex Taek-Gwang Lee and Slavoj Žižek (eds), *The Idea of Communism 3: The Seoul Confer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6.

实践的政治（politics）之可行的出发点。³¹

图像（情感与不在场）

事实上，由理念的形而上外在性所在的柏拉图式对现实的批判性距离，也可以在图像的二重结构中由情感（affect）与所指对象的不在场（absence）关系在现实内部生成。按照经典理解，图像是某一不在场之物的呈现方式，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被指定为“不真实”的那种在场。这种在场方式具有一种情感力量，掩盖了其所表征事物的不在场，但该事物仍然保持着与现实的批判性距离。确实，可以认为“图像即（具有）主体”本身（的结构）。³²那么，这与《资本论》有何关联？图像概念对《资本论》的意义何在？

图像问题与我们讨论的主题相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在马克思《资本论》的修辞层面，即马克思写作中非凡的意象力量与文本的致密完整性（见下文第十章）。第二，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以及在商品化与货币的社会经验中、以及资本主义文化自我反思中的早已司空见惯的各种图像的主导地位，即文化产业（见第三章与第十一章）。正是在这两方面，《资本论》接受史的创造性体现得最为充分。一方面，对《资本论》方法论性论争的典型对立——理论或历史？经济学或政治学？黑格尔或康德？结构主义或现象学？在对文本特异性的近距离分

³¹ 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现任教席（隶属金斯顿大学现代欧洲哲学研究中心）被命名为“真实历史与社会思想的问题化研究教授职位”（以致敬前任持有者达尼埃尔·本萨义德）。正是秉承这一命题精神，我们将本次会议及文集的议题定为“资本主义与资本：历史性的社会关系”。

³² 参见 Peter Osborne, 'The Image is the Subject: Once More on the Temporalities of Image and Act', in *The Postconceptual Condition: Critical Essay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8, ch. 14.

析中，多半被解构，或至少被更复杂地重新构型。如同 18、19 与 20 世纪所有伟大的欧洲哲学著作，《资本论》是一本激进开放的（同时也是未完成的）文本；在内部，它向不断的反思性再争论保持开放。另一方面，这种开放性因其被接收的语境多样性及相应的呼应方式而被成倍地强化，正如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沿用德里达的说法）所称的《资本论》的“命运偏移”（见下文第八章）。

*

《资本论》一百五十周年纪念为催生本书所收录论文的研讨会提供了契机，但并非这些论文的主题。本书并非关于马克思《资本论》接受史的著述，也不是对其文本与论证的注释式学术考察，也不是一系列入门性文章。相反，本书为读者提供了关于当代马克思《资本论》的多方面快照：一系列来自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左翼不同哲学与政治立场的学者，对于《资本论》当代相关性，及其帮助理解我们所处的、常常截然不同之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能力的不同回应。

WALL STREET HUMANS WITH NIGHT TOILERS

Entire Office Staffs Ordered
to Work Right Through
Until Morning.

价值形式、本体论 和政治

1. 形式分析与批判：马克思的社会劳动价值理论

埃莱娜·路易莎·朗格（Elena Louisa Lange）

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间的根本断裂在于，他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新的特定研究对象——劳动的社会形式（social form of labour）奠定了基础。因此，他的理论不仅仅是对古典经济理论的“扩展”或“重组”，而是为批判性地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视野。马克思将自己的干预理解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将其嵌入他的激进革命中，确切地说，是他的“共产主义哥白尼式转向”（communist Copernican turn）。因此，理解马克思的项目不能脱离他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正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家，尤其是斯密和李嘉图，以及庸俗经济学家，如萨伊（Say）、贝利（Bailey）、马尔萨斯（Malthus）、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麦克库洛赫（McCulloch）、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等，还有社会主义者，如蒲鲁东（Proudhon）、欧文（Owen）等的解读，为他最终创作出巨著《资本论》，实现理论发展提供了可能。

对劳动社会形式的理解，正是马克思在前人身上发现的不足：

诚然，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

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¹

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表现为价值的劳动同表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²

马克思批判地指出古典理论中的特定缺失，即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拜物教问题，这个问题甚至并未在马克思成熟的批判前得到承认。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间的区分，是前往彻底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颠倒的自我表征（self-representations）的关键。通过这些关系下劳动的社会形式确定为创造价值的抽象一般人类劳动，并将其与体现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区分开来，马克思也切入了形式和内容的问题，即拜物教的问题。

对马克思来说，抽象劳动作为价值**实体**的特殊性在于，它总是以特定的**形式**出现，即商品的价值形式、货币、资本、工资、利润、价格、利息和地租，这些范畴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而在这些形式中，抽象劳动总是被系统性地掩盖。然而，正是在这种物的现象状态中，本质或实体自身只能以颠倒、扭曲甚至是完全虚假的形式出现，这点未被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注意（更不用说李嘉图学派衰落后的新古典理论）。换句话说，在马克思之前，政治经济学只关心价值形式作为价值的表象（appearance），而没有考虑到产生这些范畴的特定实体，即劳动的一般社会形式。事实上，由于未曾考虑过价值形式的表象与本质间的“认识论裂缝”（epistemological cleft），古典经济学家只能驻足于抽象的层次，

¹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1: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of Capital*,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6, p. 174.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98页。

² 同上，p. 173. 中文版译文同上。

反复地用形式来解释形式本身。³

本文所讨论的马克思的形式问题，只能通过**形式分析**（form analysis）的方法加以解决。马克思的形式分析方法揭示了像“交换价值”或“商品”这些范畴的拜物教化的对象维度（fetishized objective dimension），这些范畴表面上看似是简单的、“既定的”且实际无前提的。对其形式分析表明，它们只有作为极为特定社会过程的结果才能被完全理解，这个过程预设了（再）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因此，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开头实际上已经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批判，即对简单流通领域自我表征和正当性的批判，这一领域构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及其经济学的唯一对象。

然而，当代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马克思所攻击的古典及庸俗政治经济学家类似，他们重新开始并重复了马克思前人的循环论证。因此，本文将证明，在“价值形式理论”（value-form theory）名下，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推动了对“形式”的颂扬，同时给予“实体”或内容以较低的地位。这一干预不仅与马克思的批判意图相悖，而回到了马克思所试图解构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拜物教”。

24

马克思对其前人，特别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批判，产生了被我称为马克思的“社会劳动价值论”（social labour theory of value）这一概念。社会劳动价值论为马克思的核心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框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所有劳动产品为何以及如何呈现出**价值形**

³ 本文更长、更详细的版本将作为第一章发表在我即将出版的专著《无拜物的价值：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下的宇野弘藏纯粹资本主义理论》（*Value Without Fetish: Uno Kōzō's Theory of Pure Capitalism in Light of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eries, Leiden: Brill, 2019）。在书中，我详细讨论了斯密和李嘉图各自价值理论中的困境和概念混淆。这使我能够证明（与普遍理解相反）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的劳动价值论。

式，其中价值形式被理解为货币、资本、利润、价格、利息、地租这些政治经济学对象。因此，社会劳动价值论是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象形成过程的理论方法工具。

因此，我将批判性地处理近期对马克思方法的批评及所提出的替代性假设，即：（1）在方法论上，偏向于将（价值）形式先于价值实体作为指导原则；（2）将简单流通（“交换”或“市场”）假定为资本关系的主要特征和价值构成的场所；（3）呼吁“无中介”或“无前提”展开的必要性。

对马克思的误解

在他自称为“新”或“体系”辩证法的著作中，克里斯·阿瑟（Chris Arthur）坚持认为，在《资本论》的结构中，应该首先研究资本的“纯粹形式”——特别是在“劳动基础”之前分析其“价值形式（作为资本的胚芽）”。他声称，“形式问题如此关键，以至于叙述从交换形式开始，可以完全包含生产方式，如果有的话，还有交换对象。”阿瑟还认为，
25 马克思过早地引入了（抽象）劳动的概念：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前三页中从交换价值的现象深入探讨劳动作为价值的实体，人们确实抱怨在这些页面中找不到任何证据。因此，我主张……我们必须首先研究价值形式的发展，只有在形式的辩证法本身要求我们这样做时，再去探讨劳动内容。

阿瑟坚持认为，为了分析资本，需要一个“没有先验条件的绝对起

点”。⁴我们将看到，这种主张对于马克思自身方法的批判性特征来说，是多么具有误导性。

吉尔特·罗伊滕（Geert Reuten）在声称货币的价值形式是“价值的构成”时也持相同的观点——这因此带来了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想确切知道为何货币代表价值，为什么货币能够购买所有其他商品。令人惊讶的是，罗伊滕似乎没有认为有必要深入马克思的分析。相反，他在循环的“澄清”（和对“抽象劳动”和“实体”概念基于字数上可有可无的“证明”！）中徘徊，这些“澄清”更倾向于混淆问题而非解决问题。⁵当罗伊滕将马克思抽象劳动的价值实体概念仅仅称为一个“隐喻”时，这一点显得尤为明显。⁶然而，在其文本中并没有任何地方指出这种实体是什么的隐喻。同时，罗伊滕声称，“古典”经济学者持有一种“真实化身”（real embodiment）的劳动价值论，而这在马克思著作中有所“残留”：“马克思……被困在从黑格尔（实体）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化身）继承而来的物质的实体-化身的隐喻中。”⁷然而，无论劳动作为价值的实体被视为仅仅是一个“隐喻”，还是的确是“具身”于商品中，

26

⁴ Christopher J. Arthur, 'Money and Exchange', *Capital and Class* 90 (Autumn 2006), p. 10; *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 Leiden: Brill, 2004, pp. 86, 12, 158. 对阿瑟《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的批判，见 Elena Louisa Lange,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New Dialectic": Marx, Hegel, and the Problem of Christopher J. Arthur's "Homology Thesis"', *Crisis and Critique*, vol. 3, no. 3 (2016), pp. 235–272.

⁵ Geert Reuten, 'Money as Constituent of Value', in F. Moseley (ed.), *Marx's Theory of Money: Modern Appraisal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 78–92.

⁶ Geert Reuten, 'The Difficult Labor of a Theory of Social Value: Metaphors and Systematic Dialectics at the Beginning of Marx's Capital', in F. Moseley (ed.), *Marx's Method in Capital: A Reexamination*,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93, pp. 89–113; 此处为 pp. 89, 106, 110.

⁷ 同上，p. 110. 这句话的无意中的滑稽在于它暗示了黑格尔和斯密持有或多或少相同的理论。

它都无法兼得两者。更令人奇怪的是，罗伊滕得出结论，认为马克思在其抽象概念方面存在“模糊”或“不清晰”，这一判断更适用于罗伊滕自身的论点。因此，罗伊滕不仅曲解了马克思的理论，实际上也不清楚马克思直接的拜物教批判方法；他进一步解释说“价值在市场交换前不存在。”⁸这实际上与马克思的分析相悖，正如我们很快将看到的。

同样地，来自宇野学派（Uno School）的马克思主义货币和金融理论家科斯塔斯·拉帕维查斯（Costas Lapavitsas）和伊藤诚（Itoh Makoto）在试图解释货币如何成为交换的普遍等价物时，认为没有必要提及抽象劳动。⁹特别是伊藤诚在试图解释货币形式时，陷入了循环论证和老

⁸ 同上，p. 108. 特别不清楚的是罗伊滕所称的“价值形式”中的“两个含义”的不同特征：一个将“价值”定义为“形式自身”（或“属”），另一个则将“价值形式”限制为“种”（同上，pp. 100–101）。相反，马克思非常清楚价值及其形式间的关键区分，特别是在他对赛米尔·贝利的批判中。“对于交换过程使之转化为货币的那个商品，交换过程给予它的，不是它的价值，而是它的独特的价值形式。有人由于把这两种规定混淆起来，曾误认为金银的价值是想象的”（Marx, *Capital*, Volume 1, p. 185.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110 页）。马克思在这里还隐含地指出，价值并不是像罗伊滕和其他人所说的那样仅在交换中“存在”。

⁹ 参见 Costas Lapavitsas, ‘The Emergence of Money in Commodity Exchange, or Money as Monopolist of the Ability to Buy’,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7, no. 4 (October 2005), pp. 549–569; ‘Money’, in David M. Brennan et al.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Marxian Econom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p. 69–80; Makoto Itoh, ‘A Study of Marx’s Theory of Value’, *Science and Society*, vol. 40, no. 3 (Fall 1976), pp. 307–340. 针对拉帕维查斯提出的“货币垄断购买力”理论的批判，参见 Elena Louisa Lange, ‘Geldtheorie ohne Fetischcharakter. Zur problematischen Rezeption des ersten Kapitalbandes bei Uno Kōzō und der Uno-Schule’ [‘Money Theory Without Fetish Character. On the Problematic Reception of the First Volume of Capital in Uno Kōzō and the Uno School’], *Zeitschrift für kritische Sozialtheorie und Philosophie*, vol. 4, nos 1–2, pp. 177–208. 我认为，拉帕维查斯提出了一种唯名论的货币理论，其含义是“货币本质即其职能”（money is what money does）——这与马克思不同，马克思从货币作为“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Marx, *Capital*, Volume 1, p. 187.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112 页）的角度发展了货币的功能，即货币**职能**即其**本质**（money does what money is）。

生常谈之中，而没有诉诸于抽象人类劳动。在他们之前，宇野弘藏（Uno Kōzō）在解释价值形式时便严格偏好形式而非实体，从而直接引发了一个逻辑上的循环论证：

作为“价值形成的实体”的劳动抽象（*shashō*）于每一种形式，除了否定和抽象的（*chūshōteki*）东西外什么也无法表达。因此，我们不能将其作为价值形式的基础。换句话说，[劳动]首先是由**价值形式发展而来的**。商品的价值形式更是通过这种实体自身经历的各种形式来把握，这些形式无非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然而，**单纯的形式规定性**仅仅阐明了“劳动产品的等等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资本论》第一卷，第 89 页）。¹⁰

关于价值形式的分析，马克思旨在进行的两个关键干预完全被这些作者忽视（甚至拒绝）：首先是必须从一开始预设资本关系的总体性，在这种关系中，分析开始的“商品”范畴并非所谓的“最简单”而是最复杂的规定性，即“总体性的关系”；¹¹其次是价值形式分析（value-form analysis）的功能，即在抽象劳动的共同基础上，从商品转化为货币的过程中推导出简单流通的拜物教表象（fetishistic semblance）。通过拒绝看

¹⁰ Uno Kōzō, *Kachiron* [Value Theory], 1947, in *Uno Kōzō Chosakushū* [Collected Works of Uno Kōzō], vol. 3, Tokyo: Iwanami, 1973, pp. 361–362.

¹¹ ‘Totalitätsverhältnis’. Helmut Brentel, *Soziale Form und ökonomisches Objekt. Studien zum Gegenstands-und Methodenverständnis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Social Form and Economic Object: Studi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Object and Method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Wiesbaden: Springer, 1989. p. 264. 罗伊滕未能看到商品的特定特征和功能：“商品是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抽象的包含一切的概念呢？我对此表示怀疑。例如，它是否包含了在资本主义形式中创造有用物品的活动的概念？” Reuten, ‘The Difficult Labor’, p. 96. 实际上，商品的确具备这一点，但似乎超出了罗伊滕的理解范围，这反映了他未能理解马克思的方法。

28 到马克思在其所谓“无害”的初步分析，即对商品分析中已然内在的批判意图，上述评论者成为了意识形态方法的共谋者，将资本关系的单纯表象正当化。

政治经济学的法证调查：预设总体性

一些价值形式理论方法的意识形态困境，根源在于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在价值形式的分析阶段，也应当对资本的总体性，“资产阶级生产的整个体系”¹²加以预设：20 码麻布和 1 件上衣间的交换并不代表“简单交换”，而是资产阶级自我表现的最抽象的领域。因此，必须满足真正且绝非简单的要求，使简单流通能够表现为资本主义交往的典范形式，并且交换价值能够表现为简单、无前提的经济形式，这些要求并不会从“对简单流通的考察”中显现出来，而是“像分工中所包含的经济关系那样是发生在简单流通背后的”。¹³像刑事案件的调查员一样，我们必须从隐藏在简单流通背后的东西来**重建**这个领域。一方面，在简单流通的考察中被“遗忘”的，是“整个生产制度的客观基础”，即不是自主的个体在“市场上”交换各自的商品，而是一种“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强制”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个人“完全是由社会所决定；其次，这种情况又要以分工等等为前提，个人在分工中所处的关系已经

29 不同于单纯**交换者**之间的关系。”¹⁴将对简单交换的叙述作为对资本主

¹² Karl Marx, *Economic Works, 1857–1861*,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9,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7, p. 466.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 353 页。

¹³ 同上，p. 467. 中文版译文同上，第 354 页。

¹⁴ Karl Marx, *Grundriss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p. 248.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 203 页。

义交换关系的分析起点本身表达了批判的意图，因为它为重新审视资本和雇佣劳动等价交换原则的形式有效性做了准备。因此，这种形式特征既是被预设的，又在简单流通中“被忽视”（“消失了”¹⁵）：

最后，人们没有看到，在交换价值和货币的简单规定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工资和资本的对立等等。可见，[资产阶级辩护论者的]这全部聪明才智不过是要停留在最简单的经济关系上，这些经济关系单独来看，是纯粹的抽象，但在现实中却是以各种最深刻的对立为中介的，并且只反映上述对立表现消失不见的那一个方面。¹⁶

在其他地方，我已经展示了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所依赖的那些方法论假设，这些假设源于黑格尔通过“反映逻辑”¹⁷（*Reflexionslogik*）中部分的内在关系来构建对象的方法。为从“最贫乏”（存在/无）到“最丰富”（概念/理念）的范畴发展而预设总体性，因此构成了对象，这种总体性被理解为“统摄的主体性”（*übergreifende Subjektivität*）。因此，它必须从单纯的表象开始，从不真实的东西开始。¹⁸这也意味着，范畴

¹⁵ Marx, *Economic Works, 1857–1861*, p. 466.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353页。

¹⁶ Marx, *Grundrisse*, p. 248.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03页。这句话出现的背景是对蒲鲁东的批判，他被攻击为一个深刻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交换代表着一个“普遍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但是被货币、资本等等歪曲了”。

¹⁷ Elena Louisa Lange,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New Dialectic”: Marx, Hegel, and the Problem of Christopher J. Arthur’s “Homology Thesis”’, *Critique and Critique*, vol. 3, no. 3 (2016), pp. 235–272.

¹⁸ G.W.F. Hegel, *The Encyclopedia Logic. With the Zusätze. Part I of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with the Zusätze* (1830), Indianapolis IN: Hackett, 1991, p. 290. 290.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立即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情况如此，为什么我们要从虚假的东西开始，而不是直接从真实的东西开始？答案是，真理必须作为真理本身得到验证[muss sich bewähren]。在这里，逻辑思维本身的验证在于概念展示自身是通过并与自身相联系而被中介的，从而证明它同时也是真正的直接

30 的独立性和“直接真理”将被证明是一个错误的假设。存在和无绝对是中介的范畴，即使假设其“纯粹性”，也不能被有意义地规定；孤立地看，它们无法解释自身的构成。¹⁹同样地，简单流通的表象和商品也是如此：我们所面对的只是一个真理的扭曲版本。资本的深层次问题真理只能通过对其构成性范畴，即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全面**批判来阐明。

因此，马克思主义作家们声称黑格尔从无前提的假设开始这一点尤为奇怪。²⁰事实正好相反：同马克思的叙述一样，黑格尔对思想的发展故意从一个完全中介的关系中出发，而在一开始，这种关系必须通过孤立地看待范畴、无前提地展示其错误，以“外在反映”(outer reflection)的方式进行。甚至我们必须承认，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就像黑格尔所批判的哲学家（我们当然要想到康德）一样，由于他们自身的范畴被概念化为不相关的东西，因此他们的理论是矛盾的。

31 我们必须在这里回到形式的问题上。我们已经勾勒出作为特定方法的形式分析的功能，即揭示传统范畴（或“形式”），如货币、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在其**形式**中消失了的**本源**结构。马克思的势头确实很黑格尔：他形式的概念与黑格尔的概念一致，并坚决拒绝对形式仅

的”（同上，p. 134）。

¹⁹ 这与辩证叙述所需的语义-语用的（semantic-pragmatic）剩余意义/缺失必要性（surplus meaning/cleft necessary）有关。更多细节参见 Lange,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New Dialectic”’.

²⁰ 使得问题复杂化的原因在于，黑格尔所谓的“无预设性”理论既有支持者（如阿瑟和罗伊滕），也有反对者（如默里），但这一主张本身从未受到过质疑。例如，默里指出：“马克思并未完全打破黑格尔体系辩证法的圈子；他反对黑格尔体系辩证法的‘无预设性’，并坚持认为科学有前提条件，这一点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行了概述”（Patrick Murray, ‘Marx’s “Truly Social” Labour Theory of Value: Part I, Abstract Labour in Marxian Value Theo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no. 7 (2000), p. 38）。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尚未发展出任何价值理论！这部早期作品采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法论框架，并且有着与马克思后来的经济学批判工作截然不同的目标。

仅“形式上的”理解。“统摄的主体性”（中介）的概念包含了形式-内容（*Formgehalt*）的概念，不再与它所指代的内容或“实体”对立。研究的对象（产生于资本关系的劳动的社会形式）被呈现为经济形式和形式变换（*Formwechsel*）的过程性总体结构，其“内在联系”呈现出一种贯穿所有个别形式的普遍共性，作为一种“统摄”的关系。²¹这并非易事：因为形式规定性（*form-determinations*）只能作为总体联系的片刻存在，马克思，以及作为他读者的我们，必须将自己置于政治经济学法证调查员的角色中，从其单纯的（有时甚至是彻底颠倒的）表象中重构这一联系。

形式总体性的总体联系同时也是这一过程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形式也是内容**。任何声称采用体系科学方法的分析都必须解释形式与内容间的相互“转化”（*Umschlagen*），即形式转化为内容，内容转化为形式。²²让我们看看这种理解如何能够为明确理解价值形式分析的批判功能提供成果。

价值形式分析的功能

总得来说，对价值形式分析的首要功能是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拜物教批判。在价值形式的分析中，马克思在不同的抽象层次上应对这种拜物教：（a）在逻辑体系的**重构**上，从简单流通领域，这一资产阶级生产的抽象和意识形态领域，过渡到这种生产方式的现实基础；（b）在价值**构成**的理论中，通过分析作为货币（形式）出现的普遍等价物的形

32

²¹ 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Volume 1, Book 1: *Der Produktionsprozess des Kapitals*, Berlin: Dietz Verlag, 2008, p. 27.

²² Cf. Hegel, *The Encyclopedia Logic*, pp. 225–226.

式和内容（反对前货币价值理论）；（c）在“价值规律”的论证上，将其作为一种逐步脱离于商品所有者意图、需求和个人欲望的自主化（autonomization）法则。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讨论了（a），即商品作为“总体性的中介”，掩盖了资本与劳动间的对立。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接下来的评价将集中于（b）。

从商品简单交换的表象中推导出货币的价值形式，并追溯到其在抽象人类劳动中的构成性内容，这并不意味着价值形式是随意的，或者说可以被忽视的。相反，价值在货币中具有其必要的表象形式。换句话说，价值在其“可触摸的”、物质的、客观的，因此是拜物化的形式中，只有在货币中才存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价值就是货币：尽管如此，价值必须以货币的形式**表现**。²³

33 在分析价值形式的第二到第四种形式中，马克思展示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是价值在社会背景下对私人劳动中介的综合的具体形式。然而，内容或实体（抽象的人类劳动）和形式间的关系并不能被简单地概括为本质与表象间的对立。（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本质必须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只不过在这种形式中仍可以识别到其中本质的拜物教扭曲。因此，对形式的分析必须识别出使形式植根于**形式自身**并与其表象相对立的内容，并使其显现出来。这正是简单流通的正当化策略陷入自我矛盾的典型案例，这种情况只有当货币被视为独立于交换过程的外部实体（entity）时才会发生：仅仅作为交换的便利手段，作为流通手

²³ “商品并不是由于有了货币才可以通约。恰恰相反。因为一切商品作为价值都是对象化的人类劳动，从而本身可以通约，所以它们能共同用一个独特的商品来计量自己的价值，这样，这个独特的商品就转化为它们共同的价值尺度或货币。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Marx, *Capital, Volume 1*, p. 188,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14页）。

段。然而，货币作为抽象劳动的可感形式，是一般社会交换的必要条件。因此，那些建议为了实现“等价交换”而放弃货币的理论，实际上与它们自身的前提相矛盾。²⁴

虽然特定内容指向了特定的形式，但反之亦然：形式必须指向特定的内容。说“没有一般等价物就没有价值”意味着，只有在等价形式下，才始终已然预设了不同劳动实际还原为抽象一般人类劳动。价值形式的分析因此也包括了对价值构成的理论。这对简单价值形式的特殊性来说很明显（例如： x 商品 A = y 商品 B），其特点在于其两端不是仅仅表示可逆的关系，而是相互排斥的功能，这也指向了等价形式的特定内容。在其中，作为基础或内容的不是特定的具体人类劳动，而是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使得所有具体和特定的劳动能够在其中反映自己，能够“代表”它。因此，货币具有双重功能：代表所有商品，但不专门代表其中任何一个商品。作为“物”，它的确代表了抽象的人类劳动，代表了所有劳动，但没有具体代表任何一个。这确实是“商品世界共同活动的结果”。²⁵

34

在这个背景下，认为马克思的分析“过早”引入了一个“预设的”劳动价值基础，这一说法是毫无意义的。要求“首先研究”价值形式的观点同样荒谬：价值形式并不是自明的。一种假设价值形式而不是分析它们的隐含内容的方法，仍然“固守于最简单的经济关系”。

尽管我们之前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回避了“百万美元问题”（million-dollar question），即价值是由生产还是交换构成的，但通过推

²⁴ 当然，这是马克思反对蒲鲁东“人民银行”的主要观点。

²⁵ Marx, *Capital, Volume 1*, p. 159.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83页。

论应当清楚的是，作为社会总体性的价值，决不能仅仅通过 W-G-W（商品-货币-商品）或 G-W-G（货币-商品-货币）的形式变换（*Formwechsel*）来构成。流通和交换的形式从来不是经济对象性（*economic objectivity*）的构成要素。正如布伦特尔（Brentel）所言，“简单流通不是对象性的经济构成的自主领域——它仅存在于资产阶级自明的意识形态外观中。”²⁶这些形式只是资本对劳动现实吸纳下，相对于真正的价值构成基础的幻象形式。我们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和第六章“总公式的矛盾”中能够看到了这一点。我在上文讨论的马克思主义作者，其动机在于与“传统”即“具身化劳动”（*embodied labour*）理论区分开来，但却过度强调了他们的观点，通过形式主义的价值理论，这些观点充其量同古典理论一样同义反复，最糟的则是不安地将边际主义假设（*marginalist assumptions*）引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而马克思的社会劳动价值论，旨在作为这些观点的解药。劳动的社会形式，其经济上的形式特征被“传统主义者”及其对手所忽视，超越了形式与实体间单纯对立的问题，为彻底批判资本主义价值自我表现的真实表象，即拜物教开辟了视野。

²⁶ Brentel, *Soziale Form und ökonomisches Objekt*, p. 256.

2. 迈向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普遍剩余价值到总体吸纳

艾蒂安·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

在“新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公式中，存在着显著的问题。¹它显然在指代马克思，再现了他著作的标题或副标题，在其中提出了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性理论。但我们也可以设想其他一种批判，可能在某些点上有所偏离，或基于对立的假设。“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在今天被重新引入，伴随着这样一种认识，即如“经济学”这样更为专业化的术语并没有确保自身具有更大的科学性，反而掩盖了特定的政治利益。然而，这一术语隐含了相当大的谜题，特别是关于其对象的界定。我们知道马克思区分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其中找到了自身某些资本主义理论的基础，以及“庸俗经济学”，后者实际上预示了在 20 世纪成为主流经济理论的理论，那么这里的“政治经济学”指的是一种话语吗？还是在指一种政治经济学的一般项目，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

¹ 这篇文章是正在进行的研究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将发表在《新自由主义的余波：市场法则与政治断裂》（*Neoliberal Remains: Market Rules and Political Ruptures*, ed. William Callison and Zachary Manfredi,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上，两篇文章来源于 2017 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讲授的名为“绝对资本主义”的研讨会。尽管这两篇文章是互补的，但它们仍然是独立的，可以单独阅读。有关更广泛的背景，请参见 Étienne Balibar, ‘Critique in the 21st Century: Political Economy Still 及 Religion Again’, *Radical Philosophy* 200 (November/December 2016), pp. 11-21, www.radicalphilosophyarchive.com/article/critique-in-the-21st-century.

37 本身可能既成为批判的对象，也成为批判的主体？

这个问题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所谓的“庸俗经济学”在马克思的死刑判决后反而幸存下来，这不仅是因为学术界的权力关系，也因为似乎表明马克思主义忽视了**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决定因素——这种印象在观察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失败后而愈发加深。然而，我们应该记住，事情比简单的选择党派更为复杂，因为某些“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确实考虑了后古典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问题和范畴，而且可以看出，主流经济学家们在许多方面实际上是在回应马克思，因此他们以一种辩证的方式来使用他。所以关于“新”这一形容词潜在的问题也就显现出来。**新**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否指的是对一种**新的**（或相对新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种经济学马克思未曾了解，或是因为马克思自身清晰的盲点，使得马克思主义者难以认真对待某些资本主义结构和趋势的表现？这样的新或重新提出的批判是否会延续马克思的批判，提供一种针对经济理论话语的延续？还是尝试发明一种不同的批判，尽管它在与当代经济话语的关系上类比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或是鉴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方式依赖于对既成问题的部分哲学和社会学假设，因而其应当代表一种完全不同的批判？最后，在这种“新”批判中，如何将涉及话语的批判性维度与涉及制度、社会结构、历史趋势的批判性维度相结合？

38 这些困境虽然很抽象，但远未穷尽。当涉及目前的争论和条件所提出的一些要素时，我将牢记这些困境。我认为，作为资本主义批判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其弱点、悖论或压力点（points of stress）总是位于其

长处附近，即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附近。²它们像这些真理的影子，在不同情况下使一切变得模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将首先讨论《资本论》中马克思论证的核心范畴，即将对剥削的分析与对积累的分析联系起来的剩余价值范畴。我将提出**普遍剩余价值**（generalized surplus-value）的观念，以脱离马克思对斯密和李嘉图依赖的局限，从而达到“总体吸纳”（total subsumption）的问题，我希望这能更好地理解金融资本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对日常生活的统治。

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

正如我们所知，20 世纪各种批判性解读《资本论》的“共同长处”（common good）在于，认为马克思批判的核心在于引入“结构性的”**社会关系**范畴，而不是商品和人的拜物教。“资本”不是一种“物”（thing），甚至不是资本家及其他主体所处理和加工的物品，也不是一种“象征性的”，因而本质上是社会的“物”，如可以被占有和以各种方式投资的货币、存款或银行账户。它本身是一种“社会关系”，即一种社会主体（social agents）、个人，尤其是阶级间的关系，他们在其中履行特定的角色，既有互补，也有对抗。这直接表明，“社会关系”这一范畴不能与**过程**的范畴相分开。社会关系是一个过程，其由多个交织的过程构成，交换的时刻与消费、生产的时刻交替出现。这个过程旨在保持自身，更确切地说是再生产社会关系及其条件，包括物质、财政和制度条件。但正如马克思很快揭示的那样，再生产，特别是“扩大再生产”（expanded

² 我借用了马克思那里**压力点**（points of stress）这一范畴的说法，该概念源自大卫·哈维，他在其《〈资本论〉导读》（*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London: Verso, 2010 and 2013）两卷中对此有着广泛的运用。

reproduction)，必须同样作为转变过程（transformation）而存在。资本是一个过程，不在某些结构性限制之内或之外实现转变，就无法在社会和历史上实现自身。

所有这一切只有在我们具体说明所讨论的关系类型——因此，所说的“社会效应”时才会变得清晰，从而赋予“过程”以方向性和驱动力。可以说，积累是这一过程的内在导向，当过程以寻求投资场所及方式的货币资本形式重启时，该目标始终已作为先决条件而被预设。而这种关系的具体性质则在于，尽管在整个社会层面上，社会相互依赖的关系可能表现出多样性，但受到积累“法则”的支配，其最终将依赖于或可以化约为，来源于生产过程中**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的对抗性。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因为我们需要解释如何对抗关系也可以是互补的，而缺乏这种互补性，它就不能服务于生活和社会的再生产，即使这种互补性以更多或更少活跃的矛盾为代价。同时，我们还需要解释如何对“直接”的社会关系形式进行分析，在这些形式中，雇佣劳动者面对他们的敌人（直接和间接的资本所有者和管理者）时，总是涉及社会层
40 面的全球关系，这些关系包括阶级关系、财富和收入的总体分配，以及涉及许多社会功能和差异的权力分配：不再是“主体间”（intersubjective）的剥削和统治关系，而是持续演变的“社会”自身“诸对象”的关系。

用阿尔都塞的方式来看，我认为这在一般意义上，是马克思**认识论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的哲学核心。这种“断裂”不仅仅是对资本的先前意识形态表述的拒绝（在马克思的辩证理论中，这种拒绝同时伴随着解释为什么这些意识形态表述是必要的，甚至在某些条件下是功能性的；换句话说，它们是社会关系本身的一部分）。这种“断裂”也是一种突破，开辟了仅仅通过发展前提而无法得到解决的问题。那些

表达所发明的公式本身就包含了障碍，这些障碍在与资本主义实际历史变革的对抗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在这里，一种解构的策略变得必要，它能够识别理论发明核心中的障碍和困难，并追溯这些障碍和困难的根源在于其“基本概念”的定义方式。没有什么可以不被触动，但在理解某个理论解释了什么的同时，也必须理解任何修正可能带来的后果（尤其是**政治**后果），因此没有什么可以在不理解的情况下被简单地拒绝或修正。

马克思的认识论障碍

从我们当代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主要认识论障碍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位于两种定义“资本”的主要方式的交汇。这两种方式对马克思来说是互为补充的，实际上是同一模式的两个方面：资本是一个（通常）依赖于雇佣劳动的剥削过程，马克思有时以黑格尔的方式称之为“本质关系”；资本也是一个通过利润最大化，在货币形式中无限积累的过程，而利润的主要部分则必须被再创造出来（**如果可能的话**，这始终是一个大问题，也是潜在的矛盾）。³这两个概念并不相同，更远非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指向不同的“社会关系”或社会机制的不同方面，但在马克思看来，它们是严格相关联的。如果你有第一个，你

41

³ 在德语中，*das wesentliche Verhältnis*（本质关系）是黑格尔《本质逻辑》（第二篇“表象”第三章）中的核心范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19章“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中直接沿用了这一表达（但未提及黑格尔的名字）。我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第9卷（*Historisch-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 ed. W.F. Haug, Berlin: InKrit, Das Argument Verlag, vol. 9）中“*Mehrwert*”（剩余价值）的词条里，对《资本论》中“资本”作为“形式”关系与“实体”关系的两种定义进行了讨论。该文的法语译文发表于 *Actuel Marx* 63 (2018), Paris: PUF: ‘L’exploitation aujourd’hui’.

就有第二个；如果你有第二个，你就有第一个。为什么会在这个交汇上出现问题呢？特别是因为，首先，对马克思而言，“资本”最终不过是资本化的劳动（capitalized labour），因此“劳动”并不仅仅是主流经济理论所解释的众多生产要素之一；其次是马克思将劳动与货币形式所联系的方式；最后则是他将“生产性”（productivity）归为劳动。⁴

42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剥削和积累的论点完全依赖于一个关键概念“增殖”（valorization）。然而，如果我们回到德语文本，就会发现有两个词可以这样翻译，对应着不同的概念。⁵当然，它们是相互关联的，但问题在于如何关联？其一是 *Wertbildung*，字面意思为“价值的形成”。其背后的思想是：在一切以商品形式生产物品的社会中，商品的交换价值必然由某种共同的“实体”所决定，而这种“实体”正是交换价值的表现。马克思从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得知，这种实体是劳动，但他进一步指出，这里的劳动是“抽象的社会劳动”：它并不是一个可观察的经验量，而是隐藏于市场背后、或存在于其缝隙中的“同质化”过程的隐含或“内在”的结果——这种同质化正是由交换本身所造成的。因此，这里存在着一种循环：只有当商品按照它们所包含的抽象劳动量成比例地交换时，抽象劳动才存在。然而，主要的困难在于如何将这种 *Wertbildung* 意义上的“价值化”与其在资本主义语境下的 *Verwertung*——

⁴ 我所提及的“三位一体公式”（Trinity Formula）——土地、劳动与资本被视为收入或利润的“来源”，由亚当·斯密最先提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48章）中对此进行了批判性的讨论。这一公式后来仍被主流经济学家沿用，作为进入“生产函数”的“主要生产要素”。自弗兰克·奈特（Frank H. Knight）在其1935年的《竞争伦理学》（*The Ethics of Competition*）中使用“三位一体公式”这一说法（但未提及马克思）以来，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又在此基础上引入了“人力资本”这一“第四主要要素”。

⁵ 关于详细讨论，请参阅我在“*Mehrwert*”（剩余价值）词条中的相关分析。

—“价值的自我增殖”相衔接，换言之，是在流通过程本身中产生出额外价值。⁶资本家之所以投资、衡量价值或计算价格，只是因为他们想要最大化这种“剩余”，即产生剩余价值。实际上，价值并不是在进入增殖过程之前就在市场上“形成”的，恰恰相反，正因为存在第二种意义上的增殖（剩余价值的生成），才有第一种意义上的价值化（价值的形成）。换言之，商品市场一开始就已经是**资本主义**市场，而“抽象的”社会劳动在根本上就是**被剥削的**社会劳动，即以雇佣劳动形式存在的劳动。因此，正是雇佣劳动，也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使劳动同质化并“相等”……

与这一公理性循环相关的其他困难在于，马克思需要解释“增长”（increment）何以产生。为此，马克思必须说明生产资料的价值已经存在，像是由“过去的”、“物化的”（materialized）劳动所构成的财富或库存，而“活”劳动，即当下的劳动，会以某种比例为其增添新的价值。为此，需要满足两个条件，这构成了劳动生产性的“秘密”：一方面，作为“具体的”劳动，它可以保存（或者更确切地说，重新创造）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机器和原材料的价值；另一方面，作为“抽象的”劳动，它能够以可度量的量创造新价值。然而，实际上，这一切并未得到确定；这一切仅在产品被出售并转换为货币时才有意义，即以完全偶然的方式实现价值。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重大的悖论：即马克思比其他任何理论家更坚持价值仅以货币形式存在，但他同时也倾向于弱化货币的功能，回归到一种“真实”的经济循环的表述中，在这种表述中，

43

⁶ 马克思那种准数学化的术语，*Das Inkrement*（增量），或称“微分”（the differential）受到 19 世纪早期关于微积分的阐释的启发，这种阐释同样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被赋予了“辩证式”的解读。参见 D.J. Struik, ‘Marx and Mathematics’, *Science and Society* 12 (1948), pp. 181–196.

与资本主义逻辑相反，并非货币支配商品的流通，而是商品与其自身相关联，并以货币运作的拜物教形式表达其关系。⁷这最终导致马克思在未完成的《资本论》第三卷（第 25 章）中将信用以及整个金融过程称为“虚构资本”（fictitious capital）。这是一个极其模棱两可的说法，其可能暗示资本主义确实通过使用“虚构”，即具有约定性、制度性基础的象征性工具来运作，或者暗示“真实的”资本主义及其历史趋势和变革必须只能从劳动关系的角度才能加以解释（即由过去和现在的劳动构成的“有机构成”），抽象掉它们的“实现”受制于货币约束的事实。

8

44 这在讨论金融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时是一个戏剧性的难题，它有可能将我们推向另一种相反的论述：即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纯粹的**金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信用货币及其衍生品展开自身自主的生产性，并创造利润，而与生产过程或更广泛的社会关系没有任何明显的联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价值在其不同形式：货币形式、商品形式间依次进行“转换”，而没有这种转换，就不会有任何意义上的增殖。要实现价值的增殖，价值必须改变形式。马克思还指出，价值必须不断地从一个“场景”转移到另一个场景，从货币交换的场景转移到生产性消费的场景。⁹

⁷ 大卫·哈维等人（贝洛菲奥雷、海因里希、米里奥斯）正确地坚持了这一点，参见 Riccardo Bellofiore, ‘A Monetary Labor Theory of Valu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21, no. 1/2 (1989), pp. 1–25.

⁸ “虚构”（fiction）这一术语与马克思的双重思想相关：一方面，在两个“循环”W-G-W 与 G-W-G 的互为关系中，第二种循环只是第一种“倒置形式”；另一方面，信用的自主化本身具有“投机性”，从而开启了危机的可能性。这一思想事实上也被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接受，尤其是凯恩斯（Keynes）。

⁹ 这一立场基本上源于苏珊娜·德·布伦霍夫（Suzanne de Brunhoff）在其奠基性著作《马克思论货币》（*Marx on Money*, London: Verso, 2015）中的观点，并在

关于劳动的问题也存在同样的困难。以“劳动的二重性”的概念为起点（这一概念解释了增殖的双重方面），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对于“劳动”的识别仍有两种方式。通过“生产性”（*Produktivkraft*）这一范畴的多义性使用，这种紧张关系变得明显。一方面，“生产性劳动”指的是任何转化为资本投资领域的活动：根据我之前的术语，货币价值转化为其对立面的任何形式，即商品使用价值的物质或非物质的增殖，都会产生剩余价值。它会产生可以资本化或积累的增量，或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它是“生产性的”。另一方面，“生产性劳动”指的是在物质意义上的生产领域中所进行的具体活动，主要包括工业与农业。对此（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讨论资本“循环”时，关于生产与流通周

45

期相互渗透所指出的），我们当然还可以加入运输、通信等领域。但这并不改变一个事实：这里的“生产性劳动”是以狭义的方式被理解的，它相对于第一种更广义的“形式的”劳动而言，仅限于货币资本的某些具体投资领域。这种限制的理由显然是政治性的：它使得我们能够界定“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将其视为工业革命的社会产物，这一阶级既是现代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又是潜在地挑战资本统治、乃至资本主义积累延续的力量。¹⁰但我要强调的是，这是一种对增殖“源泉”的狭义定义：它并不包含一切有薪活动，尤其并不包括一切被剥削的劳

其后续著作《货币关系》（*Les rapports d'argent*, Grenoble: PUG, 1979）中得到了扩展，我在此基本上是沿循她的分析。

¹⁰ 关于“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争论，始于重农学派（他们将生产性劳动仅限于农业），由亚当·斯密进一步发展（他将其推广至“一切能为其作用对象增殖的活动”），最终导向马克思对“生产阶级”的新定义（在资本主义关系下生产商品的任何工人）。尽管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生产阶级”、“无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这三者在分析上是有区分的，但他在历史和社会学的层面上仍倾向于将它们等同起来。

动，尤其是那种按定义而言不以工资形式支付、也未以货币形式得到补偿的被剥削劳动，即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性承担，这是资本主义在我们所有社会中与父权制相结合的历史结果。¹¹最后，它也未包括那些虽不直接属于“劳动”意义上的活动，却获得了增殖的重要功能、并因此从资本主义的视角看也是“生产的”的广泛活动领域。

与其从纯粹的概念性论证中推导出结论，我将在这里以一种实验性的方式进行讨论，通过探讨一些例子来展开分析。我将考察两种过程，
46 这些过程当然可能依赖于对劳动的剥削，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增殖”了人类生活和消费的其他维度，并在这种“普遍意义上”生成剩余价值。在讨论这些例子时，我们必须牢记这样的观念：如果没有转化为其对立面的商品，即能在资本主义意义上被“生产性地”消费的商品，那么就没有货币，也就没有能够增殖的资本。但我们也必须记住，劳动并不是唯一形式的这种“生产性消费”（参见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术语）。因此，我们必须挑战在马克思对剥削理解中的某些核心要点，并面对这种修正所带来的所有政治后果。然而，我提出的结果并不一定会抹去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维度。

¹¹ 参见以下学者的女性主义批评：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西尔维娅·费代里奇（Silvia Federici）、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哈丽特·弗拉德（Harriet Fraad）、弗里加·豪格（Frigga Haug）等。另可参见我的文章‘Exploitation’ in Political Concepts: A Critical Lexicon, www.politicalconcepts.org/balibar-exploitation.

剩余健康与生命资本的积累

我的第一个例子是“剩余健康”（surplus health）。我认为这个术语由乔·杜米特（Joe Dumit）在一系列研究中创造，最终在他的著作《终身药物》（*Drugs for Life*）中得到了总结。¹²这个概念模仿了“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将视角从生产转向某种消费——这种消费至关重要，因为它涉及个体在特定环境中在“可接受的”生活中生存、生活的能力。47 这就引入了与马克思主义劳动力相对称的东西，如“忍受”的能力以及接受药物和医疗服务以恢复或简单生产“健康”的能力。¹³杜米特的研究涉及三个方面：健康和疾病的定义变化、人均药物消费的持续增加，以及医药行业费用和利润的相应增长。

一方面，“疾病”的定义经历了逐步的转变，从经过医生在“临床”关系中诊断，个体体验痛苦、残疾、失调或疾病的病理学，转变为通过“生物指标”（如胆固醇水平）所测量或指示的隐性客观状态，这些量化定义会定期修订，从而更多或更少地自动要求长期使用药物（如他汀类药物）。这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对作为生活经验的疾病的剥削形式，个体可能会要求这种形式，或者无法拒绝并将其转化为需求。另一方面，疾病从一个不连续的状态（当然存在巨大的严重性、持续时间和紧急情况

¹² Joseph Dumit: *Drugs for Life: How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Define Our Health*, Durham NC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2. 这与梅琳达·库珀（Melinda Cooper）的工作有有趣的相似之处，我在这里不展开讨论。参见 Melinda Cooper: *Family Values: Between Neoliberalism and the New Social Conservatism*, New York: Zone Books, 2017.

¹³ 实际上，马克思使用了两个术语来指代这一概念的不同方面和功能：一是身体和精神上的劳动力（*Arbeitskraft*），二是社会认可的工作能力或职业能力（*Arbeitsvermögen*）。参见 Pierre Macherey, *Le Sujet des normes*, Paris: Éditions Amsterdam, 2014. 有趣的是，意大利的“工人主义”传统使用 *forza-lavoro* 的方式，将劳动力的概念与政治主体（阶级）的概念结合起来。

况的差异)过渡到一个连续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大多数“疾病”是慢性病,并且统计数据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会尽可能频繁地、尽可能长时间地消耗大量不同的药物。¹⁴因此,《终身药物》的标题讽刺道: 48 药物用于生活,或用于生存,和药物用于终身。生活因此变成了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假肢生活”(prosthetic life)的状态,显然一种依赖性的生活。¹⁵第三个方面则是:供应在需求之前,并实际上创造了需求,这符合市场“自由”法则(萨伊定律)强有力地扩展。健康成本在“发达”国家中持续增长,至少在部分人群中(但这一部分人群也很重要)。这些成本分布在公共开支和私人开支(通常由保险覆盖,因此涉及某种形式的信用)中,这一增长旨在推动医药产业的利润增长,该产业通过确定“风险条件”而影响实验室,优先选择哪些药物进行开发,并遵循投资和回报的计算。

在这里,利润不仅仅来自于生产,即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增殖,尽管必须最小化成本;利润来自于一种不同类型的增殖,这种增殖将创新与消费增长直接结合。这就是所谓的“剩余健康”,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剩余价值普遍形式。考希克·孙达尔·拉詹(Kaushik Sunder Rajan)增添了另一个维度,表明了一种全球经济层面上的新型人口规律,因此是理解全球化与金融化结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¹⁶药物主要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消费,并为这些市场设计;但它们却在印度和其他“南

¹⁴ 这里与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形成了显著的平行关系,后者结合了生产力的提高与劳动强度的加剧。

¹⁵ 不用说,每个人的生命历来都依赖于与他人的关系、所处的环境条件以及所掌握的技术:它始终是“脆弱的”。但这里所指的是一种全新的依赖类型:它既更为被动,又受制于属于制药工业经济-技术复合体的力量。

¹⁶ Kaushik Sunder Rajan, *Pharmocracy: Value, Politics and Knowledge in Global Biomedicine*, Durham NC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方”国家进行测试，即进行试验。这不仅是因为印度有大量失业的贫困人口可以作为“志愿者”（即合同患者，他们提供“知情同意”），而且主要是出于科学的社会生物学原因，因为只有在尚未进入药物慢性消费过程的地区，才能找到所谓的“无辜受试者”进行试验，这些受试者的生理反应为药物的反应提供了一个实验模型，用于理解和调整药物的效果。通过这一新的重要分析，我们理解到普遍剩余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同时具有本地市场功能和全球系统条件。

人力资本或“劳动价值论”的颠倒

“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这是我的第二个例子，其运作方式有所不同。如我们所知，这一范畴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中获得了战略性的作用，将古典经济学扩展到一些被认为“天生地”位于经济计算之外的领域：教育、婚姻、法律与刑罚、慈善等。教育尤其与我们的主题相关。在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等人的研究中，人们构建了一种模型，用以定性关联以下几方面的分析：个体被雇佣时能以最大利润率（无论是对他/她自身，还是对雇用他/她的雇主）就业的能力组成部分；这些能力“生产”的成本方程，其开支可以是公共的，也可以是私人的（即“个人的”，但多数情况下来自家庭）；并且，在理想状态下，这些成本应被最小化，而相应的收益应被最大化。¹⁷因此，人们试图评估投资与回报之间的“经济”相关性，以此为“理性预期”的经济战略提供

¹⁷ 我的参考主要为 Gary S. Becker,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196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Gary S. Becker, *Human Capital and the Person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 Analytical Approach*, Ann Arbor MI: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67. 该书给出了一个简短的介绍。

合理性，在这种框架下，可以为个体能力设定“生产函数”，并定义一种最优策略，将接受教育或培训所花费的时间（学习多少年、在哪里学习）、成本（个人或集体）与终生个人收入之间建立联系。我在这里并不讨论这种模型是否真的“有效”或“具有预测力”，但我想强调三个必须加以阐明的方面。

首先，需要知道的是，“人力资本”这一范畴并非在个人主义的视角下发明的。事实上，它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出现的，当时的讨论和规划集中在新独立的殖民地或亚洲、拉丁美洲的“欠发达”国家，目的在于通过本土发展教育、科学和医疗资源，确保国家经济独立，提高其人口在全球市场上的“生产力”和“竞争力”。¹⁸这一原则与其说是个人间的竞争，不如说是国家间的竞争，并且与某种“社会主义”去殖民化和发展政策的结合有关。新自由主义在这里所取得的成就则是改变了该概念的社会内容，这与规划思想的衰退和竞争模型的普及密切相关。

其次，贝克尔理论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为个人在成本和回报方面评估不同教育策略的相对优劣程度提供一套量化的工具，他将这些策略
51 分别称为精英主义（为那些预计会更成功的人投入更多）和平等主义（对所有人都可以获得的机构进行大规模投资，提供服务，根据个人的能力、抱负或毅力，这些服务会在不同程度上“增殖”）。¹⁹这显然是一场政治对抗，不出意外的是，结果表明精英主义体系在总体上比平等主义体系更有效率。再加上作为该模型的形式后果之一，教育服务的私有化，即将教育服务从公共机构转移到私人公司（或采用与私人公司相同

¹⁸ 参见 D. Cogneau et al., ‘Développement des pays du Sud’, *Encyclopædia Universalis*, www.universalis.fr/encyclopedie/developpement-economique-et-social-de-developpement-des-pays-du-sud.

¹⁹ Becker, *Human Capital and the Person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管理策略的公共机构)被认为更有效率,前提是保持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间的“最佳”比例。这个过程似乎有明确的阶级意图,尤其是在当你考虑到对孩子教育的个人投资已经需要现有资本时。然而,理论家们通过引入作为一种基本投资工具的**信贷**,来为缺乏足够财富的个人提供更多的机会选择,这被视为一种民主的修正。于是,民主与大规模负债联系在一起,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伪装,更是通过培训将越来越多的人纳入增殖过程的有效工具。

最后,这种理论及其在我们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趋势,与马克思关于对劳动力的剥削和资本积累的论述存在一种扭曲但非常易于理解的关系。马克思解释道,“资本”最终可以被化约为(生产性)劳动,或者说资本不过是劳动的另一种形式,被不同阶级所占有。而人力资本理论则解释了劳动——更准确地说,“劳动能力”(Arbeitsvermögen)如何能够被化约为资本,或通过资本主义的信用、投资和盈利操作来分析。这显然是个体作为“自我企业家”(self-entrepreneur)或“自己的企业家”

52

(entrepreneur of oneself)意识形态的基础。该意识形态非常有效,原因与马克思关于将社会劳动简化为各种相同“抽象劳动”倍数的理论非常相似:即资本主义如果要持续运转,就需要大量不加区分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被或多或少地从一个剥削场所转到另一个场所。同时,资本主义还依赖于对人类能力的持续区分和分层,这种区分和分层不再由传统的学科或职业提供,而是以资本主义的形式进行组织和标准化。

资本主义再生产,或“总体吸纳”

这实际上是一个过渡点,旨在定义我暂时称之为“绝对资本主义”(absolute capitalism)的概念:一个不断商品化的过程,或创造新的“虚

构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ies）的过程，而没有这些，积累过程就无法维持。这个过程导致再生产过程（生物的、知识的或象征的）被纳入增殖过程，将人类活动“转换”为货币数量，同时增加了信用和债务在关联个人和集体社会关系维度中的功能，因此也重新定义了资本本身。

20

53 尽管经过简化，但我所讨论的例子阐明了增殖的问题，既包括价值的形成，也包括将新价值添加到现有资本中的过程。这些过程涉及积累、商品化和金融化，并不完全基于对劳动的剥削，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不仅仅是“生产性消费”，而是还涉及对其他活能力的利用。这并不是说这些过程不包含剥削或剥夺（正如大卫·哈维所正确强调的那样），因此也不意味着不存在潜在的或公开的对抗。²¹相反，这些过程的对抗性特征更为明显。无限积累的倾向仍然是资本主义的驱动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甚：这就是为什么在每一次投资中，价值的实现都必须提前规划。而且由于私人资本尽可能保持“流动”，在不同部门之间转移以最大化利润，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当今的金融资本主义中，为了最大化股东资产的价值，这意味着所谓的“理性预期”被纳入银行和对冲基金所支持的对某项投资的决策中。尽管我不敢自称是这方面是专家，但我大胆地提出一个额外的假设：问题可能不在于描述现有产品市场的增长；而更在于将市场的范围推向传统意义上的“生产领域”之外，因此加入新的永久性的“额外剩余价值”（extra surplus-value）的来源，使其能够

²⁰ 关于“绝对资本主义”这一术语，英马尔·格兰斯泰特（Ingmar Granstedt）、弗朗哥·贝拉尔蒂（Franco Berardi）、贝特朗·奥吉尔维（Bertrand Ogilvie）和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也有不同的使用。我将在其他地方讨论这些不同的定义。

²¹ Davi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Socialist Register* 40 (2004), pp. 63–87.

融入增殖过程，从而克服其局限性，因为资本既在劳动和生产的“客观”方面，也在消费和使用的“主观”方面得到增殖。

这就是为何我坚持持续不断的商品化过程极为重要的原因。最终，“商品化”就是对生活的商品化，通过其对象以及它的行动或激情。这是一个早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甚至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开始的过程；但在资本主义内部，这一过程不断跨越着新的门槛。卡尔·波兰尼关于“虚构商品”的概念在此非常宝贵，前提是我们不认为存在一份“虚构商品”的自然既定清单。²²相反，这些新商品不断地被发明出来：健康、教育、知识、娱乐和艺术、护理和情感等等，这些不仅为生产部门本身或人类主体的“生存”提供“手段”（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的两个部门），还“生产”了主体本身。然而，我们也必须牢记波兰尼所涉及的问题，即是否存在着阻止无限商品化的障碍：这些障碍可能来自内部或外部的矛盾效应，使得通过商品化的更新而实现的增殖无法顺利进行。

这些客观和主观维度的结合，使我提出了一个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吸纳”概念。我想到的是“总体异化”（total alienation）的理论，这些理论可以追溯到从霍布斯到卢梭再到马尔库塞等人。最重要的是，我希望继续关于马克思所开创的并在一些未发表的文本模糊之处的思考。“吸纳”（subsumption）是一个古老的法律和哲学范畴，意思是某物

²² 波兰尼的概念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MA: Beacon Press, 2002）中有所阐述。书中提到的“虚拟商品”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货币（注意与三位一体公式的对称性）。因为这些“虚拟商品”被认为难以完全商品化，它们支持了引入（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而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波兰尼在二战结束时，面对（贝弗里奇式）福利国家或社会国家的背景，认为这一转变是不可避免的。

或某人因为被纳入一个形式，或被某种规范、法律或规则在物质上规定而“受制于”这一规范、法律或规则。²³问题当然是：什么被吸纳于什么之下？我提到“某物”或“某人”，但最有趣的情况可能是在我们引入第三个伟大的本体论范畴时出现，这既不是物也不是人，或者可以包括两者，即“行动”（actions）或“能动性”（agency）。²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从“形式吸纳”（formal subsumption）到他所称的“实质吸纳”（real subsumption）的过渡时，就是以这种方式使用它的：工人的行动，即他的生产操作，利用工具将某种物质转化为可用的对象，被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工业革命改造为一个集体过程中的“部分操作”，其内容和节奏由机器本身决定，因此工人实际上只能在工厂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增殖的“法则”下生产或“做”某些事情。工人不仅必须接受资本主义市场的支配，接受（或不接受）资本家提供的工作，而且他们在这种技术和社会形式之外无论如何都无法进行手工或脑力操作。在这样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中，工人的劳动不仅成为“抽象劳动”，还被分解为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中的“部分活动”（partial activities）。当形式吸纳以工资形式在法律上完全“实现”或转化为“实质吸纳”时，剥削不仅仅是一种支配；它纳入了对人类身体和心灵的安排中，或者被

²³ 马克思关于“形式”吸纳与“实质”吸纳的观点，主要可以在《资本论》未出版的第6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找到。在他最近的博士论文中，安德烈斯·萨恩斯·德·西西利亚（Andres Saenz de Sicilia）对该概念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的变迁进行了深入地分析：

www.academia.edu/28392192/PhD_The_Problem_of_Subsumption_in_Kant_Hegel_and_Marx_2016.

²⁴ 罗马法（遵循斯多葛学派的本体论）采用的不是二元论，而是三分法的存在类型学：物（things）、人（persons）、行动（actions）。在现代（资产阶级）法律理论的“大二分法”（Bobbio）中，第三类被排除在外，这导致在家庭法和劳动法等领域中出现了混合型法律公式的创造。

彻底地个体化。但这种“个体化”（individuation）也是一种完全的个性丧失，这次是以“个性化”（individualization）或个人身份和自主权意义上的丧失。这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期望通过另一场工业革命来获得解放，这场革命将以集体能力或集体分配的能力取代当前的个体活动形式。²⁵

然而，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另一件事，我称之为“总体吸纳”。马克思在解释资本主义的两种方式时提到了一些这一意义的迹象：不仅 56 在生产过程中剥削劳动，而且在再生产过程中剥削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工人及其家庭，作为“自我所有者”的社会个体，只是为了“再生产”或“重建”他们的劳动力而消费商品。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注意到，在这样一个具体地将家庭与市场条件联系起来的再生产过程中，会发生另一种形式的无酬家务劳动；但他并未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市场约束或市场逻辑将越来越多地支配工人的消费质量和数量，以使其对资本也具有盈利性。²⁶例如住房或城市发展问题，恩格斯早在 1845 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中就已经关注的问题，或是商品的大规模分配。然而，这在消费领域内仅是一种“形式的”吸纳。随着我所描述的剩余健康或人力资本方面商品化阶段的到来，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资本主义投资进入了护理和教育过程本身。

这意味着两件事：（1）工作与生活、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人类学障

²⁵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 15 章《机器和大工业》中，马克思罕见地提出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发展构想，即“全面发展的人”作为技术变革（劳动的智力化）和社会主义教育计划的共同愿景。

²⁶ 马克思主要关心的，是资本所面临的矛盾：资本需要不断扩大消费市场，同时又要不断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再生产成本）。

碍被消除了，因为再生产本身正在成为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生产性”领域；（2）没有任何个体性维度（也同样没有任何个体之间的主体间性、脆弱性或依赖性）能够不受商品化的影响。²⁷没有任何形式的生活，无论是作为能动性、活动、否定，甚至是痛苦，甚至是死亡，都无法脱离商品形式和价值形式，而这些事实上是资本增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不是个体生活被简化为阿甘本所说的“赤裸生命”（bare life）。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相反：这是对生活的去自然化（denaturalization），或者说“第二自然”的生产，不以任何形式（因为每一种人类文化都是一种“第二自然”），而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形式**。²⁸这就是我所谓的总体吸纳（继“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之后），因为它不再留有任何外部空间（没有“自然”生活的保留地）。或者说，任何剩余在外的东西都必须被视为一个残余，并成为进一步吸纳的领域。那么事情必须如此吗？这当然是问题的全部，无论是伦理的还是政治的：商品化是否有其界限？是否存在内在和外在的障碍？一位拉康主义者可能会说：每一个这样的总体化过程都包含一种属于“实在”的不可能性元素，它必须“并非全部”（*pas tout*）。如果是这样，那么总体吸纳的内在剩余部分可能会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出现，一些看似个体化的形式，如病理学或无政府主义的抵抗，另一些则是共同的甚至是公共的。或者，它们也可能表现为在

²⁷ 正如资本主义对生产的商品化（雇佣劳动）占据了**活动**本身一样，资本主义对再生产的商品化则占据了**关系性**，即人类相对于他人的本体论上的“脆弱性”。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一概念如今在批判理论中被凸显出来，它强调了该领域中存在的替代可能性，同时也对应于对立的存在方式。

²⁸ 我这里所指的是乔吉奥·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系列著作《神圣人》（*Homo Sacer*），从《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以及贝特朗·奥吉尔维的《政治的第二自然：否定人类学的尝试》（*La Seconde nature du politique. Essai d'anthropologie négative*, Paris: Éditions L'Harmattan, 2012）。

落实新自由主义议程时遇到的某些困难，例如一旦医保体系被立法确立之后，想要将其拆除就会变得困难重重。

3. 从商品到景观：德波的马克思

埃里克·约翰·拉塞尔（Eric-John Russell）

居伊·德波（Guy Debord）发表于马克思《资本论》一百年后的《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在发布时被描述为“新一代的《资本论》”（《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¹然而，该书的内容几乎从未与马克思《资本论》中所系统整理的价值社会形式的辩证逻辑进行过严肃的对比。尽管德波将现代景观描述为商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对德波所受到的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讨论通常侧重于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异化批判，其中他尚未深入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²

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正如他的档案笔记所证实的那样。初步浏览《景观社会》会给人一种印象，即马克思在二十多岁时首次提出的“对一切现存的无情批判”在一个世纪后仍然回响不已。³该书充满了对马

¹ 《景观社会》于1967年11月出版，正值出版于1867年9月中旬的《资本论》100周年。

² 德波将古典政治经济学称为“统治的科学”（§41）。在本研究中，《景观社会》的所有选段均采用弗雷迪·珀尔曼与乔恩·苏帕克（Fredy Perlman and Jon Supak）的英译本（底特律黑与红出版社1970年初版）。引文后标注命题编号以标明出处。中文版译文见：[法]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³ 德波在1963年秋天开始写作《景观社会》（*Guy Debord Correspondance, Volume 2: Septembre 1960-Décembre 1964*,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2001. Translation: NOT BORED ! www.notbored.org/debord-14November1963.html）。德波作为一位臭名昭著的酒徒，在两年后发誓不再举杯，直到书稿完成。至于他是否坚持了这个誓言，无从得知。正如他在1965年写给拉乌尔·瓦内盖姆（Raoul Vaneigem）的一封信中写道：“一个月来，尽管我发现自己很愉快地忙碌着，但为了完成对景观的批判，我已经将日常生活和游荡的许多魅力都置于次要地位。我已经完全停止饮酒，直到最后一行写完。一个古代的高尚榜样！高尚到温泉关，

- 59 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描述的社会异化现象的隐含与明确的引用。然而，我们发现，德波早期便以以下社会异化的视角来定位景观的出现：

经济对社会生活进行统治的第一阶段，在对任何人类成就的定义中，曾经导致一种从存在 (*être*) 滑向拥有 (*avoir*) 的明显降级。而通过经济的积累结果对社会生活进行整体占领的当今阶段，正在导致一种从拥有面向显现 (*paraître*) 的总体滑坡，而任何实际的“拥有”只能从这种滑坡中获取它的即时名望和最终功能。(§ 17)

在这里，表象对财产的优先地位不仅仅引起了对德波关于表象的理论如何从马克思早期关于社会异化的著作中获得理论规定性的关注，更具体地说，还引起了对这些商品经济发展的演变如何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占据一定中心地位的关注。我们可以在 1990 年给乔吉奥·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 的信中找到线索，德波写道：

我很高兴在 1967 年尝试了一种与阿尔都塞悲观的否定完全相反的“转移式拯救” (salvage by transfer)，通过向马克思主义方法中添加大量黑格尔的内容，同时重述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旨在铭记马克思主义方法在我们贫困国家的可确定发展，正如从之前的情况中可以预见到的那样。⁴

与斯巴达人同在……在最好的情况下，我还有六周或两个月的时间。这让我感到沉重。但我为自己设下的陷阱真是巧妙” (Guy Debord *Correspondance*, Volume 3: *Janvier 1965-Décembre 1968*,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2003. Translation: NOT BORED ! www.notbored.org/debord-1August1966.html)。

⁴ Guy Debord *Correspondance*, Volume 7: *Janvier 1988-Novembre 1994*,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2008. Translation: NOT BORED !

对于德波而言，景观社会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统治，它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商品经济的自主发展而成，其中人类活动被客观的表象形式所结构化，这些形式中介于社会关系间，但又由确定的、具体的实践模式所构成。随着劳动分工的不断碎片化和通过商品形式结构化的社会关系，对德波而言，景观是在表象层面上从其分离断裂的片段中重构统一社会生活的手段。简言之，景观是社会组织的關鍵范畴，它基于黑格尔思想所衍生的表象规定性结构的概念，具体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统一体的多元面向。⁵

60

尽管如此，德波关于景观构成资本主义质的发展主张的合理性，仍需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畴规定性来评估。是否如有所声称的那样，德波的景观只是取代了马克思的商品，尽管是在战后繁荣的条件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德波对景观的分析间的差异是否仅仅是重点不同？此外，景观如何与其他显著的价值表现形式如货币，或更重

61

www.notbored.org/debord-6August1990.html.

⁵ 尽管德波早在 1955 年就提出了“景观”这一范畴，但直到 60 年代，特别是在《景观社会》中，它才作为一种批判概念来展现结构化的总体性。从 1955 年开始，德波在《城市地理学批判导论》（*Introduction à une critique de la géographie urbaine*）中使用这一范畴，该文章刊登在比利时超现实主义杂志《裸唇》（*Les Lèvres Nues*）第 6 期中。德波在文章中以一种通用且非党派的方式使用“景观”一词，指代宣传手段以及从城市漫游中获得的印象和氛围。正如所预料的那样，“旁观者”（*spectator*）一词也在更普遍的语境中使用，指代被动接受的主体性。然而，在 1957 年的文章《情境的建构及情境主义国际组织和行动条件的报告》（*Rapport sur la construction des situations et sur les conditions de l'organisation et de l'action de la tendance situationniste internationale*）中，“景观”这一范畴被明确定义为“非介入”（*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 1997, p. 699），并与“情境的建构始于现代景观的废墟之上”（同上）相关联。因此，它开始获得一种更为技术性的含义，即作为一种“心理认同模式”（同上）。在这篇早期文章中——这是 1957 年 7 月在意大利科西奥·达罗西亚举行的会议的准备文本之一，该会议上成立了情境主义国际——“景观”作为“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景观”首次出现（同上，p. 701）。

要的资本相关联？⁶最后，如德波在 1966 年的一封信中所写，“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应当如何被纠正和补充”？⁷

本文尝试通过突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表象形式（appearance-forms）的核心作用来回答这些问题。在这里，将明确的是，价值，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财富形式，是通过一组表象的形式规定性（*Erscheinung Formbestimmungen*）在本体上构建总体性的。正如我们从黑格尔那里了解到的，一个总体不能直接或无中介地呈现，因此主要的是价值的形式，或者说马克思在多个地方提到的形式规定性（*Formbestimmung*）。⁸在这里，作为形式规定性或作为形式自我运动的价值，本身不是直接可感的，但却具有具体的表象，这种价值源于资本生产和再生产所需的社会关系总体的自我再生产逻辑。

62 《资本论》的系统性叙述通过一系列结构化的范畴而展开，这些范畴揭示了直接表象的内在动态，最关键的是揭示了本质社会关系如何获得其特定的表象形式。这是一种再现（*Darstellung*）方式，它将社会现实视为一个内在联系和规定性的总体。马克思的再现为汇集历史细节提供了具体的概念统一性。这是一个从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如何呈现的直接情况出发，逐步展开作为这些表象形式回溯基础的中介本质的重建过程。

⁶ Gilles Dauvé, aka Jean Barrot, ‘Critique of the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1979); translated by Louis Michaelson in Stewart Home, ed., *What is Situationism? A Reader*, Edinburgh: AK Press, 1996; and ‘Back to the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1979), *Aufheben* no. 9 (2000). 另见 *At Dusk: The Situationist Move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erkeley CA: Perspectives, 1975.

⁷ Guy Debord *Correspondance*, Volume 3: *Janvier 1965-Décembre 1968*. Translation: NOT BORED ! www.notbored.org/debord-26December1966a.html.

⁸ “*Formbestimmung*”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但直到《大纲》和《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初版中才再次出现。

马克思试图通过价值的表象形式（*Erscheinungsformen*）的逻辑来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价值必须以其特定形式呈现。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未提出过的问题，但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个问题对于解释利润与劳动间的中介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这个问题不能在没有黑格尔的情况下得到充分解答，特别是他的本质逻辑（*Wesenslogik*），其中本质必须以与自身不同的形式出现。对马克思来说，这种逻辑，通过表象与本质相互构成的同一性质疑形式二元论的界限，是一种以理解剩余价值作为利润出现的必要性，以及价值必须以其特定具体形态（如商品、货币和资本）所呈现的必然性的概念资源。⁹

不仅如此，景观的概念源自于这一根本上属于黑格尔的自我发展表象形式的运动，这一运动也被马克思所继承。而马克思的用法中包含了一些已经倾向于“景观”的洞察。例如，在价值的表象形式的发展中，可以识别出拉丁语“*spectaculum*”及其与“镜像”或“排列展示”的联系，以及“*spectare*”（“观看”、“注视”或“凝视”）的属性。¹⁰然而，这顶多只能证明德波在通过强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某些方法论方面来构建景观理论。这一点确实如此，德波在为《景观社会》选择不同标题时，其试图在黑格尔辩证法设定的轮廓中构建社会批判的严肃

63

⁹ 参见 Patrick Murray, *Marx's Theor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1988, and ‘The Secret of Capital’s Self-Valorisation “Laid Bare”’: How Hegel Helped Marx to Overturn Ricardo’s Theory of Profit’, in Fred Moseley and Tony Smith, eds, *Marx’s ‘Capital’ and Hegel’s ‘Logic’: A Reexamination*, Leiden: Brill, 2014.

¹⁰ 正如德波在 1980 年写给《景观社会》的一位希腊译者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在法语中，‘景观’（*spectacle*）这个词的优点在于它与拉丁语中的‘镜子’（*speculum*）相关联，因此与倒置的图像、投机的概念等也有联系。” Guy Debord *Correspondance*, Volume 6: *Janvier 1979-Décembre 1987*,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2006. Translation: NOT BORED ! www.notbored.org/debord-5August1980.html.

性显露无遗：

La véritable société du spectacle

真实的景观社会

La dialectique de 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

景观社会的辩证法

La dialectique de la société comme spectacle

作为景观的社会辩证法

La dialectique dans de 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

景观社会中的辩证法

La dialectique dans de la société comme spectacle

作为景观的社会中的辩证法

Le moment spectaculaire de la société marchande (ou sous-titre ?)

商品社会的景观时刻（或副标题？）

La société comme spectacle

作为景观的社会¹¹

除了这些作品标题所涉及的含义以及它们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亲和性之外，我认为，德波通过他的“景观”概念取得了一些显著的进展，我在此旨在阐明这一点。本文评估了德波的“景观社会”如何作为一个批判性范畴超越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特定规定，同时又在这些规定之内具有其概念基础。

¹¹ 在德波的档案材料中，翻阅他关于亨利·列斐伏尔的《马克思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Marx*）笔记，可以发现一些他为最终为《景观社会》一书设想的额外工作标题。

价值及其表象的景观形式

让我从《景观社会》第一章第 10 节开始，讨论其中包含的一些问题。¹²

就其本身的术语来看，景观就是对这种表象的肯定，也是对任何人类生活的肯定，也就是说对社会生活的肯定，将其肯定为简单的表象。然而能够抵达景观真相的批判则会发现，景观是针对生活的可见的否定，也是针对变得可见的（*est devenue visible*）生活的一种否定。（§ 10） 64

对获得肯定形式的否定或获得这种表象形式意味着什么？对德波来说，这是商品经济在其对社会关系的抽象和量化结构中的自主运动的结果。但是，要完全理解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回顾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在那里，我们将看到经济如何通过其表象形式获得这种独立的客观力量。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我们可以回想马克思对商品二重性的描述，即商品作为一种“可感而又超感觉的”（*sinnlich übersinnlich*）物。在马克思的叙述中，商品所包含的感性使用价值和抽象交换价值的统一，分别对应着其中凝结的具体和抽象的人类劳动。马克思将这种统一称为**价值**，这种统一在交换过程劳动产品等同时设定**自身**；它们通过将其使用价值的实体化约为社会必要抽象劳动时间的定量或等分部分——这是衡量其价值的标准，从而从其异质且具体的特殊性中抽象出来。

¹² 这种对景观的刻画一直保留在德波的思想中，甚至延续到了 90 年代，当他为该书的第三版法文版撰写序言时仍然如此。Debord,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p. 8.

在交换过程中，两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会暂时被置换。价值因此通过
65 交换过程否定使用价值而得以实现，其中商品质的方面暂时被交换的
量化等价所排斥。¹³然而，对于马克思来说，这种对使用价值的否定在
货币和资本的形式中获得了肯定的存在，它们各自以交换为目的占据了
生产和消费的物质性。在资本主义中，生产是为了交换的生产，因此，
世界的具体性是由价值的抽象客观力量引入存在的。在这里，商品的自
然形式成为其价值形式，即其表象形式。正如马克思所写的那样：

在价值关系及其所包含的价值表现中，并不是抽象的一般的东
西被当做具体的、可感觉的现实的的东西的属性，而是相反，可感觉
的具体的东西被当做只是抽象的一般的的东西的表现形式或一定的
实现形式。¹⁴

对具体现实的不断排斥和肯定构成了价值的基本运动，这个过程
通过交换对使用价值的否定，再次使自身对象化，或通过形式发展
(*Gestaltungsprozess*) 否定自身的否定，从而具体化现实。这是一种抽
象的虚无获得具体构成性力量的过程。这就是价值赋予自身以具体现
实的方式，一种通过现实抽象的自主性以自身的形象构建世界。¹⁵

¹³ 我感谢克里斯托弗·阿瑟的解释，Christopher J. Arthur, *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 Leiden: Brill, 2004.

¹⁴ 'The Value-Form', Appendix to the 1st German edition of *Capital, Volume 1*, 1867, in *Capital and Class 4* (Spring 1978), pp. 130–150.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812–813页。

¹⁵ 需要指出的是，“现实抽象”这一概念并非源自马克思本人，而是由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提出的，即使其概念内容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对交换抽象和平等化的分析。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认识论的批判》（*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A Critique of Epistemology*, 1978; trans. Martin Sohn-Rethel,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83）中探讨了交换抽象的社会综合及其在古代的起源与康德哲学中所达至的认识论抽

德波第一章《完成的分离》在这一框架内继续展开。因为在资本主义中，社会现实表现为一个颠倒的世界，并通过异化的抽象社会统一形式维持存在，景观就是这一拜物教的顶峰，在其中“它所实现的统一无非就是一种普及化分离的官方语言”（§3）。¹⁶德波旨在阐明一个通过表象构建的自主化社会现实，其中的社会统一仅以颠倒的形式存在。因此，景观并不是对现实的虚假**再现**，而是对已被伪造的现实的视觉或现象展示；它是价值自我显现的发展过程。正如将要显现的那样，景观不是社会现实的扭曲表现，而是对社会现实本身的扭曲或变质的表象与正当化。正如德波在第二章中所写：“景观就是这个时刻，这时的商品已经成功地实现对社会生活的全部占领。不仅景观与商品的关系清晰无疑，而且人们只能看到这个关系：人们看到的世界就是景观的世界。”（§42）。

然而，如果我们将景观视为商品世界的可视化，那么商品这一范畴本身还未具备德波所描述的特征。我们需要深入探讨货币的各种能力和功能。事实上，尽管在《景观社会》中，商品似乎作为更突出的主角出现，但我想论证的是，实际上货币逻辑的不同方面更好地阐明了景观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发展。

象间的关联。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德波熟悉索恩-雷特尔的作品，但毋庸置疑，景观社会这一概念与“现实抽象”这一概念有着明显的共通之处。

¹⁶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值得注意的是“分离”和“抽象”这两个概念间的相似性。虽然德波更侧重于前者，但拉丁语中的“*abstrahere*”始终是一种分离的过程，因此可以推测，德波的《景观社会》第一章如果有一个替代标题，它不仅同样涵盖了其内容，还更明确地指出了景观在其与价值形式的连续性中所构成的统治形式，这个标题可能会是“抽象的完成”（*Abstraction Perfected*）。

货币的景观本质

对马克思而言，价值的表象形式是通过“目视”(visual inspection)或“*Augenschein*”来展开的。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第一章及其“价值形式”附录中最为明确的表述。在那里，正是表象本身开始了价值形式的辩证法：“*Der Augenschein lehrt ferner*”(“一看就知道”)。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只是观察(*betrachtet*)它们的发展。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初几段中，“*Erscheinungsformen*”通过四个基本的阶段进行展开——一场上衣与麻布间的戏剧，逐步获得更大的视觉冲击力，最终在货币形式中达到了商品价值的总体化。正如马克思所写的那样，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¹⁷换句话说，货币拜物教不过是商品拜物教的景观化呈现。

在此之前，马克思的叙述已经经历了简单的相对价值形式，其中价值的存在只有在两种商品之间的关系中才会“显现出来”(kommt dagegen zum Vorschein)，这种关系使得一方的商品成为另一方的价值存在的“镜像”(Spiegel)。在这种关系中，价值“显现”(offenbart sich)，或以感性的方式表现出来(erhält sinnlichen Ausdruck)；也就是说，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成为另一种商品的价值的表象形式(Erscheinungsform)或对象反射。

其次，马克思讨论了价值的等价形式，与后来的版本不同，其已经触及了对商品的拜物教性质的讨论，其中神秘的形式引出了著名的光学隐喻，即主观印象并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而是表现

¹⁷ *Capital, Volume I*,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5,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6, p. 103.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13页。

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观形式”。等价形式被马克思称为其他商品使用价值的“反思规定”（reflection determination）。在他的例子中，麻布“看见”自己等同于上衣。在相对价值和等价价值形式中存在一种互为对立和镜像的关系。

除此之外，马克思转向相对价值形式的发展，在这种形式中，价值的形式成为商品的**环境**。在这里，我们发现许多简单的相对价值表达的扩展。两种商品之间等式的偶然性立即消失，揭示出“一个不同于任何别的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的无穷无尽的价值表现系列，（并且）麻布将自己与所有可能的商品体相关联，只是作为其自身包含的劳动的单纯表象。”在这个新兴的商品世界中，每个商品的实体成为普遍等价物的镜像（*Spiegel*）。

最后，马克思将这一系列发展延续到一个情形中，在这个情形中，价值的总体性现在可以获得交换价值的表现形式，或者他所称的一般相对价值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商品作为相对价值形式世界中的具体等价物仍然存在。马克思现在追溯到从等价形式的位置中发展出的货币形式。在这里，出现了一般（*allgemeine*）等价物，即抽象人类劳动的普遍而个别的具象化（*materialization*），其使用价值正是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一般价值形式。所有商品因此都在同一种商品中作为价值的量进行“镜像”或“反射”。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马克思经常使用的视觉比喻不能仅仅被视为一种风格上的特异性。例如，在相对价值形式中，两个商品之间存在着反思规定的结构；反过来，等价形式在其内部反映了所有其他商品的相对使用价值；一般等价物是所有商品总体性的可见体现或“反思规定”（*Reflexionbestimmung*），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商品的身体和使用价值都

成为了一般等价物的镜像。¹⁸

然而，正是在货币形式中，价值形式的**景观**本质找到了其最强有力的表达。实际上，货币作为先前一切的巨大视觉化身和展示而出现。在我看来，可以说货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即是**景观**。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中有三个方面，在我看来，这些方面汇聚在景观这一概念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构成景观的货币形式的三个重要元素：（1）作为价值的客观可视化的货币；（2）作为一种无所不能的购买力，并由此垄断了使用价值的货币；（3）作为共同体（*Gemeinwesen*）的货币，如我们将看到的，它总是已经是资本。现在让我简要地探讨这三个方面，然后讨论景观与资本间的关系。

作为价值可视化的货币

货币形式必然来自交换关系，因为商品的交换价值需要获得一种对象的存在。实际上，货币作为商品外在化的共同体出现，是其被赋予独立存在的统一性表象。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总劳动的必要且可观察的表象形式，货币是一面镜子，在其中所有商品的价值得到反思规定。由于每种商品都相对于其他商品获得其地位，货币在马克思的论述中表现为商品同质性和可比性的现实化，是所有商品关系的可视化体现。正如马克思所写，通过货币形式，价值在“一切点上都能看到”，它是“商

¹⁸ 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版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他对反思范畴的使用来源于黑格尔在本质逻辑（*Wesenslogik*）中的“*Reflexionbestimmung*”（反思规定）。马克思提供了以下类比：“这种反思规定是十分奇特的。例如，这个人所以是国王，只因为其他人作为臣民同他发生关系。反过来，他们所以认为自己是臣民，是因为他是国王”。《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72页。

品世界的社会表现”。¹⁹

在货币中，价值获得了其最为可见的体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货币并不严格意义上是商品价值的再现，而是它们作为价值关系的展示。它是价值统一性被呈现的现实。正如马克思所写的那样：

这就像除了分类组成动物界不同属、种、亚种、科等等的狮子、老虎、兔子和其他等等所有实在的动物以外，还存在着作为整个动物界的单个体现的**动物**一样。这样一种个别的东西，本身包含着同一事物的所有实际存在的种类，就是一般的东西，如**动物**、**上帝**等等。²⁰

货币是价值自为的必要呈现，不是作为价值的表象，而是其可视化的存在。²¹这进一步表明，马克思并没有提出货币的唯名论理论，也不认为货币仅仅是价值的符号。货币不是商品价值的代替品或参照物，而是它们关系的总体性获得了独立的形式。实际上，货币通过解放自身成

71

¹⁹ Karl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9,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7, p. 3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 496 页；*Capital, Volume 1*, p. 79.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83 页。

²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 46 页。

²¹ Christopher J. Arthur, 'Value and Money', in Fred Moseley, ed., *Marx's Theory of Money: Modern Appraisal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Hans-Georg Backhaus, *Dialektik der Wertform: Untersuchungen zur Marxschen Ökonomiekritik*, Freiburg: Caira, 1997; Ricardo Bellofiore, 'From Marx to Minsky: The Universal Equivalent, Finance to Production and the Deepening of the Real Subsumption of Labor under Capital in Money Manager Capitalism', in Heiner Ganßmann, ed., *New Approaches to Monetary Theory: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2012, pp. 191–211; Michael Heinrich, *Die Wissenschaft vom Wert*, Münster: Westfälisches Dampfboot, 1995; Christian Lotz, *The Capitalist Schema: Time, Money and the Culture of Abstraction*,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4; Helmut Reichelt, *Neue Marx Lektüre- Zur Kritik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Logik*, Hamburg: VSA, 2008.

为一种再现形式，反过来将其周围的一切都转化为它的表现。正如马克思所写的那样，在货币中，“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所有的实际产品……都变成了货币的表现形式。”²²

通过货币的这一特质，我们可以看到，货币不仅没有掩盖经济关系的真实物质内容，反而使其在现象学上变得实际。显然，景观不能被理解为世界被操纵或扭曲的表现——即一种意图上或阴谋性的努力，旨在使世界神秘化，或者仅仅是散布图像的技术能力。景观这一范畴也不指商品经济的任何符号学方面。相反，就像价值的货币体现一样，景观是一种被转化为物质客观力量的社会关系：“一种变得很有效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通过物质表达的世界观。这是一个客观化的世界视觉。”（§ 5）。这一范畴阐明了由价值的表象形式（*Erscheinungsformen*）及其发展所构成的抽象统治形式，最终演化成为一种客观的现象形式。

作为垄断使用价值的货币

现在，我将转向景观继承货币的第二个方面。首先，货币的价值在于它的购买力：也就是说，货币可以支配什么。作为一种一般等价物，它在潜在层面可以购买任何东西，甚至那些在市场上没有出现的东西。此外，尽管所有商品可能并非劳动产品，但所有商品都能够获得价格形式。²³正因如此，货币是一种普遍性，原则上使得宇宙中的一切都可以

²² Karl Marx, *Economic Manuscripts of 1857–58*,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8,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6, p. 126.

²³ 正如马克思所说：“价格形式不仅可能引起价值量和价格之间即价值量和它自身的货币表现之间的量的不一致，而且能够包藏一个质的矛盾，以致货币虽然只是商品的价值形式，但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占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因此，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

相互交换。它的使用价值恰恰在于其能够交换所有使用价值的能力。货币是“在无限多样的使用价值中恰当的等价表达”。货币是“所有使用价值的本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将货币描述为“绝对商品”或“无所不在的（*allgegenwärtige*）商品”。²⁴如同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货币的力量”一节中已经预示的那样，货币是购买的手段，是获得一切物品的途径，也是唯一真正的需求。²⁵在这里，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赋予其一种神秘且全能的力量；它是一种满足所有需求的中介。实际上，货币成为唯一真正的客观需求，并支配着其余的一切。

在《景观社会》的第二章中，德波开始探讨景观与使用价值或社会需求间的关系。在 46 节到 47 节间，德波将其判断与价值的形式规定性更加紧密地相连。在此，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通过一种吸纳关系得以确立，其中使用价值作为内在于交换的东西而出现，这一点在马克思所指出的等价形式的“四个特殊性”或“颠倒”中得到了最清晰的体现。德波写道：“通过动员任何的人类使用，通过抓住对人类满足的垄断，交换价值最终能够**领导使用**。”（§ 46）。从属于交换，使用不可分地附属于交换价值的生产——即附属于一种完全抽象且量化的标准。在这里，景观将具体的人类需求置于其自身标准之下，成为一种表象形式，其抽象概念化为具体事物的形态。

73

Capital, Volume 1, p. 112.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123 页。

²⁴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 281; *Economic Manuscripts of 1857–58*, p. 200;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 374; *Economic Manuscripts of 1857–58*, p. 164.

²⁵ “货币，因为它具有购买一切东西的**特性**，因为它具有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所以是最突出的**对象**。货币的**特性**的普遍性是货币的本质的万能；因此，它被当成万能之物……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资料之间的**牵线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 242 页。

因此，景观在某种程度上追随了货币的一个方面，它绝不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光学错觉，而是所有其他商品关系的反思规定，是赋予所有经验存在结构和意义的本体论客观现实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波在1969年的一封信中将景观描述为“商品世界发展中的一个时刻”。²⁶这个时刻就是货币的形态（*Gestalt*），它使商品世界成为可能。可见的物质世界实际上是一般等价物的反思规定，或景观图像，它构成了这个世界具体和差异化的异质性。在这个框架中，反映成为了现实本身，而物质和使用价值则反映为短暂的表象。正如马克思所写的，货币是“将图像变为现实，将现实变为仅仅图像的外在、共同媒介和能力。”²⁷

在这一框架下，德波指出了“使用价值下降的趋势”（§ 47），这是对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公式的借用，来指使用价值在交换中丧失了自主性。正如德波所写，“这便是这种恫吓的现实，事实是在最为贫穷的形式下（吃饭、居住）的使用，它只能存在于被囚禁的状况中，囚禁在增益的存活的虚幻富裕中，正是这一恫吓下的现实，在现代商品的消费中，成为普遍意义上接受幻想的真正基础。真正的消费者变成了幻想的消费者。商品就是这种**确确实实的真正幻想**，而景观则是其普通的表现”（§ 47，重点为作者所加）。

²⁶ Guy Debord *Correspondance*, Volume 4: *Janvier 1969-Décembre 1972*,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2004. Translation: NOT BORED! www.notbored.org/debord-6August1990.html.

²⁷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 p. 325.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46页。在恩格斯看来，货币“可以任意变为任何值得向往和被向往的东西的魔法手段”，“在这种财富本身的化身面前，其他一切财富形式都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 Frederick Engels, *Origins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1884),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6,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0, p. 266.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85-186页。

德波在第二章中不仅从交换关系构建了景观作为主导的社会生活模式，还通过分析使用价值在交换价值中的内在性，揭示了景观如何成为现有系统的完全辩护或正当化，并保证了这种辩护的永久存在。通过这种方式，景观既是现有社会意义的体现，也是其验证。正如德波所写：

使用价值以隐性方式包含在交换价值中，它现在应该以显性方式公布出来，进入景观的反转现实，这恰恰是因为它的实际现实受到超级发展的商品经济的蚕食：于是一种伪证明（pseudo-justification）对虚假生活来说变得很有必要。（§ 48）

在这一章中，我们发现，景观指的是使用价值的伪自主性。为了证明商品统治的合理性，使用价值被强调和赞美。正如德波在第三章中写道，“富足商品在使用中不能给予的满足，在对充当商品的价值的认可中却成为人们追求的东西：正是商品的使用在自我满足”（§ 67）。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货币形式的模型，其使用价值正是其交换能力。景观在使用价值的影子以其颠倒的形式重新出现时：经济作为一个客观现实出现，调解了需求与满足间的关系。²⁸然而，借用阿多诺的一个短语，只是一个时代中社会必要的假象，在这个时代，需求及其满足只

75

²⁸ 此外，在这种“满足的欺骗”（§ 70）中，人类需求在价值运动中的构成无法与任何对立的“自然”或“真实”需求欲望相抗衡。实际上，社会存在在其被商品形式自我生产发展所完全吞噬的过程中，作为自主经济体系中的中介环节被重新校准。“或许，强加给现代消费的伪需求，它不能够与任何真正的需求或欲望进行对抗，因为这种需求本身都是社会和历史制造出来的。但是富足的商品还在那里，就像一种社会需求的组织发展的绝对决裂。商品的机械性积累解放出一种无止境的人造物，活生生的欲望在它面前显得束手无策。独立人造物的积累性威力导致对社会生活的造假。”（§ 68）关于“表面需求”与“真实需求”作为阶级社会基本特征的区分，阿多诺在《需求论纲》（*Thesen über Bedürfnis*, 1942）中对此进行了深入阐释。见 *Adorno Soziologische Schriften II*,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是对不被任何人控制的经济的**自为**发展加以中介的规定和从属时刻。在这个框架下，景观涉及到与社会需求的主要图像的可度量识别，而这些需求是通过货币结构所构成的。²⁹因此，尽管在“**表层需求与深层需求**”之间的区分可能微不足道，景观依然建立了一种与其统治密切相关的社会满足模型。从这个角度来看，“观众们并没有找到他们所渴望的，而是渴望他们所找到的。”³⁰

在我看来，这种分析相较于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进步，因为它通过景观的范畴提出了对使用价值和需求满足的持续批判，从而避开了哈夫纳（Hafner）所称的“使用价值拜物教”（*Gebrauchswertfetischismus*）
76 的倾向。³¹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使用价值被市场力量外在侵蚀所带来的衰退或退化，这一主题在批判理论中频繁出现，尤其在赫尔穆特·莱尼克（Helmut Reinicke）、沃尔夫冈·波特（Wolfgang Pohrt）、施特凡·布罗伊尔（Stefan Breuer）甚至汉斯-于尔根·克拉尔（Hans-Jürgen

²⁹ 德波将成熟景观社会的出现定位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这段从19世纪末持续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期，正是“异化的消费（*consommation aliénée*）对大众来说变成了一种额外的义务，即面对异化的生产（*production aliénée*）的义务”的历史时刻（§ 42）。大致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速发展的这个阶段，经济体系再也不能忽视工人阶级满足自身需求的方式。统治阶级不再漠视无产阶级的消费维度，转而着力培育无产阶级的**消费**能力，这标志着无产阶级被更深层次地整合进资本积累进程。德波指出，随着商品自主性发展而展开的现代景观，其历史特殊性体现在：劳动力被更大程度地吸纳进流通领域，这种努力完全致力于剩余价值的实现而非创造。正如德波所写：“而一旦商品生产中富足的程度已经达到，而且要求工人做出额外的合作时”（§ 43），当无产阶级能够接触更多商品时，消费整体便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辩证规定性。换言之，使用价值被真正吸纳于商品交换及其抽象化过程之中。

³⁰ Guy Debord, *Complete Cinematic Works: Scripts, Stills and Document* (1978), trans. and ed., Ken Knabb. Edinburgh: AK Press, 2003, p. 114.

³¹ Kornelia Hafner, ‘Gebrauchswertfetischismus’, in Diethard Behrens, ed., *Gesellschaft und Erkenntnis: zur materialistischen Erkenntnis- und Ökonomiekritik*, Freiburg: Caira-Verlag, 1993, pp. 59–88.

Krahl) 的作品中尤为突出。³²

作为货币的补充，景观使货币从作为流通媒介的使用价值中脱离出来，而货币本身则是所有商品必要的一般等价物，进而确立了一种作为整个社会范畴的**一般使用**的伪自主性。如果说货币是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否定的实现，那么景观则是使用价值的回归，只不过这次它披上了一层虚假的独立性。景观体现为价值在其主权地位上的使用价值外观，同时无情地将世界的细节抽空。正是作为价值的客观可视化及其对使用的垄断，德波才能将景观描述为“是人们只能观看的金钱，因为它身上，正是使用的总体(*totalité de l'usage*)与抽象的表现总体(*tatalité de la représentation abstraite*)在进行交换。”(§ 49)。

作为共同体 (*Gemeinwesen*) 的货币

我们还需要探讨货币的另一个方面，以便理解景观与资本间的关系。对马克思来说，货币形式的价值是一般等价物的具体实现，因此社会在货币中表现为统一和整体。在货币中，我们可以看到，正如阿尼特拉·尼尔森 (Anitra Nelson) 所说：“个人与自己和他人的疏离的普遍性”和“他们所有关系和能力的普遍性和一般性。”³³然而，对于德波来说，在景观之中，社会能够在各个地方表现出统一性，不仅仅是在货币形式

77

³² Helmut Reinicke, *Revolte im bürgerlichen Erbe: Gebrauchswert und Mikrologie*, Gießen: Achenbach, 1975; Wolfgang Pohrt, *Zur Theorie des Gebrauchswerts oder über die Vergänglichkeit der historischen Voraussetzungen, unter denen das Kapital Gebrauchswert setzt*, Frankfurt am Main: Syndikat, 1976; Stefan Breuer, *Die Krise der Revolutionstheorie. Negative Vergesellschaftung und Arbeitsmetaphysik bei Herbert Marcuse*, Frankfurt am Main: Syndikat, 1977; Hans-Jürgen Krahl, 'Bemerkungen zur Akkumulation und Krisentendenz des Kapitals', in *Konstitution und Klassenkampf*, Frankfurt am Main: Neue Kritik, 1971, pp. 82–97.

³³ Anitra Nelson, *Marx's Concept of Money: The God of Commodit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 70.

中，而是“商人世界的总体以整块形式出现，就像一种普遍的等价，与整个社会能够变成和所做的事情等价。”（§ 49）。要理解这与资本的关系，我们需要研究货币作为统一的共同体（*Gemeinwesen*）的功能。

在《大纲》中，马克思讨论了货币的几种功能，其中包括与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不同的第三种规定。在这里，货币表现为一种目的本身，即“作为货币的货币”或“财富的普遍物质代表”（*universeller materieller Repräsentant des Reichtums*）。³⁴马克思将这种第三种规定描述为货币之前功能的统一，而作为一种目的本身，它不能局限于流通领域。第三种规定已经是潜在的资本，尽管只是通过保持其流动性、退出并重新进入流通领域来实现的。换句话说，为了使交换价值真正独立为货币，它必须发展成为资本；也就是说，它必须退出并重新进入流通，并追求永恒性。被自主化的货币是从流通中产生的交换价值，但它重新进入流通并实现自身的增殖，这就是资本。也就是说，只有在资本中，货币才失去了其刚性，成为一个过程。当然，使货币成为资本而不仅仅是商品的特定交换，是通过购买劳动力来实现的，货币通过劳动力购买实现资本的增殖过程。

78 在向资本的过渡过程中，货币不再仅仅是独立的交换价值，而是作为“自我设定”（*selbstsetzende*）的交换价值的自主性：“货币必须用于生产性消费，也就是说，它必须投入于再生产交换价值的过程中。”³⁵在G-W-G'循环中，货币是“自为的交换价值”（*Der Tauschwert als sich*

³⁴ Marx, *Economic Manuscripts of 1857-58*, p. 151.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70页。在《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中，马克思从三个主要的子决定因素来讨论“货币作为货币”的概念：（1）贮藏；（2）债务偿还手段；（3）国际贸易中的支付手段，即世界货币。

³⁵ Marx, *Economic Manuscripts of 1857-58*, p. 113.

selbstsetzende Bewegung)。作为资本的货币独立于流通，并通过购买劳动力来激活生产。资本必须同时存在于生产和流通中，既作为商品，又作为货币。

在成为资本的过程中，货币成为了共同体或社会纽带。“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但是，这要以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从而以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正如马克思接着所阐述的，货币是“**现实的共同体**，因为它是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同时又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³⁶因此，资本成为社会，这一发展包括劳动过程真正从属于价值增殖过程。价值的形式规定性力图将自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总体性。³⁷我们可以首先通过《资本论》第一卷追溯这一愿望，在那里马克思将资本定义为过程中的价值（value-in-process），然后通过《资本论》第二卷中将资本流通定义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统一，最后在《资本论》第三卷和《大纲》中，资本被定义为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简而言之，资本成为了构成社会的价值形式。现在我们可以直接讨论资本与景观**社会**间的关系。

79

³⁶ 同上，p. 155 和 p. 158.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 175、178 页。我们再次发现，货币作为使用价值的垄断形式，能够“满足任何需要，因为它可以换取任何需要的对象，对任何特殊性都不在乎”（同上，p. 153. 中文版译文同上，第 172 页）。货币具备商品所有自然属性。货币作为普遍财富，因此“包含一切享受可能性的对象”的全部需求集合（同上，p. 155. 中文版译文同上，第 174 页）；“货币是商品中的上帝”，“代表商品的天上的（*himmlische*）存在，而商品代表（*darstellen*）货币的人间的（*irdische*）存在”（同上，p. 154. 中文版译文同上，第 173 页）。

³⁷ 卡马特写道：“资本对社会实行绝对统治，并倾向于成为社会……不再是资本与以前生产方式间的对立，而是资本的一部分与资本本身间的对立，这是生产与流通过程的前提。Jacques Camatte, *This World We Must Leave and Other Essays*, Brooklyn NY: Autonomedia, 1995, p. 123.

作为景观的资本

景观不能被简化为商品，因为商品本身并不提供交换价值的客观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只会通过货币形式的出现才得以实现。然而，景观也不能被简化为货币，因为它不是一个仅限于流通领域的现象。货币只有在作为资本（货币资本）退出流通时才具备这一功能。那么，景观是否与资本或更具体地说，与“过程中的价值”同义呢？我认为并非如此，这不仅仅是因为德波识别出了一些景观的前资本主义倾向，尽管这些主题在此处无法深入探讨。³⁸

我已经指出，景观从商品中继承了交换性作为社会综合的主导模式。³⁹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上面提到的货币的三重特性：（1）作为颠倒的社会关系的视觉客观化和现实性；（2）作为所有使用价值的本质；（3）作为统一的社会整体或表象形式的统一性——即作为资本。然而，《景观社会》一书的视野跨越了许多不能被简化为资本范畴的社会现象。这些现象大体上包括看似对立的政治派别的景观化表象、以广告名人个性呈现的个体性景观形象（第三章）、无产阶级在各种组织形式中的景观化再现（第四章）、由商品生产和流通构建的景观化时间（第五、第六章）、城市环境的景观化构成（第七章）、文化产品和话语的景观化呈现（第八章），以及意识形态的景观化呈现（第九章）。这些只是景观

³⁸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发展的同时，德波还勾勒出景观的历史起源——宗教投射与专业化现象。这两者都以商品生产和交换所必需的社会劳动分工为基础。社会中神职人员专业化群体的形成及其伴随的宗教拜物教现象，至少部分可以归因于社会劳动分工和阶级的形成。

³⁹ 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说“景观概念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性，如同商品范畴对马克思的重要性”。*Perspectives, At Dusk: The Situationist Move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 38.

这一多义范畴所要批判性探讨的社会生活的若干方面，其中任何一个都无法轻易归结为资本的范畴。

德波在第一章末尾处提出了景观与资本之间最明确的联系之一。他写道：“景观就是积累到某种程度的资本，这时它就成了图像”（*Le spectacle est le capital à un tel degré d'accumulation qu'il devient image*）

（§ 34）。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表述？毕竟，从价值作为表象形式的统一性的角度来看，资本已经是“图像”了，被理解为“*Erscheinung*”。在我看来，要解开这个晦涩的命题，可以回想前面关于价值的货币形式的讨论。也就是说，正如货币成为商品关系在其总体性上的显现，景观对德波来说则是资本作为总体的显现，但不仅仅是资本的货币化，因为这将是一个冗余的表述。资本本身已经是货币的运动。⁴⁰相反，景观作为资本的显现，是表象统一性的显现——即统一在资本下的社会的显现方式。然而，“显现”不能被理解为景观这一概念主要关注的是字面上的视觉形象，或简化为广告和消费主义过度饱和的环境。这里的“显现”指的是货币拜物教的谜团——如同在马克思话中，世界被“耀眼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这样，景观作为一个范畴，批判性地阐明了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交换关系所构成的抽象形式的统治，并且将这种结构

81

⁴⁰ 《景观社会》开篇的最终定理常常使阐释者感到困惑：对德波的景观理论而言，究竟是商品还是价值的资本形式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参见 Gilles Dauvé, aka Jean Barrot, ‘Critique of the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1979), trans. Louis Michaelson, in Home, ed., *What is Situationism? A Reader*; and ‘Back to the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然而，仅举一例来说明德波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范畴微妙之处所具有的敏锐洞察，他在情境主义国际解散后针对拉乌尔·范内热姆（Raoul Vaneigem）发表的以下论战性评论便是指征：“再往后我们会遇到另一个‘珍宝’，他（范内热姆）发现‘压迫我们的不再是资本，而是商品的逻辑’。他完全清楚，马克思无需靠他来证明资本仅仅是‘商品的逻辑’；即便如此，他还是天真地指望自己的说法能听起来很现代。”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2003, p. 127.

扩展到远远超出纯粹“经济”关系的范围。正如德波所写：“资本不再是领导生产方式的可见核心。”在景观下，“社会的整个广度便是它的写照”（§ 50）。

人类被剥夺了任何除了由价值的形式规定性所引入的实质内容，并由此被表象所结构化，这一观念源自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然而，从景观概念的角度来看，这一普遍表象运动的总体性含义并未在理论上得到彻底贯彻。关键在于，表象形式的完全自主性只在虚拟资本或生息资本的出现中才得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回归到它最初以货币形式出现的状态，并且似乎只凭借自身或直接通过流通中价值的增加来产生更多的货币。在这里，生产过程实际上消失了，而对马克思来说，这是形式规定性的终极形态，其中一切都被还原为流通。⁴¹然而，
82 对马克思而言，这种“拜物资本的完成”⁴²仍然与生产关系本质上有着内在的联系和依赖。因此，可以说，马克思在其对资本的分析中明确了表象形式与基本社会关系间的必然联系。

然而，表象形式如何脱离并重新构建真实具体的社会关系，标志着它们作为社会现实的胜利，并因此引发了对表象的自主性和运动如何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探讨。在此，景观的范畴派上用场。价值在其特定表象形式中的发展与景观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与价值的拜物教性质不同，景观的神秘化并不依赖于伪装。景观只有一个要求：即社会现实必须在其所有的透明性中展现出来。

⁴¹ “因此，在生息资本上，这个自动的物神（automatic fetish），自行增殖的价值，会生出货币的货币，纯粹地表现出来了，并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441 页。

⁴² 正如马克思所写：“在这里，资本的物神形态和资本物神的观念（*Vorstellung*）已经完成。在 G-G' 上，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begriffslose*）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Verkehrung*）和物化。”同上，第 442 页。

回想一下，景观采纳了交换价值的要求：一切皆有可能，因为一切都是等价的。作为已经以表象形式显现出来的对生活 and 具体现实的否定，景观通过作为使用价值规定的否定来宣示一种积极的存在。为此，景观显现了一个既在场又不在场的世界。景观，作为被凝视的对象，指的是交换价值的非同一的同一性，不仅作为运作的形式存在，而且是被揭示出来的。它是商品社会形式“它所存在的样子”（§ 37），是一种极致清晰的异化展示。正如德波所写：“不仅景观与商品的关系清晰无疑，而且人们只能看到这个关系：人们看到的世界就是景观的世界。”（§ 42）。

作为一种揭示其对象的结构，景观是一种在虚假领域上展开的光辉。在景观中，社会活动被呈现出来，并在这一过程中赋予其一个包含商品社会下社会发展的图像和目标的意义。通过景观，资本的肖像成为整个社会的现实，因此，“社会劳动的集中结果，在经济富足的时刻，已经变得显而易见，并迫使任何的现实去服从表象，这个表象现在就是社会劳动的产物。”（§ 50）。用雅克·卡马特（Jacques Camatte）的话说：

83

“景观必须向人类展示他们是什么，或者他们必须成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不过成为“资本的仪式”。⁴³在此，资本成为“一切再现的

⁴³ Camatte, *This World We Must Leave and Other Essays*, pp. 170, 108-9. 卡马特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用以阐释客观的表象形式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内主导社会关系。尽管德波与卡马特之间没有直接通信，但他们各自的分析却构成了相似的图景。卡马特源于意大利左翼共产主义的政治传统，深受早期意大利共产党成员阿马德奥·博尔迪加（Amadeo Bordiga）的强烈影响，并主张资本已将自身人格化为一个物质共同体。在英语世界几乎未受任何关注的卡马特，从未声称自己与“社会主义还是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或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有任何亲缘关系，因为他认为这些都是正式的组织，并在他眼中固守着过时的委员会共产主义（council communist）纲领。就德波而言，他没有留下任何与卡马特接触的证据。在一段本可以出现在《景观社会》中的文字里，卡马特写道：“资本已成为绝对的表现：人的一切行为都映射于其中；它之所以能成为

镜像”，摆脱了对其形态嬗变的依赖，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其表象形式的形式规定性自我复制。⁴⁴资本成为景观，正因为作为一种社会现实，只有表象形式得以持续存在。对于卡马特和德波来说，这一资本的运动，作为自我增殖的价值或作为一种没有实体自我发展的表象形式，进而导致了人类的拟人化，即既资本化了人类，也使资本人化。

莱希尔特（Reichelt）提醒我们，马克思关于幽灵的各种表述不能仅仅理解为修辞，而是指现实的特征，其中“现实是倒置的，是表象，在这种倒置的存在形式中，理性通过（异化的）社会统一形式矛盾地存在。”⁴⁵相应地，德波的景观概念遵循了这种分析，在我看来，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这一统一性最为发展的形式。景观是社会统一性的表象，其中尽管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但它们将每个瞬间整合成一个整体。因此，德波旨在完全勾勒出阿多诺所称的“和谐的魔鬼图像”（diabolical image of harmony）的轮廓。⁴⁶值得注意的是，景观不仅仅是对表象的批判理论，更是对表象形式**统一体**或组织的理论。对其中一个方面的正当化即是对整体的正当化。它是生产与消费、

世界的景观，是因为它反映、并将整合进其生命进程的各种运动返还给所有存在者。” Jacques Camatte, *Capital and Community* (1976), trans. David Brown, New York: First Prism Key Press, 2011, pp. 339–340. 其与德波思想的亲缘关系毋庸置疑。在另一段文字中（这极有可能是直接借鉴了《景观社会》第17节），卡马特写道：“他们被剥夺了自身的活动，这些活动以再现的形式归还给他们；异化的运动不再关乎‘存在’或‘拥有’，而是关乎‘显现’：他们的生活为他们组织起来，因此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将自身感知为被抛入了非生活中。” Camatte, *Capital and Community*, p. 252

⁴⁴ Camatte, *Capital and Community*, p. 251.

⁴⁵ Helmut Reichelt, ‘Social Reality as Appearance: Some Notes on Marx’s Conception of Reality’, in Werner Bonefeld and Kosmas Psychopedis, eds, *Human Dignity: Social Autonomy and the Critique of Capitalism*, Aldershot: Ashgate, 2005, p. 34.

⁴⁶ Theodor W. Adorno, ‘Reflections on Class Theory’, in *Can One Live after Auschwitz? A Philosophical Read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96.

工作与闲暇、文化与商品、国家与经济、意识形态与物质环境的主导身份的名称。它不仅使生产与消费、垄断与竞争、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间的区别变得相当，而且也使阶级区别得以体现，留下了其运动的拟人化、再现、表象或图像。这种社会组织方式，如德波在 1966 年的一封信中所写，“垄断了所有人类的沟通”，还涉及到人类知觉的组织，定义了应当看到什么以及如何感知。⁴⁷景观是价值的现象学领域，一个“表象的垄断”（§ 12），正如德波所写，“自然地发现视觉是与触觉在其他时代的地位相同的特权人类感官”（§ 18）。⁴⁸因此，景观“仅仅意味着‘出现的（*ce qui apparait*）就是好东西，好东西就会出现’”（§ 12）。 85

结论

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德波景观理论间关系的关键在于对价值表象形式结构的研究。因此，实际上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前三章中，我们就可以找到景观的基本形式。然而，对马克思来说，表象形式

⁴⁷ Guy Debord *Correspondance*, Volume 3: *Janvier 1965-Décembre 1968*.

⁴⁸ 德波对视觉的强调，应结合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以下段落来理解。在该段落中，人类感性的历史通过异化的人类实践及其对象性得以现实化：“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也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来说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而只有作为食物的抽象存在，食物同样也可能具有最粗糙的形式，而且不能说，这种进食活动与动物的进食活动有什么不同。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 191-192 页。

“掩盖了现实关系，正好显示出它的反面”。⁴⁹这与景观通过揭露来运作的方式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是为什么货币的拜物教性质如此重要：神秘化获得了一种客观和自主的形式，与商品拜物教不同，后者的社会关系隐藏在物的社会关系背后。即使景观的范畴以这些基础为前提，它仍然超出了价值的具体规定，是一种更广泛的社会组织模型，在这一模型中，表象的结构超越了其表象的内容；更具体地说，它赋予了特定的表象以内在的一致性，作为总体性的时刻。

景观这一范畴将马克思的表象形式提升为一种多视角且无处不在的社会现实元素。正如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说，“《资本论》不只是政治经济学”。⁵⁰因此，景观这一范畴试图提供一种对社会现实的理论重建，视其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个整体正是在价值表象形式的自主性中并通过其自主性构成的。因此，景观不应以资本积累所达到的定量程度来衡量，而应以一个基于资本积累的社会总体结果在主导的表象形式层面上获得客观性作为衡量标准，即作为主导的社会结构。

景观是资本的一个方面，它不能简化为剥削现象。景观引发了一种新的贫困形式，这种贫困不仅扩大了无产阶级的困苦，也将其扩展为一种新无产阶级（*nouveau prolétariat*），⁵¹这超越了传统的剥削关系和恶化的工作条件，揭示了资本主义富裕中固有的贫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景观批判的出现通过战后繁荣的特殊性获得了尖锐的历史规定。在这

⁴⁹ Marx, *Capital, Volume 1*, p. 540.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619页。

⁵⁰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1 (1947), trans. John Moore, London: Verso, 1991, p. 80.

⁵¹ 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 *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 Édition augmentée*,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97, p. 253.

里，革命性的阶级斗争不再仅仅是为了摆脱匮乏，而是为了摆脱在主导的满足和社会意义的形象中所隐含的不满。现代贫困 (*nouvelle pauvreté*)⁵²超越了物质贫困，并在战后繁荣所带来的改善中不断蔓延。正如德波在他 1961 年的电影《分离的批判》(*Critique de la séparation*) 中宣称的 87 那样：“关键不是要认识到有些人生活得比其他人好或差，而是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处于失控的状态”。⁵³

作为一个批判概念，景观阐明并统一了当代资本主义下的多种现象，这些现象是在一种逻辑下发生的，这种逻辑源于交换的结构，其中“社会组织的表象的表象” (§ 10) 获得了“巨大的实证性” (§ 12)。正是在这个表象的领域内，对象性的内在内容得以显现。也就是说，景观是社会的**总体商品**——社会对象化的总体结果及其可见的辩护。以这种方式，景观更恰当地被理解为价值作为总体的现象学领域，或者简单地说，作为价值的现象性：表象形式的自我运动，这种运动，呼应黑格尔《现象学》的动力，生出了主体和实体。

⁵² 同上，p. 256.

⁵³ Debord, *Complete Cinematic Works*, p. 31.

4. 今日马克思式本体论

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

让我们直入主题，提出这样一个建议：我们应当从工人斗争、诸众的反抗以及无产阶级的起义这一立场来阅读马克思式本体论（Marxian ontology）。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体论意味着把双脚扎根于大地。我们当然可以像哲学家那样无休止地讨论“本体论”究竟意味着什么——但呼应《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我们要重申：直到现在，哲学家们总是把本体论理解为一种关于存在的理念，而今天我们必须建构一种革命实践的本体论。那么，这种我们声称的、并且从斗争中汲取意义与方向的本体论究竟是什么？它是**工人历史的本体论**，即那种由劳动着的人类、“活劳动”、以及通过协作生产并再生产生命世界的诸众的主体化过程（multitudinous subjectivation）不断建构起来的存在。这就是马克思式本体论运作的框架。它描绘世界，一方面承认劳动的生产力，另一方面承认生产的形式和关系。而且，在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之中，它既揭示也控诉了一种愚蠢不公正的秩序，这种秩序在生产领域以剥削为基础，在权力的经验与运用上以等级制为基础。马克思式本体论由

阶级斗争所构成，并且通过阶级斗争而不断更新，它由物质对抗所支撑，这种对抗分配着真实存在的种种一致性。在这些纠葛与冲突之中，出现了这样的景象，它由主体性的生成和解放的形象组成，并与表达它们的物质力量相互契合。因此，对抗与阶级斗争并不是镌刻在某个静态基础上的力量，它们恰恰是“一切存在”（everything that is）的力量与运动，

并在一个动态的、主体化的基础上留下痕迹——它们是欲望的诸众的表现性力量。没有这种马基雅维利式（Machiavellian）和斯宾诺莎式（Spinozist）的图景，我们便无法理解马克思式本体论，也无法把握阶级斗争是如何发生与展开的。因此，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式本体论是一种以“活劳动”的主体化为基础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一种建构性的（constituent）本体论，而不是一种辩证的本体论，尽管它也是一种“颠倒的”辩证法。单纯的颠倒或反转往往只能产生有限的效果，通常仅限于揭露阶级对手的意识形态；而辩证法由于拒绝冲突的主体化视野和转变的建构性形象，在生产理论中推进了一种李嘉图式的客观主义（Ricardian objectivism），并在价值化问题上采取了一种先验的/超历史的（transcendental/transhistorical）立场。我仍然坚持马克思的本体论方法的那个方面——它在卢卡奇的遗产之下，被汉斯-于尔根·克拉尔敏锐地强调过。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如今我们能够描述的阶级斗争的本体论肌理是什么？第二，马克思式本体论——在他的历史著作、《大纲》（*Grundrisse*）和《资本论》中所呈现的，是否已经预示了这些后来的发展？

90 如果我们坚持阶级斗争在任何当下本体论定义中的核心地位，我们就必须强调资本主义的结构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发生的变革。劳动与剥削的概念，进而资本本身的性质，实际上经历了一次重大变异。

我们对当下资本本体论的考察的第一个环节，将是分析活劳动的转变，并澄清它的生产力如何在日益增长的协作中得到强化，而这种协作正是生产方式的特征。如果说，在《资本论》中，劳动力表现为“活劳动”，它在简单的和/或扩大的协作中提升自身的生产力，并进一步在

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的组织中实现；而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通过不断强化协作、逐步界定其特征，直至将其吸纳为社会活动；那么，当我们进入资本主义发展的“认知”阶段，即“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阶段时，社会性和协作性的劳动无疑得到极大增强——它沉浸在一个由通信网络和数字连接构成的世界中，这些网络和连接纵横交错于工业资产与农业体系，以及各种各样的经济形式之中。资本正是通过这些协作性的流动而实现价值化，在这些流动中，肌肉、语言、情感、代码和图像都被吸纳进生产的物质过程之中。而正是新自由主义的反革命——继二战后工人斗争的“光辉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失败之后，把我们带到了这种境地。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的领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生产的主要场所从工厂扩展到整个社会。自动化在这一转变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不仅在政治意义上（摧毁工人阶级的力量，并在全球主导地区把工人逐出工厂），而且在技术意义上（通过强化生产的节奏）。为了恢复利润，这种利润已经无法再从工厂中提取，资本使整个社会场域劳动化，生产方式 91 越来越紧密地与生活形式纠缠在一起。在工业自动化阶段，意味着生产越来越多的物质产品；而在自动化工厂之外，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综合性生产性服务的增长，它将重型技术与基础科学、工业服务和人类服务结合在一起。在第二阶段，信息的重要性超过了自动化——事实上，正是信息在整个社会中传播了一种“活劳动”的技术构成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在过去是由工厂内部塑造的。

第二，我们的注意力将转向剥削的概念，强调它在转化为社会价值化的榨取性功能时所经历的变化。

我们已经描述过资本主义的反攻是如何瞄准 20 世纪 60 及 70 年代

抵抗与反叛的积累的。如今，我们也能够辨认出一般智力社会的出现，其经济角色愈发重要的社会生产，这意味着资本与劳动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在福特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是由纪律体制所构成的，积累集中地依靠工业劳动的计划性协作所产生的利润来驱动。而在后福特主义时期，当生产性的知识与协作的社会能力广泛扩散到整个社会，资本则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剥削新出现的劳动力形式：通过榨取共同生产的社会财富，并在某种意义上，将整个社会领域加以吸纳。**榨取**（*extraction*）的这种新的核心地位因此改变了**剥削**的性质。特别是，剩余劳动与剩余价值的量，它们原本依照时间分析来界定，如今呈现出一种新的质的特征，这意味着剥削必须按照不同的标准来分析。马克思式的剥削概念，聚焦于个体工人工作日中不同“时间”的划分，如今似乎已相去甚远。当马克思以教学的方式解释说，在雇佣劳动的体制下，工人获得的是在工作日最初几小时内所生产的财富，而资本家则攫取剩余时间内所生产的价值，他实际上建立了剥削与生产组织之间的一种亲密关系。然而今天，这种现实已经分离，而且两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金融把生产性主体抽象地看作一个整体，并在远距离上抽取价值；与此同时，生产性的主体性却拥有越来越强的能力去协作并自主地规划协作。资本主义的企业家们不再组织劳动；他们也不再像熊彼特（*Schumpeter*）曾经设想的那样，创造新的组合并生成生产性的协作形式。如今，他们沉溺于金融活动，把注意力投向证券交易所、股息和市场波动。

这就引出了第三个环节：我们必须思考资本向金融-榨取性力量的转变。当金融在 19 世纪末与 20 世纪初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组成部分出现时，它构成了对产业资本的强有力补充，帮助后者确立其

在经济及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主导地位。金融提供了抽象化与集中化的工具，便利了从工场手工业向大型公司及其垄断的统治地位的过渡，同时也被用作帝国主义计划武库中的武器。然而，随着 20 世纪的进展，这种关系被倒转，以至于今天是金融主宰工业，规定生产与剥削的一些基本条件。在金融及其日益复杂的工具的统治下，资本主要通过捕获和榨取一种看似现成的、仿佛天然赋予的价值来实现积累——仿佛是一种无主之地（*terra nullius*）的馈赠。金融资本从共同性（the common）中榨取价值，不论我们谈的是隐藏在地层中的物质性价值，还是在社会内部萌发的价值。当然，金融资本上升为主导角色的转变，可以用全球市场的形成和民族工业经济的衰落来解释，这一衰落的特征是危机的反复和投机操作的深化。但其核心，即金融的定义所在，必须回溯到生产方式本身：金融充当了捕获社会与自然价值、并榨取共同性的装置。榨取沿着共同性的轨迹展开。与工业不同，榨取基于的财富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先于资本投资而存在。汽车必须在工厂中被生产出来，而石油和煤炭则已经存在于地层之中——尽管榨取本身也包含生产、精炼与分配的过程。若我们转向社会智力、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性（sociality）的领域，这一区分会更为清晰。在工厂中，工人是在资本家规定的框架与纪律之下协作的；而在社会中，价值却是通过一种并非由资本直接组织的社会协作所产生。在这方面，社会协作具有相对的自主性。这一切再次凸显出资本关系是如何被动摇的——在协作的相对自主性面前，金融表现为一种榨取性工业。

劳动世界的总体化、生产被吸纳进再生产、价值在生产性社会被资本实质吸纳的框架中被金融升华——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著名的理论性征服。然而，基于我们迄今为止的论证，有必要“超越”这一点。

要界定这种超越，就意味着必须在我们已经开始探索的三个领域上推进，并揭示它们的“主体性”面向。

94

首先是劳动的领域。在这里，劳动力的协作性联合重新界定了工人阶级的概念：它揭示出工人阶级是一个由劳动（工人阶级的）单一性（singularities）构成的诸众集合，是由非物质（和/或物质）力量组成的多重性（multiplicity）。在协作性的联合中，这些单一性的力量在潜在意义上配置出工人阶级的多元重组（plural recomposition）——一种被主体化流动交错而成的重组。我们称这种新的阶级形象为“诸众”（multitude）。

其次，关于剥削的概念。要超越劳动的异化或物化，就意味着要在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关系中为主体化效应腾出空间。当剥削瞄准活劳动的认知性、社会性与协作性成分时，在资本对劳动价值的捕获与占有的辩证关系中出现了一道裂缝。而异化劳动，作为劳动力的第二自然出现时，也能够反过来打破剥削的秩序——在其运作的第二个层面上。但我们稍后会回到这一发展。

第三，资本及其榨取机制的新性质，在本体论上由**共同性**的社会动力学作出回应。一旦以大规模劳动为特征的纪律与控制关系瓦解，价值的度量也随之崩塌，榨取性的掠夺便会遭遇共同性维度的对抗。在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在不同的形式和程度上，社会生产已经在生产活动（依赖社会与科学知识、协作框架或关怀关系）和产品本身（其反过来又内含社会共享的要素）中变得越来越居于中心。在资本的视野下，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些产品呈现为礼物，仿佛天降的“吗哪”

95

（manna）。但我们必须牢记，正是社会生产的这些特征，既是金融榨取与财富积累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社会性反叛存在的种子与根基。剥削

与抵抗之间的这种矛盾/张力的双重性，都包含在日益抽象化的社会生产之中。我们对马克思关于抽象劳动的分析早已熟悉：它是理解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的关键。在许多方面，劳动的抽象性质以及它所生产的价值，在社会生产中被急剧放大。当工人将知识内化，并在协作中将其社会化时，他们的劳动及其生产的价值就愈发抽象。然而，生产与价值化的过程越是抽象化——当它在语言、代码、集体生活的非物质性关节、协作、情感因素等之中得以实现时，也越是展现出一种非凡的抵抗与脱离资本的潜能。我们在此所承认的抽象性，直接对应于共同性；正如我们所说，它既是当代生产的基础，又是其结果。而共同性在这里也获得了一种双重规定：它既是资本主义榨取的实质，同时也是自主与抵抗的潜在根基。

沿着马克思的论证，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三重逻辑过程来把握这种双重性：从抽象到社会生产，再从社会生产到主体性。首先是抽象。马克思写道：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经济关系“随着劳动越来越丧失一切技艺的性质，也就发展得越来越纯粹，越来越符合概念；劳动的特殊技巧越来越成为某种抽象的、无差别的东西，而劳动越来越成为**纯粹抽象的活动**。”¹

但是，马克思并不对这种“技艺”的丧失抱有怀旧之情。一个行业或一门技艺的消逝，同时也是一种获得。马克思早就指出：“劳动不是这种或那种劳动，而是**劳动本身**，抽象劳动；同自己的特殊规定性决不

96

¹ Karl Marx,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Rough Draft)*, trans. Martin Nicola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London: New Left Review, 1973, p. 297.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255页。

相干，但是可以有任何一种规定性。”²劳动的抽象性并非空洞，而是充满着内容，尤其是生产的社会性内容。

劳动日益增强的一般性能力，这是第二个理论推进，预设了生产的社会性，也就是说，预设了生产的共同性。个别的、特定的劳动，从外部被规定为社会劳动；“它是通过个体所活动其中的生产的社会条件而被中介的”。因此，生产过程的日益抽象化，是建立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上的，是建立在使生产成为可能的社会条件之上的。换句话说，它是建立在共同性的基础之上的，这一基础包括了我们集体存在所依赖的共同知识、文化形式以及协作的循环。

马克思的第三个推进，在于从主体性的立场出发，将这一社会基础加以运动化。面对资本的总体性，有着一种同样总体化、抽象的劳动。劳动之所以是抽象的、社会的，恰恰潜藏着主体化的潜能——尽管这种潜能并不总能实现。

这种对抽象总体性的指认（以及在《大纲》中所展开的“社会个体理论”）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动员出一个同质的、统一的、可直接行动的主体性。但生产的社会性意味着一个差异的场域，在这个领域中，主体性以某种（易变但有效的）组合方式相互协作并产生冲突。当无数异质的主体性在生产内部开始结合时，共同性便开始显现。正是在这种差异中的显现，构成了一条主体性对抗的路线。

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资本的概念是作为阶级斗争的一个图式与产物而给出的。这意味着，这一概念总是内含着一种关系：在资本之中、并且与资本对抗的，是发展过程的不断重构；资本主义的支配（即不变

² 同上，p. 296. 中文版译文同上，第 254 页。

资本)与被投入劳动的主体性(即可变资本、活劳动)之间呈现出一种不对称且不可通约的力量关系,它们持续处于冲突之中。我们在此所见,是真正的辩证法——一种被剥夺了“扬弃”(Aufhebung)的辩证法,一种没有目的论、且因阶级斗争而保持开放的辩证法。

请允许我在此稍作停顿,插入一个“间奏”。我认为此刻回忆葛兰西的思想是重要的。在葛兰西那里,我们发现一种始终向阶级斗争开放的资本概念。葛兰西的马基雅维利形象,既不是为了将列宁主义政党翻译成意大利语的修辞装置,也不是为了唤起某种无产阶级“复兴运动”

(Risorgimento)的类比虚构。几十年来,这些比喻被灌输给意大利共产党的活动家们,从而贬低了葛兰西的形象,也贬低了工人阶级革命进程本身。恰恰相反,唯有重新夺回那个马基雅维利的形象——那个将政治视为裂为两半、从下与从上同时观照、作为对抗性力量缠结的场域的形象,我们才能在这种光照下,对资本概念做出真正的政治定义。葛兰西在1918年《人民的呐喊》(Il Grido del Popolo)中提出的“反对《资本论》的革命”这一口号,既是针对意大利社会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解释与改良主义运用的批判,针对“洛里安主义”(lorianesimo),即阿基莱·洛里亚(Achille Loria)的经济主义迷信的反击;但它更是、首先是,对经济结构中“反叛性内容”的揭示——对资本作为阶级斗争展开其中之物的揭示。二十年后,在《美国主义与福特主义》 98

(Americanism and Fordism)中,他通过将资本概念理解为被阶级斗争不断夺取与重构的框架,印证了当年在《人民的呐喊》中提出的直觉。在这里也许无需多言,马克思历史著作中的本体论与这一马基雅维利-葛兰西式的资本定义,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现在需要回答开头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资本论》中的

本体论是否预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些后续发展？答案只能是肯定的。就我们迄今所言而言，马克思式本体论无疑呈现为一种以劳动的力量为核心的本体论——从早期《手稿》一直延续到他晚年针对瓦格纳的最后一篇文章，中间没有断裂。在这里，《大纲》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不仅仅是《资本论》的准备笔记，而是马克思哲学与经济学写作最高度综合的文本，同时也是历史著作被织入其理论结构之中的地方。这是一种关于力量的本体论，而不仅仅是关于生产本体论；是一种斯宾诺莎式本体论，而不仅仅是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参考弗朗克·菲施巴赫（Franck Fischbach）的《人的生产：与斯宾诺莎一起的马克思》（*La production des hommes. Marx avec Spinoza*）一书中最后一章《形而上学与生产》。³

99 马克思思想中另一个核心且持久的要素，也是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所一再强调的，是他对生产与再生产日益重叠的洞察。再生产过程逐渐被纳入生产过程之中。与古典经济学相反，在古典经济学那里，再生产是生产的结果与后果，归根到底是消费的结果；而在马克思式本体论中，再生产被纳入生产之内，同时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对抗也因此得以重复。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便能够识别出马克思式本体论内部的生命政治视角。

第三个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连续性与其本体论中必须被考量的要素，是一种建构性与构成性的人类学维度，它浸入资本关系并在技术问题上得到具体化。这个问题在今天对于任何马克思式解读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在一般智力的时代，它唤起了颠覆的政治主题。仅仅强调在《大纲》中马克思把这一主题清晰地摆在前景还不够；在一个劳动中的

³ *The Production of Human Beings: Marx with Spinoza*, Vrin: Paris, 2014.

智力构成生产过程核心的社会里，必须把它作为一个革命性的主题加以恢复。在这里，基于劳动的转化来实现人的从劳动中解放的主题，以极大的力量显现出来。“活劳动”对“固定资本”的“占有”这一主题在马克思式本体论中占据中心位置，同时伴随的是对抗的生产性以及将异化状态转向一种生产性的“第二自然”的翻转。活劳动对固定资本的占有——这不是一种比喻，它在《资本论》的篇页中鲜活存在。马克思实际上首先表明，仅仅把工人置于（对）生产资料的支配之前，便会改变的不仅是他的生产能力，而是他的形象、他的本性、他的本体论。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关于从“工场手工业”向“大工业”过渡的叙述是一个经典论域。在工场手工业中，劳动分工仍由一种“主观”的原则支配——也就是说，工人在生产过程适应工人之后才占有了生产过程；而在大工业中，劳动分工是“客观的”，因为对机器的主观/手工式使用被消除，机械自身成为对人的对立；机器以工人的竞争者与对手出现，甚至把工人降格为工作动物的地位。然而，在马克思那里还有另一层洞见：他认识到工人与劳动工具也被构成成为一种混合的建构，并且生产过程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工人的生活条件——他的“生活形式”（form of life）。劳动生产率的概念意味着可变资本与固定资本之间存在非常紧密且动态的联结，而正如马克思所暗示的，理论性的发现通过工人的经验被嵌入到生产过程中。

100

我们稍后将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如何直觉到生产者对固定资本的占有来结束论证。但现在让我们强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始终为《大纲》的论证所支撑，即把“一般智力”理论化为生产过程的物质与主体。正是这一发现促使他显示认知物质对生产的中心性，以及固定资本概念如何被其所改变。当马克思宣称在《资本论》中通常被理

101

解为机器复合体的固定资本已“成为人自身”时，他就预示了资本在我们时代的发展。尽管固定资本是劳动的产物、只是被资本占有的劳动；尽管科学活动的积累和马克思所称的“社会智力”的生产力被纳入到资本控制下的机器之中；并且尽管资本最终自由地占有这一切——在资本发展的某一阶段，活劳动开始行使颠倒这种关系的力量。活劳动开始显露出其对资本及资本对社会生产管理的优先性，即便它不必然能完全脱离那个过程。换言之，当活劳动成为一种日益扩展的社会力量时，活劳动作为一种越来越独立的活动运作于资本所指挥的纪律结构之外——不仅作为劳动力，而且更一般地，作为生活性活动。一方面，过去的人类活动和智力被积累并作为固定资本结晶下来；但另一方面，流向被逆转时，活生生的人能够把资本再吸收回他们自身及其社会生活中。固定资本在两重意义上都是“成为人自身”。

在这里，固定资本的占有不再是一个隐喻，而成为阶级斗争可以利用的“装置”(*dispositif*)，并且以政治纲领的形式显现出来。在这种情形下，资本不再是那种客观上包含生产者并强行将其支配加诸于他的关系；恰恰相反，资本关系现在包含了一个最终的矛盾——即一个生产者或一类生产者的矛盾：他们或部分地、或完全地，但在任何情况下实际上地，从资本那里剥夺了生产资料，并以霸权主体的形式自我主张。马克思在对资本关系的历史化处理里，将这一点类比为旧制度结构中第三等级的出现，而这一现象显然以爆炸性、革命性的方式呈现。

总之，马克思式本体论至少呈现出两重面向。第一面是由劳动力在其根本的生产能力中、在其完全且具身体性的抽象中所发展的面向；这种面向决定了资本的演进并赋予其渐进性；这是一种以死劳动的沉积为形象的本体论——一种固定的、分层的共同性，作为既存财富以及对

其的支配被组织起来。然而这一本体论还有另一面：由活劳动、阶级斗争、持续打破资本主义发展的冲动所代表的一面，它以**虚拟性**与从劳动中解放的力量出现。这种关系隐含着两种对立的终向（teleologies）：一种对应于死劳动的**本体/沉积**，另一种对应于阶级斗争的**本体/力量**。共同性因此以两种形式呈现：作为沉积与作为终向，既是死劳动的沉积，也是活劳动的终向。



资本主义、女性主义和 社会再生产

5. 从价值的生产到再生产的价值化

蒂蒂·巴塔查里亚 (Tithi Bhattacharya)

《资本论》当然是关于工人阶级，因而也是关于劳动的。¹这一论断之所以看似有争议，是因为除却少数段落和著名的工作日章节，《资本论》作为文本主要关注的是抽象劳动或劳动的价值形式。正因《资本论》最深刻地揭示了价值形式如何剥夺并消灭人类劳动的所有感性属性，马克思在书中的核心关切似乎在于追溯这种消灭的运作机制，而非确立人类劳动的主观意识层面。

这种将《资本论》解读为纯粹围绕雇佣劳动的形式规定性而展开的文本，促使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推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差别性”(indifference)。例如该观点的重要倡导者艾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便主张：

性别平等与种族平等……原则上并不与资本主义相悖。反之，阶级不平等的消亡则与资本主义本质相悖。同时，尽管阶级剥削构成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性别或种族不平等则不然——资本主义仍将所有社会关系置于其需求之下。²

106

在这种对马克思的解读中，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其生产与维系

¹ 我感谢亚伦·贾菲 (Aaron Jaffe) 对题目所提供的建议。

² Ellen Meiksins Wood, *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 Renew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59.

被重构为首个且唯一无需依赖非经济领域的不平等的剥削体系。此类不平等的存在被视为偶然而非制度必需——该制度的再生产可通过工资形式实现，或从经济上不平等但法律上平等的主体身上，榨取剩余价值来保障。

本文认为，社会再生产理论（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这一主要由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们从《资本论》中发展出的概念框架，比资本主义的无差别性假说更能准确诠释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本文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展开论证：首先从宏观层面批判性审视《资本论》中劳动定位；其次通过资本主义系统统一性（systemic unity）的专项论证，强调需构建能再现资本主义催生并维系的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最后借助实证分析，揭示劳动力在工人阶级不同阶层中的差异化生产机制。

在展开论述之前，我先简要说明社会再生产理论及其理论框架。本质上，社会再生产理论所理论化阐释的对象是劳动力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得以再生产的行为实践。立足于《资本论》的理论框架并承袭其思想脉络，社会再生产理论提出：（a）商品生产过程中（生产环节）所耗费的劳动，与为“生产”商品所需的人口或工人所投入的劳动，同属资本主义总体性，二者本质上具有关联性；并由此推导出（b）工人
107 阶级家庭是劳动力再生产或整个工人阶级再生产的首要场所，但并非唯一场所。

社会再生产理论指出劳动力及其凝结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两大关键特征。首先是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矛盾性。一方面，资本需要稳定可预测的劳动力再生产循环，因其既是资本利润的源泉，也是资本自身再生产的基础。但劳动力再生产由人类而非机器完成，故其再生产方式及能力发展程度未必契合资本需求。因此，所有劳动力再生产场所与过

程终究成为劳动与资本双方的角力场：前者持续争取更大“文明份额”以发展人类潜能，后者则竭力压缩此份额并塑造劳动力及其潜能，以创造并维系资本所需的生产性工人。

《资本论》、社会再生产理论与价值形式

若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关切在于劳动力作为性别化、种族化的再生产，而《资本论》作为文本本质上关注剩余价值如何产生及其后果，二者之间存在何种关联？诸如伍德上述立场试图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历史演进中应与资本主义的抽象逻辑架构在理论层面上予以分离。我认为这种源自《资本论》特定推演及其涉及的资本主义研究路径既违背马克思的方法论也背离《资本论》的理论企图。

《资本论》无疑探讨的是劳动的价值形式，我们确实能在马克思著作中找到支持经济范畴应与历史演进相分离的论据。³然而我们不能忽视，马克思的方法与非马克思主义方法（如李嘉图的固定本质概念）的根本区别在于，马克思拒绝将现实与其思想认知割裂开来。相反，他的方法论在逻辑层面与历史层面同步运作，确立了二者间的辩证统一。需要明确的是，马克思并非以自然主义的方式主张理论与现实的简单统一，而是揭示了理论范畴如何源于历史发展。这并非意味着此类范畴反映了直接的表象；事实上，它们可能恰恰与其背道而驰。马克思的方法揭示的，是理论与现实（或表象与本质）之间持续上升的螺旋式运动，在层层递进的规定层面中不断深化其复杂性。

108

³ “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9页。

“理论”与“历史/现实”的关系常被视为抽象范畴与具体历史的关系。迄今为止，我们论证了两者存在关联，但马克思的论述远超简单的关联性。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或许对马克思的抽象方法提供了最透彻的分析，为达成我们的目的，值得完整追溯其论证脉络。

109 通常所理解的抽象范畴是静态的，它是与动态整体分离的固定部分，能向分析者揭示整体的关键特征，后者因其总体性而无法被完整研究。马克思运用若干此类抽象概念——“货币”、“商品”——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与本质。与资产阶级抽象方法不同，马克思的方法论拒绝一切静态形式。因此，奥尔曼指出，马克思致力于“抽象事物，用他的话说，‘它们真实存在和发生的方式’，使它们发生的方式成为它们本质的一部分。因此，资本（或劳动、货币等）不仅是其表现与运作的形态，更是其发展方式；或者说，其发展过程、其真实历史，本身也构成其本质的一部分。”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嘲讽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试图证明“自然”与“历史”之间存在对立关系，仿佛它们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⁵相较之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抽象既包含其形成的历史，又揭示其可能的未来。例如，在抽象范畴“资本”中，我们既能发现其过去——“原始积累”，也能预见其未来：通过剩余价值榨取实现持续扩张，积累冲动必然催生世界市场等等。奥尔曼因此得出正确结论：

这种资本的“历史”既是资本本身的一部分，也包含在马克思

⁴ Bertell Ollman, *Dance of the Dialectic: Steps in Marx's Method*, Urbana and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3, p. 65.

⁵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5,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6, p. 39.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 529 页。

对资本的抽象概念之中，更是他试图通过这个统摄概念所传达的内容。马克思所有主要抽象概念——劳动、价值、商品、货币等——都正是以这种方式融入了过程、生成与历史。⁶

尽管我们在历史其他时期——即其他生产方式中——可能发现这些范畴的全部或部分，但它们要么未能实现其功能，要么发挥着与当前形态截然不同的作用。当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结合时，既承载着历史积淀，又在自身内部建立起新的关系。因此，前资本主义实践的历史无法脱离资本主义的解释范畴而存在。

让我们现在重新审视艾伦·伍德的论点：(a) 剩余价值的榨取是资本的首要关切，因此 (b) 该过程的具体实施方式，无论是通过种族化、性别化还是能力主义 (ableist) 手段，都与资本的核心追求无关。我们已遵循奥尔曼的观点：即便在马克思的抽象范畴中，也蕴含着历史脉络与未来隐喻。某种意义上，这已足以驳斥伍德关于资本主义无差别性的主张。但实际上，资本主义形式确实存在某种无差别性，只是这种无差别性并非伍德所设想的那样。

110

让我们以马克思所提出的“劳动”范畴为例。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与社会形态中始终从事劳动，这本是老生常谈的真理。但当劳动作为马克思构建资本主义理论基础的简单范畴，“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它便成为“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本身，而非特定劳动形式，成为创造财富的基础。以这种形式理解劳动，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实现的分析性飞跃。马克思写道：“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

⁶ Ollman, *Dance of the Dialectic*, p. 66.

111 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是劳动一般”。古典政治经济学如何抵达这种劳动的普遍形式呢？不仅在于认识到劳动是贯穿所有时代的非历史性范畴，更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首次成为“劳动一般”（labour in general）。这种普遍或简单劳动形式的**理论构想**，唯有在“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的**历史现实**中才成为可能，“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抽象产生于具体的多重规定之中，而具体之所以能够被设想为具体，恰恰只能通过这种简单的抽象来把握。马克思提醒我们：“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⁷

正因为无差别性以历史形式呈现，才能在理论形式中被如此把握。正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体能够在不同劳动形式间自由流动，劳动才“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因此，马克思的方法论绝非主张存在无差别历史形式的“抽象资本主义”与标记着具体社会关系的“历史资本主义”，而是敦促批判性思维以变革性的激进方式将理论与现实相统一。⁸

⁷ Marx, *Grundrisse*, pp. 37–38.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4–45页。

⁸ 钦齐娅·阿鲁扎（Cinzia Arruzza）在《论性别》一文中如此论证理论与历史的关系：“一旦我们接受……资本的逻辑结构与其历史维度之间的区分，便能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剩余价值的剥削发生在形式上自由平等的个体关系框架内，而无需预设法律和政治地位的差异。但这仅能在高度抽象层面实现，即逻辑结构层面。从具体历史视角看，情况则截然不同。”虽然我完全认同这篇丰富论述的主旨，但对其区分“高度抽象”与“具体历史视角”的表述略有异议。我认为支撑整篇论文的写作方法，其实比这种表述所呈现的更接近奥尔曼的观点。Cinzia

我认为，这种方法论敦促我们将《资本论》视为一项探索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命运的实践，包括其在该体系中呈现的历史形式。据此，马克思极为审慎地将抽象劳动确立为其劳动价值论的一个维度。具体劳动的主观形式，即抽象劳动与社会劳动在分析上的对应物——通过它们价值形式得以组织起来——均被理解为构成统一体的劳动的不同侧面。最重要的是，《资本论》探讨的是抽象劳动为何及如何支配其他方面，并使其服从价值规律。倘若劳动的其他方面看似抽象劳动的黯淡影子，这绝非马克思以简单方式“描述”现实所致。这些《资本论》中的其他范畴在马克思论证的整体中承担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它们昭示着资本主义将工人简化为潜在的剩余价值源泉的界限。

112

让我们更深入地审视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资本主义中的各自作用。如前所述，一个基于抽象劳动组织起来的体系，只有当不同形式的具体劳动——由处于特定历史境遇中的人们所从事——被市场强行纳入等价关系时才会出现，而这种生产纯粹是为了利润而非满足人类需求。构成资本主义整体的两个并行过程：其一是通过商品生产实现自我再生产的体系；其二是与之摩擦却又嵌套其中的、人类自身生活的再生产。维持生活（life-making）的再生产与价值的再生产必须同时且持续地进行。

这种制度存在两个前提：其一，人们被强行剥离生产资料，以致获取生存或维持生活的途径只能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其二，该制度能够通过再生产支撑市场的社会关系及剩余价值的榨取，从而确保自身的持续再生产。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必须不断再生产工人对资本的依赖。马克思写道：“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他

Arruzza, 'Remarks on Gender', *Viewpoint Magazine*, 2 September 2014.

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⁹

113 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的支配，价值对使用价值的支配，创造出并必然“催生出”顺从资本任意摆布的劳动者。

倘若《资本论》仅止于此，那么华尔街本该为其 150 周年诞辰举行庆典。那么，抵抗究竟如何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若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社会总体性的所有部分通过内在关系相互联结，那么如何证明对资本的抵抗是资本再生产内在的必然？正是在此处，社会再生产理论运用《资本论》的方法论，同时填补其理论空白，实现了对劳动力概念的范畴性转化——将劳动力作为资本主义再生产与反资本主义抵抗间的分析桥梁。

劳动力

即使对《资本论》中劳动力概念进行最富有创造性的解读，也表明该文本预设了被再生产之物的存在。对劳动力问题的探讨并非始于其社会中的生产方式与场所，而是聚焦于其商品形式如何维系剩余价值的生产。换言之，文本中对劳动力的概念化仅限于其对资本具有效用的形式。社会再生产理论挑战了这种以资本为导向的劳动力观，在理论层面实现了反向运动——从商品生产领域转向劳动力再生产领域。《资本论》中劳动力被冠以独特商品、特殊商品或特别商品等不同名称，因为它被呈现为唯一“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的商

⁹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I*, Chicago: Charles H. Kerr, 1909, p. 809.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846 页。

品。¹⁰社会再生产理论揭示了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另一个方面。劳动力并不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的商品——也就是说，它并非在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直接范围内被生产。相反，正如莉萨·沃格尔（Lise Vogel）所指出的那样，劳动力是在一种“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场所”中被生产并再生产的，即“工人阶级家庭”。¹¹ 114

沃格尔的批判性洞见在三个关键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其一，它揭示了资本的历史形式与逻辑形式的辩证统一。社会再生产理论表明，劳动力唯有通过特定但可靠的性别化、种族化的社会关系网络，才能为资本所用——这些关系网络会自我生成维系自身的制度形式（例如一夫一妻制的异性恋规范家庭模式）。¹²旧有历史形式可能被重塑，而新形式可能被创造并调动，但唯有通过具体的社会关系与感性的人类劳动，劳动力才能被生产并为资本所用。这并非关于资本创造理想家庭形式或性别制度以精准契合自身再生产需求的功利论述。相反，尽管资本不直接干预劳动力生产，因而允许形式与实践的相对自主性，资本主义再生产仍为劳动力得以再生的社会形式设定了条件。其次，通过关注劳动力在资本视角之外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社会再生产理论为资本主义总体性引入，或更准确地说，恢复了一个充斥着维持生活活动的社会关系领域。资本的目标是在生产领域增加剩余价值；劳动者的目标则是通过满足自身需求，提升生活品质，实现其劳动力与自我价值质的提升。社会再生产理论让我们重新认识到这些由工人创造的维持生活活动的力

¹⁰ 同上，p. 186. 中文版译文同上，第 195 页。

¹¹ 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51, 170.

¹² 我将性别与种族视为塑造劳动关系的最显著形式。年龄、能力、地域、族裔及其他因素同样发挥着类似作用。

量，因为它们试图踩下积累过程的刹车，如资本被迫通过工资和社会福利为这些活动买单。

115 最后，社会再生产理论具有明确的战略维度。工人维持生活的社会实践并非单纯满足需求的活动集合，它们蕴含着反资本主义的潜能。为提升或拓展此类实践而展开的斗争，终将揭示阶级力量的博弈格局。这并非主张工人改善生存条件的任何斗争皆具反体制性质。近期全球范围内围绕福利国家的争论，揭示了解放政治的阴暗面。在多个国家——尤其是全球北方——新自由主义削减政策导致福利国家社会福利日益萎缩，而威权主义的民粹政党却将这些福利作为盾牌，煽动工人阶级将其视为需要抵御移民、少数族裔及国家“他者”的权利。作为过程性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在此背景下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适应性及其系统性能力，即将过去的政治让步——此处指工人福利——重塑为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政治形式。具体而言，即揭示工人阶级内部种族主义如何瓦解全阶级团结，进而削弱抵抗潜力。那些旨在提高工人维持生活领域的斗争，往往隐性或显性地揭示出：在追求自我提升与解放的过程中，工人阶级所能争取的权益存在着明确的上限。因此，它们蕴含着向劳动斗争者传授关于资本主义最重要政治教训的潜力：只要工资形式存在，维持生活的活动就永远无法摆脱积累的驱力，而生活与劳动的真正解放，唯有在废除工资形式——进而废除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

差异的生产

116 若社会再生产理论确立了通过性别化与种族化的社会关系从而实现劳动力的非资本主义生产及其再生产，它同时也提出了关于再生产

机制更为棘手的问题。《资本论》所揭示的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榨取，在整个体系中始终存在着追求均衡的特定趋势与反趋势。但资本主义无疑标志着深刻的社会不平等——既存在于资本家阶级与工人之间，也存在于阶级内部。剩余价值的生产与榨取固然揭示了资本与劳动之间不平等的奥秘，但究竟是什么维系着工人阶级内部的不平等？

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内部种族主义的阐释，例如将种族的生产和再生产定位于劳动力市场竞争之中。其论点如下：工人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个体卖方相互竞争，而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群体则与弱势群体争夺工作岗位、养老金和社会福利。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与约翰娜·布伦纳（Johanna Brenner）在探讨 1980 年美国工人阶级部分群体为何投票支持里根时，对此论点进行了如下阐述：

工人阶级中力量较强的阶层似乎能够通过基于现有联系的组织来捍卫自身地位，从而对抗力量较弱、组织性较差的阶层。他们可以利用自身作为美国人对抗外国人、白人对抗黑人、男性对抗女性、就业者对抗失业者等优势地位。¹³

虽然我认同这一论述的大致框架，但我认为社会再生产理论敦促我们将差异化问题推进得更深，不仅要关注体现劳动力价格的劳动力市场层面，更要聚焦于劳动力价值的生产层面。

劳动力作为商品的价值，如同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商品一样，由其再生产过程中投入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但马克思提醒我们，对于这种特殊的劳动力商品而言，价值规定“和其他商品不同”，其中融入了

117

¹³ Robert Brenner and Johanna Brenner, 'Reagan, the Right and the Working Class', *Against the Current*, os, vol. 1, no. 2 (Winter 1981), p. 30.

“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这是因为：虽然劳动者为新一天工作的身体再生产所需存在下限，但其必要需求却没有固定上限——需求本身具有动态性，是历史的产物，并由工人阶级通过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所塑造。马克思认为，“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¹⁴

如果决定劳动力价值的必要需求具有历史性和动态性，那么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工人阶级不同阶层必然拥有不同的必要需求标准。爱尔兰工人与英国工人形成鲜明对比，在马克思看来，前者正是这种差异性生产的体现——因为爱尔兰工人所处的“雇佣工人的水平，这样的工人同资本交换的唯一对象和目的，就是维持动物般的最低限度的需要和生活资料”。¹⁵因此，这一关于生产性差异（productive difference）的理解，将差异安置在劳动力再生产这一运作过程本身之中。这意味着，劳动力——不妨说是有别于罗伯特·布伦纳与约翰娜·布伦纳的看法——在进入劳动力市场竞争领域之前，就已经被差异化地（再）生产出来了。事实上，甚至连进入或接入劳动力市场这一点本身，都不能被当作一个既定的前提，因为正是由于差异化的（再）生产，阶级内部不同部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本身就是不均等的。

关注社会再生产活动可揭示特定社会进程，某些工人因具备特定劳动力品质，抵达资本门槛时比他人更脆弱、更受贬损。美国拉丁裔工

¹⁴ Marx, *Capital, Volume I*, p. 190.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99页。

¹⁵ Marx, *Grundrisse*, p. 285.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第245页。

人“基本需求”水平遭无情压制，正是移民工人与本土公民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遭受残酷差异对待的例证。美国拉丁裔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中位数为 350 平方英尺，比贫困线以下的非移民家庭平均值低 80 平方英尺。¹⁶类似地，近期研究揭示黑人与白人工人薪酬差距持续扩大。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者面对“黑人相对于白人的收入差距中日益扩大的无法解释部分”时表现出的困惑。报告指出，这可能源于“难以量化的因素”，包括歧视（即种族主义）或公立学校质量差异。¹⁷资本在封闭社区/民族国家内部实现价值“均等化”（equalization）的途径，正是通过在再生产要素间建立差异化规范，使某些工人阶级群体被（再）生产为比其他群体更卑贱的存在。

住房获取、警察暴力、劣质学校与医疗服务，这些显而易见的因素决定着部分工人阶级的必要需求水平，进而决定并压低其劳动力价值。但某一阶层工人价值的降低，总会对所有阶层产生连锁影响，部分工人的低薪，往往为资本合理化削减全体工人薪酬提供了借口。因此，种族化劳动者的社会再生产恶化，反而有助于建立全员低薪的制度体系。

119

综上所述，有必要重新审视劳动力形态，因为《资本论》的论述与剩余价值理论的意义在此交融。尽管资本主义确实试图生产其所需的工人阶级，但《资本论》揭示了工人对工资形式的抗争实为该体系内部动力及其再生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工人将始终通过维持生活的活动发展自身需求，而资本则不断试图限制此类活动以增加其剩余价值

¹⁶ 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引自 Susan Ferguson and David McNally ‘Precarious Migrants: Gender, Race and the Social Reproduction of a Global Working Class’, *Socialist Register* 2015, vol. 51, pp. 1–23.

¹⁷ 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7-09-05/black-workers-wage-gap-has-widened-for-hard-to-explain-reasons.

份额，进而推动“文明”发展。基于团结的集体组织仍是工人阶级在这场资源不对等的资本对抗中取胜的唯一途径。

然而，社会再生产理论向我们发出的警示是：多族裔工人阶级的团结不会通过左翼宣传或唯意志论的方式自发形成，因为工人阶级的分化是在制度的细胞层面被制造并维系的。恶毒的边境政策以及基于性别化和种族化的劳动力制度，正是新自由主义试图在全球范围内以结合却极度不平等的方式再生产工人阶级的手法。面对此警示，社会再生产理论所传递的愿景同样重要。作为揭示商品生产点与劳动力再生产空间之间关系的统一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使所有争取强化社会再生产的斗争都蕴含着反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能够实现这种可能性的工人阶级运动不能简单复刻旧有的团结文化；必须主动锻造新的团结形式。这样的运动必须以同等力度倡导基于社区的工人阶级斗争——围绕水资源、住房或警察暴力展开——同时推进工作场所斗争。它必须学会将普遍诉求（医疗保障）与种族及性别特定诉求（生殖健康、平权行动）相统一。

如果《资本论》仍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最犀利的批判之一，那么社会再生产理论或许可以被视为通过抗争中劳动者的具象化声音，为这种批判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

6. 社会再生产与种族化的剩余人口

萨拉·法里斯 (Sara R. Farris)

在本文中，我借鉴了自己最近关于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在伊斯兰恐惧症 (Islamophobic) 和反移民运动中利用女性主义议题，或者说我称为“女性民族主义” (femonationalism) 的书。¹ 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西方世界的右翼民族主义政党越来越多地将穆斯林、移民以及种族化 (racialized) 男性群体妖魔化，指称他们普遍有着厌女症，并特别将穆斯林女性描绘成“亟需拯救的受害者”。考虑到这些政党在女性权利方面极其糟糕的过往记录，这一举措很显然是虚伪且投机的。

右翼政党在伊斯兰恐惧症和种族主义运动中对性别平等议题的利用已经被许多学者分析过，主要探讨这种手段的政治内涵。我在这里想到的是贾斯比尔·普尔 (Jasbir Puar) 的同性恋民族主义 (homonationalism) 概念，以及埃里克·法辛 (Eric Fassin) 为了描述性议题在当代反伊斯兰运动中的核心地位，对性民主 (sexual democracy) 概念的使用。² 然而，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我更关心的是，我们是否能识别出这些观点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即为何穆斯林和非西方移民女性（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被认为需要拯救。特别地，我一直想探究穆斯林

122

¹ Sara R. Farris, *In the Name of Women's Rights: The Rise of Femonation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² Jasbir Puar, *Terrorist Assemblages. Homonationalism in Queer Tim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Éric Fassin, 'Sexual Democracy and the New Racialization of Europe', *Journal of Civil Society*, vol. 8, no. 3 (2012), pp. 285–288.

和非西方移民男性突然以女性权利之名被污名化，是否与穆斯林和移民女性在经济领域的地位有关，尤其是在所谓的社会再生产领域中。

因此，在这里，解释社会再生产女性主义在何种方式上对于理解当代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形态为何要以双重标准对待种族化的男性和女性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双重标准，将非西方的男性（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视为女性的压迫者，同时也是“偷走工作”的人；而非西方女性则通常被描绘成厌女症和落后文化的受害者，需要拯救和解放。但她们却几乎从不被描绘为从“本土”工人手中抢走工作的人。为什么会这样？这种性别化、种族化的双重标准在涉及非西方男性时强调经济威胁，而同时在涉及女性时则完全忽视经济领域，为了理解这种现象我借用了马克思的劳动后备军（reserve army of labour）概念。

这篇文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我简要总结马克思关于劳动后备军或剩余人口的理论，并考察它如何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移民劳动力在当代欧洲经济中的地位。第二部分，我将讨论结合了社会再生产女性主义和马克思剩余人口理论的研究怎样能够帮助我们回答最开始提出的问题。女性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形成背后是否存在一种经济逻辑？社会再生产女性主义如何帮助我们解释为何民族主义者的种族主义叙事将种族化男性视为压迫者，而女性则是亟待拯救的受害者？

马克思的劳动后备军理论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a)社会资本规模的增加(即个别资本的总和)，(b)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c)资本积累所带来的越来越多工人的生产力增长，共同创造了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对工人更大的

吸引力和更大的排斥力相互结合”。³对于马克思而言，这三种相互关联的过程为劳动人口的增加创造了条件，“伴随着其生产出的资本的积累，与此同时还有其自身的相对过剩，变为相对过剩人口；并且这一程度正在不断加剧”。马克思将此描述为人口规律，这一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正如其他生产方式也有各自相应的人口规律一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剩余劳动人口形成的悖论在于，尽管它是“积累的必要产物”，但这一剩余人口又是这种积累的杠杆；也就是说，它“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从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⁴关于劳动后备军的讨论与马克思对资本的有机构成以及资本主义鼓励“通过减少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来不断增加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的趋势的分析密切相关。⁵

换句话说，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群体是由于资本需要增加生产资料（即机器）的量 and 价值，以牺牲活劳动（即工资和工人）的量和价值为代价而产生的。实际上，减少工资和工人或者说可变资本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技术发展和机械化，这一因素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大量劳动力从生产过程中被排挤出去，因此形成了不再被需要的剩余劳动力。尽管如此，马克思看到了机械化不可避免的界限，因为劳动力是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也因此它是劳动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完全被机器替代。这也是为什么为了保证并扩大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历史上出现了多种策略，它们都旨在减少可变资本的数量和价值，同时也限制完全机

124

³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1*,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5,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6, p. 625.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727 页。

⁴ 同上，pp. 625–626. 中文版译文同上，第 728–729 页。

⁵ 同上，p. 623. 中文版译文见同上，第 725 页。

械化的弊端。其中一些策略包括：(a)将生产迁移至劳动力廉价的地区，而不是在劳动力昂贵的地区投资高成本的技术创新以维持生产；(b)依赖通常由移民工人提供的廉价劳动力，尤其是在那些无法产业转移的生产领域（如建筑业和服务业等），从而导致“本土”工人与“非本土”工人之间在工作岗位上的竞争。由于这些原因，在马克思的时代，移民和种族化少数群体在资本主义剩余劳动人口的再生产中就已经占据着特殊位置，这种状况使得资本家能够通过分化与统治的逻辑，维持对工资的压制并抑制工人阶级的团结。

125 社会再生产女性主义和移民/种族化女性

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后备军的概念，以及那些强调国家在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后备军过程中的作用的理论，是描述当前形势下移民和种族化劳工处境至关重要的工具。⁶这些理论尤其能帮助我们解读移民和种族化工人在经济和政治层面被建构为新的全球性的被剥夺阶级的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指出当代西欧的移民和种族化女性并未像男性一样被呈现或认知。此外，这些女性作为被区隔在新近商品化的部门，如护理和家政工作中劳动力的组成部分，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也有所不同。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性别双重标准？

全球范围内，女性占国际移民总数略少于一半。⁷以欧洲为例，估

⁶ 例如，参见 Jon May, Jane Wills, Yara Datta, Evans Kavita, Joanna Herbert and Cathy McIlwaine, 'Keeping London Working: Global Cities, the British State and London's New Migrant Division of Labour',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2 (2007), pp. 151–167.

⁷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7,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publications/migrationreport/docs/MigrationReport2017_Highlights.pdf; accessed 20 February 2018.

计在欧盟 27 国的移民中，女性占比略超半数。大量移民女性及种族化女性（后者未必是移民，如许多穆斯林女性或二代移民女性）虽然活跃于西方劳动力市场，却集中受雇于单一经济分支，即护理、家政等社会再生产部门。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本土”女性越来越多参与“生产性”经济，导致生育率持续走低、老龄人口不断增加，加之公共或普惠型护理服务的日益萎缩、不足甚至消失，所谓“再生产”劳动逐渐被

126

8

为了理解当代欧洲移民和种族化女性作为劳动力与部分人口构成的、似乎免于被指控为造成经济社会及文化威胁甚至还被塑造成需要拯救的受害者的“例外”，我们需要更细致地考察社会再生产的重组。移民和种族化女性主要就业的护理与家政等社会再生产领域，与雇佣移民和种族化男性主导的其他领域有何本质区别？

首先，正如众多学者强调的，“情感性”（affectivity）是“社会再生产劳动”的基本，尽管并非排他性的构成要素。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

⁸ 参见 Rachel Salazar Parreñass, *Servants of Globalization: Women, Migration and Domestic Work*,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James A. Tyner, *Made in the Philippines: Gendered Discourses and the Making of Migran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Nana Oishi, *Women in Motion: Globalization, State Policies and Labor Migration in Asi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Maurice Schiff, Andrew R. Morrison and Mirja Sjoeblo,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Women*, New York: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and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Jennifer Rubin, Michael S. Rendall, Lila Rabinovich, Flavia Tsang, Constantijn van Oranje-Nassau and Barbara Janta, *Migrant Women in the European Labour Forc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Prospects*,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Employment, Social Affairs and Equal Opportunity, RAND Europe, 2008;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Domestic Workers Across the World: Global and Regional Statistics and the Extent of Legal Protection*,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2013.

社会再生产中的“情感性”成分使其在根本上难以被机械化或自动化替代。正如西尔维娅·费代里奇（Silvia Federici）指出，

与商品生产不同，人类再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被机械化取代，这涉及对复杂需求的满足，其中生理与情感要素密不可分，既要求高度的人际互动，又需要一个极为劳动密集型的过程。⁹

127 其次，对诸如护理和家政等社会再生产劳动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亲近关系的需求，中止这种需求的不可能性，以及这类工作必定会在它生产后或生产过程中立即被消费的事实，导致了要让这类生产被（像商品生产那样）从最终消费场所转移或打断（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10

社会再生产劳动难以被机械化和空间转移的后果之一，不仅意味着这类劳动被重新私有化、成为移民女性的重担或部分商品化，也意味着马克思的劳动后备军理论在这些领域需要得到修正。如前所述，关于剩余劳动人口或者说劳动后备军的讨论，与马克思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分析以及资本主义积累的趋势密切相关——这种趋势以牺牲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和价值为代价，来推动生产资料量和价值的增长。而减少可变资本的关键因素正是技术发展、自动化及产业转移，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劳动者被排挤出生产过程，从而形成劳动后备军。然而，社会再生产劳动对机械化和空间转移的抗拒，决定了技术发展仅能替

⁹ Silvia Federici, 'The Reproduction of Labor-Power in the Global Economy: Marxist Theory and the Unfinished Feminist Revolution', in *Revolution at Point Zero: Housework, Reproduction, and Feminist Struggle*, New York: PM Press, 2012.

¹⁰ Nicola Yeates, 'Global Care Chains',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6 (2004), pp. 369–391.

代这种劳动中的一小部分。这类劳动主要仍需依靠活劳动来完成，无论是通过雇佣家庭护工/家政工的商品化途径，借助快餐、洗衣等商业化服务的扩张，还是依靠家庭成员“无偿”承担。 128

由此，私人家庭对护理/家务劳动的需求，特别是在家庭的社会再生产任务日益私有化、外包化和商品化，加之人口老龄化、女性有偿就业率提升等社会人口结构变化的背景下，注定将在未来数年激增。这就不难解释为何近期对西欧多国移民工人受到的全球经济危机影响的研究表明，女性移民高度集中的领域（也即社会再生产）“不仅未受经济危机的冲击”，反而“在危机中实现了扩张”。¹¹如前所述，过去二十年间在人口老龄化与“本土”女性劳动市场参与率提升的同时，公共护理服务并未相应增长，家庭内部性别分工也未发生变革，这必然催生对私人护工和家政工的需求增加，成为当代移民女性化趋势的强大推力。但“影响育儿[及养老]需求的不仅是公共服务的缺失，更在于**现有国家支持的本质**”。¹²过去十五年间，欧洲各国普遍引入现金补贴或税收抵免等形式以帮扶家庭，这种制度安排鼓励了“护理商品化”和家政服务业的发展，这类服务通常需通过市场私人购买，而移民女性及种族化女性构成了该行业最主要的劳动力供给。 129

在欧洲，源于前文所述的社会与人口现象的对护理和家政工日益

¹¹ Office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utlook*,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2; Sara R. Farris, ‘Migrants’ Regular Army of Labour: Gender Dimensions of the Impact of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on Migrant Labour in Western Europe’,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63 (2015), pp. 121–143; Maria Karamessini and Jill Rubery, eds, *Women and Austerity: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Future for Gender Equality*, London: Routledge, 2013.

¹² Fiona Williams and Anna Gavanas, ‘The Intersection of Child Care Regimes and Migration Regimes: A Three-Country Study’, in Helma Lutz, ed., *Migration and Domestic Work: A European Perspective on a Global Theme*, Aldershot: Ashgate, 2008, p. 14.

增长的需求，是解释女性移民及种族化劳动力为何无法获得与男性同等对待的重要因素。有关证据可以在可以各种方式在当今针对非法移民男性女性的影响中找到。意大利的案例尤为典型：2009 年，意大利政府仅对从事护理和家政工作（*badanti*）的非法移民实施赦免，这些人多为女性，理由是该领域劳动力需求无法通过本国供给满足。当时的北方联盟党（Northern League）成员（时任内政部长）罗伯托·马罗尼（Roberto Maroni）宣称：“我们不可能合法化非法入境者、强奸犯或抢劫犯，但必须考虑那些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群体，比如移民护工。”¹³由此可见，即便是北方联盟这样的极右翼反移民政党，也愿意对从事护理家政行业的无证女性移民网开一面。该政党正是本文开头所述“女性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推行者之一。

此外，当前欧洲各国的移民融合政策正越来越多地要求女性移民必须接受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工作才能获得居留权。矛盾的是，这些政策一方面预设移民女性（特别是穆斯林）需要被“解放”，另一方面却将她们的推向儿童保育、老人照护和家政服务等传统上被认为使得女性无法解放的性别分工。

如前所述，移民女性和种族化女性所从事的、商品化的社会再生产劳动具有特殊性，其后果之一是：若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劳动后备军范畴进行分析，女性移民劳动力与其他经济部门中的男性移民劳动力及受种族化影响的移民劳动力相比，分析路径存在显著差异。如今，在西欧护理和家政领域就业的移民及种族化女性劳动力群体，并非人们所描述（且认知中）的那种会对本土劳动者构成经济威胁的劳动“后

¹³ 访谈可见于 www.repubblica.it/2008/05/sezioni/cronaca/sicurezza-politica4/bossi-spagna/bossi-spagna.html; accessed 20 February 2018.

备”军，时刻面临失业风险，且被用作维持工资的工具。相反，她们构成了一支劳动“常备”军（regular army of labour）。从事护理和家政工作的移民女性，并未与本土女性在低技能岗位市场上形成竞争，反而一方面让众多本土女性得以走出家庭工作，另一方面催生了全新的职业角色，例如带薪私人护工（*badante*），以意大利为例，这类职业此前并不存在。来自非西方的移民女性及种族化女性，她们不但没有引发将移民排除在劳动力市场、福利体系之外，或彻底逐出西欧的运动，反而能获得特殊的身份合法化渠道（意大利的案例便是如此），甚至被宣传为可从其所谓的落后文化中被“拯救”的对象。

总体而言，社会强调要帮助非西方移民女性融入社会、实现解放，包括为她们提供就业机会，其可行性在于：与男性移民和种族化工人不同，这些女性目前在社会再生产的儿童保育、养老护理、清洁服务领域中占据着关键地位。与其像男性移民那样常被贴上“抢工作的人”“文化与社会威胁”的标签，穆斯林及非西方移民女性通过提供因新自由主义改革而被商品化的服务，为西欧人参与公共领域工作创造了条件。

131

总之，我认为，在公众想象中，视移民及种族化女性为需要特殊关注乃至“拯救”的群体的这种双重标准，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工具，且与她们（当前或未来）在社会再生产的物质条件再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紧密相关。我所提出的女性民族主义，即民族主义者在种族主义运动中挪用女性主义议题的现象，因此应当被理解为新自由主义对福利制度、劳动力市场及国家移民政策进行特定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重组发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更广泛地说，是在西欧社会再生产危机的大环境中发生的。右翼民族主义者之所以能在排外政治中利用性别平等的解放理念，其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过去三十

年来西欧经济在新自由主义下的特定重构。

正如本文希望表明的那样，要理解种族压迫、性别压迫与阶级剥削之间的交织关系，以及三者 in 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同等重要的核心地位，关键在于将社会再生产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相对过剩理论结合起来进行解读。

自由、民主和战争



7. 自由之日，渐趋黯淡：《资本论》、翻译与资本主义再封建化

鲍里斯·布登（Boris Buden）

在宇宙系统中，每一个单独的行星一面自转，同时又围绕太阳运转，同样，在自由的系统中，它的每个领域也是一面自转，同时又围绕自由这一太阳中心运转。

——卡尔·马克思，《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
《莱茵报》副刊，1842 年

在企鹅出版社 2011 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版本序言结尾处，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讲述了一个故事，他听自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汉斯·摩根陶（Hans Morgenthau）。摩根陶于 1937 年自纳粹德国流亡海外，而他的父亲则在 20 世纪初，是巴伐利亚科堡市一个工人阶级社区里的医生。那里的病人多为罹患肺结核、生命垂危的矿工，他们常常请求这位医生带来《宣言》。他们最后的心愿，是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本著名的书，而非《圣经》一同下葬。

坟墓并非一本书得以延续生命的最佳之地。然而，毋庸置疑，它却是探索其多重死后生命（afterlife）形式的一个良好起点。正因此，我们不妨设想：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其原初形态——德语文本，即其本来被书写的语言，与其理想的读者——讲德语的工人阶级，一同被埋葬于坟墓之中。在这样的图景中，返回原点的行为已只能是纪念性的。

人们取一个圆整的周年数，以此举办一场记忆的仪式。然而，即便是当下盛行的强大记忆文化的自大狂热，也终究有其限度。并非一切在历史上死去的事物，都能在文化上被延续为生。这便是我们应当从其历史之死的角度重新审视《资本论》的又一理由。因此，与其纪念它曾经的生命，不如将注意力转向那些《资本论》在其中获得身后生命的、往往充满矛盾的历史与语言的交汇时刻。

自由，作为摆脱马克思的自由

在汉斯·摩根陶的父亲帮助那些弥留之际的病人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带进坟墓近一个世纪之后，另一群人却在庆祝，庆祝自己终于摆脱了这些著作的束缚。马歇尔·伯曼在谈到 1989 年柏林墙倒塌后中东欧地区的局势时写道：“到了 20 世纪末，许多曾生活在共产主义警察国家的前公民都觉得，没有马克思的生活才是真正的解放。”¹

然而，这并不足为奇。因为我们若记得，在这些地区，马克思的著作——连同其他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的文本，几十年来都被奉为教条，成为地方独裁政权的意识形态支撑，就会明白这种“摆脱”的情绪从何而来。伯曼称此为一种灾难——不仅是对历史上共产主义的灾难，更是对卡尔·马克思的文本及其真正读者的灾难。正因如此，这些真正的读者同样把历史共产主义的崩溃视为一种解放。唯有在一个没有马克思的世界里，人们才能再次自由地阅读马克思。

137 然而问题在于：谁才是这些真正的马克思读者？伯曼毫不含糊地

¹ Marshall Berman, 'Tearing Away the Vei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www.dissentmagazine.org/online_articles/tearing-away-the-veils-the-communist-manifesto.

回答：“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把这场世纪末的坍塌视为一次幸运的堕落。”²如果伯曼是对的，那么恰恰是马克思思想的历史性失败，才使它得以为后世保存。更进一步地看，似乎只有当历史本身，以及那些以马克思概念塑造历史的人们抛弃了马克思的理论、摒弃了他的论证之后，这些思想才得以重新出现，仿佛奇迹般被净化，恢复了其理论的纯真。这种转变可谓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后历史性升华：在其中，整个历史领域被回溯性地呈现为马克思原初思想的异域与敌土；而这些思想如今仿佛从自身的异化之中复原，重新安顿于一种非历史的真实性之中。但问题仍在：伯曼所说的这些“全世界的知识分子”，真的是马克思的真正读者吗？难道马克思的写作对象，不正是另一些人吗？那些他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结尾处明白无误地呼唤的“全世界的工人”？

事实上，伯曼并未对这两者作出实质的区分。早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中，他就引用了《宣言》里马克思的话，谈到现代资产阶级的历史成就：“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³既然资本主义把知识分子与工人同样纳入了雇佣关系之中，他们便在阶级与历史位置上共享同一种境遇。因此，伯曼才得以将当今世界的知识分子视为历史上工人运动解放遗产的合法继承者——那些曾经除了锁链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如今在思想层面上获得了新的继承身份。

138

² 同上。

³ Marsha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8, p. 115. 他在《揭开面纱：共产党宣言》（*Tearing Away the Vei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中使用了同样的引文，明确地将知识分子与工人联系在一起。

然而，世界上的知识分子们仍然还有一样东西要失去：那种伯曼隐含地赋予他们社会角色的自由，正是这种自由，使他们得以从历史的实践中抽离出来，去“直接地”接触马克思思想的真实世界。但这种自由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事实上，它不可避免地唤起了一个古老的观念：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更确切地说，是康德关于“在公共领域中使用理性的自由”这一概念——与其“私人使用”相对。⁴实际上，这一概念如今与常识性的公共/私人的区分正好相矛盾。对康德而言，那些在我们今日所谓公共部门工作的人们，其理性的使用受到他们所服务的机制，即政府意志的限制。因此，他们不能自由地思考，因为他们必须服从。然而，如果他们同时把自己视为整个共同体、或“世界公民社会”的一员，并以学者的身份向公众发言，那么他们仍旧能够自由地使用理性——也就是说，以公共的方式使用理性。

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伯曼以及一切真正的马克思读者，都曾以某种欣慰的心情迎接 1989 年崩塌所带来的那种“没有马克思的生活”。在康德的意义上，这场崩塌使马克思的著作从其“私人用途”中解放出来——例如，那些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党国官僚，也被讥讽为“马克思学家”（Marxologues），他们并不能自由地阅读马克思或讨论其思想，因为他们必须服从极权的主宰——党与国家。换言之，1989 年之后马克思著作的解放，可以被理解为某种由公共理性重新占有的过程。马克思作为作者被重新解放，如今他终于得以作为一名学者（*Gelehrte*），去直接面向“全世界的知识分子”，或者，用康德的语言说，面向“世界公民社

⁴ 参见 Immanuel Kan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trans. H.B. Nisbet, ed. H.S. Rei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54–61.

会”（*Weltbürgergesellschaft*）。

我们暂且撇开马克思是否曾是一个学者这一问题。那么，我们如何界定世界知识分子的形象呢？他是当代“世界公民社会”中某种认知精英的成员吗？是一个真正属于这一知识共同体的人？如果这个共同体是世界性的，它是否也是普遍的？归根到底，这个精英共同体使用哪一种语言？他们会阅读马克思的原文，还是仅仅阅读译本？

在伯曼所谓“全世界的知识分子”的概念中，我们不难辨认出一种更古老的知识分子形象，事实上，这种形象在康德的“世界公民社会”观念中仍然回响：那就是“文学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一个由学者组成的国际共同体，康德便是其典型成员之一。它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作为一种新的历史性知识交流形式，预备并最终促成了启蒙时代的到来。⁵

众所周知，“文学共和国”的原始语言是拉丁文，实际上它被称作 *Respublica Literaria* 或 *Respublica Literarum*。17 世纪后，它的主要语言转向法语。而最终，康德以德语撰写其著作，效仿文艺复兴时期那些最杰出的思想者——他们放弃拉丁文，转而使用自己的民族语，由此开创了学者的新原型：本国语的市民知识分子。马克思也是如此。他用德语写作《资本论》，那时“文学共和国”已经演变为在社会和政治意义上皆具质变的新形式——哈贝马斯后来称之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der bürgerlichen Öffentlichkeit*）。于是，古老的拉丁“文学共和国”被民族化了，或更确切地说，被辖域化于现代世界和资本主义兴起所确立的新政治制度——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疆界之内，在其中，旧日的本国语言

⁵ 参见 Dirk van Miert, ‘What Was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a Long History (1417–2008)’, *Groniek* 204 (February/March 2016), pp. 269–286.

被驯化并规范化（德国浪漫派称之为 *gebildet*，意即教化与文明），成为民族语言。

马克思居于伦敦，却以德语写作《资本论》。如果他今日生活在柏林，他肯定会用英语写作——唯此，伯曼所谓“全世界的知识分子”才能理解他。

穿越翻译之幕

我们几乎已习以为常地认为，关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所引发的相关议题的讨论，无论几乎所有还是绝大多数，如今都是以英语展开的。只要这些讨论涉及《资本论》原文，它们实际上都依赖于某种译本，而非德语原作。然而，这一事实如今已被完全自然化，以至于我们几乎对此全然无觉。我们用英语去思考、讨论马克思，好像他曾经也用同样的语言去思考、书写关于我们的世界。但事实并非如此。而这一点，有时会引起问题。

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Wolfgang Fritz Haug）便曾公开指出《资本论》英译本的问题。⁶他以当代对《资本论》最具影响力的注释之一——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资本论〉导读》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为例。⁷豪格本人也出版过类似的注释性著作，⁸但他简言之认为，哈维对马克思文本的解释缺乏准确性，从

141

⁶ Wolfgang Fritz Haug, 'On the Need for a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of Marx's *Capital*',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vol. 31, no. 1 (March 2017), pp. 60–86.

⁷ David Harvey,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0.

⁸ 《〈资本论〉导论讲座》（*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s 'Kapital'*）最初发表于1974年。事实上，豪格与哈维不仅同为1935年出生，而且他们也都在同一年1971年开始讲授马克思的《资本论》课程，对象不仅包括大学生，也包括工会工

而导致对马克思理论中若干核心概念的误解。原因在于哈维不会德语。换句话说，《导读》并非依据马克思的原文，而是依据本·福克斯（Ben Fowkes）1976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豪格指出，由于这一译本造成的意义偏移，在某些关键处显著影响了哈维的理解，并进而为当代国际左翼建立起一堵“认识论的屏障”（an epistemological barrier），不断削弱他们通过重读马克思经典文本来深化当代资本主义分析的努力。⁹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福克斯在翻译中经常忽略了马克思对几个德语形容词的区分——*stofflich*（质料的）、*dinglich*（物的）、*sachlich*（事物的）、*materiell*（物质的）。¹⁰福克斯将这些词统统译为“material（物质的）”。这一做法导致了一系列误读，而在豪格看来，这对“唯物主义思想来说几乎是致命的”。¹¹其结果是：“国际左翼如今得到的，是一个被剥夺了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以及一种没有历史物质性的历史唯物主义”。¹²

具体而言，这直接影响了哈维对《资本论》的解读。豪格指出，由于福克斯将马克思的 *dinglich* 译作“material”，哈维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反面推理即在马克思看来，“未物化的”（*unverdinglichte*）社会关系是客观的，但同时又是“非物质的”。因此，哈维认为：“人们无法以

人。

⁹ Haug, ‘On the Need’, p. 63.

¹⁰ *Stofflich* 意为“质料的”（stuff-like），在马克思那里，它是社会历史形式规定（socio-historical form-determination）的反义词；*dinglich* 大致可译为“物的”（thing-like），马克思将其与关系性的和过程性的相对；*sachlich* 也意为“物的”（thing-like），但马克思将其用作个人的（personal）的反义词；*materiell* 则译为物质的（material）。同上，pp. 75-76.

¹¹ 同上，p. 75.

¹² 同上，p. 63.

感性方式把握社会关系，你实际上不能直接看到、触摸或感受到它们”。

13

142 这一推论进一步影响了他对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概念的理解。在此，福克斯将马克思那句著名的 *sinnlich übersinnliche oder gesellschaftliche Dinge*¹⁴ 译为：“感性的物，同时又是超感性或社会的物。”(sensuous things which are at the same time supra-sensible or social) 但若更准确地译作“感性-超感性或社会的物”，便可看出马克思在词义上保持了“感性”与“超感性”的张力与同一性。福克斯的译法却将两者分离，从而使哈维能够把“社会”理解为某种超感性的、也即非物质但客观的存在。

而当这种理解被具体应用到商品拜物教概念时，即马克思所说“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在商品中呈现为一种物的关系”，哈维的解读就变成了：“一种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缺乏直接关系的现象，而这种关系的缺席正是由商品市场交换所造成的。”¹⁵ 为说明商品形式的拜物教性质，哈维举了一个超市的例子：当人走进超市购买一颗生菜时，需要付出一定数额的钱。金钱与生菜之间的物的关系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因为价格是社会决定的。于是哈维总结道：“隐藏在这种市场物的交换之中的是消费者与直接生产者——那些劳作以生产生菜之人之间的关系”。¹⁶

因此，豪格指出，哈维把“商品拜物教”简化为一种对生产者与消

¹³ 同上，pp. 63, 76. 哈维的引用见 *Companion: ibid.*, p. 33. 与其相反，豪格指出，社会关系既可以通过经验观察，也可以通过感官体验来感知；同上，p. 76.

¹⁴ 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Buch I, Der Produktionsprozess des Kapitals*, in *Marx-Engels-Werke* (MEW), vol. 23, Berlin/GDR: Dietz, 1979, p. 86. 中文版译文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89 页。

¹⁵ Haug, ‘On the Need’, p. 80.

¹⁶ 同上，Harvey, *A Companion*, p. 39.

费者关系的无知。这最终导致哈维在全球化与拜物教间建立起一种因果关系：“在高度复杂的交换体系中，人们**不可能**知道有关劳动或劳动者的任何信息，因此，拜物教在世界市场中是不可避免的”。¹⁷

143

然而，对豪格而言，商品、货币与资本世界所固有的拜物教，并不涉及民族市场与世界市场之间的差异，也与消费者对于“那种劳动或劳动者”的“主观无知”无关。对豪格来说，消费关系根本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的核心；相反，拜物教关涉的乃是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一种生产关系。在拜物教中，产品作为商品而自我自主化的能力，正是相对于那些生产它们的人而表现出来的。商品拜物教指的是生产者在自己产品生命面前的无力感。

当涉及语言转换时，人们未必要在每一点上都完全同意豪格，尤其是在他关于译文语义转移所导致的误读程度与严重性的论断上。豪格认为，当一部文本被译入另一种语言时，几乎不可避免会发生意义转移；而在他看来，这种转移有时甚至是“对唯物主义思想的致命打击”，正如他对本·福克斯英译《资本论》的批评所言，这种译法将使当代国际左翼无法重新接近马克思的真正唯物主义。这样的判断或许有些夸张；该译本在当代马克思解读中的不足，可能远不如豪格所言那般严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位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确实指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尤其是在他对当代马克思主义论辩所赖以展开的语言前提的总体评价，以及他据此发出的警告方面。

重塑我们今日阅读与讨论马克思的方式的根本性事件，乃是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的崛起。英语既是跨国高科技资本主义的语言，同时也

144

¹⁷ Harvey, *A Companion*, pp. 39–40.

是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正因如此，豪格认为，“这给英语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带来了沉重的责任，因为他们的马克思文本版本已在全球学生中获得了参照上的优先地位”。¹⁸因此，他期待这些学者能更加注意他们所使用的马克思英译本，从而消解这些译本所带来的意义偏移。就《资本论》而言，豪格毫不怀疑：必须出现一个新的英译本，一个符合批判性校勘标准的版本。否则，即便是马克思的德语原文思想，也将难以幸免于意义上的扭曲。事实上，这种扭曲在哈维《〈资本论〉导读》的德译本中已经发生了。译者将哈维基于福克斯英译本的分析重新译回德语，并与马克思的德文原句混杂在一起。其结果，正如豪格所说，“几乎等同于语言的洗钱”。¹⁹这一现象代表着更深一层的复杂性，那些在《资本论》英译过程中发生的语言异化，如今又被重新输入德语，导致马克思思想在其母语中的再次异化。

不会英语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豪格对《资本论》英译本的批评中，人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种怨意。但这里所关涉的，并不仅仅是这位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个人的失落，
145 他的那些以德语原文为基础的马克思研究与注释，即便在德语世界内部，也被一位不懂德语的国际作者的解读所取代。豪格笔下所流露的，倒更像是**语言本身的怨意**，不是他个人的伤痛在诉说，而是德语自身在发声。德语，曾经是现代哲学中最具文学与文化权威的语言，借助马克思的著作，一度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的语言典范”，而如今却只是昔日荣光的残影。

¹⁸ Haug, 'On the Need', p. 60.

¹⁹ 同上, p. 62.

这种历史性的侵蚀并不仅限于德语，而是波及当今许多民族语言。它有一个名字：“再方言化”（re-vernacularization）。所谓再方言化，是一种逆向过程，一种原本独立而成熟的民族文化语言重新坠回它在 16 世纪以前作为方言的状态。具体而言，无论在欧洲的语境中，还是在自身国土上，德语都在不断被逐出科学、政治与商业的高阶话语领域，退缩至日常生活与边缘话语的层面。正如一位德国语言哲学家带着苦涩所言：“德语如今正在成为一种正在消失的小语种（如布列塔尼语或奥克语），因为说德语的人已不再重视在高阶话语中维护德语的地位”。²⁰当然，导致德语陷入“文化无足轻重”²¹境地的原因无需多言，那便是另一种更为强势的语言，在全球化世界中成为新通用语的英语。结果是，在欧洲乃至世界各地，我们正在见证一种新的文化与语言秩序的出现，它可被描述为一种“新中世纪式的双语体系——高位：英语/低位：其他语言”。²²这一“新/旧”语言格局，也可以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关于语言能力即资本的理论加以理解。²³英语使用者所拥有的跨国语言资本不断增长，而德语乃至法语等昔日强势民族语言的使用者，则正日益丧失这种资本。从布尔迪厄的意义上说，如今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出现一种由语言所生成的新的阶级分化形式。

对此，有人将其视为一种历史性的损失，语言与文化多样性的进一

²⁰ Jürgen Trabant, *Globalesisch oder was? Ein Plädoyer für Europas Sprachen*, Munich: Verlag C.H. Beck, 2014, p. 92.

²¹ 同上，p. 192.

²² 同上。

²³ 例如参见 Jürgen Gerhards, *From Babel to Brussels: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Transnational Linguistic Capital*, trans. Maureen Metzger, Berlin Studies on the Sociology of Europe (BSSE), no. 28, Berlin: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2012; www.ssoar.info/ssoar/bitstream/handle/document/38916/ssoar-2012-gerhards-From_Babel_to_Brussels_European.pdf?sequence=1; accessed March 2018.

步衰退；也有人将其视为向全球语言和谐迈进的进步之举。然而，二者似乎都同意：这一进程已不可逆转。那些曾塑造出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各自拥有独特文化与语言的全球图景的旧式语言实践，正在我们眼前崩塌。可以想见，这一发展将带来尚难预料的文化、认知、经济与政治后果。但有一点已然清晰：越来越多的事情，已经无法用旧的民族语言表达，因为某些话语如今只存在于英语之中。毫无疑问，当代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如此。

因此，伯曼所谓的“没有马克思的生活”，其实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德语马克思”的生活，以及没有那些从德语原作翻译而来的历史性译本的生活。这是一个没有马克思的民族公共生活领域，在那里，他再也无法以本国语言对社会的各个阶层发声——从自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民族工人阶级的普通成员。按照伯曼的说法，他们正是随着历史共产主义的崩溃而从马克思中解放出来的人们。对于他们而言，如今的马克思已然沉默，他在说一种他们再也听不懂的语言。²⁴

在另一端，则是马歇尔·伯曼所谓的“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而言，“没有马克思的生活”反而以一种悖论的方式让马克思重返。如今，马克思被解放出来，正是为了他们——他当下唯一真正的受众，使他们能够自由地阅读他的著作、讨论他的思想；只要他们会说英语。而他们确实会，因为英语显然已是他们的母语——当今国际学术共同体的母语。历史共产主义的崩溃，不仅让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也让当代艺术得以普及。不久之后，克罗地亚艺术家姆拉登·斯提利诺维

²⁴ 这种情况意味着一个耐人寻味的关联：英语能力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亲和性之间存在某种奇特的相关性。一个群体中掌握英语的人越多，其中潜在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就越多。在荷兰，有 87.6% 的人口会说英语，因此《资本论》在那里的被阅读几率要远高于这一比例仅为 15.4% 的保加利亚。同上，p. 17.

奇（Mladen Stilinović）以一句话对这一语言变革做出了著名评论：“一个不会说英语的艺术家，不是真的艺术家”。这同样适用于 1989 年之后的马克思及其思想：一个不会说英语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者。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对此心知肚明。尽管他揭示了不能以原文阅读《资本论》所导致的误读与曲解，他并不指望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去学德语。豪格十分清楚：德语版的《资本论》已经死了。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制作并规范化最优的英文译本，就像古典哲学最伟大著作的权威译本那样。正如他所言：“也许在未来的世代中，马克思将扮演类似亚里士多德的角色，毕竟两者都为一种新的文明范式奠定了基础”。

25

这一与亚里士多德的类比意味深长。它完全符合伯曼关于“1989 年之后马克思之解放”的愿景，那是一种后历史性的升华，马克思的思想脱离了历史实践的偶然性，升入永恒的认知世界，成为普遍理性的经典。然而，这种升华是否仍忠实于马克思思想本身？马克思的思想，不正是与历史实践的结合构成了其核心吗？一个希望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典范化为文明形态的人，实际上已经承认了这场批判的失败。

148

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设想：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将以最终定本的英文译本来阅读和讨论《资本论》——这部由最杰出的语言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共同完成的“英文批判版”将成为他们的《资本论》。这幅景象，不由令人想起“亚里士多德的复兴”：中世纪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通过从希腊文或阿拉伯文转译为拉丁文而得以被再度发现并奉为经典。如果亚里士多德确实是通过拉丁译本而被最终确

²⁵ Haug, ‘On the Need’, p. 61.

立、并重新被发现，那么，马克思为何不能？或许，只有通过其英文译本的经典化，马克思的思想才能得以被后世保存与复兴。这看似合理，然而在我们欣然接受这种解决方案——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留给未来之前，我们必须先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何我们在《资本论》发表一个半世纪之后，却以一种比这本书本身更古老的方式在想象它的未来？难道我们的 21 世纪愿景，竟仍然依赖于一种源自中世纪的智识与社会语言范式？

149 确实如此。那位批判自己母语再方言化的德国思想家已经明言：我们所生活的这种新的社会语言与文化状态，“酷似中世纪的欧洲”，它显然具有一种“新中世纪式”（neo-medieval）的特征。若真如此，我们就不能回避当年中世纪最聪慧的头脑所提出的问题：那些在拉丁语或阿拉伯语学术共同体之外所使用的俗语，真的一无是处吗？哲学的崇高思想，诗歌的语言，难道不能用平民的语言来思考与书写吗？

我们早已知道他们的答案，但这正是我们必须重新提出他们问题的理由。回望《资本论》一百五十年来的戏剧性生命历程：在那些如今被历史重新降格为方言的、曾经自豪的民族语言中，那几十种译本之中，是否还有什么值得被铭记的？我们真的该让那部著作在这些语言中经历的全部“来世”沉入遗忘吗？²⁶在那些不同语言与文化版本的《资本论》中，在译者们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或许拙劣的失败、致命的误解与偶然的洞见之间，难道就没有什么仍能启发我们的？

就拿一个例子来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版《资本论》。这部译本

²⁶ 在问世的最初一百年里，这本书被翻译成 43 种语言。见 ‘Der Weg des “Kapitals” – 220 Ausgaben in 43 Sprachen’, in *Karl Marx. Das Kapital 1867–1967*, Special Issue 2, Frankfurt am Main: Verlag Marxistische Blätter, 1967, pp. 86–88.

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由一群入狱的共产党员共同完成的，他们的领头人是一位犹太画家兼艺术评论家，因为加入非法共产党而被判二十年徒刑。他的主要助手是一名“红色正义”恐怖组织成员，因参与刺杀内政部长而被捕。大约十年后，这些译者，或者说，那些幸存于本国白色恐怖、斯大林清洗与西班牙内战的人，出现在波斯尼亚的群山之中，150指挥着一支游击队，他们很快赢得了战争，并开始在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中使用他们的《资本论》译本：在失败的集体化与成功的工业化中；以斯大林与共产国际之名，也反对他们的名义；压制资产阶级文化，也推动现代艺术与建筑；建立一个以工人自治为基础的福利社会，同时又重新引入市场经济，使之融入新兴的跨国资本主义金融与政治体制；号召武装人民，也宣扬世界和平；遏制民族主义运动，也支持反殖民斗争。

这些故事，与无数类似的故事一起，那由不同译本的《资本论》所孕育的浩瀚历史经验，如今似乎都沉没在新的“方言黑暗”之中。²⁷的确，1989 年之后出现的“没有马克思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确实让他的著作重新回到了读者面前；但与此同时，它也剥夺了那些著作曾在世界各地通过译本获得的多样生命。最终，我们似乎只剩一种选择：支持当代国际马克思主义学者群体，继续他们对一部“完美的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追寻。这同样是 1989 年那场历史性转折的必

²⁷ 《资本论》在其他语言中的新译工作仍在继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重新开始，这一事实并不与上述诊断相矛盾。无论这些译本在语言学上如何改进、在历史上如何更新，它们都难逃与其语言及其社会文化共同的命运——被一种更加普遍的“俗语性的黑暗”所不可避免地吞没。例如，2013 年斯洛文尼亚语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三个译本，而斯洛文尼亚语的使用者还不到两百万人。然而，与此同时，世界上广为人知的“斯洛文尼亚学派”（Slovenian School）——这一哲学与文化理论流派（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其成员使用斯洛文尼亚语。该学派的作者们几乎全部以英语写作；而且，只要他们引用马克思，就必然依赖于英文版的马克思著作译本。

然结果。

151 自由而平等的个人：一出过渡时期的独角戏

1989 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似乎今天几乎没有人对此存疑：那是一场民主革命，遵循着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解放事件的理想，将东欧民众从共产主义极权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简言之，一切都是为了自由。1989 年之后，那些曾经受各种压迫的人，尤其是被异化的一党制国家及其意识形态所压迫的人，终于获得了自由，他们可以在公共领域发声，可以组建政党、在自由选举中选择代表，可以信仰宗教、追求经济利益，或随心所欲地迁徙。如果我们相信伯曼的说法，那么 1989 年甚至让马克思本人也经历了“双重解放”：一个“摆脱了马克思”的生活，同时又迎来了一个“为世界知识分子而被解放出来的马克思”。

然而，还有另一种解释，那些如今已经陷入愈发深沉的“方言性遗忘”中的语言与历史所讲述的版本，其中一些尤其强调知识分子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回望所谓前共产主义东欧的民主革命是如何展开的，我们大体可以区分出三个历史阶段。²⁸

第一阶段的民主突破，发生在正统马克思主义所谓上层建筑的层面上。觉醒的民主力量，或者用西方宣传中直到不久前仍广泛使用的典型隐喻——“热爱自由的人民”，成功占领了意识领域。在这场主要发生于文化领域的斗争中，知识分子扮演了主导角色。正是他们的思想与价值观赢得了市民社会的领导权，与一党制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相对抗，乃至公开冲突。然而，若非首先在市民社会领域确立了主导地位，

²⁸ Rastko Močnik, *Spisi o suvremenom kapitalizmu* [Essays o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rans. Srećko Pulig, Zagreb: Arkzin 2010, p. 263.

这些民主力量也绝不可能继续推进至第二阶段，即夺取政治权力，这一过程往往被误认为就是革命本身。事实上，那些令人震撼的影像——群众推倒柏林墙、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上响起成千上万钥匙叮当的自由之声、布加勒斯特中央委员会大楼的冲击，都唤起了人们对过去那些真正改写世界历史的革命的记忆。无论是否壮观，这确实是仍由杰出的知识分子所激励并领导民主力量接管国家、占据政治领域的时刻。而当全世界仍在庆祝自由的最终胜利时，新的政治精英却迅速将国家转化为自身的政治工具，并立即用它来改变财产与生产关系。这就是1989年历史转折的第三个、也是最终阶段——资本主义的复辟。

第三阶段在历史上实际上表现为资本的原始积累，具体说来，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化。这一过程既内含又依赖于一种大规模的暴力使用，既包括结构性的暴力，也包括直接的公开暴力。然而，这一点通常被排除在民主革命的宏大叙事之外；不仅因为它揭示了那场光荣历史事件的丑陋一面，还有另一个原因：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1989年及其后，人们都在谈论民主，却几乎无人提及资本主义。

问题的核心是一个意识形态建构，它将整个事件总体化，即所谓的自由平等个体这一抽象形象。它最初属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领域，然而在以往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体系中，这一形象却被禁止进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尽管如此，它仍然以一种本质上并不属于它的方式重新出现在了市民社会领域。回想青年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局限的批判，他受到黑格尔的启发，并体现在资产阶级双重人（*Homo duplex*）的概念中，我们可以说，在一党制的自由斗争中，抽象的政治形象公民（*citoyen*）被转移为其非政治的替身，即资产阶级（*bourgeois*）。在这里，在市民社会的舞台上，置身于党国体制的背后，抽象的政治形

153

象公民上演了一种独角戏，伪装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它最典型的体现，是那些为人权英勇斗争的反共异议者。最终，当 1989 年瓦茨拉夫广场上的群众高呼东欧最著名的异议者之一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的名字：*Havel na hrad*——哈维尔上城堡，即传统国家权力中心时，这出戏剧宣告结束。在这一资产阶级双重人复归的形象中，政治自由终于得以重建。哈维尔，作为国家领导人，走进了城堡；而哈维尔——剧作家、丈夫、天鹅绒地下乐队（Velvet Underground）粉丝，则留在布拉格市中心，与市民们同处于剧院、啤酒花园和知识分子沙龙中。似乎两者都与资本主义的复辟没有直接关系，人们反而称之为“向民主的过渡”。

然而，这场自由平等个体在共产主义独裁下胜利斗争的历史独角戏，又产生了另一种意识形态效果，它让我们忘记了东欧对共产政权的内在反抗。其关键在于对左翼批评的理解，即其倡导者通常被称之为“斯大林主义”。无论他们是挑战官方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还是因反对 154 对其强制实施而与党发生冲突，他们从未倒戈他方。历史共产主义的左翼批评者从未成为反共者；相反，他们始终在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解放性承诺所打开的视野内活动，共享其高光、缺陷与矛盾，并积极参与伴随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存在的理论争论与戏剧性政治冲突，而他们常常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然而，他们的批判是真正的内在批判，它一次又一次出现在体制的各个层面和发展阶段，但从未建立起针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统一战线。这同样适用于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概念，更具体地说，是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保护。始终坚守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遗产，国家社会主义的左翼批评者常常与反共异议者一样，强烈捍卫这些自由。尤其是在言论自由方面，左翼常常援引马克思本人，尤其是他关

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早期著作，以支持他们的立场。

在这些文本中的一篇里，青年马克思通过太阳系的比喻谈论自由：“它的每个领域也是一面自转，同时又围绕自由这一太阳中心运转”。²⁹根据这个比喻，我们可以说，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左翼批评者清楚政治自由的光辉历史上从何而来，源自诞生于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个体，但他们从未崇拜太阳。相反，他们关注的是整个自由的太阳系。155事实上，许多马克思主义正统批评者及其压制性实践的反对者仍用德语阅读马克思，因此他们对我们今天所谓的“市民社会”一无所知。他们讨论和处理的是一个不同的概念，即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来的概念，在德文原文中称为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更好的英文译本则称之为“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 society）。³⁰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的太阳系及其各个世界各自围绕自身的自由轴运转的真正意义：贸易自由、财产自由、信仰自由、新闻自由，诸如此类。所有这些世界共同构成了随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阶级出现的历史性新社会领域——一个由生产关系产生的竞争私人利益和阶级不平等撕裂个体的领域；被孤立的家庭生活和各自承担的不同角色分割；被不同宗教信仰和各类公民社团分隔，诸如此类。虽然所有这些世界都围绕自由个体的抽象形象运转，但在系统内部没有真正平等的个体，也不存在统一。然而，这在另一领域是可能的，即国家。在这里存在另一种形象，一个纯粹的政治存在，既自由又与他人平等，但仅作为抽象存在，完全脱离资产阶级社

²⁹ ‘die Zentralsonne der Freiheit’; in Karl Marx, ‘Die Verhandlungen des 6. Rheinischen Landtags rheinischen Landtags. Erster Artikel. Debatten über Preßfreiheit und Publikation der Landständischen Verhandlungen’, in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Werke*, vol. 1, Berlin/GDR: Dietz Verlag, 1978, pp. 69–70.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91页。

³⁰ 尽管通常被译为“市民社会”，如上文所述。

会的现实生活。

156 对这种异化进行历史性的扬弃，其经济根源已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彻底分析，而非单纯恢复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才是马克思主义左翼面临的真正挑战。左翼从未背弃资产阶级自由的太阳系，相反，他们坚持将政治解放扩展到围绕其中心运转的各个世界，尤其是生产关系的世界。³¹国家社会主义的左翼批评者希望这些世界中的每一个都能散发出与太阳本身同样的光辉。换言之，他们希望资产阶级政治体系中的两个抽象形象——公民与资产阶级，能够融合为一个自由平等的鲜活个体，这个个体在生产领域摆脱剥削、在异化国家面前获得解放，既在工作集体中承担责任，又在公共事务中做出决策，总之，贯穿整个曾被称为资产阶级社会的领域。然而，这最终不过是另一个左翼乌托邦。相比之下，右翼在类似尝试中似乎更为成功。

人性的，太人性的

众所周知，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历史性侵蚀与最终崩溃，正好与现代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同时发生。在这一过程中，自由个体这一抽象形象似乎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拉斯特科·莫奇尼克（Rastko Močnik）所指出的，新自由主义在历史性突破中的关键一步，恰恰是将这一形象从其原本属于的国家政治领域“输出”到市民社会的核心。³²然而，这一转移并非如共产主义左翼所梦想和尝试的那样，将政治自由和平等扩展到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领域，包括生产领域，而是将资本主

³¹ 南斯拉夫的自治项目正是如此。

³² 在此我遵循了拉斯特科·莫奇尼克的观点。见‘Utopizam s onu stranu utopizma’ [‘Utopianism Beyond Utopianism’], in *Spisi o suvremenom kapitalizmu*, pp. 260–284.

义统治关系强加到一个传统上古典资产阶级国家不感兴趣的社会生活空间中。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空间得以免于直接控制和统治：不同的生活方式、世界观、宗教信仰、休闲使用、时尚、地位、家庭关系等等都属于这一空间。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整个市民社会领域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正如莫奇尼克所写，这一点决定了当代时代的一个关键事实：“源自资本统治的关系侵入了一个根据资本主义理想模型本应‘自由于’，即‘与其无关’的领域”。³³ 157

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理想模型在历史实践中从未实现。一方面，所谓的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剥削形式从来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来元素，而是其功能性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将其纳入并加以利用以生产价值。特别是在资本积累的情况下，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明确将其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与那些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间的一种代谢（metabolism）”。³⁴另一方面，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资本主义中的剥削关系不可能仅通过经济手段建立和再生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结构上依赖于意识形态机器的支持，例如法律系统及其制度，如所有权，或者如前文所述，自由和平等个体的法律形象。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莫奇尼克总结称，在资本主义中，意识形态的统治永远不会完全与经济决定因素重合。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商品形式。虽然它清楚地区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之前的生产方式，但在历史现实中，它从未以唯一形式出现，而仅作为统治形式存在——也就是说，它总是与其他前资本主义或非资 158

³³ 同上，p. 265.

³⁴ 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trans. Agnes Schwarzschild,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2003, p. 416.

本主义生产方式交织在一起。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进步作用，一种会抹去所有先前个体与社会生活形式的资本主义，这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名句中表达得最为鲜明：

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³⁵

这个愿景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事实上，在资本主义中，个人永远无法直接面对自己所生活的现实以及所处的社会关系。正是商品生产的拜物教性质阻止了这种直接面对，或者更准确地说，使这些个人将彼此的关系经验化为物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商品形式的神秘性，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关于商品的收尾部分所揭示的：商品把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为劳动产品的客观性质，也就是这些物的属性，或者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³⁶

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拜物教关系，即社会关系在商品形式中的物化，虽然在资本主义中占主导地位，但从未能够完全将历史实践的整个异

³⁵ 我引用《宣言》的这段话出自伯曼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p. 21. 此处的译文更加准确，因为伯曼本人对 1888 年塞缪尔·穆尔（Samuel Moore）的标准译本作了轻微的修改。

³⁶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I*,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5,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96, p. 83.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90 页。

质领域总体化。³⁷这不仅涉及其他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所暗含的不同形式的社会关系，还涉及前文提到的抽象个体政治虚构的转移，即在新自由主义转型条件下，自由平等个体的抽象形象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

莫奇尼克从某种意义上将其理解为对马克思商品拜物教公式的逆转：这种逆转并非导致物化（即物的拜物教），而是导致对物化的社会秩序的人性化，其等级和权力关系通过法律体系得到制度化。他改写马克思，指出：“从属与统治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自由与平等个体的关系的虚幻形式。”³⁸

这产生了一种逆向效应。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被经验为个人依附、从属与统治的关系，就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一样；这些关系的社会原因被个人价值、个人优劣、个人功过等幻想所掩盖。由这些关系必然产生的社会张力最终被体验为人际冲突。简言之，莫奇尼克写道：“阶级斗争在参与者眼中呈现为个人阴谋的虚幻形式。”³⁹越是把自己的社会地位与个人经历、职业“成败”联系起来，并通过竞争斗争和相互排斥来感受与他人的关系，个人就越盲目地支持并再生产资本主义统治结构。

据莫奇尼克，这正是我们今天以存在的直接性所感知的社会关系“再封建化”（re-feudalization）过程背后的机制。这一机制在整个市民

³⁷ 至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阶级结构，也就是作为其历史本质的阶级斗争，并没有能够产生社会总体性的效果。此处所讨论的，当然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概念：即无产阶级作为“一切阶级的阶级”，仅凭其存在就直接表达了一切阶级社会的真理；并且在无产阶级革命中通过扬弃自身而扬弃整个阶级社会。参见 Močnik, *Spisi o suvremenom*, pp. 266–267.

³⁸ 同上，p. 272.

³⁹ 同上。

社会领域中显现出来，任何个人生活世界的元素，从生活方式、娱乐到家庭关系，这些原本不受国家关注的元素，现在都可能转化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巨大影响。例如，宗教原教旨主义、种族民族主义和各种身份政治的极端现象便是其体现。这种机制也表现在新的治理技术中，例如企业伦理概念及其成功与忠诚的神话，在当今企业以及经济、金融和治理领域的大型官僚机构中无处不在。正如莫奇尼克所写，一种新的“穿袍贵族”（*noblesse de robe*）——当代版旧制度（*Ancien Régime*）的第二等级掌握了权力。⁴⁰

在这幅未来的图景中……

中世纪或许并不像通常叙述的那样黑暗，但当今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似乎正准备给中世纪一个“再现”的机会。关于正在进行的“再封建化”进程如何可能改变世界，我们可以从一段引文中窥见端倪，那是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于1937年为杰克·伦敦（Jack London）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铁蹄》（*The Iron Heel*）所作的序言中的一段话：

161

在这幅未来的图景中，民主与和平进步的踪迹荡然无存。在被剥夺的一切之上，升起了由劳工贵族、禁卫军式的军队、无孔不入的警察阶层所组成的种姓结构，而在最顶端，则是金融寡头。当人读到这里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正是法西斯主义的图景——它的经济结构、统治技术与政治心理！⁴¹

难道这就是那个世界——后世将于其中纪念卡尔·马克思《资本论》

⁴⁰ 同上，p. 274.

⁴¹ 见 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37/xx/ironheel.htm.

出版二百周年的世界吗？那时的《资本论》，将仅仅被数字化书信共和国中那微不足道的一小撮马克思主义者阅读，而且只读那部完美无缺、最终被经典化的英文译本。在这全球性的学术共同体中，主导地位属于更为稀薄的学术贵族阶层——那些自诩为“学术卓越”的骑士与男爵，他们把知识的占有，以及随之而来的特权与影响力，视为自己天赋的继承权；他们的社会地位，则是建立在一支不断壮大的“认知农奴”大军的劳动之上。而这些学者，又将在何处讨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呢？在未来知识社会的城堡与堡垒中，即那些全球精英大学之内。这些高等学府，依然只对那跨国“成功者”种姓开放；它们之所以延续至今，并非因为成功适应了瞬息万变的通信技术、全球贸易与金融网络、或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迅猛增长，而是因为，这个新世界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像那些孕育了这些大学的旧制度——前革命时代的专制主义下，僵固而凝结的社会结构。⁴²最终，他们又将向谁发言呢？向那由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谓“聪明人”组成的说英语的全球市民社会，那些热切等待精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他们解说商品拜物教之谜、资本积累的界限，以及为何资本主义依然无法逃脱自身矛盾的听众。

162

似乎有一种印象，当下仍然阅读并讨论《资本论》的人正在增多，甚至有时还蔓延到出人意料的领域。⁴³然而，这种印象是虚幻的。实际上，支撑这种“重新兴趣”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基础正在不断收缩。它

⁴² 斯洛文尼亚社会学家约热·沃格林茨（Jože Vogrinc），Močnik, ‘Utopizam s onu stranu utopizma’, p. 273.

⁴³ “《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的财经记者约翰·卡西迪（John Cassidy）在1997年告诉我们，华尔街本身充满了学习小组，他们正在研读马克思的著作，试图理解并综合他作品中许多核心的思想：‘全球化、不平等、政治腐败、现代化、贫困、技术进步……以及现代生活的耗竭性本质。’在华尔街上，他被称为‘下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Berman, ‘Tearing Away the Veils’.

正随同那颗自由之太阳的光芒一同衰微——那颗在过去两个世纪里照亮了围绕它旋转的诸世界的自由而平等的个体之星。随着这颗太阳逐渐冷却，它的光系也被愈来愈多的部分吞没在新的俗世黑暗之中。而此处，在那黯淡、疲惫、日渐微弱的旧日自由之光周围，《资本论》仍被妥善地保存、被悉心地研究与讨论，正如对待任何一部珍贵且早已典范化的世界文化遗产那样。然而，在那片黑暗中，人们早已不再在乎这本书。他们重新埋首于自己的圣经、古兰经或摩西五经之中，重新膜拜着被重新神圣化的民族神话，或沉溺于后真相时代的垃圾杰作。但是，如果说他们抛弃了马克思，那更真实的说法是马克思也抛弃了他们。他已不再使用他们的新“俗语”说话——那些正在腐朽的后翻译（post-translational）社会的语言。这些社会的语言，已无法追上科技、全球贸易、金融与政治的加速步伐；它们日益失去了表达当代世界复杂性、反思其矛盾、危机与可能性的能力；它们抛弃了启蒙的理念——那些曾将它们提升至世俗普遍性、自然与人文科学、文化、法治与政治自由的理念，而用新中世纪式的“价值”——奴役、愚昧与迷信来取而代之。这些语言的使用者沉沦在自身无历史的时间性中，与任何“共同的历史”失去了联系。他们是那些被马克思解放，却被全球资本主义抛在身后的人。他们积蓄着巨大的政治动员能力，但如今，这种能量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统治与剥削的利益。正是从这片愈加辽阔、愈加深邃的俗语黑暗中，当代资本主义汲取着它继续再生产所需的意识形态能量。这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经济与新中世纪社会关系之间的“代谢”，是我们这个时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积累过程。

曾几何时，中世纪晚期的伟大思想家们——但丁、伽利略、笛卡尔，他们抛弃了拉丁语，那是当时“学术欧洲”的通用语，他们转而使用民

众的俗语，在其中，现代世界得以发声。后来，甚至自由也学会了用无套裤汉与无产者的语言说话，《资本论》正是用这种语言写成，并以之被翻译到世界各地。或许，现在又一次到了这样的时刻——该让自由重新学会在新俗语的黑暗之心中发声。

8. 《资本论》的“命运偏移”：作为事件与任务

佳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在世界的屠杀场面前缄默无言

按照德里达的说法，“命运偏移” (destinerrance) 这一概念动摇了“所有那些通过某种远程交流而声称将自己导向某种目的本身的人” (*tout ceux qui par quelques télécommunications prétendent se destiner*)。

¹它既意味着一种偏离，也是一种关于文本如何抵达其隐含读者 (implied reader) 的常规描述。这就是作为事件的“命运偏移”。换言之，这便是事物本来的样态。当我以所谓的英语对你们讲话时，常识告诉我们，我不可能确知你们每个人是如何理解这些话的。《资本论》第一卷的隐含读者是作为集体的工人阶级。即便在它诞生的年代，这种假设在西北欧的语境中也已经受制于“命运偏移”。其历史证明便是魏玛共和国 (Weimar Republic) 后的变迁，乃至我们自己——此刻聚集于这场会议的人。我们无休止地谈论“谈论的变奏”，而“目标的游移”则被研究与开发 (R&D) 以及情感性重构的金融资本所践行，在企业化教育的辅助下实现。最优秀的学生被困在一个彻底私有化的论文机器之中，在

165

¹ Jacques Derrida, *La Carte Postale: de Socrate à Freud et au-delà*, Paris: Flammarion, 1980, p. 7; *The Post Card: From Socrates to Freud and Beyond*,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 3. 在本文中，我考虑了三类受众：伦敦：一次关于“当代资本的哲学与政治”的会议；柏林：一次关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技艺与政治”的研讨会；云南：一次关于“重塑丝绸之路的历史使命”的会议。

那里，知识的理念依旧只是关于知识的知识。所谓的行动主义(activism)成了募资活动，或是偶然且国家化的行为，被视为那不可化约的地方性(local)。而这正是“命运偏移”作为任务(task)必须被安置之处。

我提议必须将当下《资本论》的隐含读者转向公民(citizen)。这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一种荒谬的宣言。《资本论》的隐含读者是公民，这一提议忽视了许多问题。公民将以何种语言阅读此书？他/她将从何种位置阅读？又将依据何种“远程学习的概要化指导”

(distant-learning subject-summarizing instructions)来追随文本？他/她之所以来到《资本论》，是否因为完全吞下了全球资本主义关于完全连通性(full connectivity)的骗局？倘若我们今日既无欲望也无能力去直面这些危险问题，那么所谓“全球思想”(global thought)便沦为一个在知识上已枯竭、却仍受优渥资助的产业，依附于一个以国籍为基础的阶级-种姓体系。在这样的处境之下，我们只能说：这个“《资本论》的隐含读者必须转向公民”的提议本身，也当然且无穷尽地处于“命运偏移”之中。公民身份的另一面是移民性(migrancy)。我无法在此细论《资本论》在这一当代全球最关键、最复杂问题，即移民性中的有用性。

杜波依斯(W.E.B. Du Bois)早已提出，要将被种族线围困的公民身份问题纳入《资本论》的隐含读者问题之中，这是通过暗示完成的。他指出，在美国内战期间，约有二十万逃亡奴隶加入联邦军队，这一行动将战争从为资本主义正常运作而战，转变为反对奴隶制之战，并将此运动称为一次总罢工。纳胡姆·钱德勒(Nahum Chandler)认为，这类举

166

² Nahum Chandler, *X: The Problem of the Negro as a Problem for Thought*,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4. “官方数据称，南北战争期间共有 186,017

修正你的理论方案。然后，再读霍滕西·斯皮勒斯（Hortense Spillers），以沉思性别问题。³

公民身份的可能性，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在其直接的意识形态意义与语义中，仍带着柏拉图式的气息，萦绕于“城市”一词之中。就我有限的知识而言，除了中文、阿拉伯语与土耳其语外，这个词在其他语言中都仍然暗示着对民族国家的归属。而我们大多数人早已不再生活在城邦国家之中。况且，柏拉图的材料甚至并非真正关于市政管理，而是关于各种政治行为的类型，在其中柏拉图预设了某种教养（rearing），而非训练（training），因为在他那里，许多政治行为类型都源自母亲误导儿子的情境。

我们仍在追踪当下《资本论》的隐含读者——全球下作为民族国家的公民。而此时的冲突，在于高度虚拟化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与一个仍然信奉希腊词汇“民主”的公民身份之间的矛盾。对于国际伊斯兰的竞争性传统而言，自其来到“竞争之地”（拜占庭）起，柏拉图式的传统并无规定性作用。希腊人离得太近，他们只是第一个被欧洲化的（Europeanized），生活在城邦之外的米利特（millet）。有一种理论认为，“伊斯坦布尔”（Istanbul）一词其实意为“城中”（inside the city）：

伊斯坦布尔是拜占庭的现代名称。通常人们认为它是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Constantinopolis）的讹变，但更有趣的说法是，

名黑人部队，其中 123,156 人仍在服役（截至 1865 年 7 月 16 日）；战争期间的损失为 68,178 人。他们参加了 198 场战役与小规模冲突。毫无疑问，包括仆从、劳工和间谍在内，约有三十万到四十万黑人以正规士兵或劳工身份参与了内战，并为胜利作出了贡献。” W.E.B. Du Bois, *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Atheneum, 1992, p. 112.

³ Dagmawi Woubshet, ‘Introduction for Hortense Spillers’, *Callaloo*, vol. 35, no. 4 (Fall 2012), pp. 925–928. 这篇文章为不熟悉斯皮勒斯作品的读者提供了入门。

它源于城中居民听到拜占庭希腊人所用的一个称呼 *Istinpolin*，其实这原是一个希腊短语 *eis tēn polin*，意为“在城中”。⁴经过几个世纪语音上的种种变形，这个短语逐渐变成了“*Istanbul*”——一个纯粹的市内性命名，犹如麦地那（*Medina*）（同样是一座叫“城”的城市），麦地那永远是阿拉伯语的“城市”，而伊斯坦布尔永远是希腊外部者口中的“内部”，如同“印度”亦然。⁵

在奥斯曼帝国及现代土耳其语中，属于某一地理共同体的含义是以一个词表达的，这个词简单地意味着属于祖国（*patria*）——“现代公民身份（*vatandaşlık*）”这一观念逐渐浮现。拥有不动产是获得投票权的主要标准。”⁶在这个词中，并无“城邦”（*polis*）的隐喻。

我们必须记住，词语的存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可以在特定政治或诗学时刻被重新动员。在所谓第二次立宪时期（*Second Constitution*）——这被认为是现代性进入奥斯曼空间的时刻，众所周知，阿卜杜勒·哈米德（*Abdul Hamid*），

在现代化国家物质与社会基础设施的过程中（扩建铁路、电报、邮政、检疫设施，修建学校、军营和官署）……试图通过向其穆斯林臣民灌输一种忠于帕迪沙（*Padishah*，即苏丹，*Sultan*）与全穆斯林哈里发（*Caliph of all Muslims*）的精神，来争取他们的支持，这

⁴ B.E., ‘*Istanbul*’,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vol. 22, 15th edn, Chicago: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1995, p. 148.

⁵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Readings*, Kolkata: Seagull, 2013, pp. 13–14. 关于作为欧洲化米利特的奥斯曼希腊人，另见 Resat Kasaba,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l. 4, p. 160.

⁶ 来自与阿里·亚伊久奥鲁（*Ali Yaycioğlu*）2018年4月10日的间接个人通信。

是奥斯曼版本的“上帝、国王与祖国”(God, King and Country), 欧洲诸君主的共同口号。阿卜杜勒·哈米德那种谨慎的现代化保守主义, 在庞大的间谍网络支持下, 使得国家在大约二十年间得以相对和平与完整地存续; 但代价是扼杀了他所培养的青年穆斯林的主动性。⁷

在伏尔泰的《老实人》(*Candide*)中, 奥斯曼土耳其是理智隐居的理想之地, 而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则是强暴与屠杀之所。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干预与表面世俗化面前的失败, 其历史从未得到充分的解决。第二次效忠哈里发的号召由部分印度穆斯林发起。可以说, 这一

168

经操纵的呼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独立印度的分裂面貌。正是在这一语境下, 我们必须理解当代所谓新哈里发(new Khilafat)的出现, 它试图反转奥斯曼帝国终结时欧洲民族国家地图的划定。这已不再是以杀戮数量来衡量胜负的问题, 而是一种对另一种国际性形式的长期渴望——一种已经变质且无法修复的渴望。因此我们无法设想《资本论》第一卷, 或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在此处的游移, 无论作为事件还是作为任务。那种奥斯曼式的欲望从未彻底消失, 至少因为通往现代性的过渡仍保留了支撑这种欲望的词汇, 而到了 21 世纪的前十年, 这种欲望仍清晰可见——体现在埃尔多安(Erdoğan)对民主的否定之中。要指称一种对民族国家的归属, 也即我们所理解的公民身份的可能性, 那么在新哈里发的历史中, 这种可能性已不复存在。然而, 库尔德军队, 其中有许多由女性率领, 在 2018 年这一年仍然保留着某种开放的可能。柏拉图曾列举了多种公民主存在的方式, 而这些方式往往出于一种糟

⁷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 p. 151.

糕的、带有竞争性的母性投射（motherly projection）。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这些存在方式依然可及，尽管它们在种族/阶级/性别的界线之上分布不均。

这部宪法对于一个几乎没有法治传统的国家而言，是一项全新的尝试。它要对行政权力加以限制，本就希望渺茫。事实上，19世纪真正能够制衡帝权的力量来自官僚体系。而正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继位后对高门（Sublime Porte）的独立性予以压制，使得权力集中于宫廷之中，并在无意间为另一股更具革命性、也更危险的权力对手——军队的崛起铺平了道路。⁸

169 我们至今仍未走出这条路径的尽头。所谓“军队”，在抽象意义上，正是我们称之为新哈里发的组成要素之一。从最广的意义上说，这支军队既属于彼此之间关系复杂的各个强势民族国家，同时又属于哈里发——那个自称为民族国家的空洞结构，即便仅仅存在于那些希望寻找继承地图之外替代方案者的心中。承载着这一“军队”运作的地缘政治，同样是无锚的。无论是在叙利亚，还是在幻影般的哈里发国，所谓公民身份的理念也不过是一种空壳形式，没有社会契约及其可能性作支撑。性别化的机制在这一无结构的动力场中被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运用。

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公民身份的可能性，在新哈里发的历史中早已消失无踪。如今，当我们在《资本论》诞生150周年之际谈论它时，这种谈论被知识分子的“小众营销”所局限，用公民取代工人——我们已无法使这部文本重新获得自由。正因如此，移民这一宏大的问题，被欧

⁸ 同上。

洲式拜物教塑造殖民主义的再现，必须被重新置入那更广阔的历史脉络之中：即各种“哈里发”欲望的历史。这无疑是一个庞大到无法在此充分展开的主题；我仅在此提及它，为的是脱离那仁慈欧洲的语言牢笼。我们被困于一系列官僚化量化的平等峰会/节庆/会议之中，这些活动在企业资助与企业化大学的支持下，对听众重复宣讲，却放弃了批判性教学的责任；我们与让资本主义全球化得以延续的意识形态，已形成有机的共生。对此，一位来自克罗地亚的资深“行动主义者”曾提出，我们应当尽可能多地从企业部门获取资金——大概是为了继续举办那些巨型的全球抵抗会议。这种做法混淆了货币与资本的区别，更进一步，也混淆了资本与资本主义的界限。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在《大纲》中对那种以为社会主义可以善用资本的观念所作的嘲讽，一直追溯到他在《资本论》中确立劳动这一离心式的（centrifugal）核心形象，它成为他批判的枢纽性发问点，并隐含地提出利用协商性资本以追求社会正义的可能。从《资本论》第一卷的“所谓原始积累”章节，到第三卷中关于以资本为中介而抹消各种生产方式差异的论述，这一思想线索始终贯穿其中。许多忠实的马克思读者认为，《资本论》第三卷既是对前两卷的延续，又超越了它们的界限。 170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最为人熟知的“越界”段落之一，便是对自由王国（realm of freedom）的召唤。它反映出马克思那种未经审视的强健人道主义。而他在构建资本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capital）的过程中所作的努力，正是要解构这一人道主义，这或可视为他自身（或他所感受到的）任务的主要内容，即设定黑格尔的“命运偏移”。

一个重要的中途站，是发现了劳动力中存在一种二重性（Zwieschlächtigkeit）或离心性（centrifugality）。生产的主体，即工人

集体（作为公民？），如果能审慎地加以运用，那么大概就能带来一种治理结构，从而支撑我们先前那段越界性的段落中所描绘的自由王国。这就要求我们理解一种社会层面在私人利益与公共责任之间张力的二重性或离心性。马克思偶尔也敏锐地察觉到这种阶级性的张力，但他从未真正对其进行过理论化。实际上，这种二重性也存在于精神（*Geist*）与意识（*Bewusstsein*）之间，前者是哲学的、普遍的；后者是私人化的，甚至是“哲人式的”（*philosopherly*）。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模糊地与意识形态这一真理/虚假意识的对立相关。这种区分在政治实践的技艺中是否重要？黑格尔指出，《精神现象学》的发展不是依靠意识，而是依靠精神；但意识的出现却又是精神生成的必要条件。他一再指出，个体意识（那种虚假地自以为是行动主体的意识）与普遍（*Allgemein*）之间存在一种颠倒性的对立，而后者才是精神真正的行动空间。当意识被安置于普遍之中时，便能通过言说（*Rede*）或一般性的语言实现扬弃（*Aufhebung*）。

171 拉康称黑格尔是精神分析学的转喻者。在黑格尔反复警告人们不要把意识的自信与精神中真理的结构性的展开混为一谈时，我们可以看到解释与原则之间的想象界/象征界的间距在被上演。这种间距形成了一个空白空间，而马克思在他的人道主义语言中称之为自由王国。这正是我们自身可以占据的越界性时刻，在其中引入不可计算的要素，即那些被机械马克思主义者视为危险的补充物。这是一种面向无法普遍化的单一者的想象训练，一种持续的伦理反射的准备。而一般教育中缺乏这一点，正是使最初那几次革命受制的原因。这段话值得细读。

在那段著名的文字中，马克思——彼时仅关注经济领域——甚至称赞了资本：

资本的文明 (*zivilisatorisch*) 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⁹

这里必须强调马克思在此并不是在谈论资本主义。在这段文字中，马克思展望的是资本的社会主义用途。我尤其想到他使用的那些词语，比如 *gesellschaftliche Verhältnisse*，这里的形容词 *gesellschaftlich*（社会的）几乎可以理解为社会主义的；而名词 *Verhältnis* 则是更具哲学意味的关系——它指的是一种哲学上正确的结构性位置，不同于更口语化的 *Beziehung*（关系、联系）。至于 *eine höhere Neubildung*（一种更高的新生成），我们可以说它与黑格尔的 *Aufhebung* 或扬弃相近。

这正是**资本**所做的事情。而**资本家**在这一段中消失了。这也正是我们当下全球分化效应（globally diversified effort）可以学习并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地方：通过持续地去人化那种贪婪——它是**最初的推动力**（*primum mobile*），是危险的补充物（*dangerous supplement*），既是一对一的，又是集体的，这就是“命运偏移”。

172

在这段丰富段落的下一步里，马克思再次进行了普遍化，他把一切生产方式汇聚在一起，把 *Gemeinschaft*（共同体）与 *Gesellschaft*（社会）结合起来，这种对比后来得到了摩尔根（Morgan）的人类学研究的支持，而马克思正是以他为主要来源。（在摩尔根的理论中，进化理论从他以受邀成员身份加入的易洛魁部落，一直延伸到工业社会，而他对后者持

⁹ 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3*, trans. David Fernbach, New York: Penguin, 1981, p. 958.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927-928 页。

批判态度。他既是参议员，也是铁路工人。马克思与恩格斯重视他经验的多样性。社会形态的辩证理解（*dialectical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formations*）这一概念，后来由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引入。滕尼斯在分析中发现卡尔·马克思是其重要权威之一，这并不令人意外。

10

在这里，生产方式的专有名称作为虚拟目标的丧失出现了。在德语原文中，这是一连串描述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的条件的句子。马克思指向资本的理性化能力。可交换性（*exchangeability*）起始于自然之中。在资本之前，自然像一种盲目的力量统治着人类；而社会化的资本，即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则以共同的、理性的方式，掌握这种最初的可交换性，即人与自然之间的 *Stoffwechsel*，后者通常译作“代谢”，其字面意义是“物质交换”。以下便是那段原文：

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gemeinschaftlich*）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beherrscht zu werden*）自己……。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¹¹

173

这里可以明显看到主奴辩证法（*master-slave dialectic*）的影子。在

¹⁰ Lewis H. Morgan, *Ancient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1877; Ferdinand Tönnies, *Community and Civil Society*, ed. Jose Harr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¹¹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928 页。

资本出现之后的必然王国的善的王国中，自然不再是盲目的主人，而是被理性地控制的对象。（位于精神与主奴辩证法之间的章节，正是理性。）为了让主奴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得以运作，意识必须首先出现，而这发生在感性确定性（*sinnliche Gewissheit*）之位被清空后；随后，意识本身又被降级，让位于对精神的空间-结构性直观。¹²我想指出的是，在各个版本的《资本论》中，马克思并没有走到那一步。因此，他为“命运偏移”作为一种任务留下了空间，这不仅是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的任务，也是行星性正义（*planetary justice*）的任务，即让与自然交换的理性控制，不再仅仅是理性意义上的控制。例如，在这段文字中，马克思暗示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一切生产方式共同构成必然王国，它支撑着人类为自身而进行的发展。在上面引用的段落中，马克思思考的是必然王国之内的自由，德语原文是 *in diesem Gebiet*（在这一领域中）。而真正的自由王国，则位于一切社会项目之外。

不过，我们暂且不要走得太快。让我们继续阅读，以下这段文字依然限制在必然王国之内，描述的是为了建构自由王国的基础而进行的社会项目。马克思首先以小农为例——一个最不可能的候选者——来说明资本主义是常态的幻象。随后他向我们展示，要驳斥这种幻象是多么容易，只需描绘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轻松图景即可，“正因为这样一种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相适应的生产形式（自营小农）可以被归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几种收入形式之中，”并且这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不正确的，“资本主义关系好像是每一种生产方式的自然关系这一假象，就更加具有迷惑作用。”再比如，在美国纽约，小企业几乎就像是彻底

174

¹² G.W.F. Hegel,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 Terry Pinkar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60–108, 132–252.

的共产主义一样。马克思写道，“如果我们把工资归结为它的一般基础”，

也就是说，归结为工人本人劳动产品中加入工人个人消费的部分；如果我们把这个部分从资本主义的限制下解放出来，把它扩大到一方面为社会现有的生产力（也就是工人自己的劳动作为现实的社会劳动所具有的社会生产力）所许可，另一方面为个性的充分发展所必要的消费的范围，如果我们再把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缩小到社会现有生产条件下一方面为了形成保险基金和准备金，另一方面为了按照社会需要所决定的程度来不断扩大再生产所要求的限度；最后，如果我们把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总是为社会中还不能劳动或已经不能劳动的成员而进行的劳动的量，包括到 1.必要劳动和 2.剩余劳动中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么，剩下的就不再是这几种形式，而只是它们的为一切社会（*gesellschaftlich*）生产方式所共有的（*gemeinschaftlich*）基础。¹³

但不幸的是，如果缺乏“命运偏移”这一维度，上述思想就很容易被翻译成一种全球化骗局（*globalization hoax*），一种因为人们忘记了剩余价值的盗取而被延续的谎言。资本仅仅是社会性生产的。然而我们却心甘情愿地购买它。

哈尔·德雷珀（*Hal Draper*）曾提出，早期的马克思是从左翼民主的角度来理解专政的。¹⁴我并未核对他详尽的文献考证。然而，确实似乎

¹³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991–992 页。

¹⁴ *Hal Draper,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ume 2: The Politics of Social Classe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如此，如果说马克思之所以开始不信任国家，是因为资本具有潜在的全球化力量，而唯有国际才能与之抗衡，那么，他之所以忽视“社会”一词内部的冲突，正是因为他忽略了民主内部自身所包含的矛盾（因此也忽略了他在英国——他所选择的避难地——所观察到的、具有性别与阶级特征的公民身份中的矛盾，如同一切所谓民主社会中那样）。民主内部的矛盾，是自由（作为自主性的自同性）（ipseity as autonomy）与平等（作为他者性的他异性——与我不相似的他者）之间的矛盾。而“社会”一词内部的冲突，则存在于量化的劳动力与由行动者（agents）组成的集体性之间。后者利用这种抽象的平均劳动力来产生剩余，这种剩余按照上文所提到的越界性段落，被用于使“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体”（*Gesellschaft*）重新结合。而这一结合又需要正如柏拉图所言的公民式行为。正是这种准备被马克思搁置了，而葛兰西则将其视为一种“认识论的”（gnoseological）问题。¹⁵

175

关键在于，要在“社会”内部产生一种二重性（*Zwieschlächtigkeit*），恰恰介于类似“公共的”（量化劳动）与类似“私人的”（对社会正义的欲望）之间，以此修正黑格尔的“既成正义”（achieved justice），并将其向“永久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敞开。马克思在理论上无法彻底思考这一点。众所周知，1844年，26岁的马克思在研读黑格尔和《国富论》时，发生了思想上的转变：他从国民经济学（national economy）转向了政治经济学，从民族国家的视角转向国际性视角——因为资本本身就是国际性的。他正在准备书写一部资本现象学，而不仅仅聚焦于

¹⁵ 参见 Gayatri C. Spivak, ‘Global Marx?’, in Robert Garnett et al., eds, *Economics, Knowledge, and Class: 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 London: Routledge, 2017, p. 268.

精神。

然而，近期去世的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在最后一次访谈中却指出，当马克思移居英国后，他变成了一个维多利亚人。¹⁶这也确实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的说法，他写道，正因为英国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它才是从中展开批判（以德国古典哲学的意义）资本本身的恰当场所；而此时在德国写出的任何著作，
176 都只会是混乱的拼凑。¹⁷马克思主义至今仍未从这种对民族国家的持续聚焦中恢复过来，尽管它在理论上宣称自身关切国际性或全球性。正因为这种未被承认却又必然存在的民族国家中心性（毕竟，全球并不等同于世界），当代马克思主义“命运偏移的”主体（destinerrant subject）便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一个对未经反思的民族主义保持抵抗的主体。

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一个由债务国与债权国构成的联合体，以德国为不安的首脑，绝不应被误认为是德国对于“地方性”的某种必要执念。正如哈维尔·萨拉伊马丁（Xavier Sala-i-Martin）所言，这位全球竞争力指数的共同发明人，在卢旺达与加拿大的财政部发表演讲时反复强调，尽管他都在建议这些财政部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但他在这两个地方说的并不是同一件事。¹⁸我们这些左翼人士必须记住，德国国家的“地方性”，与当今那些巨大的战争营地中被随意囚禁女性的“地方性”并不相同，那些女性身陷强暴与贿赂文化之中，而这种文化已被世界大部分地区视为正常。能够记住这一点，正是政治的“技艺”

¹⁶ Moishe Postone, interview by Anej Korsika, Chicago, 2011, <https://anejkorsika.wordpress.com/2015/02/26/interview-with-moishe-postone-critique-and-dogmatism>.

¹⁷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5页。

¹⁸ 私人谈话。

(the art)，因为它需要想象力。我们不能因为某些以国家为基础的地方性胜利（无论是哪一个国家）而自我祝贺，并认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唯一的模式。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Marxist feminism）或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feminist Marxism）的目标，是为女性实现社会-政治的、经济的、法理上的平等，这绝非易事。然而，如果我们承认性别化（gendering）甚至早于个体对自身的成为（becoming-proper），并且它为社会形态的生成提供了第一个符号系统（semiotic），那么我们就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可能性，女性主义必须持续地打断马克思主义，将那被忽略的社会的二重性（Zwieschlächtigkeit）不断补充进性欲的迷宫式、开放性的路径之中。正因为这种大胆的补充被忽视，才导致这样一种情形，在莫伊舍·普殊同最后访谈的结尾处，人们仍然可以轻易地提出一份马克思主义推荐书目，而上面只列着四位白人男性。要替代普殊同对维多利亚人马克思的批评，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与女性最后的一次书信往来，那就是他与维拉·查苏里奇（Vera Zasulich）的通信。在经历了多次痛苦的草稿修改后，马克思最终写下了这样一句来回答查苏里奇的提问：“我们该如何在以农民公社为基础的亚洲俄国建立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回答道：“我不知道。你们必须自己去解决。”这对当时的欧洲想象力来说，实在是过于艰难。¹⁹

177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即任何可能的欧洲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技艺与政治”的语境中，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列宁在1919年创立共产国际（Comintern）这一事件。正如乔治·帕德莫尔（George Padmore）

¹⁹ Karl Marx to Vera Zasulich, 8 March 1881, in Teodor Shanin, ed., *Late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3, pp. 99–126.

那句极具价值的话所说：当“预期中的西欧革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并未发生时”，列宁转向的不仅是“沙皇俄国的文盲工人与缺乏教育的农民（*mujiks*），（还转向了）封建中国中更为落后的工人和农民”，当然也包括殖民地中的进步资产阶级。²⁰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帕德莫尔这种理想化的表述，就必须面对一个无法普遍化的问题：底层性别差异与公民身份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一种甚至比公民身份问题本身更为荒谬的“命运偏移”。这一领域的工作必须以语言与文本性为基础，通过这种方式去赢得成为全球性与结构性分析的权利。在这一点上，弗里加·豪格（Frigga Haug）提出的欧洲“记忆工作”（*memory-work*）理论是一个有趣的思路，尽管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般性。²¹但如果我们从现实出发，考察当代各殖民地中那一度短暂联合起来的反殖民“进步资产阶级”力量，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境，一个更具阶级连续性的图景。²²同时，在英国与德国的语境下，我们也不能忘记，共产国际在 1943 年解散，因为那时斯大林必须维持与英国和美国的同盟关系。

事实上，罗莎·卢森堡在 1918 年狱中写给列宁的一封信，这封信并非关于民族主义之争，而是提醒他不要忽视俄国广大地区的农民公社

²⁰ George Padmore, *Pan-Africanism or Communism?*, London: D. Dobson, 1956, p. 293.

²¹ Frigga Haug, *Beyond Female Masochism: Memory-Work and Politics*, London: Verso, 1992.

²² 这段文字出自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所著的《印度的发现》（*Discovery of India*），写于 1942 至 1945 年间的艾哈迈达巴德监狱，它让我们感受到列宁再思考的重要性：“在中亚，即便在今天，人们仍记得四位传奇性的伟大征服者——亚历山大（*Sikander*）、苏丹·马哈茂德（*Sultan Mahmud*）、成吉思汗（*Chenghiz Khan*）和帖木儿（*Timur*）。而现在必须再加上第五位，这是一种不同类型的人物，他不是战士，而是在另一领域的征服者，他的名字已经凝聚了传奇——列宁。”（New Delhi: Penguin, 2004, p. 247）

传统，这一警告也应当再次被听见与铭记。²³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来自孟加拉的共产主义者罗易（M.N. Roy）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概括：对于欧洲，是工业资本主义；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是农业资本主义。列宁与布哈林对此十分赞同。而毛泽东则出于战略考虑，不得不继续以无产阶级革命的语言来阐述自己的路线。次年，列宁去世；斯大林对罗易深恶痛绝，罗易于是自我流放，转赴墨西哥创立墨西哥共产党。如果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忽视了这一段历史，它就无法建立起任何具有普遍化潜能的运动。

杜波依斯向我们展示过，种族主义是一种可被普遍调用的意识形态，其功能正是维护资本的自我规定（self-determination）。²⁴我之所以关注《资本论》第一卷中那种“命运偏移”的结构，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技艺与政治相关联，并非出于某种以身份为基础的种族主义或反向种族主义，而是因为资本具有全球性的本质，它必须不断地幽灵化（spectralize）农村，以便持续地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地区，并在网络化社会的名义下，宣称这些地区所产出的地方性成就是最优的。而拒绝一切仅限于地方性胜利的政治想象，正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起点。因此，我愿以我 2018 年 4 月 15 日在中国的一段演讲作为结语，那次演讲试图化入一种普遍化的中国主体（generalized Chinese subject）之中，而非以美国或印度民族主义者的身份发言，后两者都因竞争心理而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欧洲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否有可能想象出如此广阔的基础？而不是仅仅

179

²³ Rosa Luxembur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Leninism or Marxism?*, trans. Bertram Wolfe,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1, p. 45.

²⁴ 这是杜波依斯《美国的黑色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的总体论点。

执着于底层移民的困境，或者将对殖民主义的迷恋视为最后的真理？

重塑丝绸之路的历史使命²⁵

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最持久的文化想象之一。如今，在网络化世界成为现实可能的时代，它再次被唤起，成为重新思考全球连通性的象征。历史使命（imperative）指一种由外部情势所迫的紧急要求或命令；在这里，它指的是全球格局变化所带来的重新思考的必要性。严格地说，我们知道历史上并不存在一条单一的丝绸之路。事实上，这个词汇本身是由一位德国历史学家创造的。²⁶然而，今天它却成为一个伟大的统一性象征，唤起人们对古代中国所开创的宏大跨文化贸易事业的想象。我与这一世界区域的联系在于，我的出生地加尔各答，与中国的古城昆明自14世纪以来便有贸易往来，而这一历史也可以纳入这条被想象出来的伟大叙事之中。

丝绸之路最初的伟大之处之一，正在于其物理穿越的艰难，那种几乎无法逾越的地理障碍。而今天，重新想象这一统一理念的历史使命，来自这样的事实：物理的艰难已被全球交通的科学成就以及数字化推动的网络化与可达性所超越，但与此同时，这种连通性又被地缘政治的暴力所复杂化。正是这种矛盾局面，产生了当代重新想象丝绸之路的必

²⁵ 参见 Gayatri C. Spivak, ‘Imperative to Re-imagine the Planet’, in *An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335–350. 该文是二十一年前作者在苏黎世 “Stiftung Dialogik” 的演讲稿，当时该机构正在从二战时期救助成功逃脱希特勒集中营的犹太人转型，开始为来自卢旺达、索马里、土耳其等地的难民提供庇护。

²⁶ “Seidenstraße” 或 “丝绸之路” 一词由费迪南·冯·里希托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创造，见 Tamara Chin, ‘The Invention of the Silk Road, 1877’, *Critical Inquiry*, vol. 40. no. 1 (2013), pp. 194–219. 感谢查理·阿姆斯特朗（Charles Armstrong）提供该参考文献。

然要求。

近两百年前，卡尔·马克思曾在论述无产阶级革命时写下这些令人难忘的话，而中国在上个世纪实现了其中的寓意：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 18 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学会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长期沉溺于消沉状态。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例如 19 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我批判，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局势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²⁷

马克思在此描述的，正是一种由外部情势所催生的历史使命。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中，我们同样面对着一种类似的使命，要在数字化与地缘政治条件的共同作用下，重新思考丝绸之路这一统一性想象，并追问

²⁷ 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trans. Ben Fowkes, in *Surveys from Exile*, London: Allen Lane, 1973, p. 150.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 474 页。

在发展的名义下，我们如何以多样化、复焦化的方式回应这种使命。这应当是一个长期的、具有全球性精神的计划，它需要深度的语言学习，使世界语言的丰富性能够与云南的语言多样性相呼应。如今，丝绸之路的一个新的、并且已经确立的目的地，是非洲大陆。这正是“想象力”（imagination）这个词至关重要的地方。正如我们所知，就在前文所引的那段话之前，马克思还写道：

19 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 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²⁸

马克思只能想象这样一种全球性历史使命，资本能够以 *Gedankenschnelle*，即以思维之速运动，如果它能够或愿意这样做的话。在 21 世纪，资本的流动速度已经远远超出单纯思维的范畴。在广阔的全球语境下，旧观念已经能够主导发展。因此，一种重新想象过去而非简单埋葬它的历史使命应运而生。我在此呼吁欧洲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重新想象共产国际，不仅超越其欧洲去殖民化的历史，也将记忆工作式女性主义（memory-working feminism）纳入其中，这便是对未来诗情的追求。马克思使用了源自希腊语的宽泛词汇 *poesie*，而不是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常用的德语词 *Dichtung*，用以将诗意与真理联系起来。马克思拥有希腊哲学博士学位，精通亚里士多德，尽管他也承认亚里士

²⁸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p. 149. 中文版译文同上，第 473 页。

多德无法产生劳动价值理论。但亚里士多德曾指出, *poesie* 比纯粹的历史书写 (historiography) 更适合作为认识历史和预示未来的方法。我相信, 马克思使用希腊词 *poesie* 而非普通德语 *Dichtung*, 正是指向了这种可能性, 将诗作为一种方法, 而不仅仅是隐喻。

正如中国伟大的寓言式儒家传统深知, 诗歌与想象性诠释的可能性密切相关。想象力既非纯理性, 也非非理性, 它拥抱理性。它在我们因单纯理性而犯下的错误之外, 保持着开放性, 因为我们是人。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这些从事文学、哲学和定性社会科学的人所提供的信息, 是合作式的支持, 而非单纯纠正性的帮助, 与新数字技术所提供的知识管理能力相比。数字技术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 既强大又危险; 而想象力则慢慢地训练着骑手, 让我们以新的方式思考旧事物, 从而也能以旧的视角理解新事物, 而不会陷入无根据的黄金时代主义 (golden-ageism), 那只是对过去的美化, 而非真正的重新想象。在此, 我以亚洲人的身份发言, 代表中国与印度的伟大传统。我们在历史上曾携手合作, 我希望从智识上, 我们能够再次如此合作。(如何将这种传统话语引入性-性别 [sex-gender] 的补充中, 是一个极为艰巨的问题, 几乎将我们推向荒诞的边缘。²⁹)

同样的精神下, 我想在德国提出, 今天有必要,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历史使命, 去想象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尤其是当它开始不断自我伪装, 或者为全球殖民主义提供伪装时。这是强烈而深刻的表述, 旨在让我们

²⁹ 戴锦华的《电影与欲望: 戴锦华作品中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政治》(Cinema and Desire: Feminist Marx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Work of Dai Jinhua, ed. Jing Wang and Tani E. Barlow, London: Verso, 2002) 提供了一个出发点, 让我们开始勾勒这一问题。一个与我们的学术能力相称的问题是: 我们如何解读一部电影, 如《人鬼情》(字面意思为“人和鬼之间的联系?”)。在此感谢张震对翻译工作的帮助。

反思自身角色，当我们从欧洲国家迈向全球化，以批判人类世（Anthropocene）为名时，该如何行动，同时呼应弗里加·豪格的信念：就业能力（employability）并非尊严的衡量标准。我非常支持豪格提出的四点方案，在自动化时代，不是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而是现有岗位应缩短工时并实现同工同酬。当我在中国，以磕磕绊绊的中文向各地女性主义工人讲话时，我总是感到失望，这些工人多是社会科学工作者，而
183 他们的工作往往过于狭隘地集中在收入生产上。在这一点上，我与豪格的观点完全一致。³⁰就业能力并非推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前进的唯一标准。正如我所提出的，若我们想回到 1844 年（而非 1818 年），从国民经济学转向政治经济学，而非仅仅去回忆一个出生年份，那么仅靠阶级连续性地向全球南方延伸，是无法纠正任何问题的。最终，那只会是一种家庭价值的宣言，而这正是最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做法。

《资本论》第一卷的“命运偏移”作为事件，对伦敦、柏林、昆明等城市进行了一种概括。任务在于将底层群体纳入公民身份，不仅是这些城市的公民身份，也包括所有命名的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同时，规范资本以改变全球普遍性格局。性别，作为大于整体的一部分，将“命运偏移”的事件推向不可计算的境地，使思想与世界的革命成为一项永久任务。

³⁰ Frigga Haug, 'The 'Four-in-One Perspective': A Manifesto for a More Just Life',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vol. 23. no. 1 (2009), pp. 119–123. 然而，我无法认同豪格与国际公民社会共享的“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目标。我过去三十年的工作，大多不太成功，一直致力于培养最贫困的儿童和最富有的成人理解民主背后的矛盾直觉，因为他们终将投票，即自由（作为自主性的自同性）与平等（作为他者性的他异性——与我不相似的他者）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引出了《资本论》第一卷中“作为臣民的公民”（citizen-as-subject）的概念，也正是本文中“命运偏移”这一荒诞任务所体现的。

9. 主体化与战争：马克思与福柯

埃里克·阿利耶 (Éric Alliez) 毛里齐奥·拉扎拉托 (Maurizio Lazzarato)

如今，我们在那些最异端的理论交汇点上重读《资本论》。这种异端的阅读让我们在《资本论》第二卷与第三卷、《大纲》以及那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才得以问世的遗失章节之间来回穿梭。更重要的是，我们“1968 年那场不可能的革命”（在其大体为马克思-列宁语法意义上不可能）和随后的新自由主义反革命之后，在金融资本的支配下，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中重读《资本论》，这一金融全球化强化了资本主义全部再生产过程，以至于让昔日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如今被贬为“早期资本主义”的“更晚阶段”。¹我们每个人在阅读《资本论》第一卷时，或许都会感受到一种“奇异”而“独特”的孤地 (*locus solus*)：也就是一个独特且封闭的轨迹，它将《资本论》第一卷的读者，从对资本自为目的机制的辩证阐释，再辖域化 (*reterritorialize*) 到“事实”层面上，即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概念，它本身就是一个在全球尺度上的历史复合体——资本主义作为世界性的概念。因此，“这一过程总要从某地某时开始”，²否则货币就不可能在那“永无止境的循环”中转化为资本，这个循环是幻象性自由主义的软权力 (*soft power*)，以“交换”和“契约”

185

¹ Peter Osborne, *How to Read Marx*, London: Granta Books, 2005, p. 2.

²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I*, trans. Ben Fowkes, Introduction by Ernest Mandel, Harmondsworth an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0, ch. 23, p. 714.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656 页。

这两个交织的概念为支撑，它构成了市场之所以被视为等价、平等、均衡理论与价格公正等的根据。如果政治经济学批判恰恰表明“资本是雇佣工人自己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³而分析的路径，必须迫使“分析的进程要求把研究的对象这样分割开来”，而这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而这种分割也是符合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的**”。⁴

暴力（*Gewalt*）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正是在这种精神之下，我们可以断言，资本主义生产不仅生产商品与剩余价值，同时也不断地再生产生产关系本身。工人不仅被再生产出来，而且首先是在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的阶段之中被生产出来的，包括“后备军”，这群人口“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⁵而这种苦难随着财富潜能的增长而加剧，并引发“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一般规律”，根据这条规律，“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⁶那么，如果进步带来了真正的贫困和财富的匮乏，如果机器是资本家对罢工和加薪的回应，并且进一步提高了绝对与相对的剥削、扩大了广泛而深入的统治，那么《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商品形式及其“与黑格尔的勾结（*flirtation*）”这一整个论述，都被历史性地暴力地牵引进关于“原始积累”的最后一部分，并以“现代殖民理论”作结。简言之，自从罗莎·卢森堡对《资本论》的解读以来的一百年里，我们付出了代价才学到，在中心与边缘世界中，“所谓”原始积累实际上是资本主义自身持续创造的过程：在金融与金融全球

³ 同上，ch. 25, p. 769. 中文版译文同上，第 714 页。

⁴ 同上，ch. 13, p. 443. 中文版译文同上，第 378 页。

⁵ 同上，ch. 25, p. 798. 中文版译文同上，第 742 页。

⁶ 同上，ch. 25, p. 799. 中文版译文同上，第 743 页。

化这一极度数学精密性的外壳下，永远存在着马克思在最“原始的”语境中所描述的那群“银行巨头、金融家、食利者、经纪人、证券投机家和交易所的豺狼这一伙人”，⁷这正是世界市场的真相。

因此，并非偶然，马克思在此最终呈现了一个资本主义系统性的组合，詹姆逊称之为“某种音乐尾声”（“历史作为尾声”），⁸其中包括“殖民地、国债（与国际信贷体系及股份公司相关）、现代税收制度，以及对本国产业的保护体系”。马克思写道，“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暴力（Gewalt）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economic power）。”⁹同样也并非偶然，福柯在《资本论》第一卷的论述中发现了双重殖民的原则：欧洲的内在殖民与美洲的外在殖民互为强化，并共同定义了世界经济，伴随着“殖民活动对西方法律-政治结构的反作用”。¹⁰然而我们也理解到，若要将规训与生命权力（biopower）的技术谱系追溯到原始积累的起点，那么同样必须承认，这些权力装置（dispositifs）的历史、运作与后续生命政治的变形无法与战争分离，无论是以军事战争、殖民战争，还是阶级、种族与性别的战争形式，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正是由战争所创造的。自17世纪末起，这些装置在不同形态中的发展，成为以其他方式继续战争的特权表达，

187

⁷ 同上，ch. 31, p. 920. 中文版译文同上，第866页。

⁸ Fredric Jameson, *Representing Capital: A Commentary on Volume One*, London: Verso, 2011, ch. 3, 'History as Coda', p. 74.

⁹ Marx, *Capital, Volume I*, ch. 31, pp. 915-916.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861页。

¹⁰ Michel Foucault,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5-1976*, New York: Picador, 1997, Lecture of 4 February 1976, p. 103. 中文版译文见[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法兰西学院课程系列：1976》，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08页。

并使战争成为一种对权力关系的分析。

这种逻辑在福柯 1976 年的系列讲座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在那些课程中，他并不是像人们常说的那样颠倒了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公式，而是相反地提出，真正“翻转了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广为流传的一个既朦胧又准确的论点”的是克劳塞维茨本人。¹¹如果这引导福柯去研究一种话语的出现与传播，这种话语首次将政治构想为战争的延续，那么在此过程中他最终将对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占核心地位的观点进行反思：也即关于一场不可调和的对抗（*antagonism*），即阶级斗争，是“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的观点，马克思将这一对抗引入《资本论》第一卷第 10 章的核心，在工厂里，“在（形式上）平等的权利（就工作日的维度而言）之间，力量（*Gewalt*）就起决定作用。”¹²倘若这再次印证了马克思的断言“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既然它决定了剩余价值与工资之间的分割，而这两者是“那是两个独立的互为界限的可变数的函数”¹³（顺带一提，正是在这一章节里，奈格里“学会了从事政治”¹⁴），并且倘若这揭示了在一个重要的语义层面也就是在德语中，*Gewalt* 兼具“暴力”与“权力”，并由某种机构（*potestas*）、尤其是国家行使暴力的含义，那么，*Gewalt* 可能以一种无法被完全控制的形式往返于政治与经济之间。首先是一种辩证的否定的要素，它表达了其最终将统治逆转为革命，并加速历史进程，历史因此成为由“唯

¹¹ 同上，Lecture of 21 January 1976, p. 48. 中文版译文同上，第 50 页。

¹² Marx, *Capital, Volume 1*, ch. 10, p. 344.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272 页。

¹³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3*, trans. David Fernbach, Harmondworth: Penguin, 1991, Part V, ch. 22, p. 486.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408 页。

¹⁴ Antonio Negri, ‘Why Marx?’ (2013), in *Marx and Foucault*, trans. Ed Eme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p. 21.

一的革命阶级”所承担的普遍解放。产业无产阶级本身就是这一趋势的历史主体，它意味着生产的社会化与“集体工人”（collective worker）的形成，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 32 章“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将这一趋势视为如同自然过程（*Naturprozess*）一样必然。¹⁵

现在，我们都能同意这一点：不存在天然的战争。正因如此，我们不得不重申（为了更好地转化）巴利巴尔的观察：马克思主义从未建立起一个“战争”的概念，而这恰恰是一个问题，¹⁶因为，要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甚至当代形式，就必须以一个前提为出发点，即在资本最解辖域化的（deterritorialized）形式（货币）与主权最解辖域化的形式（战争）之间存在一种紧密的、构成性的、本体论的关系。正是因为战争与经济的可逆性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根基，所以“战争”（wars），而非“某场战争”（the war），后者始终是国家的视角，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与外部秩序的基础，成为资本主义下社会组织的原则。相反地，战争，不仅是阶级战争，还包括军事战争、内战、性别与种族战争，如此深刻地融入对其的分析之中，以至于我们若就必须以它的最后一部分为起点重写《资本论》，以揭示战争最现实的动态运作。在资本主义每一个重大转折点，我们发现的并不是熊彼特所说的由企业家创新所推动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而总是一种军事与内部战争的变种多重体构成的企业。

189

在金融资本主义下，强行显现其自身的是“原始积累”的共时性，

¹⁵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874 页：“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

¹⁶ Étienne Balibar, ‘Marxism and War’, *Radical Philosophy* 160 (March/April 2010), p. 9, www.radicalphilosophyarchive.com/article/marxism-and-war.

即在“贸易”（*le doux commerce*¹⁷）的掩护下，掠夺与剥削同最现代的生产/破坏过程同时发生。资本真正的战争机器是金融化，其中“产业”资本仅是一个组成部分，如今已被彻底重组，并从属于（所谓的）“虚拟”资本的需求。暂且不论金融资本霸权所引发的政治问题，换言之，无法区分剥削式积累（*accumulation by exploitation*）与“剥夺式积累”（大卫·哈维）等同于无法承认经济中或经济具有的构成性战争。¹⁸

这绝非颠倒“政治是战争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这一公式的问题，而是资本在与各类斗争的持续对抗中，所采取的战争交织于政治、政治交织于战争的状态。政治不再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国家政治，而是金融化经济的政治，它与多重战争相互交织，这些战争既驱动并维系着主动的破坏之战，包括阶级战争、种族战争、性别战争以及主体性战争，它们构成了其他所有战争的全球性“环境”。我们难道不正是生活在“内战主体化”（*subjectivation of civil wars*）的时代吗？

在下一部分中，我们将说明社会冲突（*social warfare*）无法被简化为某种能以辩证方式将其平息的阶级斗争，而这正是将政治权力作为战争进行分析的前提。我们将在福柯的理论框架内展开论述，同时也对其提出批判：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并未取代战争。治理术对战争与权力的可逆性进行组织、治理和控制。这种可逆性，为福柯提出的权力关系（规训、安全与治理术关系）与战略对抗之间的本质差异赋予了新的意义。¹⁹

¹⁷ 即 31 章中的“温和贸易”。

¹⁸ Davi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64.

¹⁹ Cf. Michel Foucault, 'The Subject and Power' (1982), in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 3, ed. James D. Faub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2, p. 346.

为了真正逃离黑格尔……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将资本定义为一种矛盾的社会关系。矛盾不仅意味着对抗被包含于或内在于这一关系之中，还指向否定性劳动中关系双方“差异”的消除，以及马克思主义由此衍生出的目的论（teleology）。工人阶级与资本因其自身的关系而对立，二者同属一个共同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正是这一关系内部的争议对象。工人阶级与资本被置于同一层面，被迫采用一种共同的衡量标准，也即劳动，这是二者斗争的基础，双方围绕劳动的同一性或非同一性展开争论：活劳动与死劳动的对抗。实现这种对抗性同质化（antagonistic homogenization）的原则是辩证法。因此，这种矛盾被某种幽灵般的力量所困扰，即他者性语言（language of alterity）的消除，这种消除发生在否定之否定中，而正是这种否定之否定产生了历史：一种内在生成的动态——一种趋向于自身逆转的矛盾性动态。难道资本本身不正是一种“自我消灭的矛盾”吗？²⁰

然而，我们在此姑且粗略地借鉴一种洞见，这种洞见让我们直面整个“68年思想”（*la pensée 68*），因为正是在1968年，冲突的非辩证性质、其差异的“不可扬弃”本质，被确认为所有新历史形式/暴力的熔炉。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初，正是与辩证法的决裂催生了辩证法此前一直阻碍着的议题：战争问题以及敌对者之间的战略对抗的问题。 191

是1971年。在一本致敬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的论文集中，米歇尔·福柯首次转向尼采，试图将战争作为社会关系的密码进行主题

²⁰ Marx, *Capital, Volume 1*, ch. 19, p. 676.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615页。

化。为实现这一目的，他将统治定义为一种“非关系”，而非某种关系，这是一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非场所”（*non-lieu*）中的暴力分布。²¹

“非关系”是一种纯粹的距离，是暴力之间的鸿沟。统治既是一种“非关系”，又是“在[一个]非场所中上演的戏剧”，这一事实意味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并不属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空间。而辩证法恰恰是将统治所具有的绝对差异与异质性简化为同质实体（*homogeneous instances*）之间的冲突。如此，福柯后来所称的“治理术”正是这样一种机制，它通过施加“规则、义务与权利”将对抗双方之间作为关系的非关系，简化为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被平息的”（*pacified*）对抗。规则的世界使得统治的游戏能够不断重演：规则并非共享世界的体现，而是一种“被精心重复的……暴力”。²²

192 延伸这一对资本辩证法的批判（通过具体抽象层面的资本主义概念对资本的辩证概念化批判），我们可以发现资本不仅是一种剥削性的社会关系，同时也密不可分地是一种战略性的战争关系。资本同时在两个层面运作，并在二者之间切换。与福柯的观点相反，治理术的建立并未消除战争，而是以其他手段延续了战争。任何对冲突及其所蕴含的主体化过程的定义，都必须从资本的战略联结出发——资本既以“关系”也以“非关系”的形式展开，既体现为治理术也体现为战争。

战争，或者说敌对者之间的对抗策略，能够转化为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原因在于相对稳定的机制（装置、规则、法律）使制度能够以足够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去引导被治理者的行为。但正如

²¹ Michel 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1971), in *The Foucault Reader*, ed. Paul Rabinow,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4, p. 85.

²² 同上。

福柯在《主体与权力》(The Subject and Power)中所言,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每一种权力关系都可能引发新的战略对抗,从而将被治理者转化为敌对者,开启局势潜在的逆转。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情况正是如此:二战后美国的政治-军事胜利使其得以建立新的权力关系,而新一代冲突将在这些关系中发展,为新的战略对抗建立背景:1968年那场非同寻常的革命。因此,我们必须仔细区分两种场景下所蕴含的冲突、自由与主体性,一种是权力关系(治理术)所蕴含的,另一种是战略对抗所蕴含的。这两种场景中的“冲突”、“主体性”与“自由”并非同一概念。

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意味着双方都拥有“自由”。只有当人们承认失败者身上存在一种“自由”,一种“抵抗”的可能(福柯)或“逃逸”(flight)的可能性(德勒兹与加塔利)时,失败者才能转变为被治理者,而这种“自由”实际上已被纳入治理的运作模式之中。治理术范围内的冲突、自由与主体性由“内部反抗”(within-against)的限度所定义:被治理者的“自由”存在两种情况,要么是因为享受由掌权者鼓励和煽动的、人为制造的自由(即“自由劳动”、“自由消费”、“自由选民”的自由),要么是因为在对抗自由主义“自由权”(liberties)的斗争中并且为这场斗争而视自身为“自由”的。前者是一种被让渡且经过协商的自由;后者则是一种来之不易的自由。

193

罗斯福新政时期的资本主义以及其后的冷战在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之外创造了新的自由(“劳动自由、消费自由、政治自由”),其目的是摆脱经济战争(1929年大萧条之后)、摆脱与共产主义的政治战争,以及摆脱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冷战作为一种控制世界经济的新技术使得这些新自由得以(在全球北方)普及,这得益于对共产主义革命的

政治-军事胜利。这也解释了为何全球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新殖民政策的枷锁之下，而推行这些政策的正是那些“创造了新自由”的国家。在（后）殖民情境中，治理术的转型并未真正发生。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始终是敌人，他们从未置身于“同一个世界”，即便如法农（Fanon）所言，“黑人渴望成为白人”。这些“细节”正是福柯在分析（新）自由主义时所忽略的。²³特隆蒂的自治主义（operaism）理论亦是如此。

194 治理术特有的冲突及其“自由”不足以定义政治运动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它们是必要但非充分的条件，因为自主性与独立性以一种断裂和主体化即“主体性断裂”（*coupure subjective*）为前提，这种前提能让“被治理者”脱离治理术的框架及其“自由”，而后者本是为保障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平稳运转而存在的。脱离治理术意味着同时产生一种主体性“突变”，并进入敌对者之间的对抗动态，另一种“自由”也由此开始显现。一旦“被治理”、“成为被治理者”的指令被解除，从断裂中迸发的是一种作为“外在于并对抗”（*outside-and-against*）资本主义自由的自由与主体性。“非关系”不再是被统治者被动承受的，而是由其主动践行、坚持的。关键始终在于，实现从治理术范围内“在内部反抗”的自由与主体化向“外在于并对抗”资本主义的自由，即战略对抗中所蕴含的自由的转变。在这两种冲突、两种自由与两种主体化的变动之间，发挥作用的正是革命性断裂。正是在此处，战争机器以及自主且独立的主体性得以形成——或未能形成。

20 世纪 60 年代的运动完全接纳了这两种冲突、主体性与自由模式之间的断裂与非连续性。1968 年为列宁主义机器敲响了丧钟，更广泛

²³ 参见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地说，也为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理解主体与行动主义的一种方式画上了句号。这些新运动的形成，基于与传统工人运动截然不同的时间性，涉及其他类型的主体化过程与组织模式。女性主义运动的重要性正在于此，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追问主体性问题、时间问题，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尚未建立起新战争机器的坐标。

20 世纪 70 年代初，卡拉·隆齐（Carla Lonzi）以双重方式清晰地阐述了与列宁主义、更广泛地说是与马克思主义战争机器的决裂。她宣称主体并非既定存在，因为它“不可预期”；同时，女性主义运动的时间性并非指向未来，而是聚焦“当下”。通过“不可预期的主体”（*soggetto imprevisto*）这一概念，隆齐将批判矛头指向了那个被预先期待、已知且获认可的工人阶级主体化过程。对马克思主义而言，其遵循黑格尔的理论，认为革命进程是从“自在”（*in itself*）到“自为”（*for itself*）的过渡，是从无反思的直接性到兼具主观性（意识）与客观性（在世界中的真实存在）的存在的过渡。然而，隆齐在《唾弃黑格尔》（*Sputiamo su Hegel*）中写道：“未被困在主奴辩证法之内的我们……将不可预期的主体引入这个世界。”²⁴

195

马克思主义革命虽与“权力”形成断裂，却维持了革命“主体”的连续性。工人阶级本身已展现出一种自在的革命性生产协作，其唯一缺陷在于受到资本权力的剥削与限制。一旦摆脱这些束缚，它便能兑现自身蕴含的所有承诺。革命被理解为对生产、劳动与协作中已包含的可能性的实现。这些可能性是“趋势”，革命的加速将使其得以实现。但 20 世纪 60 年代的运动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它们兴起于两场世界大战

²⁴ Carla Lonzi, 'Sputiamo su Hegel' (1970), in *Sputiamo su Hegel: La donna clitoridea e la donna vaginale e altri scritti*, Milan: Scritti di Rivolta Femminile, 1974; Edizione Economica, 2013, p. 47.

196 构成的一场全面世界大战之后，彼时革命性生产（即生产本身具有革命性）的幻想、“工人”主体已然存在的幻想，以及科学技术作为进步暴力的幻想，都被生产与毁灭、劳动与战争、科学与核武器的同一性所贯穿。加速这一阶段已经过去了，同时也被过去化，被全面战争所使之过时，资本采纳了全面战争的视角，以无限战争为代价，将整个社会及其“生产力”纳入“实质吸纳”之中。以至于生产、劳动与主体性不再能从革命的镜像中看到未来的图景，或是解放的希望。它们必须服从于社会剧变。（可能的）趋势的实现过程，本质上仍是一种以或多或少的目的论为基础的历史实现过程。劳动、协作与生产的现实追踪并预示着未来。而如果革命的时间性指向未来，那么这个未来就是过去的未来。²⁵

相反，若主体是“不可预期性”（*imprévu*），其构建便以当下而非未来为基础。未来始终是一种无法被经验的承诺，而当下才是断裂的时间性，是开启了主动摧毁主体化刻板印象过程的此时此地——对隆齐而言，尤其指向“女性”主体性。《女性起义宣言》（*manifesto of Rivolta Femminile*）写道，“当下，而非未来”。²⁶当下是一种未知、不可预期的感性（*sensibility*）显现的时刻，这种感性自身蕴含着在真正出现前无法被构想的新存在形式的潜能，它们“为我们的存在本身引入了断裂”，正如福柯在《尼采、谱系学、历史》（*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中所写。²⁷这里不存在目的论，只有斗争、对抗与策略的现实，在加塔利

²⁵ 参见 Reinhart Koselleck,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s. Keith Tribe,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MIT Press, 1985.

²⁶ 参见 *È Già Politica*, ed. Marta Lonzi, Anna Jaquinta, Carla Lonzi, Milan: Scritti di Rivolta Femminile, 1977. 另见《唾弃黑格尔》最后，其中有着强烈本雅明式的回响：“没有任何目标，只有此时此地的当下。我们是世界的黑暗过去，我们正在为当下塑形”（p. 48）。

²⁷ 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p. 88.

所说的“过程性创造力”（processual creativity）中，决定着通往存在的过程。²⁸这种情况下，追随德勒兹与加塔利“将政治置于存在之前”，²⁹便意味着将策略置于本体论之前。这种与历史、与主体、与劳动、生产、科技（那些始终待实现的）承诺的断裂，既未消除权力关系也未终结战争。 197

但 1968 年之后，那场，或那些场“运动”最终未能直面它们自己助力引发的全面社会战争。反过来，面对 1968 年这场奇特的革命，资本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发起了一场同样奇特的全球金融“反革命”。它将战争与内战的强度调整到与自身在全球范围内所面临的暴力相匹配的水平：这是第一场以阶级、种族、性别与主体性战争的政治复现为标志的“另一种全球化”运动，而“工人阶级”已无法再将这些战争置于自身“客观利益”或特定组织形式（政党与工会）之下。1968 年奇特革命中的各个主体性表明他们未能想出并组织起能同时支撑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双重决裂，并能对抗资本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重新配置的战略攻势与权力关系的战争机器。解放与自主必须在政治上得到确立，并需防范敌人始终存在于两个层面，也即关系层面（统治者/被统治者）与非关系层面（战争）的主动性。简而言之，1968 年的运动陷入了一个我们至今仍远未摆脱的僵局：当他们直接对抗资本战争时，采用了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模式；而当它们转而探索主体化模式、绕过矛盾的辩证运作时，又放弃了构建本应重新配置尼采所说的“有效历史”（wirkliche Historie）的新型革命战争机器的问题。这种缺陷在理论 198

²⁸ Félix Guattari, *Chaosmosis: An Ethico-Aesthetic Paradigm*, Bloomington-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3.

²⁹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before Being there is politics’ (p. 203).

层面同样存在。

与马克思主义不同，68 年思想能够捕捉到时间与主体性之间的新关系，并以“事件”为视角对其进行思考。但福柯理论中主体性“转变”（conversion）的伦理-美学转向、加塔利的“主体性生产”（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以及朗西埃（Rancière）的“解放”（emancipation），都与“政治革命”和反资本主义战争机器构建的问题彻底割裂，这一问题不以战争为目标（根据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著名观点，例如将分化的暴力转化为联结的暴力），因而无法重新思考并着手解决战略对抗的问题。若没有对抗资本的斗争和对对抗的全新思考，自我关系、主体性生产与解放就会被资本主义的“自我改造”产业所“收复”，而这种产业恰好能持续供给“人力资本”。

在 1968 年运动五十周年之际，我们仍深陷同一僵局。一方面是主体性变革、政治革命、自我关系、主体性生产与自我改造，另一方面是战略对抗，二者必须在一种暴力关系中被维系，进而实现逆转。事件作为暴力关系的逆转——这是福柯在 1971 年提出的后马克思主义“事件”（event）定义。³⁰我们也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150 周年及其“与黑格尔的勾结”（马克思语）。最后，让我们回顾福柯在法兰西公学院就职演讲中，在伊波利特思想恩荫下提出的“诊断”：“要真正摆脱黑格尔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与他决裂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³¹就我们而言，
199 这正是我们在**战争**（继福柯之后）与**资本**（继马克思之后，也继德勒兹

³⁰ Michel 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p. 88.

³¹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Discourse', trans. I. McLeod, in Robert Young, ed., *Untying the Text: 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 p. 74.

与加塔利未曾放弃的马克思主义之后）中试图思考并将其问题化的。³²

³² Éric Alliez and Maurizio Lazzarato, *Wars and Capital*,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18.



但剧作家正是借此宣告



理论与诗并不存在边界

《资本论》 / 资本的诗学

10. 《资本论》的诗学

凯斯顿·萨瑟兰 (Keston Sutherland)

在由恩格斯监督的《资本论》英文首版于 1886 年出版的前一年，他发表了一篇简短而尖锐的论战文章，矛头直指那些自命不凡，竟以为这部巨著可由区区业余文人译成英文的狂妄之徒。论战的对象是亨利·迈尔斯·海德门 (Henry Mayers Hyndman)，文章里用其笔名约翰·布罗德豪斯 (John Broadhouse) 指代。1880 年，海德门阅读了《资本论》法译本后，于次年推出小册子《大家的英国》(*England for All*)，其中两章几乎原封不动地剽窃马克思的作品，成了赤裸裸的盗版缩写。海德门竟敢翻译马克思。¹恩格斯以《千万别这样翻译马克思》(*How Not to Translate Marx*) 为题进行回击，对海德门那笨拙、保守、毫无生气又含糊其辞的文字毫不留情：

204

马克思是当代具有最简洁最有力的风格的作家之一。为了确切

¹ 《大家的英国》序言末尾附有一句说明：“第二、三章的观点与大量材料，我得自一位伟大思想家与原创作家的著作；我相信，该书将很快能为我的大多数同胞所阅读。” H.M. Hyndman, *England for All*, London: Gilbert & Rivington, 1881, p. vi. 马克思对这番剽窃及其遮遮掩掩的托辞大为震怒：海德门竟不敢表明自己抄来的批判究竟出自谁手。弗朗西斯·维恩 (Francis Wheen) 在《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London: Fourth Estate, 1999, p. 372) 中评论道：“海德门为何不能公开承认《资本论》及其作者的名字？他拙劣的理由是：英国人‘对社会主义谈虎色变’，更‘害怕被外国人教训’。”关于这段公案的始末，见 Chuschichi Tsuzuki, *H.M. Hyndman and British Socialism*, ed. Henry Pell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32–34, 41–44；另见 Gareth Stedman Jones, *Karl Marx: Greatness and Illusion*, London: Allen Lane, 2016, p. 550.

地表达这种风格，不仅要精通德语，而且要精通英语。布罗德豪斯先生看来虽然是个相当有才能的新闻工作者，但他所掌握的英语只限于满足一般的写作要求。对于这种目的，他的英语知识足够了，但是，这种英语却不能用来翻译“资本论”。富有表现力的德语应该用富有表现力的英语来表达，必须使用最好的词汇，新创造的德文名词要求创造相应的新的英文名词。但是，布罗德豪斯先生一碰到这些问题，他不仅缺乏词汇，而且缺乏勇气。稍微增加一点他的有限的惯用的词汇，稍微有一点超出英文日常书刊惯用语的新东西，都使他感到可怕。于是他不敢去冒这种异端的危险，而宁愿用他以为不刺耳、但是模糊了作者原意的比较含混的用语来表达难译的德文词，或者，更坏的是，当这样的词一再出现时，他却用许多不同的词来翻译，忘记了一个术语始终都应该用一个意思相同的词来表达。²

《资本论》那铿锵有力的语言，对于海德门那样精致的耳朵来说，无异于刺耳的噪音。他对语言上的不和谐与一切高声喧哗都格外敏感，于是顺理成章地换上一套更圆润、更惯用的措辞，让马克思那些“或多或少有点模糊”的词听起来比直白、准确的译法更悦耳。于是，在《大家的英国》中，他这样写道，“资本是奉献于当下生产的过去劳动的产物；资本实为过去劳动的储蓄，专用来增加未来的储备。”³这些话落在耳朵里是什么效果？它们究竟指涉怎样的世界？对它们的“终点站”——

² ‘How Not to Translate Marx’,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6,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0, p. 336.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中文第一版，人民出版社，1965，第267页。

³ Hyndman, *England for All*, p. 65.

一耳道，又体贴到了什么程度？把**储蓄**的东西说成**奉献**的过程，在基督徒耳中，自然比马克思那种带冲击力的、残忍的、扭曲的把死的东西榨干吸空要舒服得多。在马克思笔下，资本是 *Auspumper*——一台抽水泵，执行着对工人的 *Aussaugung*，把工人榨干，把一个“发育不良、寿命短促、更替迅速”的人榨成空壳。⁴这不是什么奉献的储蓄，而是一场把人掏成真空的恐怖疏浚。海德门或许会理直气壮地反驳：毕竟“意思一样”嘛！要紧的不是选了哪几个词、哪种句式，而是范畴逻辑是否被正确理解。毕竟，他也真心诚意地鼓动读者去反对资本主义。他同马克思的分歧也许只在于：他真诚地相信，对“每个英国人”来说，目标应是实现“即将到来的政治与社会动员，而无需卷入麻烦而危险的冲突”。然而，这种策略层面的差异，无法触动批判资本的根本逻辑或其基本范畴的定义。⁵于是，这位英国版的差不多有点模糊的革命家直接对工人喊话：“你们，一切财富的创造者，且想想自己身处何地；你们，亲眼见过家园被拆、健康被毁，目睹妻小在资本暴政下渐渐憔悴的人，停下来，想一想”。⁶这段演讲是对《资本论》里最猛烈、最彻底、最充满厌恶感的那一整段“连珠炮”的意译。在那里，马克思历数资本给劳动者带来的灾难，说男工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juggernaut)”

⁴ Karl Marx, *Das Kapital*, MEGA, vol. 6, Berlin: Dietz, 1987, pp. 309, 245;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1*, trans. Ben Fowke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0, p. 380.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310页。这些明确的恐怖意象在本·福克斯的标准英文译本中被淡化了：*Auspumper* 被译为更抽象的“extractor”，而 *Aussaugung* 被译为“draining away”，这一过程似乎可以在没有任何意图或暴力的情况下发生。Marx, *Capital, Volume 1*, pp. 425, 348.

⁵ Hyndman to Marx, 25 February 1880, cited in Tsuzuki, *H.M. Hyndman and British Socialism*, pp. 33–34.

⁶ Hyndman, *England for All*, p. 63.

车轮下”。⁷马克思以触目惊心的笔触向读者呈现了这样的画面：至亲的肢体被撕扯得四分五裂，挚爱的头颅被碾压得血肉模糊。海德门却以柔和的色调，让同样的身躯只是“渐渐憔悴”，像济慈（Keats）笔下林中小仙子般悄然消散。“停下来，想一想”，他温声劝道，“且引以为戒”。在马克思笔下，那些被碾压、被榨干、被摧残、被荒废、被任意摆布、被折磨扭曲，最终沦为人类碎屑、残躯与零工的劳动者，到了海德门这里，却被文学体面的语言重新投胎成了抒情诗人，“他们此刻尚能在短暂繁荣的微光中欢欣，转眼又将被下一次停滞抛入更深的绝望”。⁸

恩格斯早就说过，“这种英语却不能用来翻译‘资本论’”，不仅是特定的意象序列或整体的表征氛围，也不仅是被我们径直称为“美学”的那些要素，就连批判本身、连同其范畴逻辑体系，都注定无法在英语中存续，除非译者能找到足够的“勇气”，去“革新日常文学中陈腐的英语表达方式”。至于那些患上“海德门耳朵”的读者，要害恰恰在于他们应当被批判所刺痛。他们的“舒适”，正是把《资本论》的意义抹糊，把它变成一剂被主观麻醉的逻辑镇静剂。被牺牲的不仅是马克思的文字功夫，连批判本身也被这些读者顺畅的呼吸、免受暴力的耳朵以及无痛走完范畴逻辑的每一步所遮蔽。海德门“有才能的”（恩格斯语）
207 那种语言，说到底是“反诗的”（anti-poetic）——它守护着自满，也阻隔着《资本论》的真理。一旦剥离了这种独有的诗性，《资本论》的真理便会在麻痹的逻辑思维中烟消云散。

如果恩格斯不认为《资本论》有其自身的诗学，或他觉得《资本论》

⁷ Marx, *Capital, Volume 1*, p. 799.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743页。

⁸ Hyndman, *England for All*, p. 64.

的诗学可以被安全地视为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过度**表现，仅仅是马克思在隐喻上的某种失控，那么恩格斯就不会真这样说了。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Comments on James Mill）中，马克思描绘了这样一种信贷形式：善良的富人会向诚实的穷人提供贷款，只因后者证明了自身的勤勉，因而值得慈善鼓励。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类型的信贷属于国民经济学的浪漫的、温情的部分，属于它的迷误、过分行为、**例外**，而不属于常规。”⁹《资本论》的诗学并非其“感伤的部分”，而是其**造成麻烦**的根源；说资本吸干了工人的血，并不是对范畴逻辑和价值形式“法则”的过度偏离，而是这一法则响亮的真理。恩格斯在其论战中所阐明的真理是，《资本论》的诗学远比任何英语“只限于满足一般的写作要求”的人所能识见的所谓意象、修辞或思想辞藻所能涵盖。《资本论》从根本上就是诗性的。它的真理不仅具有逻辑性和历史性，而且同时不可避免地也是诗性的；马克思意义上的“批判”，与所谓“政治经济学”不同，不是一种本质上平静的、仅仅在表面上点缀着图像和插画的阐释过程，这些图像和插画只是简单地帮助理解逻辑范畴所完成的实际工作。马克思意义上的批判与海德门的“轻松前行”截然相反。这是一种受阻的运动：它既带来动荡不安，又催生狂澜四起，不仅颠覆那些僵化停滞的思想，更冲击整个思维体验乃至全部生命存在。我们不断撞向无法逾越的矛盾壁垒，深陷于认知悖论的憎恶角落；但这受阻本身也构成了特殊的行进方式，在思想与逻辑中演绎生命轨迹，此时概念的推进竟与其瘫痪合而为一，而这仅仅源于

208

⁹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5, p. 215.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文第一版，人民出版社，1979，第22页。

那个简单却无限费解的真相：世界尚未改变，我们仍困于资本关系之中，在此境况下，思考本身即是瘫痪的内在根源。¹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批判本身还不是这种“**现实的运动**”；它也不是“用思辨的、观念的方式，也就是用幻想的方式解释”哲学及其“理论上的空中楼阁”的虚假运动或原地踏步；批判是一种受阻的运动，是现存状况尚未被废除的逻辑声音。¹¹根据马克思，资本本身“只能理解为运动”。《资本论》的诗学正是一种受阻的思维运动，它既不能依靠魔法或法令轻易实现于生活，又必须携着不和谐的全部压力与概念的全部力量，持续冲击当下现实的壁垒，以期把握那种具有灾难性的、**畅通无阻**的资本运动，即“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¹²

209 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是由那些“**不敢正视真理**”的人构思和发展起来的“科学”。¹³《资本论》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的真理，其代价不

¹⁰ “（贝克特）感觉，他说，‘就像有人跪着，把头靠在一堵墙上——更像是一座悬崖——然后有人对他说继续吧。’后来他又说，‘墙只需要稍微动一下，仅此而已’。” ‘Lawrence E. Harvey on Beckett, 1961–1962’, in *Beckett Remembering Remembering Beckett*, ed. James Knowlson and Elizabeth Knowlson, London: Bloomsbury, 2006, p. 137.

¹¹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5,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6, pp. 49, 52, 56.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 539、542、547 页。

¹²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2*, trans. David Fernbach,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2, p. 185; Marx, *Capital, Volume 1*, p. 254.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121 页；《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179 页。

¹³ Frederick Engels, *Outlines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 p. 436.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 77 页。

仅仅是经济上的，也不仅仅是伦理良心的危机。《资本论》的真理使生活更加难以维系。阅读这一批判并把握其真理和必然性意味着与世界为敌。这是一种对现实的批判，它在逻辑上证实了现实本质上对生活敌对的感觉，并且以巨大的压力赋予了这种感觉实质，不仅通过在范畴逻辑中表述它，而且通过将这种逻辑与另一种逻辑纠缠在一起，这种逻辑更难读懂，但对于任何一个真正被这本书搞得心烦意乱的人来说，却是不容忽视的。范畴的逻辑无处不与激情的逻辑（logic of passion）纠缠在一起。我借用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安德烈·格林（André Green）的术语，他将这种逻辑简要描述为“一体性（oneness）、二元性（duality）、三重性（trinity）、结合（conjunctions）、分裂（disjunctions）、融合（fusion）、分离（separations）”等逻辑。¹⁴这种逻辑及其半范畴性的范畴与黑格尔逻辑和概念的明显接近并非仅仅是巧合，而是一种构成性的模糊和摇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在工作日中无法得到区分，因为它们 *verschwimmen in einander*：字面意思是，当眼睛模糊时，它们像视觉感知中的物体或颜色一样，彼此相互交融。¹⁵《资本论》

¹⁴ André Green, ‘Psychoanalysis and Ordinary Modes of Thought’, *On Private Madness*, London: Karnac, 2005, p. 28. 格林在《黑格尔与弗洛伊德：一次不太可能的比较》（Hegel and Freud: Elements for an Improbable Comparison）中描述了精神分析与黑格尔哲学的共同课题，该文收录于 *The Work of the Negativ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99, 26-49.

¹⁵ ‘Mehrarbeit und nothwendige Arbeit verschwimmen in einander.’ *Das Kapital*, MEGA, vol. 6, p. 243. 一如既往，在理解马克思的著作时，我们不仅需要关注论述的风格，也需要关注论点的实质：这句话在其他文学作品中可能出现的地方，以及马克思可能期望它在读者耳中引发的特定联想。*Verschwimmen* 对有文化的德语读者来说，是一种熟悉的、带有诗性韵味的表达，源自德国浪漫主义诗歌和散文的惯用语。《雅各布·格林与威廉·格林德语词典》（*Deutsches Wörterbuch von Jacob Grimm und Wilhelm Grimm*）中列举了来自弗里德里希·吕克特（Friedrich Rückert）、让·保罗（Jean Paul）、席勒（Schiller）和歌德（Goethe）的使用实例。马克思讽刺性地暗示，资本使人的大脑无法区分为自己而做的劳动与为资本家而做的劳动，

中的两种逻辑就是这样“交融”的。对价值形式的分析模糊成了一幅噩梦般命运虚无的幻象，其中个体工人“不过是”一个完全非人的抽象，“劳动力”，“贯穿其一生”。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人之间的“分离”这一内在特征，在分析中逐渐模糊成一种地狱般的幻想——“点状”的人类微粒漂浮于异化的无限之中。在《大纲》的手稿中，资本被实验性地用多种谓语来描述，包括“积累的”“过去的”“客体化了的”“物化的”“积累的”和“一定的”劳动。¹⁶自由的谓语变化记录了马克思对如何命名这种价值形式，及其统治的整个事实（在最完整的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应该围绕它聚集哪些联想，它应该让人们有什么感觉，它必须以什么目的而命名。安东尼奥·奈格里将《大纲》描述为“在本质上是一个开放性的文本”，其创作时期是马克思作为作家的“完全幸福的时刻”，当时“范畴没有被压平，尚未终结”。¹⁷《资本论》是这种思辨性开放和范畴谓语自由变化的结果，是流动想象力的批判性终点。从此，只有一个谓语：资本是“死”劳动，一劳永逸。激情的逻辑诗意地压平了这些范畴——那些在《大纲》中被奈格里称作“幸福”的、凸出且可自由互换的范畴特征。对问题的各种愉悦表述实验至此终

这种状况与浪漫主义诗人的精神疲劳使那个更精致的“人心劳工”感知系统产生混沌（obnubilation）的效果如出一辙。*Verschwimmen ineinander* 的一个恰当英文对应词可以是“intermingle”或“interfuse”，这些词带有华兹华斯（Wordsworth）式的诗意。福克斯则用更平淡的“mingles together”，淡化了原文特有的浪漫主义韵味。Marx, *Capital, Volume I*, p. 346.

¹⁶ Karl Marx, *Grundrisse*, trans. Martin Nicolau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pp. 85, 86, 134, 143.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6、82页。

¹⁷ Antonio Negri,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trans. Harry Cleaver, Michael Ryan and Maurizio Viano, ed. Jim Fleming, New York: Autonomedia, 1991, p. 12. 中文版译文见[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孟丹、王巍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30页，译文有改动。

结，陷入了死胡同。

在激情的逻辑中，“一元性”并不等同于黑格尔《逻辑学》中的“统一性”(unity)，黑格尔说他创作这部作品是为了保持“心平气和的、纯粹的思维认识”。黑格尔的统一性，即“互不相容的东西的一种躁动，亦即一个运动”，对思想来说是现实的：它是思想主体的体验。¹⁸然而，一元性在《资本论》中工人被完全否定了一元性。激情逻辑中的一元性，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共融——在个体潜能的现实实现中真正得以圆满的共同性。而在当下的现实状态中，这种圆满既未被感受、也未被认识、亦未被享受。然而，对它的受阻预感仍必须在受阻的批判运动中回响，以指向那批判本身原则上无法抵达的境域。马克思将这种存在状态称为 *Trennung*，福克斯将其翻译为“分离”(separation)。工人被分离：与其他工人分离，与他的劳动产品分离，与他的未来发展分离，最终与生活本身分离。他与其他工人的唯一接触是在交换上。马克思说，工人“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占有者而存在”，他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相互关联。¹⁹这一切怎么可能是真的？毕竟实际上，工人们在工作之外一直以朋友、恋人，甚至敌人的身份交往，组建了无数团体，共享了无数活动。

在黑格尔首次出版的著作《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The Difference Between Fichte's and Schelling's System of Philosophy*)中，黑

¹⁸ G.W.F. Hegel, *The Science of Logic*, trans. and ed. George Di Giovann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2, 67. 中文版译文见[德]黑格尔，《逻辑学 I》，先刚译，人民出版社，2019，第20、70页。

¹⁹ *Capital, Volume 1*, pp. 165, 178–179, 187.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90、103–104、113页。

格尔写道：“拥有最高程度生机的总体只有把自己从最高程度的分离中重新产生出来才是可能的。”英文译文中的对立掩盖了黑格尔对极端的直接并置：原文“*in der höchsten Lebendigkeit ... aus der höchsten Trennung*”并非“最高”与“最深”的对照，而是字面意义上的“至高的、极致的生命性”与“至高的、极致的分离”。²⁰对于黑格尔而言，生命性与分离的这两个极端确实存在，但它们的现实性并非可被直接观察或假定；这种现实性必须以热情的思维去加以设想，否则根本无法真正被认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分离（*Trennung*）这一极端状态的界定，同样对思维的构想力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在那里，生命以“劳动力”的形式被封装在一整套逻辑限定之中；这些限定实际上意味着一种先验层面的不可能——工人之间在交换行为之外或之上的社会接触被彻底阻断。至于他们在此之外可能是、或可能做的任何事情，都无法以价值形式加以表达，因此在“资本关系”之内毫无意义，仿佛根本不存在。

在激情的逻辑中，一元性正是分离（*Trennung*）的极端，它不仅仅是被对立着、被保持在命题性不相容的运动的不安中，而是被彻底抹除于未来之中。唯有彻底摧毁雇佣劳动与资本，这种抹除才有可能实现；而在当下，每一次被阻断的通向这一终点的前进，都必须在概念之中回响为一种特定的痛苦，那是被取消的预感与无处可去的分离之痛。分离必须在范畴中被如此表达：唯有在激情的逻辑中，它才能被理解为一种淫秽的不可能与痛苦。你从未真正触碰过他人，你们只是作为劳动力在

²⁰ G.W.F. Hege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ichte's and Schelling's System of Philosophy*, trans. H.S. Harris and Walter Cerf, Albany NY: SUNY Press, 1977, p. 91; G.W.F. Hegel, *Werke*, 2,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6, pp. 21–22. 中文版译文见[德]黑格尔，《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王志宏译，东方出版中心，2024，第21页。

交换瞬间短暂相交；而即使接触发生，在唯一具有意义的逻辑中，那一刻的生命也失去了意义。然而，这种被逐出他人接触的状态，并不能被简化为欲望问题，也不是主体的某种可有可无的能力——那种可以与批判逻辑相分离或外加其上的能力。正是各种自我言说方式的缠绕与模糊，每一种都无法无损地被化约为另一种逻辑，生成了批判的极致激情，也正是它的诗性所在。“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²¹

试图把握《资本论》对于“活着”这一事实所意味着的一切，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抵抗——一种认知的、想象的、诗性的、幻想的、欲望的、焦虑的抵抗。这意味着要经受新的痛苦与新的喧嚣，也意味着要学会把这种痛苦当作真理与知识本身来理解。那种由范畴逻辑揭示出来的统治结构，确实会令人感到疼痛。所谓揭示，在这里并不是让事物变得更清晰从而更可忍受，而是让它们变得更难以忍受、更无法承受、更彻底：事情在被解释之后，并不会变得更轻松，反而会让人瘫痪。阿多诺曾写道，一切真理的条件在于让苦难变得雄辩；而《资本论》同样深受这一根本上是诗性的命令所塑造。²²这种使生命难以为继的逻辑阐明，正是《资本论》仍然必须完成的工作——它在我们都将死去的这个世界中的生动任务。那些真正希望活出马克思所梦想的生活、希望一个“以个体的普遍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的世界，而非强制性的愚化、大众贫困、以及将生产活动系统性地转化为无聊与折磨的世界的读者们——

²¹ 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 p. 337.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页。

²²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B. Ashton, New York: Continuum, 2005, pp. 17–18.

他们无法回避、也不能以学院化思辨的灰尘与多余的理论修辞来掩盖《资本论》批判所向头脑钻入的那种赤裸恐怖。聆听其真理的前提，首先就是遵循这一条在马克思思想中无处不在的命令：不要掩盖现实的暴力与恐怖。《资本论》的真理是痛苦的，而阅读它，也必须让人感到痛苦。

这归根结底是一个关于诗学的问题。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多么迅速多么深刻地摧残了人民的生命根源”。²³《资本论》让这种被夺取的力量的瘫痪、那根本的窒息，在逻辑上高度活跃的概念中回响。范畴的逻辑是一种显性的逻辑，它揭示并界定了在资本支配下，“以个体的普遍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被阻断并变得不可能的物质与社会界限。当我们理解“劳动力”、“剩余价值”、“工资形式”、“生活资料”等范畴的意义时，我们便理解了个体为何不自由、为何无法发展。但与这种显性的逻辑交织在一起、时而模糊、时而割裂它的，是另一种逻辑——激情的逻辑。这是一种隐性的、诗性且癫狂的逻辑，是那种“点状”生命的逻辑——支离破碎、扭曲变形、漂流于无限的价值增殖过程之中——这种无限本身正是对人类主体那“普遍发展”的自然潜能的怪诞讽刺。²⁴第二种逻辑并非用来明确说明社会与物质上发展的障碍，而是用来让被阻滞、被麻痹的生命的真理发出回响。这种逻辑的激情，是一种痛苦与乐观的强烈混合体。跟随范畴与范畴之间的推演，去理解生命普遍发展的阻塞，并让这种认知真正沉入心底、展现其不可逃

²³ *Capital, Volume I*, p. 380. 福克斯版译文为：‘capitalist production has seized the vital forces of the people at their very roots.’原文为‘die 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 ... die Volkskraft an der Lebenswurzel ergriffen hat.’ Marx, *MEGA*, vol. 6, p. 272.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311页。

²⁴ 关于“如同尘点般漂浮于无穷之中”的论述，参见 Keston Sutherland, ‘Infinite Exhaustion’, *Brittle Land*, ed. Rachel O’Reilly, Amsterdam: Roma, 2016.

避的真相——这是极其痛苦的。那是永远无法真正地活着，却又不断挣扎着想要活的痛苦；是那种（借用黑格尔的话）“无论如何必须**存在着**的东西，而不是永远只是一个任务”的普遍发展的生命的痛苦。然而，

《资本论》令人无法承受地表明，这样的生命并不**存在**，而它依然是此刻、始终、亟需完成的任务。²⁵但这种逻辑的痛苦，同时也是它的乐观之处。与资本共生的痛苦，总是指向自身之外——指向那种阻碍的爆裂、当下不可能性的排拒、以及生命的彻底扩展。这种对不可能的排拒，必须被真实地体验。马克思在《大纲》中写道：“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珂德的荒唐行为（*wären alle Sprengversuche Donquichoterie*）”。²⁶那么，当我们通过批判的力量，真的找到了这些被掩藏的条件时，那会是什么样的体验？那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它在我们耳中，又会响起怎样的声音？

215

“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深刻地攫取了人民的生命根源。”对资本的批判，其诗学必须与这种攫取一样剧烈——它必须深入到同样的深度，伸展到同样的广度，触及一切，在主体的每一次麻痹之中探测到其潜在的爆炸，捕捉每一个灾难的信号，并找到一种方式，使范畴的逻辑本身都

²⁵ G.W.F. Hegel,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 A.V. Mill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68. 中文版译文见[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人民出版社，2013，第373页。关于“痛苦”，参见 *Hegel's Philosophy of Mind*, trans. William Walla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 pp. 15-16: “属于外部自然的东西都由于矛盾而毁灭；例如，如果赋予黄金以一种特殊的不同于它所有的比重，它作为黄金就必然消失。可是，精神却有力量在矛盾中，因而在痛苦中（既超越邪恶也超越祸害）保持自己。”中文版译文见[德]黑格尔，《哲学科学百科全书 III 精神哲学》，杨祖陶译，人民出版社，2015，第18页。

²⁶ Marx, *Grundrisse*, pp. 159, 77.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09页。

能回响起那被摧毁的生命的痛苦，那被抛掷于无尽暴力荒原中的生命。这种深入一切、在处处发现被碾碎的生命屠场、并将逻辑与疯狂、悖论交织在一起，以指认从资本所造就的世界中爆裂而出的潜能，这正是《资本论》的诗学：它与被麻痹的思想、被阻塞的生命共鸣，并与它们未来必然的爆发产生回响。回响——正如马克思在《大纲》中所写：“现在完全有可能只有通过极端的不协调，才能达到协调”。²⁷

恩格斯在 1886 年英文版《资本论》序言中写道：“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²⁸马克思正是完成了这场革命。而海德门将那种充满痛苦与不和谐的批判性思维柔化为“日常文学的传统英语”的倾向，本质上是一种反革命行为，是在地狱中用委婉语做交易。但在恩格斯看来，比这种对单词的丑陋“改良”更糟糕的，是这种改良所依赖的自由。这种表达的自由几乎构成了一种反革命的方法论，一种反诗学。面对《资本论》中那些复合名词或刺耳的新造词，这些词潜藏着或预示着概念的力量，亟待被巧妙地界定与强化，海德门在翻译时“当这样的词一再出现时，他却用许多不同的词来翻译，忘记了一个术语始终都应该用一个意思相同的词来表达”。对恩格斯而言，这完全是一种背叛，是对批判的掩盖，是对其诗性力量的中和——这种诗性力量正是为了让范畴的逻辑所放大的生命的不可承受性得以被准确地表现。而讽刺的是，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所有英文版《资本论》译本，包括由恩格斯本人监修的那一版，也都未能忠实于他所宣称的这一首要原则。

²⁷ 同上，p. 148. 中文版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 97 页。

²⁸ Marx, *Capital, Volume 1*, p. 111. 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32 页。

《资本论》中许多潜在或隐含的概念，在英文译本中顶多只能若隐若现地被察觉。当马克思重复同一个词（通常是他特意创造的新词，用来捕捉一个被扭曲的思想真相或糟糕事实，这些在日常语言中尚未被处理，而传统文学体面的语言又千方百计地去掩盖和琐碎化），通过重复，这个词本应开始获得至少看起来像是、或能承诺的明确概念轮廓时，217 他的英文译者往往在不同部分以各种方式意译这个词。实际上，他们不仅遮蔽了单个词的潜在、隐含或已明确的概念轮廓，同时也消解了该词伤人之力，并拆解或软化了那种逻辑的紧缚——这种逻辑通过词语的扼杀作用来表现对生命的压迫。例如，马克思的新造词 *Wertgegenständlichkeit*，字面意思是“价值对象性”，在企鹅出版社的标准英文版中，本·福克斯先翻译为“the objectivity of commodities as values”，接着又译为“objective character as values”，然后是“objectivity as a value”，再后是“objectivity of the products of labour as values”。这些意译大致意思相近，但显然并不是单一概念的重复，也不是单一紧缚的强化；它们并未像原词那样，以其粗糙的技术术语身份，同时作为对技术术语的讽刺，在耳边反复敲打或低沉回响；也没有明显地被卷入马克思为德语读者布下的横向词汇结构网中，使读者被不可抗拒的联想之网捕捉，比如在《商品》一章的一页篇幅内，他用一连串明显有内在关联的新词洪流填满范畴逻辑，使原本刺耳的海德门之耳晕旋：*Wertgegenständlichkeit* 引出 *Wertding*（价值物）、*Wertspiegel*（价值镜）、*Wertkörper*（价值体）、*Wertausdruck*（价值表现）、*Wertform*（价值形式）、*Wertgröße*（价值量）。这些荒诞词语被困在不完整或讽刺化概念化的阻塞行为中，生成新的词汇场，并形成逻辑复杂的拼贴，这正是《资本论》诗学运动的核心部分。概念的疯狂扩展不仅——如同病毒式爆发——

表达出一种自发的、半讽刺化的范畴逻辑，使“价值物”的“价值表现”可以突然在“价值镜”中被读出；这种扩展同时也是窒息的、令人厌恶的、疯狂的，就像在暴风雪中拼命想用针线编出一条路逃生，却被一堆乱七八糟、奇形怪状的东西纠缠住，怎么也脱不开身。这也是关于“价值对象性”的真理，而不仅仅是它的呈现风格或修辞。*Wertgegenständlichkeit* 是对象在无对象关系下的不可抗拒逻辑制度，或者换句话说，是你作为一个价值物，在价值镜中瞪视自身，并以抽象的价值表现者的扭曲姿态喊出愤怒的价值表达。存在于资本关系中，就是以价值对象的形式存在——作为一个价值物，拥有通过价值表现呈现的价值身体，凝视着价值镜中的自己，否则根本不存在。

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恩格斯那看似极其严肃的要求——《资本论》中的技术术语必须“始终用同一个对应词翻译”，以及他坚信“有力的英语”、“语言的最佳资源”和“新造的英语术语”才行，同时还要认真对待一个不可避免的含义：《资本论》既是批判，也是诗学，而诗学的力量正是被纠缠在不可分割却无法解决的逻辑之网中的批判力量，那么，对于马克思这部伟大著作的未来影响、命运以及它的生命任务而言，准确把握其诗学就显得绝对必要。这意味着：必须让其全部逻辑力量回响，既包括范畴的逻辑，也包括激情的逻辑；必须将其概念化与解构的能量推至不和谐的极致；必须让它对资本统治下生命的无法忍受与无限屈辱的阐明，在此刻、每一瞬间，都切实地让人感到难以承受；无论付出何种努力，无论使用何种语言，不仅要让范畴能够被理解，更要足够压迫读者的体验，使他们在理解这些范畴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它们在社会、心理与个体层面上的真实，并让这种真实从冷冰冰、残酷逻辑一致性的表面内容中迸发出来。

11. 货币的回流：《绝命毒师》中的非法积累与辖域化

约翰·克拉尼亚斯卡斯（John Kraniauskas）

他们谁也抓不到他

比死亡还让人害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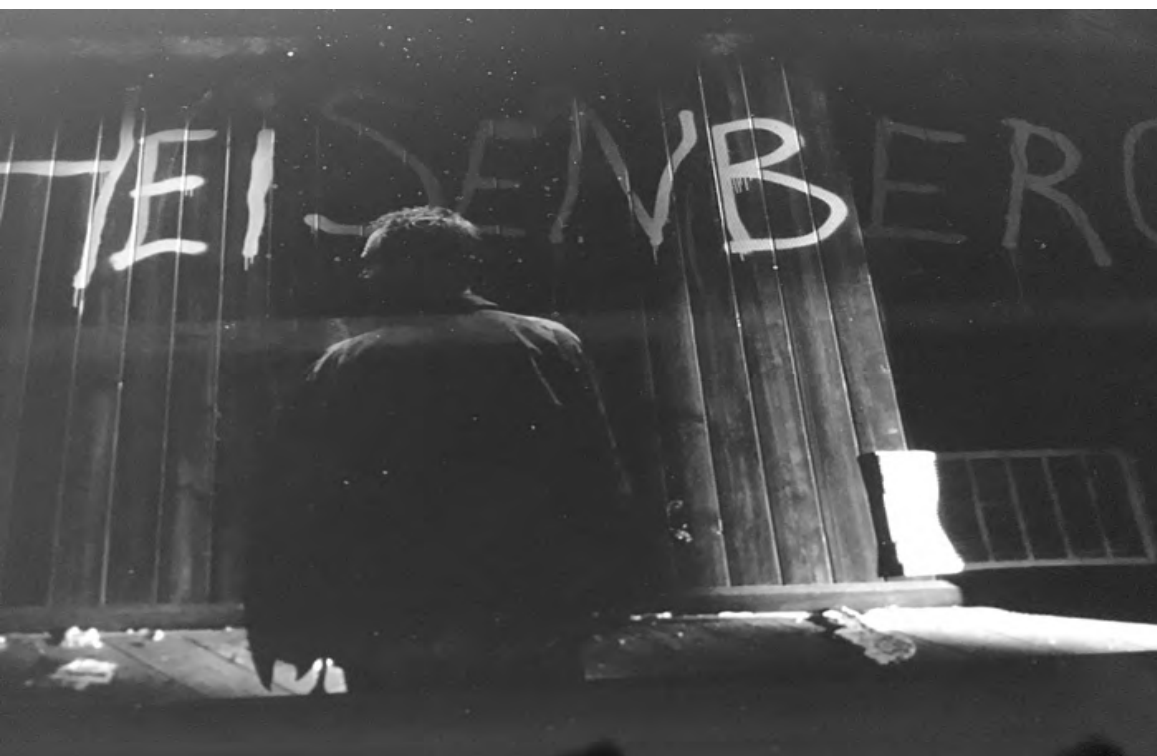
一提到他的名字

他们就吓得发抖。

——《山中的头目》，洛斯·图卡内斯·德·蒂华纳

当代以金融为驱动的全球资本主义，其历史现实在美国核心地区的日常社会经验中，是如何被体验、想象与再现的？在这一日益被掏空的西方资本主义心脏地带，既多孔又僵化的腹地，发生了什么？而新的文化工业生产形式，例如当代“后电视时代的电视”（post-television television）叙事诗学，又如何向其消费主体表征这一资本主义的当下？它们讲述了怎样关于资本寄生式自我发展的故事与幻想？又展示了哪些它们自身无法意识到的事物？

文斯·吉利根（Vince Gilligan）创作的电视/DVD 系列剧《绝命毒师》（*Breaking Bad*, AMC, 2008–2013），讲述了一位化学教师沃尔特·怀特（Walter White）将自己改造为毒枭的故事（他的名字“Walt”暗示了其作为一种国家寓言的性质）。该剧在家庭与家务领域——社会再生产



的主要生命政治场域，以及怀特试图为之挽救的未来之中，打开了一个黑洞。¹《绝命毒师》因此描绘了一条走向坏的“逃逸线”(line of flight)，这也是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在《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 1980)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这令他们在政治上倍感绝望，即“战争机器”(war machines)要么被国家形态俘获，要么完全脱离一切主体性与政治锚定。沃尔特·怀特的自由追求，正如他们所言，冒着“放弃自身创造性潜能，堕入死亡之线，或被彻底

¹ 《绝命毒师》唤起了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形象，他是《草叶集》(*Leaves of Grass*, 1855)的作者，这部作品塑造了美国作为一个民族的形象。而正是通过惠特曼及其作品，沃尔特·怀特的犯罪身份最终被他的警察姐夫汉克发现，从而凸显了家庭及其象征秩序在该剧中的戏剧性重要性。由此，家庭、国家与政府都通过法律及其越界行为被呈现出来。

转化为纯粹毁灭之线”的风险。²

此外，正如沃尔特·怀特家被毁的照片（图1）所暗示的那样，这个家庭叙事中的黑洞也涉及到了电视图像本身的“灾难性”瞬间。这是一个不再作为客厅的客厅镜头。它以探索性的景深呈现给观众，但同时被剥夺了场景调度（*mise en scène*）和内部蒙太奇，这些可能会填充它——“给它空间”，创造出三维性和居住感的幻象，因为它被涂黑并涂鸦上了沃尔特·怀特的另一个、非法的名字：海森堡（Heisenberg）。³从一个角度看，这种对家的毁灭是对毒品和犯罪的警告：一种要求“清醒”的道德主义呼吁。⁴然而，我将在这里探讨的另一种观点是，它也暗示了《绝命毒师》作为毒品积累史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局限，这个黑洞戏剧性地记录了，定义了其叙事弧线，但它却无法完全理解。

221

第一次作为……闹剧

《绝命毒师》第一季第一集以一条被丢弃的裤子的合成图像开始，裤子在空中飞舞，背景是广阔的蓝天、沙漠景观和逐渐接近的警笛声。这立即唤起了三种经典电影行业的类型——喜剧、西部片和犯罪片，这种电影混合定义了整个系列。它以喜剧闹剧开始，处在一个新西部的环境中（图2）。这位疯狂的中年男子是谁，他穿着内裤出现在视野中，

²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Brian Massumi, London: Athlone Press, 1988, pp. 506, 508. 在白人面孔的背景下，德勒兹与加塔利开始展开他们对黑洞的论述，而这些黑洞随后又开始困扰他们文本中的政治。

³ 参见 André Bazin, 'The Evolution of the Language of Cinema', in *What is Cinema?*, trans. Hugh Gra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p. 23-40.

⁴ 参见 Herman Herlinghaus, *Narcoepics: A Global Aesthetics of Sobriety*,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2013.



挥舞着枪，围绕他的露营车，兼作移动毒品工厂，笨拙地为妻子和儿子在手机上录制最后的遗言，并笨拙地建造一座小纪念碑，以纪念他去世并进入新墨西哥州历史，而警察接近但随后又驶向别处？我们即将发现。因为《绝命毒师》是一部犯罪小说，当然还有另一个开始。在片头字幕之后，时间回溯，我们发现它讲述的历史实际上首先是一个悲剧。尽管整个过程中不断出现闹剧时刻，但它将在其五季、六十二集和大约五十小时的“复杂电视”中保持如此。《绝命毒师》的开场闹剧，我们还不知道这是犯罪闹剧，被悲剧所解释：在沃尔特·怀特五十岁生日那天，他被宣判了死刑；被诊断出患有肺癌，只剩下两年的生命。而且他需要钱。

这种从故事中间开始的回溯循环（*in medias res*），为该剧提供了其

时间和叙事结构，它以一种循环的方式不断赶上或恢复自己——沃尔特的未来（死亡）已经崩溃到他的现在，使其陷入一种结结巴巴的停顿。以侦探或犯罪小说中“故事”（*histoire*）和“情节”（*discours*）之间的断裂为出发点，以便实验叙事形式，优先考虑情节构建而不是它展示和讲述的故事的编年史，并产生通过恢复发展（development through recovery）的循环叙事（第一次作为闹剧，第二次作为悲剧），《绝命毒师》的戏剧性构图描绘了沃尔特存在时间旷日持久的危机。⁵沃尔特不会恢复。在这方面，场景调度（包括延时摄影）和蒙太奇的电影程序本身被猛烈地循环到叙事和连续时间中，加速、减缓并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被毒品积累的破坏性逻辑所塑造：一种无限的拼贴式“拼凑”积累——沃尔特的逃逸线，然而，这却被捕获并过度编码，以产生其毒品资本主义的黑洞。⁶

《绝命毒师》因此表现了“危机”（它的标题告诉我们），在许多历史意义上记录了这个概念的重要性：经济、政治和医学。沃尔特曾经是一位广受认可的学者，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附近的科学研究中心工作，那是核弹的发源地，他在晶体学研究中做出了贡献，该研究获

⁵ 关于侦探小说的结构分析，参见 Tzvetan Todorov, 'The Typology of Detective Fiction', in *The Poetics of Prose*, trans. Richard Howar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7, pp. 42–52; 以及 Fredric Jameson, 'Totality as Conspiracy', *The Geopolitical Aesthetic: Cinema and the Space of the World System*,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and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92, pp. 9–84. 关于“复杂性”（complexity），参见 Jason Mittell, *Complex TV: The Poetics of Contemporary Storytelling*,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5.

⁶ 该节目将沃尔特剩下的两年生命延展到电视节目五年的现实时间（即各季）。这种积累呈现为拼接式的“被动迁移”，其与游牧的亲近程度不仅通过轨迹被命名，而且“表现”轨迹，并在开放空间中与速度或运动密不可分。这个如拼布般的拼接结构没有中心，因此是去中心化的；它将“平滑空间重新概括为条纹化空间，条纹化空间重新概括为平滑空间”。正如德勒兹与加塔利所说，它通过“频率与积累的过程”相互连接。A *Thousand Plateaus*, pp. 476–477, 485.

224 得了诺贝尔奖。然而，如今步入中年，他已经“堕落”到平庸之中——据说是因为某些未能实现的浪漫原因——当初拒绝与他研究中心的旧同事们一起创办一家成功的科技公司“灰质”（Grey Matters）（看起来这家公司甚至还是他最初的构想）。此后，他将通过利用他们的财富来掩藏并拯救自己以犯罪方式积累的财富，从而对他们实施报复。此外，他被那些最亲近他的人永久地羞辱，因为他试图通过担任高中化学老师和兼职洗车工来维持生计。当一个犯罪机会出现时，他立即抓住了它。沃尔特·怀特“变坏了”。几乎没有医疗保险来支付他的治疗费用（故事发生在2010年《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即奥巴马医改之前），并且没有经济资源来确保他家庭的未来，他做出了一个关键的决定，暂时解决了他的危机，但留下了其最终诊断：转向犯罪。⁷

很快变得非常明显，沃尔特的决定也受到愤怒和怨恨的推动，因为他的个人和职业失败不断在工作和家中被重新唤醒。我们在第一集早期就发现，当叙事返回以解释沃尔特的闹剧行为时，他的学生在工作中不尊重他，而他的姐夫汉克（当地缉毒局的工作人员，最终将追捕他并在这一过程中丧生）则在家庭中，在他儿子的眼中，篡夺了他在象征秩序中的位置。因此，沃尔特决定通过将他相当但未充分利用的非物质劳动，他的人力资本（他的知识）投入到非法生产和分销毒品（“坏”药）中，与他的前学生杰西一起，夺回他剩余的生活。通过这样做，他成为了杰出的冰毒制造商，这种毒品神话在新旧墨西哥都广为人知，他的化名“海森堡”——他那标志性的产品，正如一个缩影，映照着笼罩整部

⁷ 沃尔特在洗车店晕倒后被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时说：“我的保险也不算最好”，并坚持认为他们干脆把他丢在街上算了。关于“危机”（crisis），参见 Reinhart Koselleck, ‘Crisi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67, no. 2 (April 2006), pp. 357–400.

作品影像与行动的那片蓝天。⁸这种神话最终将是沃尔特和他的家庭字面意义上的毁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他接近生命的尽头时，他回到了家，发现它已经成为被遗弃、烧毁了的废墟，其墙壁上喷绘着他的非法名字。仿佛它如今属于某种完全“他者”的空间结构——一个暴力地在家中显现出来的毒品领地，如同吞噬一切的黑洞。

在《绝命毒师》中，随着资本变得“虚拟化”、转化为银行资本，未来投资由此获得了资本所保证的“期货”特性——沃尔特需要一个“私人”的替代银行来存放他的现金，这一需求贯穿整部剧，并最终成为他强迫“灰质”公司昔日同事们所必须为他提供的东西。这种被资本虚拟化的未来投资最终反噬当下，将其彻底摧毁：毒品积累的引力场吸入了沃尔特，也将他的儿子小沃尔特与妻子斯凯勒一同卷入其中。斯凯勒曾是一名短篇小说作家，最终却把她的“虚构性”才能用在了犯罪会计上。

从播出时间来看，《绝命毒师》以当代金融资本危机的经验为框架——这一危机通过住房与保险体系体现出来，构成并戏剧化了我们今日所谓的“生命资本主义危机”（bio-capitalist crisis）（即社会再生产的危机），而随后为支撑全球银行体系而推行的紧缩政策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危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一方面，以及同年美国从布什政府向奥巴马政府的政治过渡，另一方面，都被《绝命毒师》文本性地内化、重新配置为电影化的素材，并在紧缩时代被叙述为一场医疗保险层面的生命政治再生产危机。

⁸ 关于天空作为运动影像的“包容者”（encompasser），如约翰·福特（John Ford）的电影所示，参见 Gilles Deleuze, *Cinema 1: The Movement Image*,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London: Athlone Press, 1986, p. 151.

226 大卫·西蒙（David Simon）的《火线》（*The Wire*）在叙事上映照了布什时代，以及后 911 时期从“禁毒战争”到“反恐战争”的转变——背景是美国北部后工业城市巴尔的摩。而文斯·吉利根的《绝命毒师》紧随其后，与奥巴马上台的时刻相契合，并在美国南部近边境城市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追踪同样的战争，只不过在新的语境中，在那里，一种新的辖域形态正在出现。就此意义上说，2016 年特朗普的当选（其代表着建筑业、娱乐业与新型资源资本），以公开反奥巴马的姿态，又一次使《绝命毒师》重新具有了当代性；当然，其衍生剧《风骚律师》（*Better Call Saul*, Netflix, 2015-）同样延续了这一点。然而，《绝命毒师》并不是一部社会现实主义的长篇电视剧作品。它拒绝像《火线》那样，凭借多层叙事结构（polydiegetic ambition）不断扩展叙事范围，将更多社会层面纳入视野，直至在“金融”这一层面触及再现的极限。相反，它从当代生命-金融资本的经验出发，将注意力（以及观众的目光）集中在三点上：其一，是沃尔特那荒诞悲剧的故事；其二，如同大量美国电视剧与文学作品（包括犯罪小说）一样，试图以失败告终地支撑“家庭”这一奠基性制度；其三，是新墨西哥州特有的边境语境。随着危机的加深，沃尔特背离了法的秩序，成为一个不法者。在《绝命毒师》中，当代非物质劳动的教育与塑造（*Bildung*）过程，被反过来用于对抗教育与教化制度自身——那些承载“进步”与“德性”叙事的传统机构。这正是使得该剧对众多观众如此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它在这种对抗中塑造出一个问题性的英雄形象：他的新“探索/研究”[(re)search]将他彻底带离了轨道。⁹

⁹ 在《千高原》中，德勒兹与加塔利将后工业资本主义对劳动的吸纳称为“机器化奴役”（machinic enslavement）——其中电视被视为关键技术。我在此也借用

洗钱

然而，《绝命毒师》与《火线》确实共享着一个共同点——对非法毒品商业的政治经济学持续而强烈的关注，同时也聚焦于其生产过程（此处即甲基苯丙胺的制造）。沃尔特的晶体学背景对于他那标志性的产品至关重要；而他的竞争者——主要是“加斯”·弗林（‘Gus’ Fring）227（他在一家德国跨国企业的企业伞形结构下运作，并与一个笼统意义上的“墨西哥”贩毒集团合作，最终又与一个凶残的新纳粹帮派结盟，而沃尔特在死前将其全部消灭）都拼命想要控制这一产品，并除掉“海森堡”。其中的关键经济逻辑，马克思已在《资本论》中以抽象的方式提出，而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则在其研究全球经济霸权转移的长时段著作《漫长的二十世纪》（*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中重新加以阐释，这部著作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中资本主义东方的崛起。两者都可用两个简单的公式来表达：G-W-G’（“资本的一般公式”）及马克思所谓的“简化形式”G-G’。¹⁰这两个公式描述了资本扩张性再生产（即积累）的不同阶段——在此，毒品积累的过程被一种原国家式的（proto-statist）暴力所支撑，使得毒品积累呈现出永久的“所谓原始积累”的社会形式。¹¹在G-W-G’形式中，商品，例如毒品，被

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的《小说理论》（*Theory of the Novel*），特别是其被整合到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现实主义的矛盾》（*The Antinomies of Re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3）中提出的新历史主义现实主义论述中。

¹⁰ 参见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1: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Ben Fowke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6, pp. 247–280; 以及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4.

¹¹ 特别参见 Marx, *Capital, Volume 1*, pp. 873–940.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制造、购买（G-W）并以非法方式出售（W-G'）以获取利润。马克思对商品交换的分析的关键在于：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揭示了货币作为资本的起源，即在价值增殖过程中，换言之，在“货币的回流”（reflux of money）的过程中，通过“销售”这一中介（例如甲基苯丙胺的“交换价值”）而实现。¹²至少在第一阶段是如此。不过，这一积累逻辑在阿里吉对马克思洞见的继承与发展中，还伴随着其重要的简化（即金融化）形式：G-G'。在此形式中，毒品销售中以暴力方式实现的利润（G），如同一种魔术般生息“自动的物神”（automatic fetish），通过众所周知的银行与对“合法”企业的投资过程，使货币增殖为更多的货币（G'）。

228 这也正是沃尔特最终强迫他昔日的同事承担的角色——他们成为他“虚拟的”代理银行，将他积累的资金储存起来，为他的妻子和儿子保留作为他生前所缺乏的保险，否则便要以死相威胁——即便家庭早已被摧毁。正如货币在流通中（例如以信贷形式）所体现的那样，虚拟资本（积累）的时间性总是面向未来。¹³而沃尔特则尤其面向一个他终究

2004，第 871 页。事实上，阿里吉坚持认为“解构”始终伴随着生产以及 G-W-G' 和 G-G' 的循环过程。

¹²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1*, pp. 250–251.

¹³ 同上，p. 257. 在这一章中，马克思讨论的是发生在“流通领域”的资本积累——劳动仍然停留在“背后”中：“剩余价值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因此，在剩余价值的形成上，必然有某种在流通中看不到的情况发生在流通的背后”。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192 页。在《绝命毒师》中，这个“背景”——毒品生产（以及劳动）的领域——不断被凸显出来；毒品分销、“销售”等劳动同样被突出展现，从而突出“货币的回流”过程。就此意义而言，阿里吉似乎在其叙述中偏重“商业”资本。关于马克思对这些关于生息资本作为“自动的物神”与“虚拟”资本思想的发展，参见 *Capital, Volume 3*, trans. David Fernbach,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1, pp. 515–524, 594–606: “因此，和资本的现实增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中文版译文见《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 529 页。另参见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6: “如果这种信用货币被贷出作为资本，那么它就成为虚拟资本”（p. 267）。

无法拥有的未来：他的货币资本注定要比他活得更久——的确，它也将比我们所有人都更长久地存在。若说《火线》聚焦于商业型积累形式与金融化积累形式（即一般公式与简化公式）之间的竞争性张力，那么《绝命毒师》则聚焦于这两种积累形式的经验性体现（以及毒品生产本身），某种意义上，它暗示了一个“后阿里吉式”（post-Arrighian）的金融资本世界。¹⁴

当然，《绝命毒师》并不需要直接分析资本积累的抽象细节，尽管那样的分析或许有助于理解它。正如我先前所指出的，这部剧讲述的是沃尔特·怀特如何**体验** 2008 年金融危机的“生命政治”维度的故事。从这一视角来看，该剧确实将金融化，以及更广泛的货币经验，融入了其犯罪叙事（沃尔特的故事）之中，并通过其视觉隐喻建构出自身的“现实”。在这方面，“洗钱”这一主题尤为关键：它戏剧化地呈现了金融简化（abridgement）、创造性会计与银行运作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沃尔特妻子斯凯勒那种“虚构性”的会计才能最终发挥了重要作用。剧集通过沃尔特犯罪生活这两个维度间的冲突来呈现这一主题：一方面，是他那在自我生产其独特品牌的冰毒中寻求自由与自主的矛盾欲望；另一方面，则是他必须依赖银行与/或金融（投资）体系来实现并管理其非法积累的财富的需求。洗钱的艰难工作突出了这样一种核心活动，即金融化所依赖的“简化”过程，它通过抹除商品交换的时刻（即 G-W-G' 中的中介环节）来调节积累，使得这一资本循环中至关重要但被定为非法的中间项商品本身得以被“洗净”，包括在其“销售”过程中所伴

229

¹⁴ 关于《火线》的这一方面，参见 John Kraniuskas, 'Elasticity of Demand: Reflections on *The Wire*', *Radical Philosophy* 154 (March/April 2009), pp. 25-34; www.radicalphilosophyarchive.com/article/elasticity-of-demand.

随的暴力。¹⁵因此，洗钱成为组织《绝命毒师》叙事的一个关键母题：首先，在沃尔特的蓝色结晶冰毒进入工业化生产阶段后，其生产场所被隐藏在加斯·弗林的工业洗衣厂之下；其次，当沃尔特试图摆脱对弗林的隶属（并最终刺杀他）时，这一母题又再次显现。随后我们看到，他试图通过自己曾经打工、如今专为洗钱而购买的洗车行来“清洗”非法所得，但最终未能成功，在此之后，他被迫让昔日同事成为他的银行家。

沃尔特那关键而又犯罪性的决定，涉及到他试图将自己的脑力劳动从被剥削与屈辱性的从属状态中“解放”出来（在其中，他无法真正行使自己的思维），这一从属关系正属于联邦国家对教育（*Bildung*）的再生产逻辑中。然而，正如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Negative Dialectics*）中对康德抽象“自由意志”概念的批判所揭示的那样，沃尔特越是挣扎着追求自主性，便越发现自己依赖并臣属于非法市场及商品化的“看不见的手”。事实上，这种依附甚至具体化到某种视觉层面：他时而被描绘成直接面对着货币这一客体——那些已实现的利润，而货币则被其

230

¹⁵ 但这一点又会重新出现，例如在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编剧的《黑金杀机》中，在伦敦金融区以一种致命的方式返回，以“毒品绞杀器”（narco-bolito）的拜物教形式出现。

3



金融的“拜物教”公理所过度编码，并“自动地”转化为资本（G-G’），奇迹般地成为主体。在这种货币-资本拜物的面前，沃尔特自己也变成了另一种“物”，被物化为一个带着玩世不恭与杀戮倾向的存在（他清楚自己在作恶），陷入了阿多诺所称的拜物教式“物性”（thingness）的社会逻辑中（参见图3）。¹⁶这种“物性”构成了《绝命毒师》中金融化戏剧展开的另一面：沃尔特究竟该如何存放他的非法利润？它也在整部剧的视觉构成中回响不绝，作为家庭内部的黑洞，突显出沃尔特真正的悲剧性与愈加滑稽的他律性（heteronomy）。

¹⁶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B. Ashton, London: Routledge, 1990, pp. 211–299（论“自由”：其中康德被证明对其自身命题的社会内容视而不见），以及 pp. 183–194（论“对象”与“物”之间的差异）。



231 这种“物性”的显现尤其体现在电影摄影的层面上：主观镜头（主体对客体）有时会被突然反转，或完全被剥夺主体性；角色——尤其是沃尔特——被从物的视角观看，而此时，《绝命毒师》的叙事本身似乎也由这些物组织并聚焦。例如，观众常常从沃尔特装钱的包内看到他的画面，而那笔钱，因为拒绝流动性（liquidity），在剧集最后几季中成为他背负的重担，这一视角暗示着货币在影片文本中扮演着某种准超验的（quasi-transcendental）第三人称叙述者的角色，仿佛是整部作品的无形组织者。¹⁷类似的还有从弗林冰毒工厂储罐内拍摄的镜头，我们看到

¹⁷ 关于叙事的“编排”（orchestration），参见 Mikhail M. Bakhtin, *The Dialogical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trans.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Austin TX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5



沃尔特与杰西往其中倒入蓝色化学混合液的场景。¹⁸

最荒诞的镜头与场景，是那些通过一只粉红泰迪熊的假眼来聚焦、或围绕其展开的画面，这只假眼在一架飞机半空爆炸后落入沃尔特的游泳池（图4），而沃尔特对此灾难负有间接责任——暗示着他的罪咎。

随后，这只假眼“旅行”般地出现，从沃尔特床底下窥视他（图5），最终落入两名寻求杀死海森堡的毒品杀手手中。最终，在《绝命毒师》结局前的一幕中，摄影机透过一张桌子和边境地区的地图观看，使得他们

232

¹⁸ 在《绝命毒师》中，甲基苯丙胺生产或“烹制”的体制呈现出不同阶段：手工艺阶段（在移动房中）；工业或福特制阶段（在弗林的工厂中，沃尔特和杰西被弗林的组织规模与机器的巨大所压倒）；弹性或后福特制阶段（生产随着房屋在熏蒸期间被腾空而在不同房屋之间转换；这是沃尔特与一支新纳粹熏蒸帮派短暂联盟的开端）。



行动剧场的领土以某种方式印刻在沃尔特、杰西以及背叛者莉迪亚的脸和身体上——沃尔特之后用蓖麻毒杀了她；而这毒药与金钱和假眼一样，也作为沃尔特的化学产物之一在叙事中循环（图 6）。这种摄影和场景调度暗示了拉康电影分析中“缝合”（*suture*）概念在运用上的一种可能转向。传统上，“缝合”用于指涉观众的凝视是如何被“缝合”进电影叙事中作为一个（替代性的）主体——即被安置在一个作为叙事内对话者而事实上不可能的位置，那是由摄影机所占据的位置，以制造主体认同的幻觉。但在《绝命毒师》关于金融化与洗钱的叙事中，这种主体幻觉被彻底转化。在这里，观众被邀请——或被缝合为替代者——去占据那个不可能且虚幻的位置：即那件被赋予拜物教性质、如今成为“主体”的“物”，它直面并支配着已变成物的主体。这便是沃尔特最

233

终被“货币的回流”噎住的戏剧。¹⁹

按照阿里吉的说法，“两个时代或阶段”，即 G-W-G' 与 G-G'，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性资本积累循环”。²⁰阿里吉以这一结构来划分资本主义发展史，经过一系列接续的帝国霸主（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尤其是从一个霸主向另一霸主的转换，而金融化的时刻正监督着这一过渡。在这一叙述中，继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以国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史之后，金融化代表着某一时代的“秋天”，以及某一霸主（他对传统“帝国”一词的替代）的衰落；在其被新霸主取代之时，生产、破坏与积累的循环便在另一片区域重新开始。²¹这一循环逻辑也可以被应用到哥伦比亚与墨西哥贩毒集团的竞争关系上。234

然而，在《绝命毒师》，以及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的《黑金杀机》（*The Counsellor*, 2013）、丹尼斯·维伦纽瓦（Denis Villeneuve）的《边境杀手》（*Sicario*, 2015）等电影中，洗钱的现实困难被置于主题位置，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种不同的情形：金融不再仅代表一个“秋天”，而是全部四季，冬、夏与春一应俱全。金融变得戏剧性、暴力地自主，自我吸纳、吞并着所有其他形式，定义自身的循环。因此，《绝命毒师》呈现的，是某种金融化资本新“帝国”的地下毒品腹地，其所有阶段——种植、商品交换与分销链条，以及实现洗净剩余价值所依赖的金融时

¹⁹ 《绝命毒师》对金融自主化（以及对“现金”消失的某种可能预示）的戏剧化呈现，可能是其相较《火线》的主要批判性进步。关于电影理论中的“缝合”（suture）概念，参见 Stephen Heath, *Questions of Cinema*, London: Macmillan, 1981, pp. 76–112.

²⁰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p. 6.

²¹ 阿里吉在《漫长的二十世纪》中引用布罗代尔如下：“每一次此类的资本主义发展，一旦进入金融扩张阶段，在某种意义上似乎都宣告了其成熟：这是‘秋天’的征兆”（p. 6）。



刻——都以生产、破坏与积累的循环为特征。暴力与奇观、生产与破坏在日益全球化的尺度上相互构成，这是沃尔特作为海森堡短暂参与其中的非法毒品积累逻辑的本质，也构成了其对“一种整全生活方式”的辖域化：即毒品积累的毒品文化（narco-culture）。这种日常生活的毒品文化，正是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ño）的小说《2666》中揭示的公共秘密，其核心是华雷斯城（Ciudad Juárez）对女工人的连环杀害。

22

²² 这包括对其自有生产力的破坏，以一种“过剩人口”的暴力景观形式呈现，并在贾伊鲁斯·巴纳吉（Jairus Banaji）所称的“生产体制”（regime of production）中象征性地将其投入劳动。关于受损与遭受折磨身体的商品景观，参见 Sayak Valencia, *Gore Capitalism*, trans. John Pluecker, South Pasadena/Cambridge and London: Semiotext(e)/MIT Press, 2018.关于毒品集团对选美皇后的剥削，参见赫拉

辖域与“阿帕奇式拒绝”

235

海森堡的大名已传到了米却肯……那蓝色玩意儿早成了国际货。新墨西哥这名字如今真贴切……人们口中那个海森堡，如今掌控市场……这个贩毒集团可是讲究规矩的，从来没人能逃得出去。那家伙其实已经是个死人了，只是没人去告诉他而已。

——《黑与蓝：海森堡之歌》，锡那罗亚兄弟

正如阿里吉关于霸权周期的历史分期所揭示的，资本积累的逻辑也包含辖域化的维度：即各种地缘政治的安排，把国家及其机器——法律与军队——引入其中，通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多种历史形式来保障生产、贸易与金融。这一辖域维度，使他的工作与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中提出的战争机器、组装体（assemblages）、国家俘获与“叠句”（refrain）的根茎式分析产生了呼应。如前所述，《绝命毒师》通过沃尔特对“货币的回流”与洗钱的经验，将积累叙事化。它也呈现辖域的问题，但并未将其反思性地内部化为自己的叙事空间。尽管剧中充满戏剧性或象征性的地景与天景——例如作为“西部整体性象征”，但它们最终仍只是行动发生的“场景”。沃尔特破败家中出现

236

尔多·纳兰霍（Gerardo Naranjo）的电影《选美小姐》（*Miss Bala*, 2011）。关于全球化与暴力景观，参见唐·温斯洛（Don Winslow）的惊悚小说《恶犬之力》（*The Power of the Dog*, 2001）以及尤其是《贩毒集团》（*The Cartel*, 2015），还有罗伯托·萨维亚诺（Roberto Saviano）的《零零零》（*Zero, Zero, Zero*, 2013）——一部聚焦 20 世纪 80 年代墨西哥贩毒集团、关于毒品贸易全球化的叙述。关于博拉尼奥的《2666》，参见我的文章‘A Monument to the Unknown Worker: Roberto Bolaño’s 2666’, *Radical Philosophy*, 200, Nov/Dec, 2016, p. 37-46 www.radicalphilosophyarchive.com/article/a-monument-to-the-unknown-worker。这是本文的姊妹篇。关于“生产体制”，参见 Jairus Banaji, *Theory as History: Essays on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Exploitation*,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1。



的黑洞是这一缺失或空洞的症候，它怪异地凝视着观众。它标记着沃尔特的悲剧性存在危机，以及他那荒诞的对自由的追求，而这一切最终都被非法毒品经济的“物化”效应——金钱与洗钱的地下经济——所吞没。然而，洗钱经济具有一个辖域性的维度，这一维度不断迫切显现——虽仅以指示性的方式——但《绝命毒师》无法真正让其进入叙事经验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本中的黑洞仍是一个神秘的地平线，要求阐释：剧集知道并展现了什么？又不知道却仍展示了什么？我将此“他者的辖域”的幽灵般存在称为“阿帕奇式拒绝”（图7与图8），它以其地缘政治的历史将沃尔特拉入一个被过度编码的致命空间。

毒品的生产与销售确实为少数墨西哥贩毒集团头目（即毒品资产阶级）带来了巨额财富，但其同时也是一种大众现象，一种由小生产者

与销售者构成的非法的民众资本主义（popular capitalism），并伴随一个庞大的“骡子”式不稳定无产阶级（precariat-proletariat），某种可以说“堕落了”的巴洛克经济（baroque economy）。²³在这一意义上，它可以被视为维罗妮卡·加戈（Verónica Gago）从生命政治视角所描述的巴洛克经济的努力（*conatus*）——一种关于生命与生存策略的情感肯定。这一概念延续了玻利瓦尔·埃切维里亚（Bolívar Echeverría）对民众巴洛克“伦理”（ethos）的研究，这一伦理形态在 17 世纪拉丁美洲出现，其背景是殖民掠夺与商品化，以及殖民政权的“文明化”使命——通过在“聚居区”（reductions）与保留地对原住民的抓捕与改造，把拉丁美洲**重新塑造**为天主教欧洲。加戈将此分析延伸到当代新自由主义化地区的非正规经济。然而，与加戈分析的共同体市场不同——这些市场分布在拉巴斯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边缘地区（墨西哥的 *tianguis* 可视为其等价物）——毒品经济以其相对的游牧性与移动性为定义，生成一种“生活方式”（也是死亡方式），一种文化构造，并非“在地方中被真实生活出来”，而是沿着非法商品跨越美墨边界的“来去”历史线条展开；这一跨境流动构成了其积累的辖域。²⁴ 237

当然，毒品文化的积累也会在城镇与城市中出现——或更准确地说，是出现在城镇与城市的一些片段（作为总部与招募中心），甚至包

²³ 值得注意的是，贩毒集团从其他活动中获取的收入，例如敲诈勒索、保护费（保护服务）、移民生意以及人口贩运，很可能比其毒品贩运本身赚得还要多。

²⁴ 参见 Verónica Gago, *La razón neoliberal: economías barrocas y pragmática popular*, Buenos Aires: Tinta Limón and Traficantes de Sueños, 2015; Bolívar Echeverría, *La modernidad de lo barroco*, Mexico City: Ediciones Era, 2000.（埃切维里亚与加戈的视角涉及一种以共同体为中心、文化主义的解读，即所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例如劳动与合作）关于“在移动中的文化”（cultures ‘on the move’），参见 Tim Ingold, *Lines: A Brief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2–3.

括乡村庄园 (*haciendas*)，以及因腐败而转变或再私有化的局部国家——但这些都是从属于毒品积累战略性的、富有弹性的向量及其辖域化效应，并从属于其内部伴随的暴力的贩毒集团竞争：这种竞争围绕路线及其他路径（包括跨境地道）展开，毒品正是沿这些路径移动的。正如德勒兹和加塔利所指出，这种移动并非沿着某种发展线发生，而是横向地，从中穿过，贯穿其中，构成一种“与……”的逻辑 (logic of the AND)：一种拼接状的拼布式积累。非法的“游牧性”被资本化了。²⁵

那么，何谓辖域？尤其是这样一种暴力的、跨国的、弹性的、游牧-战略性的毒品辖域？它一端由土地与商品生产（位于绝对关键核心的 G-W-G'），另一端由对其军事行动至关重要的媒介技术与金融（G-G'）所中介？一个如今还包括虚拟维度的辖域？而它又是如何被想象与被居住的？根据德勒兹和加塔利，辖域是一种“辖域化”行动的结果，它最低限度地将行动、环境与节奏连结起来。（“行动发生在一个环境中，而节奏则位于两个环境之间”。²⁶）这是他们称之为叠句 (*ritornello*) 的时空：一种组装的行动，或行动的组装，它“编织时空”，以一种情感学 (ethology of affects) 的形式呈现，依照我们如何具体地在一个环境中居住并将其转化为辖域。²⁷这也是一种理解文化形成如何成为主体形成或情感召唤 (affective interpellation) 的方式。他们指出，居住 (inhabitation)——他们以人类婴儿的例子开篇（随后论及鸟鸣）——与被调制的声音（叠句）密切相关，这种声音同时在一个生成中的环境展开与环绕，并最终产生他们称之为 *nomos* 的东西，而 *nomos* “作为一种习俗

²⁵ Deleuze and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pp. 25, 477. 另见注释 6。

²⁶ 同上，pp. 313–314.

²⁷ Anne Sauvagnargues, *Artmachines: Deleuze, Guattari, Simondon*, trans. Suzanne Verderber,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36, 133.

性、未成文的法律，与空间的分配、在空间中的分配不可分离”。这正是此处所指的那种强盗辖域——带着“强盗式”的符码、法律与传统——即毒品文化的毒品辖域。这种辖域化会“跳跃”，标记着“从一个既存的环境到辖域的移动”（例如，向毒品辖域的移动），并使“国家”与“战争机器”彼此交叉、互相转化。²⁸

除了通过金融机构洗钱之外，贩毒集团也会通过产业资本的形式来洗钱（例如建筑业），以及通过娱乐资本：酒吧、夜总会、妓院等等（可参见博拉尼奥《2666》）。在这方面，各种类型的景观（spectacle），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包括那种创立性、维持性暴力的景观，都是根本性的。然而，对于作为一种被包裹与被居住形态的毒品文化来说，最重要的是文化工业，尤其是流行音乐。从这个角度看，毒品叙事民谣（narco-ballad）或科丽多（corrido）可以说为毒品积累提供了其轻快、重复、并具有辖域化作用的叠句，其节奏一次又一次地回响，在重塑传统八音节诗句形式的音景之中，开辟和关闭通道，同时为不断扩大的非正规经济中的听众提供了关于无法无天的可能性的故事，掺杂着爱情与背叛。科丽多已经成为一种霸权性的文化形式，不仅是毒品积累的叠句——一种包裹性、主体化、甚至如国家般“共鸣”的东西——也是它的档案，叙述着一种活着的传统，用巴利巴尔的话说，将“个人的存在投射进集体叙事的经纬”，情感性地建构并重构着一种“人民”。²⁹然而，与巴利

240

²⁸ Deleuze and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p. 312; Anne Sauvagnargues, *Art-machines*, p. 131.

²⁹ 与原始社会相反，德勒兹与加塔利写道：“国家社会作为共振装置（apparatuses of resonance）来运作”，“是一种共振的组织”；“因此，国家是私人权力与公共权力的共振室。”（*A Thousand Plateaus*, pp. 211, 536）关于毒品科丽多（narco-corrido），参见 Elijah Wald, *Narcocorrido: A Journey into the Music of Drugs, Guns and Guerrilla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ebooks, 2002. 关于日常生活与死亡的毒品文化，参见 Roberto Bolaño, *2666*, trans. Natasha Wimmer, New York: Farrar,

巴尔的重要论述不同的是，毒品辖域并不受民族国家及其作为法律-政治形式的边界所限制。它更像是一片跨国边境腹地，其存在理由恰恰就是非法跨境：一种捕捉了移民劳动与非法商品分配交换之横向重叠路线的毒品积累辖域。正如在电影《边境杀手》中所呈现的，后者（非法分配的通道）反过来折返并吞没前者（移民通道）：被贩毒集团抢占的跨境移民隧道又被中情局（CIA）的黑色行动重新功能化。

在此意义上，本节开头引用的《黑与蓝：海森堡之歌》（*Negro y Azul: The Ballad of Heisenberg*）中的一段歌词，恰如其分地描绘了这片移动的强盗辖域——边境腹地。以音乐录像带的风格表演的这首歌构成了第二季第七集片头前的序幕，也为该集命名为“黑与蓝”。它指涉如今已经“国际化”的海森堡神话——身着黑衣的他，以及他的蓝色产品——科丽多将它们包裹进一片毒品辖域中，这片领土从墨西哥米却肯州（米却肯家族贩毒集团的“老家”）一直延伸到美国的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所在之地，也即沃尔特·怀特（以及海森堡）的基地；歌曲幽默地坚持说，因为两者属于同一个空间结构，“新墨西哥”的这个名字现在“正合适”。正如德勒兹和加塔利对“叠句”的阐述一样，《黑与蓝》的节奏将两个环境、两个民族碎片组合进同一片辖域。最后，演唱

Straus & Giroux, 2008.（尤其第3部分）关于景观，参见 Valencia, *Gore Capitalism*. 关于“奠基性”与“维持性”暴力——以及它们在警治（police）中的结合，参见 Walter Benjamin, ‘Critique of Violence’, in *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trans. Edmund Jephcott and Kingsley Short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 pp. 132–154. 关于“想象着一种人民”（imagining a people），参见 Étienne Balibar, ‘The Nation Form: History and Ideology’, in Étienne Balibar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Race, Nation, Class: Ambiguous Identitie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1, pp. 86–106. 其他形式借用了科丽多作为艺术材料，尤其是墨西哥“毒品小说”（narco-novel）。例如：尤里·埃雷拉（Yuri Herrera）的《国王的领地》（*Kingdom Cons*, 2004），其背景设定在一种类似中世纪的毒品童话世界中。小说由一位科丽多作曲家叙述，他成为“国王宫廷”的成员，其功能是为国王提供一个将他叙述进历史的档案。

此民谣的组合“锡那罗亚兄弟”（Los Cuates de Sinaloa）的名字唤起了墨西哥最著名且最强大的锡那罗亚贩毒集团，其头目便是那位臭名昭著、如今成为囚徒名人的“矮子”古斯曼（*el chapo Guzmán*）。³⁰歌词最后的那段反复的副歌坚持说，该贩毒集团要求“尊重”（即服从其所管理的毒品积累逻辑），并且实际上海森堡“已经死了，只是还没有人告诉他”。当然，讽刺之处在于观众知道，当他被诊断出癌症时，他事实上已经被告知；正是这种认识激励并赋权了他；甚至多到让他觉得自己可以挑战（不尊重）贩毒集团。这就是那片致命的“他者”辖域，一种毒品式的 *nomos*，在危机来临时沃尔特坠入其中，如同一个黑洞投射到他的生命中，将他捕获。

回到沃尔特·怀特的存在主义危机、他的闹剧与他的悲剧：沃尔特想要创造历史，但是，当然是在他无从选择的情境中这样做的。偏偏在《绝命毒师》开始之初，他就在新墨西哥一处保留地上忙忙碌碌，那是原住民的土地。正如上文所暗示的，剧集确实记录了这一存在：印第安人出现在镜头中帮助沃尔特；另一个则在他所在的学校做清洁工。然而，这一充满历史的存在似乎只被以指示性的（*indexical*）方式呈现，仿佛只是故事展开的景观的一部分。然而，这种准指示性的存在要求被正视。尽管在叙事上没有被反思，正是在这片印第安土地上，在他借助弗林的“兄弟鸡”（*Pollos Hermanos*）短暂成为全球化的半工业生产者之前，他与前学生杰西驾驶房车“下厨”制造产品。³¹事实上，他还会反复回到那里，利用那片土地，以及其横切美国与墨西哥国家的“条纹化道路”

³⁰ 本篇论文开头的题辞引用自另一首同样以古斯曼为题的科丽多歌曲，其中一句歌词来自《山中之王》（*The Boss of the Mountains*）。

³¹ 由于当代形式的“新榨取主义”（*neo-extractivism*），美国原住民对其土地的权利再度遭到侵犯，而这在特朗普时期尤为明显。

242

的平滑、斜向路径——旧有的基础设施被重新功能化。最后，在他迫使昔日富有的朋友成为他的私人银行（并如我们所见，为他剩余的财富赋予未来）之前，他回到那里埋藏他所积累的现金（在逃离弗林的掌控后，他再也无法洗钱）。此时，随着汉克被杀、新纳粹帮派、沃尔特打手迈克的死亡，以及最终沃尔特自己的死亡，《绝命毒师》也接近尾声。印第安土地于是构成并支撑着《绝命毒师》的叙事，也构成其所描绘的毒品辖域，一方面作为文本的底层次位（subaltern limits），另一方面作为沃尔特家中那个黑洞的历史——毒品积累所呈现的症状，但又无法彻底耗尽——因为这片土地有其自己的历史，其历史可追溯到过去（“阿帕奇式拒绝”的过去），当原住民的战争机器，包括（但不限于）阿帕奇人，抵抗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入侵，抗拒其社会的毁灭。正如马里奥·特隆蒂的“工人拒绝”（worker refusal）概念——其威胁通过技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以消除资本对活劳动的依赖）——“阿帕奇式拒绝”同样是墨西哥与美国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一个构成要素，但也持续抵抗着。³²

243

在一部关于墨西哥北部奇瓦瓦州的最新史著中，路易斯·阿博伊特斯·阿圭拉尔（Luis Aboites Aguilar）描述了一片辖域，其沟通和商业的向量并非如现代铁路系统那样自南向北延伸（而今天的贩毒集团则袭击火车以抓“骡子”——劳工——来将毒品运到美国边境），而是在他的话中，“自西向东，从高地到低地……其中奇瓦瓦的人民——印第安人和非印第安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十分突出……西马德雷山脉是一条自史前时代至今一直在使用的地理走廊。”阿圭拉尔接着指出，之后的后殖民时期，

³² Mario Tronti, 'The Strategy of Refusal', *Italy: Autonomia, Post-Political Politics, Semiotexte*, vol. 3, no. 3 (August 2004), pp. 28–35.

一场针对游牧民的战争发生在一片与前一个世纪（殖民时期）完全不同的领土上。大约在 1830 年（即墨西哥独立之后）……来自美国的一大批虽分散但数量众多的人口开始进入许多印第安群体——无论是游牧的还是定居的——的土地……这些群体开始向南迁移（而 1848 年后，则穿越由《瓜达卢佩条约》确立的新墨西哥-美国边界）……许多战争集团（如阿帕奇人和科曼奇人——新的暴力情境中的主角）发现，在美国的扩张中存在一个市场，可以出售他们在墨西哥抢来的物品。换句话说，阿帕奇人以及科曼奇人——通过用他们在袭击墨西哥牧场和庄园时获得的牛群，交换到了马、酒精和武器。³³

我想在这里强调两个要点：首先，阿博伊特斯·阿圭拉尔指的是第二个漫长阿帕奇战争时期的开端——这场战争由奇瓦瓦州的富有地主特拉萨斯（Terrazas）家族领导，持续到 19 世纪 80 年代才结束，并最终导致阿帕奇与科曼奇人在墨西哥北部大部分地区的失败。其次，他同时强调了一种跨境交换关系，这种关系几乎可以被视为结构性的，它赋

³³ Luis Aboites Aguilar, *Chihuahua: historia breve*, Mexico City: El Colegio de México and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2011, p. 117.（译文与斜体为作者所作）。经典“毒品小说”《走私》（*Contrabando*）的作者维克多·雨果·拉斯孔·班达（Victor Hugo Rascón Banda）这样描写阿帕奇人在奇瓦瓦州乌鲁阿奇克的圣罗莎·德利马的存在：“我们这些年轻时生活在奇瓦瓦东北部的人，只要看到那被蓝色群山环绕的无尽绿色平原，就能感受到阿帕奇人的存在；他们告诉我们，那些野蛮人会在袭击从奇瓦瓦一座矿场前往另一座矿场的商队或独行旅客后，藏身于此……无论是前往北方之关（Paso del Norte）、图森、阿尔伯克基，还是洛杉矶圣母镇（Our Lady of Los Angeles）……阿帕奇民族最终被华金·特拉萨斯（Joaquín Terrazas）的枪手所消灭，据说他这样做是为了修建一条铁路——那条在 20 世纪初从南向北延伸至新边境的铁路……我们至今仍用一句话来描述危险、焦虑与恐惧，这绝非偶然：‘我们身在阿帕奇的领地（We’re in Apache territory）。’” Manuel Rojas, *Apaches ... fantasmas de la Sierra Madre*, Chihuahua: Instituto Chihuahuense de la Cultura, 2008, pp. 2, 4.

244 予我在此描绘的这一辖域一种跨越时间的持续性——一种“拒绝”的历史效应，它既向过去延伸，也向未来延展，同时又又在一种或多或少持续的跨文化变形过程中不断变化、转译，表现为形式吸纳与再功能化（re-functionalization）的复合体。

因此，阿帕奇拒绝的辖域的历史，就是其被过度编码与被捕获的历史；但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它也不断抵抗这种捕获，使得尽管已被吸纳，但德勒兹与加塔利所称的“战争机器”与“国家俘获”之间非同一性的幽灵性时刻仍然得以保留。³⁴举个例子：根据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卡茨（Friedrich Katz）、人类学家丹尼尔·纽金特（Daniel Nugent）以及文化批评家豪尔格·阿圭拉尔·莫拉（Jorge Aguilar Mora）的研究，漫长的阿帕奇与科曼奇战争改造了北墨西哥的农民-士兵（这些士兵最初在殖民地的 *presidio* 边境守备制度下被授予土地以进行防御）；他们逐渐掌握了敌人的知识（包括他们沿辖域横向路线“来去”的知识），并且——用阿圭拉尔·莫拉的话说——“变成了印第安人”。在这样的叙述

³⁴ 德勒兹与加塔利将他们的“战争机器”概念源自皮埃尔·克拉斯特尔（Pierre Clastres）关于原始社会的研究。克拉斯特尔将这些社会定义为无国家并反国家的社会。原始战争即“游牧战争机器”遂成为一种战略，最典型地体现在阿帕奇人身上，用以阻止不平等以及国家式权威中心的出现，两者相互关联。杰罗尼莫（Geronimo）可被视为“阿帕奇式拒绝”的伟大代表。他是一位坚决不停止对墨西哥人作战的战士。然而，他最终被自己的族人放弃，因为他的坚持可能导致专门的武士阶层的形成，并由此产生一个基于不平等的国家结构。德勒兹与加塔利批判克拉斯特尔关于原始社会的定义，指出它们并非完全免疫于国家形成（克拉斯特尔本人也暗示过这一点）；真正的问题是“程度”，即战争机器与原始社会转折并成为国家的具体时刻。“对黑洞的绝望”便是其后果之一。参见 Pierre Clastres, *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Zone Books, 1989, 尤其是 pp. 189–218. 因此，毒品积累（narco-accumulation）具有某种战争机器的维度，但它已经被某种原国家所过度编码并加以规训/吸纳，而该原国家执行着一种永久原始积累（permanent primitive accumulation）式的暴力逻辑，这种逻辑有时与墨西哥国家结盟，有时对抗，但大多是两者并行。

中，尽管阿帕奇在军事上被击败，其“战争机器”却被捕获并纳入最终成为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革命军队的强盗力量之中。而这支军队又曾周期性地“解放自身”，重新成为非法武装，越境突袭美国，并最终必须被新的后革命墨西哥国家所击败——后者将比利亚派（*villismo*）视为其野蛮的“他者”。³⁵ 245

概括而言，国家俘获以及对阿帕奇辖域再辖域化的历史序列包括：殖民与后殖民的征服，以及种族主义式的禁闭（例如在保留地中）；对原住民土地的私人占有；以及特别是在奇瓦瓦山区银矿开采的扩张、工业化与早期全球化。随着经济转移，这些印第安辖域的路线被废弃——也就是说，被**边缘地带化**（*hinterlanded*）——但它们又被重新占据，其路径也在强盗式跨境过度编码中被再功能化（如同比利亚派）。这片非法领土——最初由阿帕奇式拒绝所创造——在被纳入统治的同时，也被毒品资本主义积累重新创造，作为一种原国家形式，作为一种“实现方式”（*model of realization*），即资本的增殖方式，拥有其自身的压制性与意识形态装置。在《绝命毒师》中，这片辖域为沃尔特提供了他“烹制产品”的“土地”——一个他可以追求财富与自由企图的地方。之后，它穿过他的家，将其摧毁。

³⁵ 这一时期还有其他案例：例如无政府主义者弗洛雷斯·马贡兄弟与“摇摆者”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nternational Workers of the World*）的跨境联盟。关于比利亚派，参见 Friedrich Katz, *The Life and Times of Pancho Vill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Daniel Nugent, *Spent Cartridges of Revolution: An Anthropological History of Maniquipa*, Chihuahua,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及 Jorge Aguilar Mora, *Una muerte sencilla, justa, eterna: cultura y guerra durante la Revolución Mexicana*, Mexico City: Ediciones Era, 1990.

作者简介

埃里克·阿利耶（Éric Alliez）

巴黎第八大学哲学教授，同时任英国伦敦金斯顿大学现代欧洲哲学研究中心（CRMEP）研究员。其英文著作包括：《战争与资本》（与毛里齐奥·拉扎拉托合著，*Wars and Capital*, 2018）；《解构图像：论当代艺术》（5卷本，*Undoing the Image: Of Contemporary Art*, 2018-）；《脑-眼：现代绘画的新历史》（*The Brain-Eye: New Histories of Modern Painting*, 2017）；《行动的领域：艺术与政治》（与彼得·奥斯本共同编著，*Spheres of Action: Art and Politics*, 2013）；《加塔利效应》（与安德鲁·戈菲合编，*The Guattari Effect*, 2011）；《世界的署名：什么是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哲学？》（*The Signature of the World: What is Deleuze and Guattari's Philosophy?*, 2004）。

艾蒂安·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

毕业于巴黎索邦大学，后获荷兰奈梅亨大学博士学位。现为巴黎南泰尔大学哲学荣休教授，并任伦敦金斯顿大学现代欧洲哲学研究中心（CRMEP）当代欧洲哲学周年讲席教授。其近期英文译著包括：《同一性与差异：约翰·洛克与意识的发明》（*Identity and Difference: John Locke and the Invention of Consciousness*, 2013）；《暴力与文明》（*Violence and Civility*, 2015）；《公民主体：哲学人类学的基础》（*Citizen Subject: Foundations for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2017）；《世俗主义与世界主义》

(*Secularism and Cosmopolitanism*, 2018)。

蒂蒂·巴塔查里亚 (Tithi Bhattacharya)

美国普渡大学历史学教授、全球研究项目主任。著有《文化的哨兵：阶级、教育与孟加拉的殖民知识分子》(*Sentinels of Culture: Class, Education, and the Colonial Intellectual in Bengal*, 2005)，并主编《社会再生产理论：重新绘制阶级、重新聚焦压迫》(*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Remapping Class, Recentering Oppression*, 2017)。其与钦齐娅·阿鲁扎、南希·弗雷泽合著的新书《为 99%的人而作的女性主义：一份宣言》(*Feminism for the 99 per cent: A Manifesto*) 即将由 Verso 出版社出版。

鲍里斯·布登 (Boris Buden)

作家、文化批评家与翻译家，获柏林洪堡大学文化理论博士学位。20 世纪 90 年代曾任萨格勒布杂志《阿尔克津》(*Arkzin*) 编辑。其论文与文章涵盖哲学、政治、文化及艺术批评等领域，并将弗洛伊德的重要著作译介为克罗地亚语。近著包括：《过渡地带》(*Zone des Übergangs*, 2009)、《寻找欧洲》(*Findet Europa*, 2015)、《走向虚无的转型》(*Transition to Nowhere*, 2018)。现为维也纳欧洲进步文化政策研究所常驻研究员，居住并工作于柏林。

萨拉·法里斯 (Sara R. Farris)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社会学系高级讲师。其研究聚焦社会学理论中的东方主义根源——这一问题已在其关于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的首部专著中展开——以及性别、种族与社会再生产理论，尤其是这些理论在西欧移民女性分析中的应用。其最新著作为《以妇女权利之名：

女性民族主义的兴起》(*Name of Women's Rights: The Rise of Femonationalism*, 2017)。

约翰·克拉尼亚斯卡斯 (John Kraniauskas)

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教授。近期著作包括：《文化政治：积累、发展与文化批评》(*Políticas culturales: acumulación, desarrollo y crítica cultural*, 2015) 以及《资本主义及其不满：拉丁美洲文化中的权力与积累》(*Capit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Power and Accumulation in Latin-American Culture*, 2017)。其当前研究聚焦毒品文化与“毒品积累”、其资本逻辑及其辖域。

埃莱娜·路易莎·朗格 (Elena Louisa Lange)

苏黎世大学日本研究高级研究员兼讲师，2011 年获博士学位。现正撰写教授资格论文，研究对象为宇野弘藏“纯粹资本主义”理论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中的再阐释。她曾合编两部关于现代日本哲学的文集：《现代日本哲学的概念与图像》(*Begriff und Bild der modernen japanischen Philosophie*, 2014)；《亚洲与伊斯兰世界的哲学概念》(*Concepts of Philosophy in Asia and the Islamic World*, 2018)，并发表多篇有关《资本论》中的方法论、价值理论、货币理论及所谓“工业 4.0”的论文与章节。

毛里齐奥·拉扎拉托 (Maurizio Lazzarato)

独立社会学家与哲学家，现居巴黎。20 世纪 70 年代末为逃避政治迫害离开意大利。其英文译著包括：《符号与机器：资本主义与主体性的生产》(*Signs and Machines: Capitalism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2014);《马塞尔·杜尚与对劳动的拒绝》(*Marcel Duchamp and the Refusal of Work*, 2015);《债务式治理》(*Governing by Debt*, 2016);《战争与资本》(与埃里克·阿利耶合著, 2018)。《视频哲学：后福特主义中的时间知觉》(*Videophilosophy: The Perception of Time in Post-Fordism*)即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安东尼奥·奈格里 (Antonio Negri)

意大利哲学家与政治活动家。其著作包括：《马克思与福柯：论文集（第一卷）》(*Marx and Foucault: Essays, Volume 1*, 2017);《革命的时间》(*Time for Revolution*, 2003);《起义：建构性权力与现代国家》(*Insurgencies: Constituent Power and the Modern State*, 1993, 1999 年英译);《〈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1991);《颠覆的政治：二十一世纪宣言》(*A Manifesto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1989, 2005);《野蛮的反常：斯宾诺莎形而上学与政治的力量》(*The Savage Anomaly: The Power of Spinoza's Metaphysics and Politics*, 1981, 1991 年英译);以及与迈克尔·哈特合著的“帝国三部曲”：《帝国》(*Empire*, 2001)、《诸众》(*Multitude*, 2005)、《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2011), 及其续作《集会》(*Assembly*, 2017)。

彼得·奥斯本 (Peter Osborne)

伦敦金斯顿大学现代欧洲哲学教授，现代欧洲哲学研究中心 (CRMEP) 主任。曾任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 (2014)、斯德哥尔摩皇家艺术学院 (2015) 及耶鲁大学艺术学院 (2017) 访问讲席教授。1983 年至 2016 年间为英国期刊《激进哲学》(*Radical Philosophy*) 编辑。其著作包括：《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派》(*The Politics of Time: Modernity*

and Avant-Garde, 1995, 2011); 《文化理论中的哲学》(*Philosophy in Cultural Theory*, 2000); 《马克思》(*Marx*, 2005); 《无处抑或全在: 当代艺术哲学》(*Anywhere or Not at All: Philosophy of Contemporary Art*, 2013); 《后概念状态》(*The Postconceptual Condition*, 2018)。

埃里克-约翰·拉塞尔 (Eric-John Russell)

伦敦现代欧洲哲学研究中心 (CRMEP) 博士研究生。其博士论文考察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如何在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中以不同方式显现。

佳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教授, 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所创始成员之一。其著作包括: 《民族主义与想象》(*Nationalism and the Imagination*, 2015); 《全球化时代的审美教育》(*An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2013); 《另一些亚洲》(*Other Asias*, 2008); 《学科的死亡》(*Death of a Discipline*, 2003); 《后殖民理性批判: 走向消逝当下的历史》(*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1999); 《教学机器之外》(*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1993); 《在他者的世界中》(*In Other Worlds*, 1987)。

凯斯顿·萨瑟兰 (Keston Sutherland)

诗人、评论家, 著有《何去何从, 俄罗斯》(*Whither Russia*)、《献给 TL61P 的颂歌》(*The Odes to TL61P*)、《无穷的统计》(*The Stats on Infinity*)、《压力姿态》(*Stress Position*)、《热白安迪》(*Hot White Andy*)

等诗集及《昏钝》(*Stupefaction*)。现任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诗学教授。

索引

- Abdul Hamid II 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 158-160
- Aboites Aguilar, Luis 阿博伊特斯·阿圭拉尔, 路易斯 236、237
- Adorno, Theodor 阿多诺, 西奥多 7-8、205、222-223
- Agamben, Giorgio 阿甘本, 乔吉奥 54、56
- Aguilar Mora, Jorge 阿圭拉尔·莫拉, 豪尔格 238
- Althusser, Louis 阿尔都塞, 路易 6、8、38、147
-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139、174-175
- Arrighi, Giovanni 阿里吉, 乔万尼 219-221
- Arthur, Chris 阿瑟, 克里斯 24-25
- Badiou, Alain 巴迪欧, 阿兰 14、15
- Bailey, Samuel 贝利, 赛米尔 21
- Balibar, Étienne 巴利巴尔, 艾蒂安 7、13、181、233-234
- Bauer, Bruno 鲍威尔, 布鲁诺 104
- Becker, Gary 贝克尔, 加里 47、48
- Benjamin, Walter 本雅明, 瓦尔特 3
- Berman, Marshall 伯曼, 马歇尔 127-132、138-139、142
- Bolaño, Roberto 波拉尼奥, 罗贝托 228、233
- Bourdieu, Pierre 布尔迪厄, 皮埃尔 137
- Braudel, Fernand 布罗代尔, 费尔南 227
- Brentel, Helmut 布伦特尔, 赫尔穆特 34
- Breuer, Stefan 布罗伊尔, 施特凡 72
- Bukharin, Nikolai 布哈林, 尼古拉 171
- Camatte, Jacques 卡马特, 雅克 79-80
- Chandler, Nahum 钱德勒, 纳胡姆 156
- Dante Alighieri 但丁·阿利吉耶里 152
- Debord, Guy 德波, 居伊 55-63、69-73、76-83
- Deleuze, Gilles 德勒兹, 吉尔 185、189、190、212-213、229、232-234、238
- Derrida, Jacques 德里达, 雅克 157
- Descartes, René 笛卡尔, 勒内 154
- Destutt de Tracy, Antoine 德斯

- 蒂·德·特拉西, 安托万 21
Du Bois, W.E.B. 杜波依斯, 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 158、173
Dumit, Joe 杜米特, 乔 45
Echeverría, Bolívar 埃切维里亚, 玻利瓦尔 233
Engels, Frederick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53、106、197、200-201、202、210、212
Erdoğan, Recep Tayyip 埃尔多安, 雷杰普·塔伊普 161
Fanon, Frantz 法农, 弗朗茨 188
Fassin, Eric 法辛, 埃里克 117
Federici, Silvia 费代里奇, 西尔维娅 122
Fischbach, Franck 菲施巴赫, 弗朗克 96
Foucault, Michel 福柯, 米歇尔 181-182、184、185-188、192
Fowkes, Ben 福克斯, 本 135-138、205、211
Fraser, Nancy 弗雷泽, 南希 12
Gago, Verónica 加戈, 维罗妮卡 233
Galileo Galilei 伽利略·伽利雷 154
Giddens, Anthony 吉登斯, 安东尼 153
Gilligan, Vince 吉利根, 文斯 213、220
Gramsci, Antonio 葛兰西, 安东尼奥 95、169
Green, André 格林, 安德烈 203
Guattari, Félix 加塔利, 菲利克斯 185、189、190、212-213、229、232-234、238
Hafner, Kornelia 哈夫纳, 科妮莉亚 74
Harvey, David 哈维, 大卫 50、134-138、184
Haug, Frigga 豪格, 弗里加 172、178
Haug, Wolfgang Fritz 豪格, 沃尔夫冈·弗里茨 134-135、136-138、141
Havel, Václav 哈维尔, 瓦茨拉夫 146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黑格尔,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 8、13、17、29-30、39、85、147、167、189、192、203-205、206
Hobbes, Thomas 霍布斯, 托马斯 51
Hyndman, Henry Mayers 海德门, 亨利·迈尔斯 197-198、200、201、210、211
Hyppolite, Jean 伊波利特, 让 185、192
Itoh Makoto 伊藤诚 26
Jameson, Fredric 詹姆逊, 弗里德里克 181
Kant, Immanuel 康德, 伊曼努尔 5、13、15、17、132-133、224
Katz, Friedrich 卡茨, 弗里德里希 240

- Keats, John 济慈, 约翰 200
- Krahl, Hans-Jürgen 克拉尔, 汉斯-于尔根 74、88
- Lacan, Jacques 拉康, 雅克 54
- Land, Nick 兰德, 尼克 14
- Lapavistas, Costas 拉帕维查斯, 科斯塔斯 26
- Lefebvre, Henri 列斐伏尔, 亨利 84
- Lenin, Vladimir Ilich 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171-173
- London, Jack 伦敦, 杰克 152
- Lonzi, Carla 隆齐, 卡拉 189-190
- Lukács, Georg 卢卡奇, 格奥尔格 7、88
- Luxemburg, Rosa 卢森堡, 罗莎 172、180
- Malthus, Thomas 马尔萨斯, 托马斯 21
- Mao Zedong 毛泽东 173
- Marcuse, Herbert 马尔库塞, 赫伯特 51
- Maroni, Roberto 马罗尼, 罗伯托 124
- McCulloch, John Ramsay 麦克库洛赫, 约翰·雷姆赛 21
- Mill, James 密尔, 詹姆斯 21
- Morgenthau, Hans 摩根陶, 汉斯 129、130
- Močnik, Rastko 莫奇尼克, 拉斯特科 148-149、151、152
- Negri, Antonio 奈格里, 安东尼奥 11、13、182、204
- Nelson, Anitra 尼尔森, 阿尼特拉 75
- Nietzsche, Friedrich 尼采, 弗里德里希 185、191
- Nugent, Daniel 纽金特, 丹尼尔 240
- Obama, Barack 奥巴马, 贝拉克 219、220
- Ollman, Bertell 奥尔曼, 伯特尔 106-107
- Padmore, George 帕德莫尔, 乔治 171-172
- Plato 柏拉图 13、14、15、16、159、161、169
- Pohrt, Wolfgang 波特, 沃尔夫冈 74
- Polanyi, Karl 波兰尼, 卡尔 11、12、51
- Postone, Moishe 普殊同, 莫伊舍 170、171
- Puar, Jasbir 普尔, 贾斯比尔 117
- Rajan, Kaushik Sunder 拉詹, 考希克·孙达尔 46
- Rancière, Jacques 朗西埃, 雅克 13、192
- Rand, Ayn 兰德, 安 14
- Reichelt, Helmut 莱希尔特, 赫尔穆特 82
- Reinicke, Helmut 莱尼克, 赫尔穆特 74
- Reuten, Geert 罗伊滕, 吉尔特 25-26
- Ricardo, David 李嘉图, 大卫 21、23、37、105
- Rousseau, Jean-Jacques 卢梭, 让-

- 雅克 51
Roy, M.N. 罗易, 马纳本德拉·纳特 173
- Sala-i-Martín, Xavier 萨拉伊马丁, 哈维尔 170
Say, Jean-Baptiste 萨伊, 让-巴蒂斯特 21、46
Schumpeter, Joseph 熊彼特, 约瑟夫 90、183
Scott, Ridley 斯科特, 雷德利 229
Simon, David 西蒙, 大卫 220
Smith, Adam 斯密, 亚当 7、21、24、37
Spillers, Hortense 斯皮勒斯, 霍滕西 159
Spinoza, Baruch 斯宾诺莎, 巴鲁赫 88、96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斯皮瓦克, 佳亚特里·查克拉沃蒂 17
Stalin, Joseph 斯大林, 约瑟夫 143、172-173
Stilinović, Mladen 斯提利诺维奇, 姆拉登 140
- Thompson, E.P. 汤普森, 爱德华·帕尔默 10
Tronti, Mario 特隆蒂, 马里奥 8、13、188
Trotsky, Leon 托洛茨基, 列昂 152
Tönnies, Ferdinand 滕尼斯, 斐迪南 166
- Uno Kōzō 宇野弘藏 27
- Villa, Francisco ‘Pancho’ 比利亚, 弗朗西斯科·“潘乔” 241
Villeneuve, Denis 维伦纽瓦, 丹尼斯 229
Voltaire (François-Marie Arouet) 伏尔泰(弗朗索瓦-马里·阿鲁埃) 161
von Clausewitz, Karl 冯·克劳塞维茨, 卡尔 182、184
von Richthofen, Ferdinand 冯·里希托芬, 费迪南 174
- Wagner, Adolph 瓦格纳, 阿道夫 96
- Zasulich, Vera 查苏里奇, 维拉 171
Žižek, Slavoj 齐泽克, 斯拉沃伊 15

后记

很高兴在几个月的工作后把这本书交给读者，本书是一部论文集，原标题为 *Capitalism: concept, idea, image: Aspects of Marx's Capital today*，彼得·奥斯本、埃里克·阿利耶、埃里克·约翰·拉塞尔编，由英国伦敦金斯顿大学现代欧洲哲学研究中心于 2019 年出版。本书所辑录论文来源于 2017 年举办的“资本主义：概念与理念——马克思《资本论》问世 150 年：当代资本的哲学与政治”学术研讨会，涉及 13 位学者。

本书围绕三个关键词展开：概念（concept）、理念（idea）与图景（image），探讨当代资本主义如何被理解、经验与批判。奥斯本首先回到马克思《资本论》，将资本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而非市场机制或物的集合，强调通过价值、抽象劳动与剩余价值等概念，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加以批判性把握。与此同时，他指出，当资本关系趋于普遍化并被理解为社会整体的自我实现时，资本主义便从分析性的“概念”滑向哲学意义上的“理念”，无论在左翼的反乌托邦版本还是右翼的乌托邦版本中，这种理念化都会削弱历史中介与现实政治实践的可能性。

在此背景下，奥斯本引入“图像”作为第三种批判结构。图像通过情感力量在现实内部呈现不在场之物，既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经验与文化生产的重要机制，也为概念与现实之间保留了一种非形而上学的批判距离。因此，当激进政治不断从历史退回为理念之时，重新理解资本的概念工作及其在图像中的呈现方式，仍是连接理论批判与当代资本

主义现实的重要路径。

这三个关键词所大致对应的本书章节如下，“概念”对应第一至四章，以价值形式、抽象劳动、剩余价值为核心对象，把资本理解为社会关系的结构性概念，探讨资本如何通过商品化、剩余价值生产、总体吸纳从而构成社会总体；“理念”对应第五至九章，这一部分讨论的是：当资本主义被理解为一种总体性历史形态乃至“命运”时，概念如何滑向理念，以及这种转变的政治后果。“图像”则对应第十及十一章，探讨资本主义如何通过图像被感知、再现与情感化，以及图像在批判中的双重角色。

第一章围绕马克思的社会劳动价值理论，阐明其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断裂。朗格指出，马克思的独特贡献不在于提出一种新的“劳动价值论”，而在于将研究重心转向劳动的社会形式，即劳动为何以及如何资本主义条件下表现为价值，并以货币、资本、利润等形式出现。这一转向使《资本论》成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而非对市场或交换现象的描述。她强调，理解价值形式必须以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区分为前提。古典经济学及部分当代“价值形式理论”忽视了价值形式背后的社会劳动实体，从而陷入以形式解释形式的循环论证，反而重返资产阶级拜物教。与此相对，马克思的形式分析始终预设资本关系的总体性，把商品和简单流通视为资本主义自我表象的最抽象、也是最具意识形态性的层面。因此，价值形式分析的核心功能在于拜物教批判：通过揭示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形式，如何遮蔽并同时表现抽象社会劳动这一内容，说明价值并非由交换或市场构成，而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由此，社会劳动价值论被界定为一种方法论框架，用以揭示资本主义价值形式的真实社会基础及其颠倒的自我表征。

第二章中，巴利巴尔以“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问题框架，重新检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核心及其当代张力。他指出，马克思批判的决定性贡献在于将资本理解为一种历史性的社会关系与过程，但这一理论在剥削与积累的联结处存在认识论压力：价值形成与价值增殖、劳动与货币、生产与实现之间始终存在循环与不稳定性。为回应当代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条件下资本对生活世界的全面渗透，巴利巴尔提出“普遍剩余价值”的概念，强调增殖已不再仅依赖雇佣劳动，而是通过健康、教育、能力与生命本身的商品化来实现。通过“剩余健康”和“人力资本”等例子，巴利巴尔展示了资本主义如何将再生产领域纳入增殖逻辑，从而消解生产与再生产、工作与生活之间的传统界限。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总体吸纳”的概念，作为对马克思“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的延展，用以描述一种没有外部空间的资本主义：行动、能动性与生命本身均被纳入价值形式之中。章节最终将问题指向政治与伦理层面：持续商品化是否存在内在界限，以及这些界限是否可能构成新的对抗与抵抗形式。

第三章以德波《景观社会》为对象，系统重构其与马克思《资本论》之间被长期忽视的理论关联，尤其是与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和表象形式(*Erscheinungsformen*)分析的内在联系。拉塞尔指出，德波的“景观”并非简单替代“商品”的新概念，也仅源自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而是深植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价值如何必然以特定表象形式出现的逻辑之中。通过引入黑格尔的本质-表象辩证法，文章表明，价值并非隐藏在表象背后的实体，而是通过商品、货币和资本等表象形式构成其现实存在。文章的核心论证在于：景观应被理解为价值表象形式发展的历史结果，其关键中介不是商品本身，而是货币及其向资本的转化。作

者通过对货币的三重规定——作为价值的可视化、作为对使用价值的垄断力量、以及作为社会共同体（*Gemeinwesen*）——的分析，论证景观如何继承并扩展了货币拜物教，使社会统一性以“可见的表象”形式全面显现。由此，景观并非对现实的虚假遮蔽，而是对已经被价值形式结构化的社会现实的公开呈现和正当化。

第四章中，奈格里从工人斗争与诸众反抗的立场出发，重新界定“马克思式本体论”为一种以活劳动的主体化为核心的建构性本体论。他反对将本体论理解为关于“存在”的抽象哲学，而是强调本体论只能在阶级斗争与革命实践中获得意义：存在本身由劳动、协作与对抗不断生产出来。马克思式本体论因此不是静态的基础，而是由活劳动、诸众主体化及其物质冲突所构成的动态图景，这一图景深受斯宾诺莎与马基雅维利传统的影响。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奈格里指出资本的本体论结构已发生根本变异：生产从工厂扩展到整个社会，劳动日益呈现为认知性、情感性与协作性的社会劳动，“一般智力”成为生产的核心力量。与之相应，剥削不再主要通过工作时间的计量来实现，而是转化为对社会共同性与既存社会财富的金融化榨取。资本由组织生产的力量，转变为捕获和抽取社会生产成果的装置。在这一背景下，奈格里提出“诸众”作为新的阶级主体形象：由差异化的劳动单一性构成，通过社会协作不断重组自身。共同性在此呈现出双重规定——它既是资本榨取的对象，也是主体化与抵抗的潜在基础。抽象劳动的高度发展一方面强化了资本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孕育了脱离资本的现实可能性。

第五章中，蒂蒂·巴塔查里亚以社会再生产理论为框架，批判将《资本论》理解为“资本主义无差别性”理论的解读，尤其反对把性别与种族不平等视为资本主义的偶然附属物。她指出，《资本论》对抽象劳动

与价值形式的分析并非脱离历史与社会关系的形式主义，而是一种将理论抽象与历史生成统一起来的方法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据此强调：劳动力并非在资本-雇佣劳动关系内部被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而是通过性别化、种族化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家庭、社区与公共制度中被再生产。正是这些再生产过程，构成了资本主义总体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系统性地生产工人阶级内部的差异。由此，种族主义与性别压迫并非外在于资本积累逻辑，而是深嵌于劳动力价值形成之中的机制。本章最终提出，围绕维持生活、社会再生产与基本需求展开的斗争，既揭示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结构性上限，也构成了反资本主义政治的关键战场。真正的阶级团结必须同时在工作场所与社会再生产领域中被重新锻造。

第六章中，萨拉·法里斯结合社会再生产女性主义与马克思的劳动后备军理论，分析当代欧洲右翼民族主义为何以性别化、种族化的双重标准对待移民男性与女性。她指出，所谓“女性民族主义”——即右翼在反移民与伊斯兰恐惧症话语中挪用女性解放话语——并非单纯的意识形态虚伪，而具有明确的政治经济基础。与被视为“经济威胁”的移民男性不同，移民与种族化女性因集中于护理、家政等难以机械化和外包的社会再生产领域，构成了一支不可或缺的劳动“常备军”，而非可随时弃置的后备军。正是她们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维系社会再生产的关键作用，使其在排外叙事中被塑造成“需要拯救的受害者”。由此，法里斯表明，性别压迫、种族主义与阶级剥削并非彼此外在，而是深度嵌入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重组过程中的同一结构性机制。

第七章鲍里斯·布登以 1989 年东欧剧变为历史断点，重新审视《资本论》在当代的“身后生命”，并将问题聚焦于自由、语言与资本主义再封建化之间的内在关联。他指出，冷战结束后所谓“摆脱马克思而获

得自由”的叙事，实质上意味着马克思被从其历史实践与阶级语境中剥离，并被重新安置进一个以英语为通用语的全球知识精英公共领域。布登通过对《资本论》翻译史与当代英语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揭示英语霸权如何造成理论意义的系统性偏移，使马克思的批判逐渐经典化、去历史化，并丧失其介入现实斗争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民族语言的“再方言化”与知识生产的等级化同步发生，形成一种新中世纪式的文化与社会结构。在政治层面，布登将 1989 年的“民主革命”重释为一个三阶段过程：意识形态解放、政治权力转移，以及最终的资本主义复辟。抽象的“自由平等个体”形象在此成为关键的意识形态装置，它掩盖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中的暴力，并将阶级关系重新体验为个人化、道德化的人际关系。借助莫奇尼克的分析，布登将这一趋势概括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再封建化”：社会统治不再主要以商品拜物教的物化形式出现，而是以自由、身份与个人责任的名义被人性化、法权化。最终，布登警告说，《资本论》若仅作为一部被完美英译、由全球学术精英研读的经典文本而存在，其批判潜能将被彻底耗尽。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如何保存马克思，而在于如何使自由与批判重新学会在当代“新俗语”的黑暗之中发声。

第八章借助德里达提出的“命运偏移”(*destinerrance*)这一概念，重新界定《资本论》的历史存在方式与政治意义。所谓“命运偏移”，并非指文本在传播过程中偶然遭遇误读或偏离原意，而是指任何被设想为“送达”特定主体、承担特定历史使命的文本，都内在地包含无法消除的偏移与游移结构。《资本论》也不例外，它从一开始就无法保证其理论与政治诉求能够稳定地抵达预设的革命主体，而只能在不同历史语境中作为事件被不断重新激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章区分了

《资本论》的两种存在形态：作为事件，它在翻译、传播与再政治化的过程中持续发生意义转移；作为任务，它并不提供完成了的政治方案，而是将未竟的批判责任不断推向未来。命运偏移因此并非《资本论》的缺陷或失败，而是其理论生命得以延续的条件。通过这一视角，作者将《资本论》的当代意义理解为一种开放的、不可封闭的政治理论使命，而非一套能够被忠实继承或直接执行的封闭体系。

第九章在马克思与福柯的交叉视野中，重新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以战争为结构原则的社会形态，并据此重构主体化问题。作者指出，《资本论》并不仅分析剥削关系或经济规律，而是在其关于原始积累、工厂斗争和国家暴力的论述中揭示，暴力（*Gewalt*）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始终伴随着战争——无论是殖民战争、阶级战争，还是种族与性别战争。由此，资本主义并非从战争过渡到和平治理，而是通过治理术、法律与制度，以其他方式持续组织和管理战争。在此基础上，作者引入福柯关于权力、战争与主体化的分析，区分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场景：一是治理术内部的权力关系，其中主体被建构为“被治理者”，其自由与抵抗被纳入制度化框架；二是战略对抗的场景，在这里，主体并非既定身份，而是在断裂、冲突与战争中生成。作者据此批判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以辩证法为核心的主体理论，认为其倾向于将对抗同质化、目的论化，从而遮蔽了战争与差异的不可扬弃性。通过回溯 1968 年运动及其后果，本章指出，当代政治的困境正在于：主体性生产、自我解放与伦理美学转向，往往与反资本主义的战略对抗脱钩，从而被新自由主义重新吸纳。作者因此强调，若不重新将战争视为资本主义的构成性维度，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主体化与政治组织问题，就无法突破治理术所设定的自由与抵抗的限度。第九章由此将“主体化-战争

-资本”确立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斗争形式的关键分析框架。

第十章通过恩格斯对海德门“错误翻译马克思”的批判，提出《资本论》具有内在而不可剥离的诗学维度。萨瑟兰指出，《资本论》的诗性并非修辞装饰或情感渲染，而是资本批判得以成立的条件：资本对生命的掠夺与瘫痪，无法通过平滑、中性的语言被准确表达。正因如此，马克思的概念分析必然伴随着刺耳的新造词、暴力的隐喻与不和谐的语言结构，使批判在逻辑推进的同时制造思想的阻滞与感受上的痛苦。任何试图通过温和化语言或“可读性”来消解这种不适的翻译与阐释，都会中和《资本论》的真理内容，将批判转化为反诗性的理论形式。

第十一章以《绝命毒师》为分析对象，将非法毒品经济理解为当代金融化资本主义的一个极端而清晰的显影场。作者借助马克思的资本一般公式（ $G-W-G'$ ）与阿里吉关于金融化（ $G-G'$ ）的分析，揭示毒品积累如何在暴力生产、洗钱与金融简化中完成“货币的回流”，并将家庭、生命与主体性一并吞噬。在此基础上，本章进一步引入德勒兹加塔利的“辖域化”理论，指出《绝命毒师》所呈现的并非单纯的犯罪叙事，而是一种跨越美墨边境的毒品辖域：一种以非法流通、文化叠句（如毒品民谣）和金融暴力为核心的生活方式。通过“阿帕奇式拒绝”这一历史幽灵，作者揭示了该剧无法完全反思却不断显现的殖民-后殖民底层结构，从而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地下腹地并非例外，而是其总体逻辑的组成部分。

上述概括当然难以涵盖章节的全部内容，还敬请读者自行阅览。本书的校对排版由 Assean 负责，封面由高正阳提供，第一至四、七至八章由 Assean 翻译，第五章由 lousee 翻译，第六及第九章由 Aloysius 翻译，第十和十一章由 Eros 翻译，我在此衷心感谢封酒编译组成员们的

辛勤付出，也欢迎读者们留下您对本书宝贵的意见。

“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末日更容易。”詹姆逊的这句判断，在当下或许正悄然发生逆转。不断加剧的危机已经清楚表明，资本主义并非不可终结的永恒秩序；它的历史性、脆弱性乃至其自我毁灭的倾向，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显现出来。这一点，几乎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直觉。然而，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看见了终点，而在于我们是否仍被一种无力感所俘获——在清醒中旁观，在认知中迟疑，任由世界一步步滑向灾难的边缘。

21 世纪的四分之一已然过去。对于在危机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而言，这不再只是理论判断或历史评价的问题，而是一种无法回避的责任。改变并不会自动到来，批判本身也不能替代行动；但没有直面现实的艰难思考，一切行动都注定是盲目的。正如马克思所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今天，这句话或许同样适用于我们理解世界、认识世界，并试图改变世界的努力本身。

封酒编译组

2025 年 12 月 30 日



Éric	Alliez
Étienne	Balibar
Tithi	Bhattacharya
Boris	Buden
Sara R.	Farris
John	Kraniauskas
Elena Louisa	Lange
Maurizio	Lazzarato
Antonio	Negri
Peter	Osborne
Eric-John	Russell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Keston	Sutherland

CRMEP BOOKS